



● 一个传奇人物的
生活纪实

毛泽东逸闻录

● 一个传奇人物的
生活纪实

.13

法律出版社

●一个传奇人物的生活纪实●

毛泽东逸闻录

法律出版社

毛泽东逸闻录
树荣 文竹 陈城等编

法律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市111信箱)

合肥市杏花印刷厂印刷

字数: 247,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

印数: 2—300,00

1989年1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2次印刷

责任编辑: 塘江 责任校对: 苏茸
装帧设计: 王和平 版式设计: 丁树荣

ISBN7—5036—0473—5/D·359

定价: 4.98元

(限国内发行)

内 容 提 要

毛泽东的名字响若春雷，他的丰功伟绩已载入史册，将万古流芳。可是，长期以来，有关他的生活纪录，却很少报道，因此，人们渴望对他有更多的了解。为此，我们选编了几十篇比较真实、可靠的佳作，供广大读者学习。从中可以了解毛泽东一生中各个时期的一些逸闻趣事。他的理想与奋斗，爱情与家庭，挫折与成功，悲伤与欢笑……这些逸闻，虽然不那样全面系统，但是一个个片断的充满生活情趣的故事，却如云中之龙，往往更见神韵。这些逸闻，不仅能使广大读者在趣味盎然的阅读中产生新颖感受，得到有益启迪，满足求知欲望，同时还能研究毛泽东的读者提供比较丰富、翔实的珍贵史料。

这确实是一本难得的、具有收藏价值的好书。

目 录

从小就有反抗意识.....	(1)
——毛泽东的自白	
毛泽东剪了十几个人的辫子.....	(9)
毛泽东的鞋子被贼偷去.....	(20)
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经历.....	(24)
毛泽东的岳父.....	(29)
毛泽东为什么没去法国.....	(31)
刘仁静追忆毛泽东.....	(35)
毛泽东与霞姐.....	(37)
一个神秘的住所.....	(44)
毛泽东曾在国民党中央任职.....	(48)
毛泽东的女儿为啥叫李敏.....	(54)
毛泽东爱上了贺子珍.....	(57)
相爱·离婚·六个孩子.....	(61)
毛泽东为何没参加南昌起义.....	(68)
一封伪造的阴谋信.....	(71)
毛泽东脱险记.....	(73)
毛泽东被软禁于都的传说.....	(75)
周恩来一度取代毛泽东.....	(77)
毛泽东的两个弟弟.....	(79)
毛泽东面对两个土匪.....	(81)
担架上的“阴谋”.....	(86)

失传的资料	(90)
向何处去	(99)
毛泽东说林彪：“你还是个娃娃”	(103)
两个互不信任的人	(107)
危急时刻	(112)
《红辣椒》，毛泽东最爱唱的一首歌	(123)
致蒋介石	(133)
毛泽东给法庭的亲笔信	(136)
她远离了毛泽东，另一个她又亲近毛泽东	(140)
毛泽东为何爱玫瑰	(149)
为了女儿，贺子珍被送进疯人院	(151)
娇娇看妈妈	(153)
重庆谈判详细内幕	(159)
戴季陶宴请毛泽东	(166)
毛泽东爱跳舞	(168)
毛主席特别高兴的一天	(178)
毛泽东与护士小刘	(182)
白胖子变成了黑胖子	(183)
米高扬秘密会晤毛泽东	(185)
毛泽东获奖	(191)
毛泽东一语醒刘斐	(192)
“我毛泽东独龙能下雨吗？”	(193)
“为有牺牲多壮志”	(194)
毛泽东和他的干女儿	(197)
毛泽东和他的两个儿媳妇	(206)
毛岸英和毛岸青的岳母娜飞	(207)
一九五三年的一桩公案	(209)

授元帅衔的前台与幕后·····	(212)
和毛泽东生活的日子·····	(214)
不听话的病人·····	(223)
呵，毛泽东的女儿也在挨饿·····	(232)
毛泽东和邓小平·····	(237)
毛泽东与彭德怀庐山之争·····	(241)
《海瑞罢官》受批判的内幕·····	(252)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几次交锋·····	(259)
毛泽东同刘少奇的最后一次会见·····	(266)
一个未解开的谜·····	(275)
“七·二〇”事件揭秘·····	(278)
轰炸与陷害·····	(293)
毛泽东保老帅·····	(297)
她与毛泽东没有共同语言·····	(300)
一条迟迟披露的内幕新闻·····	(304)
毛泽东一半是虎，一半是猴·····	(307)
尼克松谈毛泽东和蒋介石·····	(311)
毛泽东的一桩憾事·····	(313)
毛泽东性格之谜·····	(320)
毛泽东喝药论英雄·····	(324)
病中吟与村妇泪·····	(336)
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	(342)

从小就有反抗意识

——毛泽东的自白

我于一八九三年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我父亲叫毛顺生，我母亲在娘家的名子叫文其美。

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只好去当兵。他当了好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积攒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地。

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六十担谷。一家五口共吃三十五担——即每人七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二十五担剩余。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七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那时候我家每年可以收八十四担谷。

当我十岁家中只有十五亩地的时候，一家五口人是：我父亲、母亲、祖父、弟弟和我。我们又买了七亩地以后，祖父去世了，但又添了一个弟弟。可是我们每年仍然有四十九担谷的剩余，我的父亲就靠此渐渐富裕起来。

我父亲还是一个中农的时候，就开始做贩运谷子的生意，赚了一些钱。他成了“富”农之后，就用大部分时间做这个生意了。他雇了一个长工，还叫孩子们和妻子都到地里干活。我六岁就开始干农活了。我父亲做生意并没有开铺子，他只是从贫苦农民那里把谷子买下来，然后运到城里卖给商人，在那里得到个高一些的价钱。在冬天碾谷的时候，他便

多雇一个短工干活。那时我家就有七口人吃饭，我家吃得很俭省，不过总是够吃的。

我八岁那年开始在当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他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十岁的时候曾经逃过学。但我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一个山谷里。乱跑了三天之后，终于被我家里的人找到了。我这才知道我只是来回兜了几个圈子，走了这么久，离家才八里路。

可是，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

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帐。他要我学珠算。既然我父亲坚持，我就在晚上记起帐来。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帐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对雇工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可是从来没有肉。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

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

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

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者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但我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同我父亲辩论的有效的方法，那就是用他自己的办法，引经据典地来驳他。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经书上老者必须仁慈的话来回敬。他指责我懒惰，我就反驳说，年纪大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干活，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干活。我还宣称：等我到他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

老头儿继续“聚财”，这笔财产在那个村子已被认为是笔大财了。他不再买进土地，但他典进了许多别人的地。他的资本增加到了两三元。

我的不满增加了。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在不断地发展着。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在他们面前争论了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回想起来，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是自招失败。我学会了恨他，我们对他建立了真正的统一战线。同

时、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帐，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

我父亲读过两年书，认识一些字，足够记帐之用。我母亲完全不识字。两人都是农民家庭出身。我是家里的“读书人”。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我十三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堂，开始整天在地里帮长工干活，白天做一个全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帐。尽管如此，我还是继续读书，如饥似渴地阅读凡是我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经书除外。这使我父亲很生气，他希望我熟读经书，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时，由于对方在法庭上很恰当地引经据典，使他败诉之后，更是这样了。我常常在深夜里把我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我读一些象经书那样实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

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

我父亲毛顺生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亲信佛却很虔诚。地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九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骂我们，在他进攻之下，我们只好退让，另想办法。但他总是不愿意和神佛打交道。

可是，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了影响，我自己也越来越怀疑了。我母亲开始为我担忧，责备我不热心拜佛，可是我父亲却不置可否。后来，有一天，他出去收帐，路上遇到一只老虎。老虎猝然遇见人，慌忙逃跑了。可是我父亲却感到更加吃惊，对于他这次脱险的奇迹，他后来想得很多。他开始觉得，是不是得罪了神佛。从此，他开始比较敬佛，有时也烧些香。然而，对于我越来越不信佛，老头儿却不加干涉。他只有处境不顺畅的时候，才求神拜佛。

《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争吵，最后我从家里跑了。我到_レ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以后我又在一位老先生那里读了更多的经书，也读了许多时论和一些新书。

这时，湖南发生了一件事情，影响了我的一生。在我读书的那个小学堂外边，我们学生看到许多豆商从长沙回来。

我们问他们为什么都离开长沙。他们告诉我们城里闹了大乱子。

那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长沙有成千上万的人饿饭。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济。但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饭吃？城里有的是。我就总是吃得饱饱的。”抚台的答复一传到人们的耳朵里，大家都非常愤怒。他们举行了群众大会，并且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他们攻打清朝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府标志的旗杆，赶走了抚台。这以后，一个姓庄的布政使骑马出来，晓谕百姓，说官府要采取措施帮助他们。这个姓庄的说话显然是有诚意的，可是皇他不喜欢他，责他同“暴民”勾结。结果他被革职，接着来了一个新抚台，马上下令逮捕闹事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斩首示众，他们的头挂在旗杆上，作为对今后的“叛逆”的警告。

这件事在我们学堂里讨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数学生都同情“造反的”，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他们并不懂得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听的事而感兴趣。我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象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

不久以后，在韶山，秘密会社哥老会里的人同本地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这个地主到衙门里去控告他们。因为他有钱有势，所以很容易胜诉。哥老会里的人败诉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屈服，他们起来反抗地主和政府，撤到本地一个叫做浏山的山里，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山寨。官府派兵去攻打他们，那个地主散布谣言说，哥老会举起义旗的时候，曾经杀死一个小孩祭旗。起义的领袖，是一个叫做彭铁匠的人。最后他们

被镇压下去了，彭铁匠被逼逃走，后来终于被捕斩首。但是在学生眼里，他是一个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这次起义。

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乡里发生了粮荒。穷人要求富户接济，他们开始了一个叫做“吃大户”的运动。我父亲是一个米商，尽管本乡缺粮，他仍然运出大批粮食到城里去。其中有一批被穷苦的村民扣留了，他怒不可遏。我不同情他，可是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也不对。

这时还有一件事对我有影响，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学来了一个“激进派”教师。说他是“激进派”，是因为他又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大家对他议论纷纷。我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

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意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父亲决定送我到湘潭一家同他有来往的米店去当学徒。起初我并不反对，觉得这也许是有意思的事。可是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有一个非常新式的学堂，于是决心不顾父亲反对，要到那里去就学。学堂设在我母亲娘家住的湘乡县。我的一个表兄就在那里上学，他向我谈了这个新学堂的情况和“新法教育”的改革。那里不那么注重经书，西方“新学”教得比较多。教学方法也是很“激进”的。

我随表兄到那所学堂去报了名。我说我是湘乡人，以为这所学堂只收湘乡人。后来我发现这所学堂招收各地学生，

我就改用湘潭的真籍贯了。我缴纳一千四百个铜元，作为五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我父亲最后也同意我进这所学校了，因为朋友们对他说，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这是我第一次到离家五十里以外的地方去。那时我十六岁。

（摘自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毛泽东剪了十几个人的辫子

“我开始向往到长沙去。”毛泽东继续述说着他年青时的经历：“长沙是一个大城市，是湖南省的省会，离我家一百二十里。听说这个城市很大，有许许多多的人和不少学堂，抚台衙门也在那里。总之，那是个很繁华的地方。那时我非常想到那里去，进一所专为湘乡人办的中学。那年冬天，我请我的一位高小教员介绍我去，他同意了。我步行到长沙去，极其兴奋，一面又担心不让我入学，我几乎不敢希望真能进这所有名的学堂。出乎意料，我居然没有遇到困难就入学了。但是政局迅速发生变化，我后来在那里只呆了半年。

“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份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这个时候，我也听说了孙中山这个人 and 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动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由于修筑川汉铁路而兴起了反对外国投资的运动。立宪成为广大人民的要求。皇帝的答复只是下旨设立一个资政

院。在我的学堂里，同学们越来越激动。为了发泄排满情绪，他们反对留辫子。我的一个朋友和我剪去了我们的辫子，但是，其他一些相约剪辫子的人，后来却不守信用。于是我的朋友和我就出其不意强剪他们的辫子，总共有十几个人成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品。就这样，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我从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发展到主张全部取消辫子了。政治思想是怎样能够改变一个人的观点呵！

“在剪辫子事件上，我和一个在法政学堂的朋友发生了争论，双方就这个问题提出了相反的理论。这位法政学生引经据典来论证自己的看法，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但是，我自己和反对蓄辫子的人，站在反清的政治立场上，提出了一种相反的理论，驳得他哑口无言。

“黎元洪领导的武汉起义发生以后，湖南宣布了戒严令。政局迅速改观。有一天，一个革命党人得到校长的许可，到中学来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当场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廷，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会上人人聚精会神地听着。那个革命的演说家是黎元洪属下的一个官员，他向兴奋的学生演说的时候，会场里面鸦雀无声。

“听了这次演讲以后四五天，我决心参加黎元洪的革命军。我决定同其他几位朋友到汉口去，我们从同学那里筹到了一些钱。听说汉口的街道很湿，必需穿雨鞋，于是我到一个驻扎在城外的军队里的朋友那里去借鞋。我被防守的卫兵拦住了。那个地方显得非常紧张。士兵们第一次领到子弹，他们正涌到街上去。

“起义军当时正沿着粤汉路逼近长沙，战斗已经打响。在长沙城外已经打了一个大仗。同时，城里面也发生起义，

各个城门都被中国工人攻占了。我穿过一个城门，回到城里。进城后我就站在一个高地上观战，最后终于看到衙门上升起了“汉旗”。那是一面白色的旗子，上面写了个‘汉’字。我回到学校，发现它已经由军队守卫了。

“第二天成立了都督府，哥老会的两名首领焦达峰和陈作新被推举为都督和副都督。新政府设在省咨议局的旧址，议长谭延闿被免职了。省咨议局本身也被撤销。革命党人所发现的清廷文件中，有几份请求召开国会的请愿书。原稿是由现在的苏维埃政府教育人民委员徐特立用血书写的。当时他切断指尖，表示诚意和决心。他的请愿书是这样开头的：

‘为吁请召开国会，予（为本省赴京代表）断指以送。’

“新都督和副都督在职不久。他们不是坏人，而且有革命要求。但他们很穷，代表被压迫者的利益。地主和商人都对他们不满。过了没有几天，我去拜访一个朋友的时候，看见他们已经陈尸街头了。原来代表湖南地主和军阀的谭延闿组织了一次叛乱，推翻了他们。

“这时，有许多学生投军。一支学生军已经组织起来，在这些学生里面有唐生智。我不喜欢这支学生军，我认为它的基础太复杂了。我决定参加正规军，为完成革命尽力。那时清帝还没有退位，还要经过一个时期的斗争。

“我的军饷是每月七元——不过，这比我现在在红军所得的要多了。在这七元之中，我每月伙食用去两元。我还得花钱买水。士兵用水必须到城外去挑，但是我是一个学生，不屑挑水，只好向挑夫买水。剩下的饷银，我都用在订报纸上，贪读不厌。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里面讨论到社会主义，我就是从那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其实那只是

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我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表示同意。

“在我那个班里，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非常喜欢他们。其余的都是一些庸碌之辈，有一个还是流氓。我另外又劝说两个学生投了军，我同排长和大多数士兵也交上了朋友。因为我能写字，有些书本知识，他们敬佩我的‘大学问’。我可以帮助他们写信或诸如此类的事情。

“革命这时还没有定局。清朝还没有完全放弃政权，而国民党内部却发生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湖南有人说战事不可避免要再起。有好几支军队组织起来反对清朝，反对袁世凯。湘军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当湘军准备采取行动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和议，预定的战争取消了，南北‘统一’了，南京政府解散了。我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军队，决定回到我的书本上去。我一共当了半年兵。

“我开始注意报纸上的广告。那时候，办了许多学校，通过报纸广告招徕新生。我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来判断学校的优劣，对自己究竟想做什么也没有明确主见。一则警察学堂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于是去报名投考。但在考试以前，我看到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的广告，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还答应给些津贴。这则广告很吸引人，鼓舞人。它说制造肥皂对社会大有好处，可以富国利民。我改变了投考警校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我在这里也交了一元钱的报名费。

“这时候，我有一个朋友成了法政学生，他劝我进他的学校。我也读到了这所法政学堂的娓娓动听的广告，它许下种种好听的诺言，答应在三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并且保

证期满之后马上可以当官。我的那位朋友不断向我称赞这个学校，最后我写信给家里，把广告上所答应的一切诺言重述一遍，要求给我寄学费来。我把将来当法官的光明图景向他们描述了一番。我向法政学堂交了一元钱的报名费，等候父母的回信。

“命运再一次插手进来，这一次采取的形式是一则商业学堂的广告。另外一位朋友劝告我，说国家现在处于经济战争之中，当前最需要的人材是能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议论打动了，我又向这个商业中学付了一元钱的报名费。我真的参加考试而且被录取了。可是我还继续注意广告。有一天我读到一则把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说得天花乱坠的广告。它是政府办的，设有很多课程，而且我听说它的教员都是非常有才能的人。我决定最好能在那里学成一个商业专家，就付了一块钱报名，然后把我的决定写信告诉父亲。他听了很高兴。我父亲很容易理解善于经商的好处。我进了这个学校，但是只住了一个月。

“我发现，在这所新学校上学的困难是大多数课程都用英语讲授。我和其他学生一样，不懂得什么英语；说实在的，除了字母就不知道什么了。另外一个困难是学校设有英语教师。这种情况使我感到很讨厌，所以到月底就退学了，继续留心报上的广告。

“我下一个尝试上学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一块钱报了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这个学校很大，有许多学生，毕业也不少。那里的一个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很愿意接近我。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其中有乾隆的上谕和御批。

“大致就在这个时候，长沙的一个政府火药库发生爆

炸，引起大火。我们学生却感到很有趣。成吨的枪弹炮弹爆炸着，火药燃烧成一片烈焰，比起放爆竹来要好看得多了。过了一个月左右，谭延闿被袁世凯赶走，袁现在控制了民国的政治机器。汤寿铭接替了谭延闿，开始为袁筹备登基。

“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我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还不如自学更好。我在校六个月就退学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我非常认真地执行，持之以恒。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只停下来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饭。我天天在图书馆读到关门才出来。

“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我那时住在湘乡会馆里。许多士兵也住在那里，都是‘退伍’或者被遣散的湘乡人。他们没有工作，也没有什么钱。住在会馆里的学生和士兵总是吵架。一天晚上，他们之间的这种敌对爆发成为武斗了。士兵袭击学生，要想杀死他们。我躲到厕所里去，直到殴斗结束以后才出来。

“那时候我没有钱，家里不肯供养我，除非我进学校读书。由于我在会馆里住不下去了，我开始寻找新的住处。同时我也在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我差不多已经作出结论，我最适合于教书。我又开始留意广告了。这时候湖南师

范学校的一则动听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我津津有味地读着它的优点：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有两个朋友也鼓励我投考。他们需要我帮助他们准备入学考试的作文。我把我的打算写信告诉家里，结果得到他们的同意。我替那两位朋友写了作文，为自己也写了一篇。三个人都录取了——因此，我实际上是考取了三次。那时候我并不认为我为朋友代笔是不道德的行为，这不过是朋友之间的义气。

“我在师范学校读了五年书，抵住了后来一切广告的引诱。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这所新学校有许多校规，我赞成的极少。例如，我反对把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我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我没有好好地去学，所以大多数这些课程我得到的分数很差。我尤其讨厌一门静物写生必修课。我认为这门课极端无聊。我往往想出最简单的东西来画，草草画完就离开教室。记得有一次我画了一条直线，上面加上了一个半圆。表示‘半壁见海日’。又有一次，在图画考试时，我画了一个椭圆形就算了事，说这是蛋。结果图画课得了四十分，不及格。幸亏我的社会科学各课得到的分数都很高，这样就扯平了其他课程的坏分数。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起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

“一位姓唐的教员常常给我一些旧《民报》看，我读得很有兴趣。从那上面我知道了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有一天我读到一份《民报》，上面刊载两个中国学生旅行全国的故事，他们一直走到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我想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所以我想应当先在湖南旅行一试。

“第二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五个县。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与我同行。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和我一同旅行的萧瑜这个家伙，后来在南京在易培基手下当国民党的官。易培基原来是湖南师范的校长，后来成了南京的大官，他给萧瑜谋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管理的职位。萧瑜盗卖了博物院里一些最珍贵的文物，于一九三四年卷款潜逃。

“我这时感到心情舒畅，需要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名要结交能吃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

党，接着又转向了。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但是我逐渐地团结了一批学生在我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核心，后来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地。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对女人不感兴趣。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没有想到她。在这个年龄的青年的生活中，议论女性的魅力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非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青年的家里，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当着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谈买肉的事，最后吩咐他去买一块。我生气了，以后再不同那个家伙见面了。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我们也热心于体育锻炼。在寒假当中，我们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绕城，渡江过河。遇见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高声叫嚷，说这是叫做‘风浴’的体育新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我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十一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体格锻炼’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我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中，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

中，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

“我同住在其他大小城市的许多学生和朋友建立了广泛的通信关系。我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比较严密的组织。一九一七年，我和其他几位朋友一道，成立新民学会。学会有七、八十名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参加过新民学会的较为知名的共产党人：罗迈，现任党的组织委员会书记；夏曦，现在在二方面军；何叔衡，中央苏区的最高法院法官，后来被蒋介石杀害；郭亮，有名的工会组织者，一九三〇年被何建杀害；萧子暉，作家，现在在苏联；蔡和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七年被蒋介石杀害；易礼容，后来当了中央委员，接着‘转向’国民党，成了一个工会的组织者；萧铮，党的一个著名领导人，是在最早发起建党的文件上签名的六人之一，不久以前病逝。新民学会的大多数会员，在一九二七年反革命中都被杀害了。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湖北成立了另外一个团体，叫做互助社，同新民学会性质相近。它的许多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人。其中有它的领袖恽代英，在反革命政变中被蒋介石杀害。现在的红军大学校长林彪也是社员。还有张浩，现在负责白军工作。北京也有一个团体叫做辅社，它的一些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员。在中国其他地方，主要是上海、杭州汉口、天津，一些激进的团体由富有战斗精神的青年组织起来，开始对中国政治产生影响。

“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

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我在一九一二年进师范学校，一九一八年毕业。”

（选自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毛泽东的鞋子被贼偷去

在另一个晚上，毛泽东盘膝而坐，背靠在两只公文箱上。他点燃了一支纸烟，接起前一天晚上中断的故事的线索说下去：

“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用了一百六十元钱——里面包括我许多次的报名费；在这笔钱里，想必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一元。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七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母亲去世了，这样我更不想回家了。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平去，当时叫北京。当时湖南有许多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法国在世界大战中曾经用这种办法招募中国青年为它工作。这些学生打算出国前先去北京学法文。我协助组织这个运动，在一批批出国的人里面有许多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其中大多数后来成了著名的激进分子。徐特立也受到这个运动的影响，他放弃了湖南师范学校的教席到法国去，这时他已经四十多岁了。不过他到一九二七年才参加共产党。

“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

国会更有益处。那些决定去法国的学生从现在任中法大学校长的李石曾那里学习法文，我却没有这样做。我另有打算。

北京对我来说开销太大。我是向朋友们借钱来首都的，来了以后，非马上就找工作不可。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他就是李大钊，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当大官了；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之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党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所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强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还遇到了张国焘——后来的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康白情，他后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加入三K党〔111〕；段锡朋，现在在南京当教育部次长。也是在这里，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以前的伦理教员杨昌济的女儿。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

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找寻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我自己在北京生活条件很可怜，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采、生动有趣的补偿。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从一九一九年初，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前往上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不知道到后怎样才能再向前走。可是，象中国俗语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一位同学从北京孔德学校弄到了一些钱，他借了十元给我，使我能够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那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有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在这次旅行中，我登上了山东的神岳泰山，冯玉

样将军曾在这里隐居，并且写了一些爱国的对联。

“可是我到达浦口的时候又不名一文了，我也没有车票。没有人可以借钱给我，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离开浦口。可是最糟糕的是，我仅有的一双鞋子给贼偷去了。哎哟！怎么办呢？又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又碰到了好运气。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他借钱给我买了一双鞋，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的车票。就这样，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游程——随时留神着我的新鞋。到了上海，我了解到已经募集了大批款项，协助把学生送到法国去，还拨出一些钱帮助我回湖南。我送朋友们上轮船以后，就起程回长沙了。”

（摘自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经历

毛泽东原来就想参军，既然革命已经发展到长沙，他就不必去武汉，在湖南就能够入伍。他参军后，成了赵恒惕上校的部属，最高上司是谭延闿。谭在消灭了对手后已经大权在握，成为湖南最高军政领导人。这两人当时谁都不可能注意到毛泽东这个十八岁的列兵。不过后来他们对他很熟悉了。赵恒惕成了毛泽东的对手，而谭延闿，说来也怪，在他算作国民党“左派”时，成了毛的盟友。

毛泽东参军的目的，是“为完成革命尽力”。看来他从未参加过战斗。正当孙中山和袁世凯（原为朝中大臣，后转而拥护共和）双方支持者之间的武装冲突似乎不可避免的时候，两人达成了和议，孙解散了他在南京的政府，就理论上说重新实现了统一和和解。其实，袁独揽一切权力，真正主张共和的革命党领导人，不是很快被抓、被杀，就是被放逐或被剥夺言论自由。但是，在1912年春，毛泽东认为革命已经结束，便决定退伍，继续求学。他一共当了半年兵。

如果说毛泽东实际上并未在很大程度上参加辛亥革命，那么，他在军队的六个月却标志着他在接受教育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如他的朋友埃米·肖（Emi Hsiao）所说，这段很短的军事生活是否就使他早在此时断定军队在中国是政权的关键因素，是值得怀疑的。实际上，只有经历了军阀时代长期的分裂和无政府状态之后，才能得出这种结论。但是，毛泽东的确扩大了他的接触面，特别是同一个矿

工和一个铁匠交上了朋友。这时他还存在着浓厚的学生心理，要从每月七元的薪饷中拿出相当大一部分去向挑夫买水。士兵必须到城外挑水，但毛认为自己是个知识分子，干那种事有失尊严。

他这样节省下来的时间用于读报。剩下的银饷，他都用来订报纸。有一种报纸登了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他就是从那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他还读了江亢虎写的几种小册子（江曾经留学日本，于1911年11月建立“中国社会党”）。他为这些著述所鼓舞，就同其他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还同学生时代的几个朋友通信讨论这个问题，但响应者寥寥无几。

毛泽东说他在1912年就对社会主义抱有“热情”，我们肯定不能据此认为他这时已经支持社会革命。我们知道，五年以后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几乎没有丝毫激进思想。但当时第一次接触社会主义思潮所产生的想法，对他后来的思想发展不会毫无影响。

毛泽东退伍后决心继续求学，但是他不能确定究竟应该选择何种科目或专业。在这个问题上，他在当时的中国很有代表性。旧学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非议。虽然在最新式的学校里仍然读过去的历史和哲学著作，但只有少数极端保守分子才认为它们在现代还有用。而且，旧的科举制度，在帝制被推翻以前，就于1905年废除了，只读经书的人从此不再有任何前途。但是另一方面，虽然人们认为必须采用现代西式的教育，也建立了一定数量的新式学校，可是还不知道，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在国家生活中将居于什么地位，哪些学校最适于有才华的年轻人就读，使之日后能成就一番事业。

因此，不是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感到选择道路困难。当时

他为报纸上的招生广告所吸引，先后到一所警察学校和一所肥皂制造专科学校报了名。一个法政学堂的朋友，又使毛泽东注意到他那个学堂的广告。广告许诺三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期满后马上可以当“官”。毛泽东对这种前途产生了兴趣，遂写信向家里要学费，并把将来“当法官”的光明前景向他们描述了一番。后来毛泽东又被另一则广告所说服，认为最好能学成一个商业专家，就进了一所高级商业学校。他在那里实际上只学了一个月就退学了，因为大部分课程都用英语讲授，他听不懂。

他又在长沙省立第一中学进行了六个月的尝试，在哪里读了更富有传统性的历史著作。之后，他决定还是自学为好。于是他又退学，每天去湖南省立图书馆看书，从早到晚呆在那里，这样度过了半年。就是在这个期间，他读了严复翻译的反映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经典著作，作《原富》、《法意》，以及达尔文、穆勒、卢梭、斯宾塞等人著作的译本。他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并学习了俄、美、英、法及其他国家的历史和地理。

虽然这个期间毛泽东极有收获，但他难以为继，因为家里不支持这种似乎漫无目的的学习。而且他认真地考虑了自己的“前途”，认定自己最适合当教员。一则招生广告又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次是长沙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广告。1913年春毛泽东考进这所学校。次年秋，第四师范学校并入第一师范。毛和同学们遂转到第一师范。1918年春，毛泽东在该校毕业。这五年在毛泽东一生中的重要性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首先，他所受到的教育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五年里获得的，其内容既有古典的也有现代的，既有中国的也有西方的。但是，这五年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这五年使毛泽东能

够进入教育界，执教时间虽然不长，却是一个使他得以发挥更大作用的阶梯。更为重要的也许是，长沙第一师范和其他男女生学校的学生团体，思想活跃，有政治觉悟，给毛泽东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使自己成为一名政治工作者的演练场。他在那里产生了后来付之实践的思想和方法，在那里交了朋友和同志，其中一些人追随他直到1949年革命取得胜利。

胜利之日，毛泽东在师范学校时的两个极亲密的朋友都不在他身边。其中一个蔡和森，多年以前在革命斗争中牺牲；另一个是萧旭东，他选择了不同的政治方向，成了毛泽东的死敌。

蔡和森同毛泽东的母亲一样，是湘乡县人。他是六个孩子中最年长的一个。他父亲一度是上海江南兵工厂的一个小职员。蔡因其母而同曾国藩有远亲关系。蔡和森、毛泽东、萧旭东被认为是学校中最有才华的三个学生，他们也以此自负，喜欢自称三个豪杰。豪杰一词，是毛泽东爱读的小说《三国演义》的常用语，表示不仅有力量和勇气，而且智慧过人，品德高尚。

顺便提一句，在长沙的那些岁月里，毛泽东始终重视体育锻炼。他和朋友们有意识地通过长途跋涉和经受风吹、雨打、日晒来锻炼身体的抵抗力。

在师范学校时，毛泽东结交了另一个同代人，这就是在他日后的经历中有很大大影响的李立三。有一天，毛泽东在报上登了一个广告，署名二十八画生（他的名字三个字原共二十八画），邀请关心国家前途的青年同他联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收到“三个半人的回答”。“半个回答”来自李立三，他听了毛泽东说的话以后，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就走了。1936年，毛泽东稍带讽刺意味地说：“我们的友谊始终

没有发展起来。”实际上，两人在十几年之后，在什么才是最能保证象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取得革命胜利的战略这一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第一师范是一个公认的中等而非高等教育机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毛泽东从未受过大学教育。但是，这个学校的标准很高，就其所学而论。同进一个省立大学一样。特别是师范学校里有两位教员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一位是绰号叫“袁大胡子”的国文教员，他嘲笑毛泽东模仿梁启超的文风，叫他以唐朝著名散文家韩愈为楷模。另一位是伦理学教员杨昌济。杨只教高年级，所以毛泽东直到1915年或1916年才成为他的学生。

当时，中国知识界已在酝酿五四运动，跃跃欲试。其标志之一就是《青年》评论杂志（不久改名为《新青年》）的创刊。《新青年》的灵魂是北京大学（国内知识分子中心）的陈独秀，陈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他认为，只有“德先生”和“赛先生”能够救中国，它们将把过去的愚昧、迷信、野蛮一扫而光，并为一个新的、现代的、世俗的西方式国家奠定基础。

（摘自红旗出版社《毛泽东》一书）

毛泽东的岳父

毛泽东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差不多从《新青年》创刊之日起，就是这个刊物热情的读者和坚决的支持者。他还鼓励他的所有学生看《新青年》。正是通过他，毛泽东很快接触到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毛泽东还通过上课从杨那里受到融合中西思想为一体的教育。杨对此十分胜任，因他不但对中国古文有坚实的基础，而且曾在日、英、德留学十年。在那里他成了康德和托马斯·格林的信徒（也敬佩塞缪尔·斯迈尔斯），但并不放弃十二世纪著名哲学家朱熹的理学。杨昌济在毛泽东进入他授课的班级以前，在长沙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有如下一段话，无疑概括了他的教学精神：

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国家为一有机体，犹人身之为一有机体也，非如机械然，可以拆卸之而更装置之也。拆卸之则死矣。

因此，他虽然倡导学习西方的各种思想和制度，深入利用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但又要求学生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遗产。在他看来，向西方学习的益处，不是以一种新的文化来整个地取代中国的文化，而是借以推动中国的文化恢复活力。

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确实是很深的。毛泽东在1936年谈到杨时，还忘不掉他。后来毛同杨的女儿结了婚。毛很爱杨开慧，但杨开慧后来在1930年被国民党杀害。人们有一切

理由相信，毛泽东说杨昌济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这不仅是因为对岳父的爱慕，而且表现出对老师的衷心敬佩。

杨昌济不仅指引毛泽东去接近《新青年》杂志社中主张西方化和反对偶像崇拜的激进派，而且指引他接近另一个团体，其成员从十七世纪初湖南大学者王夫之的著作中寻找鼓舞力量，以求在保持中国固有传统的前提下使国家达到复兴。这个团体就是船山学社，或称王夫之研究学会，是由长沙一批杰出的文人学士建立的，它几乎和《新青年》同时出现。清统治者征服中国后，有几个很有名的人物拒绝为异族统治者效劳，王夫之是其中最激进的一个。这些人批判朱熹和其他宋明理学家著作中的唯心主义邪说。他们认为，宋明理学家使文人脱离实际，闭门修养，以幻想代替实践，导致民族丧失独立。他们还强调尚武精神。这种主张即使不是同经书直接对立，也是同传统观点格格不入的。船山学社的成员从他们身上找到了当代催人奋进的力量。在杨昌济的推动下，毛泽东曾出席船山学社的会议，接受了他们的观点（袁大胡子在这面对他也有所鼓励）。后来，他经杨昌济（刚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介绍，在李大钊手下做图书馆助理员。李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任历史系教授。毛泽东每月有八块钱薪水，只能节俭度日——他同其他七名湖南学生共住一个房间，但是故都之美，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种“丰富多采、生动有趣的补偿”。他还经常应邀去杨昌济家中，并在那里结识了他未来的夫人杨开慧。

（选自《毛泽东》，红旗出版社版）

毛泽东为什么没去法国

赴法勤工俭学是新民学会会员北上的一个重要任务。至于勤工俭学运动的缘起，是到了北京，经多方了解，事隔多年之后，才逐渐知其内幕。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壮丁大部分上前线参战，农业、工业缺乏劳力，因而法政府从西班牙、意大利等国输进大批工人，亦与中国政府签订合同，招募三十万华工赴法做工。北京政府为此成立了惠民公司，由张弧出面承办签证、输运事宜。前后输送了几十万华工赴法做工。张则乘机中饱私囊。在法的李石曾等人见张获取暴利，亦想从中捞到好处，于是也向法政府商取招募华工的代理权，亦发了一笔横财。李石曾直隶高阳人，清代臣宦李鸿藻的后人，父亲亦为大官，祖传遗产很多。大战期间（一九一四——一九一八）赴法留学，学生物学兼营商业。他精通法语，往来于法国上层社会，在法国外交界亦有地位，对中国官场也很熟悉。他在法国经营了一些工厂和企业，其中较大的有巴黎豆腐公司。当时社会上有人提倡素食主义，结果李大赚其钱。他以这些为资本，勾结法政界上层官僚，获得了招募华工的权力。但过不久大战结束，大批军人复员，劳工不再缺乏，部分华工亦被遣送回国。这一来一往，中国官厅都是有利可图的。但李石曾颇有心计，看到华工不能继续去法，这事已无前途，但又不愿放手，就转向中国学生，鼓动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一则继续招募工作，二来也可博得青年学生的信仰，

便于今后在政治上有所活动。

李石曾以创办华法教育为名，要求法国政府步美国后尘，退还庚子赔款，筹办里昂大学。赔款额达几百万法郎。以此，李便可以上下其手，取得该款的支配权。李还伙同汪精卫、吴敬恒等中国教育界上层人物，向国内青年鼓吹勤工俭学的好处。为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影响，他们办刊物，立门户，树旗帜，大肆宣传勤工俭学运动。一九一七年四月间，他们开始在《新青年》杂志刊登广告，介绍留法勤工俭学规章。于是，勤工俭学运动在全国兴盛起来了。

湖南新民学会首先响应，子昇与和森先行到京联系，接着第一批会员于一九一八年八月间来到北京。当时李石曾已回国，并在北京大学兼课，他当即表示欢迎。是年冬，李石曾邀子昇、和森、润之和我到其西山寓所商谈赴法留学问题。李在席上谈话自称，他平日信仰世界主义，反对强权，强调无政府思想；在学术上研究生物学，奉拉马克(Lamarck, 系法国生物学家)为师，兼以工学救世。李并宣称自己不茹荤酒数十年，长期吃素，平生自奉俭约，借以取信于我们青年。他装得清流自许，如刀崖岸。我们也深为所动，认为勤工俭学一事非常紧要，作为一种反抗旧思想和反抗剥削阶级的利器，奉工读为主义，决心大力提倡，并推润之执笔，写出勤工俭学的实施方案。经子昇修改文字后，送交李石曾，李表示同意。新民学会诸人在最初推动这一运动，出了大力。湖南学生以及四川等地青年，一时响应者极众，如水赴壑，不能自止。其中大多数为失学、失业青年和穷苦学生。我也为此奔走呼号，在青年学生群中作过多次演讲，倡导世界工学运动，并在《新生活》等刊物上撰文——《世界工读运动的讨论》。事后回想，不免有些不切实际，系主观片面

之臆说，经过深思熟虑后，深觉今日万事应从中国做起。润之亦认为，这些只是一时冲动，所谓“急不择路”，此路未必走得通，但事已至此，欲罢不能，只好徐觅良途。后来，我和润之都决定暂不出国。

湖南学生汇集北京，等待放洋急如星火，而华法教育会徒托空言，无补实惠，于是湖南同学被迫自筹旅费。关于湖南学生筹措赴法旅费方面颇多曲折，先是在清朝末年铁路风潮中，湖南省为商办粤汉铁路曾收集民股二百万元（自由募集）；米盐公股一百二十八万元（由湘省出口米捐与盐附加税，积累而成）；长沙房捐四万元；以上共三百三十二万元，存放北京银行，均为湘籍官绅把持中饱。辛亥以后从未理落。此事渐为外间所闻，旅京学生声言查帐。经手人湘绅熊秉三、范静生等，为和缓舆论攻訐，乃声言愿从此款中提出数万元，作为津贴湘籍赴法学生费用。于是，乃由熊、范二人出面在湖南善后协款中拨出一万六千元，作为湖南学生赴法路费贷款，发每人四百元。第一批接受贷款学生共四十名，其中法文专修馆二十名，保定留法预备班十六名，其它四名。第一批放洋赴法的有蔡和森、~~以~~绍麻、熊光楚、萧植蕃、郭名忠、欧阳泽、成湘、黄昆吾、何长工、李蕃、刘明俨、孙发力、罗学瓚、萧拔、王守素、李维汉、陈毅、侯昌国、王人达、龙协群、陈炎、罗汉、张增益、陈闻纳、穆青、娄绍丞、贺果、李富春等。同时蔡和森以个人名义向上海纱厂资本家聂云台（湘乡人）请求帮助，聂允其请，捐三千元作蔡全家赴法用费，始得成行。新民学会会员离京赴法时，同人纷纷赋诗赠别，我写五言律诗一首云：

送新民学会会员赴法（一九九一年冬）

雪月映西山，冰封渤海湾。

围炉忻笑语，别意动燕关。

徙倚双轮动，踟蹰落日闲。

车书观万国。海上有书还。

一九二〇年间，中国留法学生集中巴黎者数以千计，其中湖南学生四百人（有一部分是自费赴法，如徐懋徇、曾琦等），因觅工不易，初由华法教育会给每人每日补助五法郎，至一九二一年一月止。华法教育会宣称：自是年二月份起与学生断绝经济关系。学生群起申诉，被置之不理。李石曾对学生表示决绝，于是勤工俭学运动陷入困境。子昇曾从巴黎写信给我，表示勤工俭学毫无成功希望，本人想离开巴黎。其它学生，家资富裕者继续留法或进里昂大学，后来，部分勤工留法学生先后赴苏联，大多数则被遣送回国。

但李石曾等却为此事欺世盗名，声誉大增。他于法国政客赫里欧勾结，取得法国政府退还的庚款，办了里昂大学，扩张已派势力；后又回国勾结军阀、政客，盗卖北京故宫古物，立成巨富；继又设立投资银行，进行政治投机，取得了特殊地位，得鱼忘筌，不复再谈往事。

新民学会在长沙时，初计议全体赴法，但到了北京以后，审度情势与长沙所闻不同，我鉴于国事日非，大变将临，忽然去国，良非本怀。曾以此意函告瞻帖，瞻帖复函也以为然。润之亦中途易辙，停止赴法。但和森则坚持赴法，谓势成骑虎，舍此无它途。陈绍麻初犹豫，未起程。其弟绍常坚请行，绍麻遂护送其弟出国，后竟客死巴黎，诚非始料所及；杨楚亦病歿于巴黎。

在勤工俭学运动告一段落后，我与润之共留北京从事学习与工作，期望在北方开辟一个新的革命阵地。

（摘自罗章龙：《椿园载记》）

刘仁静追忆毛泽东

党的一大代表、后来成为“托派”的刘仁静在他的《往事漫忆》的遗述中写道：1918年秋，我从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考入北大。当时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我初次结识了毛泽东。在他同我的几次谈话中，我感到他是一位博学多才、眼光远大、思想激进的青年。他对中国的政治和世界的了解和分析是很有见解的。他不爱多说话，但说出都是有条理、有意义、使人信服的。

党的一大，我作为北京的代表，和张国焘一起参加了这次大会。毛泽东是湖南代表。在上海我们第二次见面了。会上，张国焘是一个活跃分子，夸夸其谈。但是善于思索的毛泽东则采取谦虚谨慎的态度，没有事实根据的话他是不讲的。

会后，毛泽东在即将返回湖南的前一天，和我有过一次谈话使我终生难忘。他说：“你今后要多做实际工作。”这当然是对我在这次会议上发言时不能结合实际空发议论而言的。这确实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的弱点。我当时并没有很好地理解毛泽东的这些思想的意义，因此在1929年我从苏联回国后，没有走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正确道路，离开了革命队伍，这是深刻的教训。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脱离托派立场的政治声明中郑重表示：“今后一定要靠近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我过去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以后决心在党和

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做出应有的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被冲击、关押长达十多年之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还记着我，他曾几次指示有关部门和军代表：对刘仁静用不着监护，可以让他写一写回忆录。这以后，我的处境才逐渐好了起来。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彻底恢复了人身自由，落实了政策，生活才开始安定下来。

每当想到同毛泽东同志在一起的这些往事，我都感到欣慰。

（摘自《文摘旬刊》268期）

毛泽东与霞姐

贺子珍相貌隽秀，有点脾气，是个热情奔放的革命者。长征开始时，她二十四岁。她与毛在井冈山相会时仅十七、八岁。

贺子珍并非毛泽东的原配夫人。毛的父亲曾强迫他在十五岁时就娶了一个比他大四、五岁的媳妇。他顺从地按礼仪拜了堂，但是拒绝接触那个年轻女人。她的名字从未透露过（因为这是一次没有圆房的婚姻）。

贺子珍也不是毛泽东的第一个爱人。毛的第一个爱人和第一位真正的妻子是他的老师的女儿。这位老师便是杨昌济教授，毛泽东跟随他到了北京。在北京毛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几乎在同时也热烈地爱上了杨开慧。杨开慧是个身材苗条、才华出众的女子，比毛泽东小八岁，她立志献身于建立新中国的事业。两人对革命志同道合，并携手合作。

毛泽东和杨开慧一类的青年人蔑视中国的旧习俗。他们嘲笑中国传统的婚姻制度。一九一九年，毛的知心朋友及革命同志蔡和森与年轻的湖南姑娘向警予（很多人后来都把她看成革命的化身）在去巴黎的船上相遇，并开始相爱。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结了婚。他们在巴黎举行了婚礼，并照了结婚照片。照片上除了小两口之外，前面还放着一本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照片下面顺序写着“向”、“蔡”两个字，这两个字包含着有趣的双关意义：既是他们两人的姓，又可解释为“向上的结合”。大家看到新娘的姓写在新郎的前面，既惊讶又赞同。在革命者中，这对夫妇的命运最为悲

惨。向警予在汉口的法租界被捕，并被押交给国民党。国民党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清晨四点杀害了她。蔡和森于一九三一年在香港被捕，也被押送给国民党，国民党残忍地把他的手脚钉在墙上，用棍棒把他活活打死。死后还把他的前胸和肚子切成了碎块。

毛泽东和杨开慧对传统婚姻的反抗没有他们两个朋友那么强烈。他们只是宣布他们“试婚”。他们一起生活了许多年，开慧生了三个儿子。一九二二年出生的毛岸英是一位才貌双全的青年，一九五〇年在朝鲜被一颗美国炸弹炸死。一九二三年出生的毛岸青，一九八四年仍生活在北京，已与一位叫邵华的女子结了婚。据某些人说，开慧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是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出生的。

杨开慧，1901年出生在湖南长沙县板仓。父亲杨昌济，是一个思想进步、知识渊博的知识分子。母亲向仲煦，勤劳俭朴，慈祥善良。由于家庭的熏陶，开慧从小爱读书，爱劳动。7岁上学，刻苦用功，喜读古典诗文。她待人温和谦让，同学们都喜欢和她接近。

开慧13岁那年，父亲留学回国，应聘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书。开慧随全家迁至长沙城内，转入稻田女子师范附小读书。当时，湖南一师的学生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经常在杨昌济先生家里聚会，纵谈国家大事，研究革命道理。开慧经常作一个沉默而热心的旁听者，为他们的谈论所吸引。她钦佩毛泽东的伟大抱负和深刻见解，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个有理想的女孩子。

1918年夏，杨昌济受聘到北京大学任教，开慧随父来到北京。因父亲长期患病，她没有进学校读书，在父亲的指导下，坚持自学。在这期间，毛泽东、蔡和森为筹备赴法勤工

俭学活动，也先后来到北京，常来探望老师。开慧又有机会聆听他们纵谈国事，抨击时政。在毛泽东的帮助下，她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开始接受了一些民主革命的新思想。毛泽东经常把自己写的日记和学习笔记借给她阅读，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开慧进一步接触新思想、新思潮，正当她在父亲病榻前为层出不穷的新事物而兴高采烈时，她的父亲杨昌济却于1920年1月不幸病逝。开慧随全家扶柩南下。回长沙后，进入福湘女中读书。她的反抗性格开始显露。这是一所外国人创办的学校，规定每星期日要集体做“礼拜”，她偏偏不去。当时女同学学习惯留长发，她却带头把长发剪短。顽固派讽刺她“男不男，女不女”，她干脆把头发剪得更短些，作为回答。她还在《福湘周刊》发表了《呈某世伯父的一封信》等文章，抨击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揭露了宗教的虚伪，她主张解放女权，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要求制订男女平等的法律。她还为周南女校一位教员逼死出身贫苦的妻子一事，和同学们一起，愤怒地控诉了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她的这些活动，引起了学校当局的注意，把她看成“危险分子”，扬言要把她赶出学校。恰在这时，知识界提出了“男女同校”的主张，她便串联了五个同学，毅然离开女校，进入岳云中学读书，成为湖南男女同校的第一批女生。

1920年8月，毛泽东等为了传播进步思想，在长沙成立了文化书社。开慧积极参加了文化书社组织的一些活动。不久，她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开慧和毛泽东经过数年的了解和相爱，于1921年秋结婚。1921年7月，毛泽东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以后，从上海回到长沙，建立了中共湖南省支部，1922年改为中共湘区委员会。毛泽东担任区委书记，开慧就在这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从家里拿了一部分钱，向湘区委交纳了党费。入党后，她担任区委的机要交通联络工作。他们的家，长沙市郊清水塘22号，就是区委所在地。从这时起，开慧就成了毛泽东的助手。为了党的工作，她经常来往于文化书社、望麓园织布厂和犁头街青年图书馆。她还协助毛泽东剪辑报纸，收集资料，抄写文稿，经常工作到深夜。

婚后，开慧对毛泽东的生活起居体贴入微，使毛泽东得以有时间、有精力从事十分繁重的工作。

毛泽东于1923年4月去上海党中央工作。开慧和母亲带着岸英和刚出生不久的岸青到了上海，继续协助毛泽东工作外，还到工人夜校去教书。一年后，又随着毛泽东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毛泽东在韶山办起了农民夜校，开慧担任夜校教员。

1925年10月，开慧离开韶山到广州，协助毛泽东编辑《政治周报》。1926年冬，湖南召开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农民代表大会，电请毛泽东回湘指导工作，开慧也回到湖南，帮助处理大会文件。大会后，当毛泽东对五个县的农民运动进行考察期间，开慧也紧张地帮助整理和抄写有关农民运动的资料，为当时的革命斗争作出了贡献。

1927年2月，毛泽东前往武汉举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慧随往武汉。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回湖南领导湖南临时省委。以后，按照党的八七会议指示，发动秋收起义，开慧则回板仓参与当地的地下斗争。

开慧告别了朝夕相处的亲人，带着孩子和保姆陈玉英回到板仓，周围是一片白色恐怖，开慧丝毫没有畏惧。孩子有保

保姆照管，她开始了新的工作。白天，她有时打扮成一个村姑，提个竹篮，来往于各地的秘密联络点。晚上，她有时和贫苦农民促膝谈心，有时伏案学习或是写信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在板仓，她很注意联络大革命时期农民协会的积极分子，不断向他们宣传：“挫折是暂时的，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在她的鼓励下，缪佩秋和他的妻子秋一嫂等当年的农民协会委员，革命意志更加坚定。

开慧在板仓坚持斗争3年，和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她关心群众疾苦，群众也把她当作贴心人，大家都亲昵地叫她“霞姑”、“霞姐”。

毛泽东率部队上井冈山以后，开慧日夜思念毛泽东。她在一首《偶感》诗中写道：“天阴起逆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是否痊，寒衣是否备？……”表现了对毛泽东的深情眷怀。

1930年8月，红军占领长沙又主动撤离后，敌人更加疯狂地进行反扑，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还贴出布告，悬赏捉拿“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形势非常险恶，但是杨开慧不顾个人安危，奔走于板仓方圆几十里，鼓励大家坚持斗争。就在这一年的10月24日凌晨，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国民党乡长范庆煦带领80多名匪徒包围了开慧的家。开慧迅速地把党的机密文件拿到厨房里烧掉，然后从屋里走了出来。凶恶的敌人连8岁的小岸英和保姆陈玉英也不放过，把他们同开慧一起押送到长沙警备司令部，后来又转入陆军监狱。

敌人多次逼问她：“毛泽东到哪里去了？”她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晓得！”

敌人用打木棍、抽皮鞭、扎竹签、踩杠子等毒刑，把开慧折磨得遍体鳞伤，可她始终坚贞不屈。

敌人见硬的不行，于是又改变策略。一天，他们把开慧“请”到客厅坐下，对她说：“只要你在报纸上发表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的启事，你就可以马上得到自由。”

开慧冷笑道：“要打就打，要杀就杀，要我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

敌人无计可施，决定对他处以极刑。

开慧早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在阴暗的牢房里，她教岸英识字，嘱咐他长大要好好听爸爸的话，努力为党工作。她对前来探望的亲友说：“死不足惜，只望革命早日成功。”

1930年11月14日下午1时，长沙浏阳门外的刑场上，响起了嘶哑的枪声，29岁的杨开慧英勇就义了。当地农民冒着生命危险，连夜把烈士的遗体运回板仓，埋葬在青松环绕的棉花坡上。

不久，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得到开慧牺牲的噩耗，悲痛地说：“开慧之死，百身难赎。”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先后派岸英、岸青回板仓扫墓。

1950年，毛泽东接见杨开慧的堂妹时，满怀深情地赞扬了杨开慧。他说：“你霞姐（开慧的乳名）是有小孩子在身边英勇牺牲的，很难得。”又说：“你霞姐，那时候是积极主张武装斗争的。”

1957年5月11日，毛泽东复柳直荀烈士的夫人李淑一的信中，写了著名的诗词《蝶恋花》，其中第一句就是“我失骄杨君失柳”。章士钊先生曾问毛主席：词中“骄杨”二字怎样理解？毛主席回答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毛主席在复李淑一信中还说：“暑假或寒假你如

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

（摘自《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个神秘的住所

党的“三大”在广州召开后，决定“三大”中央设在上海，“三大”中央局的常委全部到上海集中。常委们陆续到达，有的由湖南到上海，有的由北方到上海，有的由广州到上海，到达上海的时间路线都不一致。到上海后，在闸北找了一所房子作为中央办公处，这就是三曾里三户楼。

三曾里的房子是王荷波租的，离闸北火车站一二里路远。在中兴路与香山路交叉的地方有个小里弄，称三曾里。这个名字很费解，后来才知道这个里弄只有三个门牌，由此而得名。

三曾里的房子结构是普通的二层楼房子，用上海话说叫做两楼两底。我们决定找这个地方作办公地点，是因为此地属于中国地界，周围有几十家缫丝工厂和一些手工业工厂。居民以广东人最多，其次为江北人。这个地方既不是贫民区，也不是绅士区，五方杂居，环境条件对工作很有利，所以才定了下来。这个房子，楼上楼下大小共有八、九间房，当时没有户口制度，但住房必须有个户主，我们三户联居，称它为三户楼。毛泽东、杨开慧一户，向警予、蔡和森一户，我一户，大大小小算起来有十口人常住。对外就说是一家人，向警予是一家户主。

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两个孩子住在这栋房子的前厢房。那时杨开慧身体好，虽然有了孩子比较劳累，但他仍然挤出时间做了很多工作。

蔡和森和向警予带着小孩住的房间和润之的房间只隔一层板壁。向警予在中央参加工作，负责妇委，兼做工人运动。在三户楼中间，她是年长的一个，做事很有经验。我们推她当户主，中央开会和里里外外的事都由她安排、照顾。

另外，有一个管事务的女同志，叫王熙春，共青团员。她是扬州邗江人，原上海某教会大学英文班学生。她排行第九，外号九姑娘，主要是在秘书处领导下负责对外联系，管理机关内一些政治性和事务性工作，包括警卫、后勤等，房子上有一个警报电铃，也由她管。熙春同时负责女工运动，组织领导丝厂工会斗争，曾被捕过一次。我们还请了一个姑娘，叫魏贞秀，苏北盐城人，是个丝厂女工，有三十多岁。她是工会成员，不是党员，但很忠实可靠。

三户楼设有公共伙食，由向警予管理，平时吃饭有七、八人。每月休息时间由向警予和王熙春规定。为了工作，我们口头约定了一些共同遵守的纪律，不成文的公约，即不准到外面上餐馆，不看戏，不看电影，不到外面照相，不在上海街上游逛，休息时间和业余时间如要出外，可在空旷的地方散步，假日可到吴淞炮台、兆丰公园，或远处如松江、太湖、虎丘、苏州等地旅行。

中央机关不止这一处，英租界威海卫路瑞兴里也有办公处，其他如共青团中央设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和辣斐德路等处，国际联络处即外白渡桥苏联领事馆，太平洋工会书记处设在英租界汇山路。

经常到三户楼来的有王荷波，他住在英租界同孚路，是我们当中年纪最大的，约四十多岁。国际代表也来开过会，他不常在上海，有时到广州等地去。恽代英当时是共青团的

书记，中央开会他也要来列席会议。陈独秀不住在这里，离这里有一、二里路，但在三户楼设有床铺，开会晚了或有事不能回去就在这里留宿。我们这个“家庭”对外以“报关行”作职业，即帮人填外文表格到海关去报税。经常来的这几个人对外就说是亲戚串门子的。其他人非经允许不准来。例如，有一次陈独秀的爱人高君曼来找陈，王熙春不认识她，不让她上楼。还有一次，湖南有个青年从长沙来找杨开慧，杨问明来意，知道他头次到上海，很想在此留宿，杨说不行，叫他回去。这个青年远道而来，很难过，杨说你一定要离开，以后也不能来，就把他送到了车站。这只是一个例子，足见其严密了。一些特殊的，经中央允许的人和来接头的人可以来往，这个地方是不公开的。苏联领事馆派专人和我来往，他可以进我们的房子。当时，常委会在楼上的客厅举行。

在三曾里，我们订了《新闻报》、《申报》、《新申报》、《上海民国日报》、天津的《益世报》，订外文报有《密勒氏评论》，这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一家外报。还订了一些外国杂志，主要是第三国际的英、美、德、法各种文字的报刊。润之主要看中文报，代英、荷波、仲甫和我都看外文报，有时我们也在一起谈论有关报刊内容诸问题。

毛润之每天早上利用吃早饭的时间看报，把重要的记录上来或剪下来。我们的报纸头天取回来，第二天仔细看，主要是了解政治情况。报纸中最使我们感兴趣的是《申报》、《新闻报》的北京专电，可借以研究全国的政治动向。我们的报纸不是送到所住的地方，而是送到信箱，由小王每天去取。我们的信箱不止一个，在北四川路离苏州河不远的邮政局地下室，也有我们的信箱，也可以收到报纸。

三曾里离环龙路执行部比较远，我们坐车去办公，大家指定一个地方集合，然后坐车前去，大部分坐出租汽车。当时出租汽车很多，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上车。就是专车，我们也不让他开到住处，让它在指定的地点停下来。

我从一九二三年秋搬到三曾里，第二年六、七月才搬走，住了近一年。后来我出国到欧洲工作，以后的情况就不太了解了。向警予住在此地，到丝厂做女工的工作也很方便。这附近有个湖州会馆，是浙江大资本家盖起来的，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时，它是最著名的司令部所在地。

三户楼诸人，平日生活十分紧张，如草拟文件、决议，为《向导》及党报撰文，经常静思澄虑直至深夜，但大家以革命为信仰，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改进工作，生活又十分有朝气。“同心若金，攻错若石”，“团结一致，同舟共济”是我们遵守的信条。

（摘自罗章龙《梅园载记》）

毛泽东曾在国民党中任职

在斯大林的使者鲍罗廷指导下进行的国民党的改组是一件充满矛盾的事情（鲍于1923年10月抵广州）。这种“从内部”进行的合作，以前仅有过一例，即马林在印度尼西亚的经验。那里的伊斯兰教联盟是组织松散的群众运动，很容易被坚定的少数派所控制。同样的，1924年以前的国民党，正象鲍罗廷常说的那样，还很难说它是一个党，鲍的任务是要从中建立一个党。

可现在却提出要按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把国民党本身改造成一个非常有效率的组织，而且还为孙中山提供了一支由苏联顾问训练的现代化军队。孙在1923年底虽然得出结论，除了依靠苏联，别无其他选择，但他完全不想成为莫斯科的傀儡。从苏联对外政策的目的来看，加强国民党的组织完全是值得的，因为莫斯科由此可以得到一个更为有力的支持者。但是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莫斯科的两个伙伴来说，都充满着危险。要是共产党能成功地控制住国民党的中下层组织，那么他们就可以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操纵整个国民党。如果做不到这点，那么就会被由他们自己帮助建立起来的机器所摧毁。

毛泽东立即投入到同国民党合作的组织工作中去，1923年6月他被选入中共中央委员会以后，他移居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1924年1月和2月，他曾去广州作短暂逗留，参加国民党一大。那时他刚过三十岁生日，就是在这里，他第一

次以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人物出现在讲台上，这是一次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国民党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他已经为自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赢得一席之地，从下面一件事可以得到证明，他是审查国民党新党章的十九个委员中的三个共产党代表之一。他还经常参加讨论，强调共产党对孙中山主义的坚定支持。

正如已经指出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毛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他以这一身份参加了中央党部的会议，直到他于2月7日或8日启程去上海。他留下了四份决议，它们非常清楚地反映了他那时的政治思想。国民党中央在1924年2月9日的第四次会议上曾对此进行过讨论，他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这些决议全力抓住了组织方面的问题。在毛的全部政治生涯中，这是他的最大资本之一。他一方面反对广东省高层干部的过剩，他说，中央及省的国民党机构是“空洞的组织”。他认为，那些在“指导党员行动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实际的组织”，是设在城市中的一些局或农村中层一级的机构（县或区的机关）。但与此同时，毛又强调，国民党在人力和财力上不应过于分散。他建议在会后几年内，党应以其70%的财力用于运动已得到很好开展的八九个主要城市，其余30%给那些真有发展前途的十一个或十二个地区。其他地方则暂时可以不管，“以免分散我们的力量”。

毛想使国民党分权的想法并不反映农民的利益。他建议党要花力量的那些地方主要都是大城市。长沙也未列入。对这一点最可能的解释是毛想避免给人以这种印象：他偏爱自己的故乡。毛在有关决议草案中只提到了1924年积极进行工作的二十个城市中的九个，其他都以“等等”概括了。在毛

的思想中，长沙可能已包括在那些未指名的城市中了。从下列事实可以证明，他对湖南革命的进展并不是莫不关心的：1924年4月。他派他的朋友、以前在学生时代组织的新民学会会员夏曦去长沙，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国民党组织。

毛在提出这些决议草案后不久便回上海，他在中国共产党内身居要职，同时又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他在上海时的国民党同事是汪精卫和胡汉民，他俩不久就分别成了国民党左派和右派的领导人。根据毛的自传所说，在这一年年底时他病了，不得不回湖南休养。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讨论整理党务案的问题。在讨论中，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一个同事提出了一个三点计划，旨在减少对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究竟有何意图给他们造成的不安。要求所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必须讲明他们在共产党内的身份：必须完全公开他们在国民党内的活动：未经当地国民党组织的许可，任何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对这几项意见，先是张国焘，接着是毛泽东，代表共产党员作了回答。也就是这一次，他俩的观点完全相同。这些内容从理论上说是好主意，但是在中国大多数地区的现有条件下，公开声明共产党员身份而不遭逮捕或处决是不可能的。毛说，迫使部分革命力量经受这样的打击，“于国民革命前途是不利的”。

大会最后通过了由陈公博提出的一个妥协方案，就是由两党的中央执委会召开一次会议，寻求一些办法使右派对共产党员的活动感到放心。毛曾因为没有参加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而失掉了在中共中央委员会里的位置，但现在他却又一次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大会后不久，他被任命为国民党的一份新机关刊物《政治周报》的主编，这

份刊物在3月初开始发行。

虽然国民党领导机关中的共产党影响问题在决定蒋介石与莫斯科的较量中起一部分作用，但决定性的问题是北伐。进行军事讨伐以推翻北京的军阀，同时建立一个统一的国民政府，这一直是孙中山最后几年最迫切的愿望。他接受了苏联的很多援助，因为他深信，这是要建立一支能承担这一任务而又属于他自己的强大军事力量的唯一道路。而现在蒋介石不仅是出于他个人的野心，而且也是考虑到国家的前途，驱使他来实现孙中山的愿望。

苏联的看法则完全不同。1926年3月，就在这一决定性较量即将出现的时候，苏共政治局在莫斯科开会，讨论由托洛茨基主持的特别委员会准备的一份关于远东政策的报告。在这位“不断革命论”鼓吹者的思想指导下，准备了一份几乎完全是讲是否可能使用外交手腕的文件。新近发生的中东路事件使莫斯科感到惊慌。苏联人现在提议，承认亲日派张作霖在满洲事实上已拥有的自主权，以此向日本求得苏联自身的安全，而不惜牺牲中国的民族利益。他们不管吴佩孚在三年前对铁路工人的大屠杀，还抱有同吴佩孚恢复谈判的想法。至于对广州革命政府，苏联人派其驻法国大使拉科夫斯基去试探，承认他们自主的可能性，想以此来抵销张作霖的势力。在一份谈到与广东关系的报告中，下面的话是斯大林亲自提出并加进去的：

广州政府在现阶段必须坚决反对进行具有进攻性军事讨伐的思想，一般来说，任何这种做法都可能怂恿帝国主义采取军事行动。

这些话是3月25日说的，也即蒋介石在3月20日事变五天之后，当时莫斯科尚未得到这一消息。对蒋在军队政治委员

中逮捕大批共产党员以及软禁苏联顾问的行动，毛显然是不会同意的。但蒋的动机就某种程度说是向莫斯科施加压力以便得到苏联对其计划中的北伐的支持。那么就这点说，蒋与毛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在蒋发动事变后十天，即1926年3月30日，毛参加了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他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动议，根据会议记录概述如下：

民众运动与政治有密切关系，目前各省农民运动应以全力注意将来革命军北伐时经过之区域如赣鄂直鲁豫诸省。

毛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方面是证明他有先见之明，预见到北伐实际上会起促进农民运动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证实了他独立于莫斯科的立场，因为莫斯科就是在这同一天表示坚决反对广州发动任何类似这种性质的进攻行动。因此，只要蒋同苏联人讲和，除免去他特别厌恶的两三个顾问外，重新恢复所有军事顾问的职务；同时对国民党右派进行象征性的批判以平衡他向左派发动的政变，毛同蒋继续合作就不足为奇了。令人更为奇怪的倒是这样一件事，就是他从1926年5月到10月，仍然担任着农讲所所长这一如此重要的职务。蒋同莫斯科恢复关系是有条件的，除了要斯大林支持北伐外，再就是“整顿”国民党，目的是要限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在任何领导机关任职的共产党员人数规定只能占三分之一，并且不准他们担任各部部长那样高级的职务。在这一规定下，谭平山被迫辞去组织部长职务，林祖涵辞去了农民部长职务。毛本人也失掉了宣传部副部长的位置，但他还保留了农讲所所长职务。不管怎么来解释这一情况，说他是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也好，或者说主要的因素是由于他和蒋都具有民族主义思想也好，

但事实毕竟是事实。

毛在农讲所的活动对蒋和国民党并无好处，这是确实的。

（摘自《毛泽东》，红旗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的女儿为啥叫李敏

李敏，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爱女。

1937年10月，贺子珍去苏联治病，远离了延安，远离了毛泽东同志。1940年，4岁的娇娇（李敏）来到了贺子珍的身边，在距离莫斯科几百公里的伊万诺夫城苏联国际保育院学习。

1948年冬，贺子珍携娇娇随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夫妇从莫斯科回到哈尔滨。

13岁的娇娇天真活泼，聪明好学。她用俄文写了一封短信给爸爸：

毛主席：

大家都说您是生我的亲爸爸，我是您的亲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有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您的亲女儿？请赶快来信告诉我，这样，我才好回到您的身边。

娇娇

毛泽东同志接到娇娇的信后，挥笔写了回信：
娇娇：

看到了你的来信很高兴。

你是我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你去苏联十多年一直未见过面，你一定长大了长高了吧？爸爸想念你，也很喜欢你，希望快快回到爸爸身边来。爸爸已请贺怡同志专程去东北接你了，爸爸欢迎你来。

毛泽东

毛主席写完信后又立即改变主意，吩咐有关同志将此信改用加急电报发出去。

不久，娇娇回到毛主席的身边。

娇娇该上中学了。上学注册得有个学名，不能老叫娇娇呀！一天吃饭后，毛主席叫来娇娇说：“爸爸再给你起个名字。”

“你的名字就叫敏，但不一定叫毛敏，可以叫李敏。”毛主席对娇娇说。

“为什么？大哥毛岸英，二哥毛岸青，他们都跟爸爸姓毛，我为什么不姓毛？”娇娇睁大眼睛，十分不解地问。

毛主席爱抚地用手拍拍娇娇的头说：“娇娇，爸爸姓毛，这是不错的，但是为了革命工作需要，爸爸曾用过毛润之、子任、李德胜等10多个名字，爸爸特别喜欢李德胜这个名字。”

在转战陕北途中，毛主席用李德胜（离得胜的谐音）的代名同周恩来副主席一起指挥作战。从此，李德胜这个名字就出现在作战电报和命令上。

李敏明白了爸爸给取名的用意，意识到爸爸给自己寄予多大的期望！

李敏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随着年龄的增长，李敏有了意中人，是北京航空学院的高材生孔令华。李敏把心中的秘密向爸爸吐露了。

毛主席听了李敏的介绍点头微笑。他主张对儿女的婚事，大人们不要干涉，只要孩子们自己认为满意就行。

孔令华是父亲孔从周同志原是杨虎城将军部下的炮兵旅长，在西安事变中作过贡献，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他从毛主席的话语里悟出主席是赞同这门婚事的，原先

的疑虑就烟消云散了。

李敏、孔令华婚后同毛主席住在中南海一栋大院子里，给毛主席的家庭增添了欢快的气氛，一年以后，李敏生了个男孩。毛主席看见小外孙长得可爱，经常抱抱、亲亲，内心的喜悦是不言而喻的。

江青却看不得这些，对李敏一家人冷漠、轻视，常常寻衅滋事。李敏考虑再三，和孔令华带着孩子搬出了中南海。

1969年李敏随国家科委下到河南遂平，“九·一三”事件后才返回机关。但“四人帮”不准她进中南海，直到主席病危，她才见到日夜思念的爸爸。

毛主席逝世后，江青胡搅蛮缠，只准李敏为父亲守灵一次。李敏以家里的客厅为灵堂，将爸爸的遗像挂在灵堂上方，下面摆几盆鲜花，两旁是她全家洒泪写下的挽联，寄托着无限哀思。

1977年9月，李敏、孔令华陪同经中央批准来北京治病的妈妈贺子珍，瞻仰了毛主席的遗容，敬献了花圈，母女俩在毛主席遗体旁痛哭失声……

党中央很关心李敏和孔令华，安排了适当的工作，他们决心继承爸爸的遗志，为实现祖国的四化勤奋学习，努力工作。

（选自《趣闻集萃》）

毛泽东爱上了贺子珍

过去，有关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婚姻问题，在社会上有多种猜测和传说。有的说他们是在中央苏区结婚的，有的说他们1927年就结婚了，还有的说他们是在长征路上结合的。众说纷纭，越传越奇。近年来，通过一些老同志的回忆，以及我亲自采访了解贺子珍的有关人员，根据所得到的情况，他们应该是在1927年10月认识的，经过近一年时间的接触和了解，于1928年9月自愿结婚的。

秋收起义以后，毛泽东根据党的力量、群众基础和地理条件等方面的情况加以分析对比，认为井冈山是革命军落脚的理想地方。于是，他带领起义队伍的余部向井冈山方向前进，在耒市与当时被称为“土匪武装”的袁文才的队伍会合。袁文才得知毛泽东是党中央委员，还听说他能文能武，非常高兴，像迎接自己的亲人一样，接待了毛泽东的队伍。在交谈中，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并表示革命军以后要与自卫军协同作战。在这次会合中，毛泽东把他一起上山的战友向袁文才作了介绍，袁文才也把山上的同志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同见面的每个人一一握手，表示问候。当袁文才领着毛泽东来到贺子珍面前时，毛泽东有些惊讶了。他没想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然有一位年轻的姑娘。袁文才介绍说：“她叫贺子珍，是永新的干部。前不久，她从永新带来一支队伍与我们会合，别看她只有十七岁，去年就加入了共产党，也算老革命啦！”听到这

里，贺子珍的脸涨得通红。毛泽东握着贺子珍的手说：“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这是1927年10月发生的事情，也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第一次见面的经过。

说是共同战斗，其实这时期贺子珍与毛泽东接触并不很多。时间推移到1928年6月，红军第三次攻下永新后，贺子珍根据党的安排，带领工作队到西乡塘边村，领导打土豪分田地的的工作。她到塘边村，住在一个贫农老婆婆的家里。不久，毛泽东也带领一部分战士来到塘边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处，工作队只好也安排他住在这个老婆婆的家里，毛泽东这次来塘边，主要是了解当地如何分配田地，想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所以他一住下来，就立刻要求贺子珍和工作队的同志汇报情况。汇报中毛泽东记录得很认真，也问得很详细，有些情况贺子珍及其他工作队员说得不太准，毛泽东丝毫没有责备之意，并开导他们，向他们传授调查研究的过硬功夫。毛泽东讲得绘声绘色，工作队员听得十分认真，贺子珍更是睁大眼睛听，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之情，不禁油然而生。汇报结束时，毛泽东提出要开几个调查会，请工作队帮助安排一下。贺子珍自告奋勇地承担了这个任务。

贺子珍一边筹备开调查会的准备工作。一边留神观察毛泽东的工作方法。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她深深感到，能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对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很有帮助。正当他们工作得得心应手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一天，外县的一支地主保安队向塘边村袭来，扬言要捉拿毛泽东，到蒋介石面前领取重赏。这时，正在同毛泽东一起分析调查材料的贺子珍，听到枪声后大吃一惊。驻在这里的红军连队和毛泽东的警卫班都到各个庄子做群众工作去

了。一时无法集中，毛泽东的安全怎么办？在她毫无主张的时刻，抬头看了看毛泽东，他却非常冷静，仍然大口大口地吸着烟，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实际上毛泽东头脑冷静，思绪清晰。他认为在不知敌人底细的情况下，冒险之仗不能打，于是立即决定：“通知群众，马上撤离！”，敌人进村了，找不到人，知道这里的老百姓有了准备，在村子里抢掠一阵子便走了。在炮火纷飞的年代，同许多的战役相比，这乃是小事一桩，但在贺子珍的生活中，却是一次关键性的、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她亲眼看到毛泽东在危急的时刻，是那样沉着果断，又一次感到自己年轻幼稚，而毛泽东不仅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同时具有一个革命家、军事家的伟大气魄。如果说见面初期毛泽东与贺子珍是同志关系，那么这时候他们的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贺子珍长得婷婷玉立，被誉为“永新第一美人”，虽说是反封建的先锋战士，但一想到自己在悄悄爱恋着一个人，胸口怦怦直跳，平时那种落落大方的神态变了，有时见到毛泽东还怪不好意思的。有一次，贺子珍外出工作回来，像往常一样轻手轻脚地准备走进毛泽东的房间。她见毛泽东正在伏案写着什么，便一声不响地倚在门坎上，深情地注视着。也不知过了多久，毛泽东停笔沉思，一抬头，正遇上那双火热的眼睛。贺子珍赶紧把目光移到自己的脚尖上，极不自然地抚摸着自已的上衣纽扣。就在这一瞬间，双方都意识到了那个意思。还是毛泽东成熟老练，急忙招呼贺子珍坐下，用他那满口湘音的韶山话坦率地说：“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停了一会，他又讲起了自己的经历和身世。

贺子珍从谈话中，知道他为了追求革命、献身革命所走

过的坎坷道路。那天，他们谈了很久，很投机。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身世，在他们的心灵上引起了共鸣。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追求革命，他们彼此产生了爱慕之情。贺子珍看到毛泽东工作繁重，生活得不到合理的照料，自己便默默地承担了这一工作。毛泽东为能得到这样一位年轻姑娘的悉心关照，常常露出会心的微笑。从此，他们深深地相爱了。

自从那次地主保安队袭击后，他们又在塘边村工作了一个时期。早稻成熟了，田野一片金黄，乡亲们喜气洋洋欢庆丰收，毛泽东和贺子珍也参加了收割稻子的劳动。没过多久，也就是1928年9月一天，由袁文才提议，并征得毛泽东、贺子珍的同意，由袁文才掌锅炒了几个菜，把大家召集起来，吃了一顿饭，热闹了好一阵子。袁文才趁大家欢乐达到高潮的时候，当众公布了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婚事，他们的夫妻生活便从这里开始了。

（摘自1987年第5期《名人传记》。）

相爱·离婚·六个孩子

贺子珍是在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降生的，她父母因此给她起了一个娇滴滴的、富有诗意的名字“桂圆”。在中国，桂是八月的意思，而桂圆即龙眼，与荔枝差不多的一种水果。她长大成人后，觉得桂圆这个名字“太软绵绵了”，便改为子珍，意为珍贵的孩子。她长得很漂亮，可算得永新城里的一位美人，白嫩的皮肤，明亮的眼睛，活泼热情，又娴熟诗书。她是学校里最早从事革命事业的女子之一。她领导同班同学剪去长辫，推倒了庙宇神龛里的菩萨。她高昂圆润的声音和善于表演的才能更使全县的人望尘莫及。她是永新县中遭国民党通缉的首批人员之一。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她参与领导了三个县的起义，使监禁在狱中等待处决的二十八名共产党员（其中包括她的一个哥哥）得救。贺子珍她们在起义时仅有几支老式步枪，但是他们闹得满城风雨，终于取得了胜利。（井冈山王佐这帮土匪也参与了这次行动。）

贺子珍就在井冈山地区活动，后来跟随毛泽东上了山。不久她便从事敌后的危险工作。有一次她不得不装成奄奄一息的病妇人才使自己免遭逮捕。另一次，她在执行一次侦察任务时，把遭伏击的毛泽东和朱德救了出来。她跳上一匹马，双手各握一支手枪，一口气奔驰了十几里，转移了敌人的注意力，使毛泽东和朱德得以脱险。

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井冈山相遇。她是个刚

从福音教会中学出来的优秀生，身材苗条，充满活力。她加入毛在井冈山的队伍之前就已在当地农民秋收起义中作过战。

不仅仅贺子珍本人是个革命者（她于一九二六年十六岁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她的全家在其父亲的影响下都从事革命工作。她父亲是个开设茶馆的小商人，但也是主张变革的爱国者。共产党放弃江西，踏上长征之路的时候，贺子珍的父亲是遭国民党报复屠杀的首批人员之一。贺的一家住在井冈山北面永新县的黄竹岭，属红军的作战地区。贺子珍的母亲是位聪明能干的人，主持家务。从一九二七年起，贺家的其他成员都投入了革命工作，贺子珍的四个兄弟都参加了革命。其中之一当地下交通员，在送信时被截获，遭杀害。

毛的夫人贺子珍在长征途中没有与其丈夫一道行军。按规定夫妇不能在一起，而且这个规定很严格。参加长征的红一方面军中只有三十名妇女干部，女护士和女勤务兵也寥寥无几。但并非其他各军都是如此。四方面军就有两千名妇女，还组成一个妇女独立团，该团在长征中曾经历了一些殊死的战斗。

贺子珍由于怀孕，便与大多数妇女一起被分配在休养连。她只有在周末或在驻军休整的几天里才与毛见面，而这种休整在初期是极少的。他们可能比别的夫妇见面机会略多一些，但也多不了多少。自从井冈山时期以来，“星期六晚上见面”的规定一直在执行。若遇丈夫有病，妻子需要照顾丈夫，则可以例外。除此之外，这一规定在长征中从来没有改变过。

幸存下来的指挥员和医务人员都坚持说，长征中不存在任何严重的两性关系问题。部队行军途中接触妇女的机会不

多，当然，主力部队中也没有多少妇女。一九三六年朱德曾告诉过海伦·斯诺，在长征初期，确有强奸的问题，后来由于严明了纪律，这种现象得以控制。强奸犯经军法审判后当场处决，部队到达延安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但是，当时在陕北城镇居民中，梅毒仍很流行。

尽管红军的领导人原则上已经打破了有关两性关系的所谓封建观念，但红军仍有浓厚的清教徒色彩，干部战士未经正式批准不得结婚，干部和军官获准才能结婚，但并非轻易能得到批准的。

很多年之后，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产生了离婚问题，党不得不进行审议，并对于是否允许离婚作出裁决。红军在极大程度上是由青少年组成的。约百分之五十四的战士都在二十四岁以下。据傅连暉大夫估计，百分之九十的人未曾有过性生活的经历，危秀英是个黄花闺女，曾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她记得当她和一位青年战士一起跳水过河时，引起了那位战士的惊慌。她的黑裙子一直卷到臀部，这位战士喊道：

“你受伤了吗？”她意识到，他看到了她的月经流血。他不知道妇女还有月经。在这方面许多战士与他一样无知。

一支红军部队距离主要渡口以北的云南边界越来越近了，傍晚抵达云贵边界的盘县羊场，贺子珍在赤水河渡口附近生完孩子后，又回到休养连。一天，连队正在休息，敌机突然出现在上空，许多伤病员都无法立即离开担架。

“快！”贺子珍喊道，“快把伤员隐蔽起来！”

大家还没有来得及行动，一架飞机就俯冲下来，投下了一串小炸弹，并用机枪向人群扫射。好几个担架员被打死了。贺子珍看见一名受伤的干部正努力从担架上往外爬。他是在娄山关受伤的团政委钟赤兵。当那架飞机返回来再次攻击时，

贺子珍扑倒在她身上。一枚炸弹的弹片使她十七处负伤，包括头部的一处重伤，她倒在血泊之中，她一连昏迷了好几天。醒来后，她告诉护士不要让毛知道她负了伤。她说：“他很忙，我不想让他操心。”她要求医生把她留在一个农民的茅棚里养伤。医生坚持不同意，而是用担架抬着她上路，有时走到难行之处就背着她走。

从此，贺子珍就和悲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她到了延安，体质虚弱。她在那儿生了个女儿，取名李敏，昵称娇娇。她

因为毛与一个来自上海、名叫吴丽丽的漂亮女演员眉来眼去而与毛吵了架。吴丽丽的中文名字是吴匡柳。她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曾担任史沫特莱和海伦·斯诺的翻译，她是在她与史沫特莱和海伦·斯诺合住的窑洞里认识毛的，因毛有时上那儿去。毛喜欢喝咖啡，用饼干蘸着咖啡吃，爱玩单人纸牌或在她们采访时听史沫特莱的手提式留声机。吴丽丽在延安剧团上演的剧目中担任过角色，包括高尔基的《母亲》。贺子珍曾责怪史沫特莱怂恿她的丈夫与别人调情。据斯诺夫人说，有一次她还威胁说要杀史沫特莱。史沫特莱当了真，与斯诺夫人易床而眠。后来，这场丑闻使吴丽丽被调离延安，史沫特莱也提前离去。

一九三七年，贺子珍离开延安前往西安，想从那里去上海治病，可是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上海。她得到了毛的同意后去了莫斯科，在那里她生下了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一个男孩。据刘英回忆，当时，贺心情很愉快。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上一路都很高兴。刘英是随行者之一，同行的还有毛以前在长沙的老师、年长的徐特立，党内历史学家，失去了双腿的徐梦秋，以及在长征途中被贺子珍救过命的指挥员钟赤兵和独臂将军蔡树藩。

毛泽东是同意此行的。他觉得贺子珍怀孕生孩子占去的时间太多，从来没有真正的学习机会。她在莫斯科也许既能得到治疗，又能学习。但事与愿违，她的小男孩在托儿所得肺炎死了。那里没有青霉素。从此她精神深受刺激，在莫斯科长期待了下来。毛把他们的女儿娇娇送去陪她。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她与毛通过娇娇通了几封信。她给他送了些礼物——他喜欢吃的新鲜雪里红，一只冬笋和几个瓜。毛给她送了些中国水果。

直到一九四八年贺子珍才回到中国。这时毛早已与她离婚（得到了党的批准），并和江青结了婚。江对贺十分冷漠。西方的一些猜测是不对的，江青到延安与贺子珍去莫斯科这两者之间没有联系。用小刘英的话来说，“毛身边无人，江青就是钻了这个空子。”

贺子珍想回北京，可是江青设法让她最近只能到天津。一九五〇年，贺子珍和毛在上海见了一面，后来在庐山又见了一次。她的身体在一段时间里还不错，但恢复得不很稳定，有时会产生幻觉和偏执的恐惧感。在上海的时候，她住在一所普通公寓的一个小间里。老司令员陈毅当时是上海市市长，听说她在那儿，便出面帮她的忙。一九六〇年陈毅离开上海时，将她迁入了他原先居住的二层小楼，但是她的生活依然与世隔绝。江青的阴影时刻笼罩着她。江青甚至一度使娇娇疏远了自己的母亲。老战友照例是不允许去看望她的。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后，贺子珍要求去北京。但直到江青“四人帮”一伙被捕以后，她才获准透过毛的玻璃棺瞻仰了遗容。（北京有未经证实的谣传说贺子珍曾在调查江青时作过证。）一些与贺子珍一起经历了长征的妇女到她住的

军队医院来看望她。她坐在轮椅上接待了她们，热泪盈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一九七九年六月，她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她的名字第一次在报上出现。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九日，贺子珍在上海去世。公布死因为中风。实际上，多少年来，她一直处于半瘫痪状态。当然，早在长征时她就负伤了，现在去世，就如同一九三五年那颗炸弹在贵州把她当场炸死一样，她的死，使她成为随一方面军完成长征的三十位年轻女性中的第十五名死者。

刘英说：“她是一个朴实的农村姑娘。”在长征中曾照料过她的毛的警卫员吴吉清说：“她是个勇敢刚毅的女同志。”

很可能是在刚过赤水河以后，悲惨的遭遇再次降临到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身上来了。一天晚上九时，在傅连璋医生的看护下，她生下了一个女孩，这是她的第四个孩子。当时国民党正在追赶红军，毛和红军总部凌晨四时就要撤离，因此无法作出照料婴儿的适当安排，也不可能把孩子带着一起长征，孩子生下来几小时后就从贺子珍那里抱走，也没来得及给孩子起个名字，只用一块黑布把孩子裹着，连同十六到二十四块银元托付给一对农民夫妇抚养。这对夫妇保证照顾好小孩。天亮前，毛、贺和红军又启程了，后面是紧追的敌人。以后再也没有打听到那个女孩的下落。

长征过来大多数的夫人都不操持家务。康克清宣称她从来没有照料过朱德。他有贴身警卫为他做饭缝补，也为他做饭。康克清没有当过家庭主妇。她的父亲是渔民，一贫如洗家里把每一个出生的女婴送给另外一家贫苦农民——甚至是分文不取的白送。女孩子便成为仆人、雇农或守着锅灶的家奴。康克清生下后刚满月便送了人，她奴隶般地生活，直到

十五岁才逃出去参加了红军。朱德的身世也一样，他家有五名婴儿都因养活不起而被溺死。他自己被送给一家没有后嗣的亲戚，并进了一个地主子弟学校读书。他如是个女孩子，一出生就会被溺死。也许正因为朱德和康克清有过共同的遭遇，才使他们这样情投意合。康在与朱德结婚前一直是个普通战士。当时她本应做政治工作，长征前夕，她正好在一个拥有八百名战士的营里，营长在一次进攻中阵亡，战士们让她来指挥。他们击败了敌军。红军称她为“女司令员”。

贺子珍则不同。她喜欢照料毛泽东，而且一有机会就这么做。她善于烹调，为毛制作他爱吃的湖南风味菜。毛泽东非常喜欢吃辣椒，特别是贺子珍做的辣椒汤。“不喜欢红辣椒，你就成不了好的革命者。”毛泽东喜欢这么说。

（摘自《井冈山纪念馆资料》）

毛泽东为何没参加南昌起义

毛泽东没有参加南昌起义，按照中央委员会的命令，他正忙于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这是一次以攻占长沙为目标的农村起义。

毛泽东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发动秋收起义，使用一面他自己设计的旗帜——一颗红星中间有一柄锤子和一把镰刀。起义结束了，九月十九日，毛泽东率领所剩的约一千人来到通往井冈山途中的文家市村。在文家市，他站在里仁学校泥泞的操场里临时搭起的讲台上高声问他的部下：“我们有没有胆量把革命进行下去？”人们答道：“有！”

井冈山是峻峭的岩层露头组成的山脉，海拔四千至五千英尺，是毛泽东的家乡湖南与江西的分界线。在中国，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偏僻了。井冈山位于两省交界处，向两边伸展，没有道路，森林茂密。千百年来，这里是亡命之徒出没的地方。没有任何一届政府认真地调查过井冈山一带的情况。

毛泽东了解井冈山，井冈山正好符合他当时的需要——在这里，可以聚集力量，可以检查他酝酿中的暴力革命理论，还可以用共产主义的实践来教育农民。

用湖南人的话说，毛泽东是个“上通天文，下知地理”的人，也就是说，他通晓长沙地区的情况。井冈山这个名字对他并不陌生。政府鞭长莫及，整个地区由王、袁两股土匪控制着。袁自称大刀会，在茅坪周围活动，王的领地在山

上。

近来，毛泽东听说王、袁表现出某些有觉悟的迹象。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他们允许一支共产党部队通过他们的领地到上海去参加北伐。一九二七年一月，他们参加攻打永新县城，帮助解救了关在永新监狱的共产党员。假如毛能把王、袁这些人争取过来，他们可以成为一支可观的力量。但如他们反对，准会使毛泽东在井冈山站不住脚。

上井冈山是一场冒险——这里没有道路，田地荒芜，没有工业，山上没有学校，也没有什么地主的财产可以没收来补给毛泽东的队伍。井冈山充斥着迷信。人们相信鬼神和中国的所谓风水术，在他们看来，风水先生可以预卜男女是否可以结婚，可以使妇女生子，可以测定房屋和水井的最佳位置，能治愈疾病，还能用符咒迷惑敌人或对手。很少有人冒险进山。也没有人出山。这里对外界一无所知，一支国民党部队竟在这里悬赏捉拿一个名叫苏维埃的共产党领导人。而苏维埃是俄文Soviet（代表会议）一词的中文译音。

县城里有两三个中医，用中草药治病行医。没有报纸，也没有书店。各种罪恶——奴役、压迫、卖淫、梅毒、高利贷——在旧中国的一切落后现象在井冈山应有尽有。山上居住着很多结有世仇的家族，他们的仇恨是多少年流传下来的，有些甚至搞不清起源于何时了。

后来，一些在苏联培养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就开创井冈山根据地的问题批评毛泽东。他们指责他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说他没有依靠无产阶级，即城市工人阶级，说他应当攻打大城市，而不应当从他们叫作没落分子的土匪、乞丐、妓女、被遗弃的社会渣滓中拉队伍。他们说毛与土匪头子差不多，说他信奉的是枪杆子而不是《资本论》。

其实，早在到达井冈山之前，毛已经受过批评和处分。（他过去受过批评、将来还要受批评。）理由是秋收起义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攻打长沙；他因而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免除了在湖南省委的职务。这个消息过了几个月才传入荒凉的井冈山。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作出上井冈山的决心。井冈山酷似《水浒传》里那些绿林好汉的巢穴，毛泽东正是一辈子颇喜欢看这本中国古典小说的。

毛泽东要实现理想的任务绝非易事。但困难和危险对他并不陌生。仅仅在几个星期之前，他在为秋收起义招兵买马时还被民团逮捕过。士兵们拿走了他的鞋子（作为战利品，而且说把他的鞋子拿走之后，将来他的鬼魂就不能追赶他们了），把他押到司令部去枪毙。后来他回忆说，他向另一个犯人借了几块银元，想用来买通押解者逃跑，结果没有成功。但后来他还是设法在路上逃掉了，他在丛林里一直躲到天黑。第二天，他用借来的钱买了新鞋、一把雨伞和吃的东西，逃到了安全地带。韩素音听说，甚至在他初上井冈山时，他部下的一些军官还密谋要杀害他哩。

（摘自《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一封伪造的阴谋信

1930年12月中旬的一天半夜，当时任红军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同志突然接到一封信，信是当时任红军总政委的毛泽东写给古柏（毛泽东的秘书）同志的。彭总打开一看，信中大意是：要在审讯AB团（反革命组织）中，逼供出彭德怀也是AB团，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

彭总看完信，头脑中马上回想起毛泽东同志建设工农革命军、建设井冈山根据地、传达“六大”决议、争取袁文才、王佐联盟、严肃批评乱杀两个群众的事。他想：“毛泽东决不是一个阴谋家，而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他认定了这封信是伪造的，是一个分裂红军一、三军团的险恶阴谋。

第二天，彭总立即召开三军团紧急前委会议，先给到会的同志看了那封挑拨信，接着派一个班把信送到毛泽东那里，然后谈了自己的看法，并判断出这封信是富田事变的头子丛永中写的。他平日学毛体字，学得比较象，但还是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写信，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不用罗马和阿拉伯字。而这封伪造信却用的是阿拉伯字。接着，彭总又讲了毛泽东的一些好话，他的一番讲话，稳定了大家的情绪，也擦亮了大家的眼睛。会上通过宣言：“反对反革命的富田事变，打倒AB团，拥护总前委，拥护毛政委；一、三军团团结一致粉碎国民党进攻。会后第二天，彭总又将三军团开到离总前委15里的地方，亲自去请毛政委来三军团干部会上讲话。这下，敌人的挑拨不但未能成功，红军团团结得反而

更坚强了。但白军前线指挥张辉瓒却发生了错觉，以为红军内部分裂了，迅速进到龙岗，结果全师被歼，他本人也成了俘虏。

第一次“围剿”的胜利，是与彭总以光明磊落的态度处理敌人的挑拨信分不开的。直到1965年，毛泽东还记得这件事，称赞彭总“这件事处理得好”。

（摘自《彭德怀自述》）

毛泽东脱险记

在1927年秋收起义中，毛泽东同志在安源布置完工作后，在潘心源和易子义陪同下奔赴浏阳铜鼓第三团。他化名安源煤矿采购员张先生，又叫易子义改名绍钦，三人绕过敌人盘踞的萍乡，进入浏阳万载山区，到浏阳和铜鼓边界时，发现关卡盘问严格，埃户团的流动哨特别多，当毛泽东三人到浏阳张家坊一家伙铺吃早饭时，一伙反动的埃户团埃家埃户敲门查人抓人。几个团丁进来盘问，毛泽东从口袋里掏出证明信回答说：“我是安源采购员”。团丁没有发现什么破绽就走了。但没过一会，有两个团丁返回来，说埃户团小队要他们三个到团防局走一趟，五个团丁前后左右紧紧跟着，寸步不离。后来毛泽东假装脚痛，一拐一拐地走得很慢，潘心源和易绍钦见状，有意走快些，使一行拉成两节。毛泽东趁和一个矮个子团丁闲谈，后给他一把铜钱说：“这些钱给你买茶喝吧。”矮个子团丁接过钱以后，使了个眼色让他走。他正要回身，却被另一个团丁发现，跑过来说：“别走！”毛泽东又从口袋里掏出一点钱递过去：“就是这一点了，再没有啦！”团丁接过钱，加紧步伐往前走，让毛泽东走在最后。在一个小村口，毛泽东纵身一跳，跨过水沟，迅速地闪到一栋草丛后面。前面敌人见毛泽东跑了，就派两个团丁继续追赶。毛泽东在一个拐弯处，跳进路边一条水沟里，借着沟边茅草灌木的掩护，将整个身子都躺在水沟里，团丁两次都走到了毛泽东的身边，都始终没有发觉，只好端着梭镖离开。

后来潘心源、易绍钦被关进团防局。毛泽东在张家坊脱险后，经一个樵夫的帮助，才到铜鼓找到三团的张启龙、彭商仁等负责同志，传达了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的决议和举行湘赣边秋收起义的部署，要求各部队迅速做起义的准备工作的。

（摘自《爱晚报》1987.3.11）

毛泽东被软禁于都的传说

当时传说毛泽东在于都受到了软禁。他虽是政治局委员，但不能前往瑞金同政治局磋商，他同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之间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了。多年来，一直流传着这种说法。但看来，他显然未被软禁。与本书作者交谈过长征时期所有重要的幸存者和当代中国党史学家及档案管理人员都肯定了这一点。但是，在决定撤离中央苏区并执行这一决定的日子里却把毛派往于都，这种主意至少是难以被人理解的。毛也不可能那么急切地需要亲自去于都搞他的“调查研究”。当时担任翻译因而了解内情的伍修权将军认为，有些人不想让毛参加长征。“毛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的”，伍说：“去于都调查，这只不过是~~不让他参加的一个借口~~罢了。”

一九三四年春天就有人要把毛泽东转到苏联去“治病”。博古和李德向莫斯科提出这个建议。这显然是李德的主意（虽然他在回忆录里只字不提）。但是莫斯科没有同意。共产国际认为，尽管他和毛有分歧，但是毛的威信和名字还是有用的。另外，据翻译伍修权说，毛曾声明：“我不去，我不离开中国。”

气氛很紧张。据说，有一次，毛泽东和埃德加·斯诺在保安的一条街上看到博古时，毛告诉斯诺：“那个人曾经要置我于死地。”假如一九三四年夏末秋初时，有人要把毛干掉，那并没有什么奇怪。但是，至今没有明确的证据能说明确实有过强迫毛留在苏区的计划。

毛到达于都后，很难再去离于都有一两天路程之遥的党政中央机关了。不过，他的私人警卫员还没有被撤掉，而且他依旧可以在于都和附近地区自由活动。

毛在于都的生活和他一九三四年九月在云石山的生活很不一样。在云石山时，从一个石崖往上走两层石阶，就到了他住的一所漂亮的小庙，离红军总部不到一英里。他的政治局同事、到那时为止一直支持李德的洛甫也住在小庙的一厢，这使他们俩有机会进行密切的交谈，后来发现这些交谈是非常重要的。那时，毛可以随便出入红军总部。但由于他的意见无人置理，他也就很少前往了。政治局开会他很少得到通知。由于他是苏维埃主席，所以中央政府机关他还是要去的。那地方不远，名叫沙洲坝。中央政府机关占据了一座一九二二年由杨氏家族建造的颇为壮观的祠堂。毛在那里住过一年左右。杨家祠堂里有一座雅致的两层议事厅，暗红木架房，石板铺地。朱德和妻子康克清，陈毅和周恩来也住在这里。不过，朱德夫妇象陈毅（直到他负伤以前）和周恩来一样，通常是在前线。

有意把毛泽东排除在决策圈之外还不是事情的全部。这时，和其它一些紧张的时期一样，毛泽东又是疾病缠身了。从一九三四年仲夏到十月，由于身患疟疾，他时而卧床不起，时而只能勉强活动一下。他总是精力很差，情绪低沉。

（摘自《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周恩来一度取代毛泽东

毛泽东在红军长征前夕，被剥夺了领导权。红军突破了长江重围之后，他先后和王稼祥、周恩来会面。一直掌握着部分领导权的周恩来，在李德、博古等人操纵大权之后的错误的指挥下，他头脑清醒、千方百计挽救危局。在龙胜县境侗族村寨的小木楼上，他拜访了毛泽东，两人围坐火塘打着“牙祭。”周恩来一方面向毛泽东请计问计，一方面谈论挽救危局的良策。随后，红军摆脱了10万敌人的追击，渡过乌江，在遵义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议。午夜休会后，我们随着一盏马灯，在卖碗糕的石桥旁，可以听见周恩来在追寻毛泽东商讨大计。在谈到总的领导责任的时候，毛泽东说：“这个问题，我看更不要匆忙，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军事指挥问题，很明显，李德是不能再搞下去了。”

周恩来说：“那是自然，军事指挥还是由你来搞。”

毛泽东说：“不，这样变动太大，恩来，还是你军事上负总责吧，我来协助你。”

“如果你不接受我的意见，那只好在会上说了。”

遵义会议的结果，在军事上取消了三人团（李德、博古、周恩来）。以朱德、周恩来为最高军事指挥者，毛泽东为军事指挥上协助者。为了内部的思想稳定，毛泽东雄才大略，只求自己的思想进入领导，以团结内部，挽救危局。周恩来品德高尚，不计较个人地位，千方百计请贤让贤，一个场面一个环境同时描写了两个领导人。

遵义会议后，红军统帅部急切要乘遵义大捷，再吞掉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一个师。会议以少数服从多数决定发起这个战斗。周恩来拟好了作战命令已是半夜了，毛泽东提着马灯敲门来见，他坚决不同意打这一仗。他指着地图进一步说明，红军处于敌人100个团的包围之中，如果这一仗不能很快结束，红军将陷于难以摆脱的重围。

在这个关系红军成败的重大问题上，我们看到了周恩来的虚怀苦谷和含笑的脸色。他们风趣地说“寒夜客来茶当酒”，举杯相邀喝浓茶。天明之后，周恩来重又召集紧急会议，决定放弃攻打鼓新场的战斗方案。事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领导小组。这一决定取代了“周恩来为军事指挥最后决策负责人”。实际上周恩来的权力削弱了，毛泽东的权力增强了。这种权力变化之后，两人走在田间小径上，周恩来如愿以偿，神色爽朗地说：“这就好了，今后要更多地打胜仗了！”

以后，他们并肩作战，指挥红军健儿一路胜利进军，终于到达陕北。

（摘自《文摘旬刊》第257、253期）

毛泽东的两个弟弟

毛泽民，湖南湘潭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安源煤矿从事工人运动，组织工人俱乐部。一九二五年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一九三一年任闽粤赣军区经理部部长。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家银行行长。一九三四年十月参加长征。红军到达陕北后，任国民经济部部长。一九三八年由党派到新疆工作，任财政厅厅长、民政厅厅长等职。一九四二年被军阀盛世才逮捕，次年九月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英勇牺牲。

毛泽覃，字润菊，湖南湘潭人。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湖南常宁水口山和长沙从事工人运动。一九二五年以后曾先后在黄埔军校、中共广东区委、广东省农民协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作。南昌起义后在叶挺的十一军政治部工作。上井冈山后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团三营党代表。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四军向赣南转移后，在赣西南从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先后任中共东固区委书记、中共闽西南特委委员、红三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吉安县委书记、赣西南后方办事处主任和中共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独立五师政治委员和师长等职。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委员和红军独立师师长。一九三五年二月底或三月初，毛泽覃带领大约二十名游击队战士离开于都以东的山区去闽西。他可能是向长汀进发。

他在离瑞金十英里的山区红林附近一所土房中停留了一

夜。四月二十三日早晨天亮前不久，泽覃嘱咐一个战士站岗警戒，注意可疑的迹象，谁知，这个哨兵找到一块草地，躺下便睡着了。一队国民党巡逻兵经过那里发现了。他招供附近房子里有十来个人带着枪，其中有毛泽覃。国民党立即包围了这所房子，泽覃把其他人送出后门，自己挡住前门作掩护，击毙了最先闯进来的敌人。可是一名国民党士兵从背后击中了他。

毛泽覃死后，国民党大事喧嚷，报纸作了大量报道。他的尸体被送到瑞金示众，报上登了许多照片。蒋介石传令，特别嘉奖他的第二十四师师长。今天，泽覃牺牲时所在的村子以他的名字命名。那个漫不经心（或叛变）的哨兵直到今天也没有找到。

（摘自《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上海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对两个土匪

井冈山地区并不险峻。毛泽东也没有象我一直想象的那样爬上高耸的山顶，然后象沃尔特·司各脱爵士描写的高地头领那样建寨扎营。整个地区大约有一千二百平方英里，六十多英里长，二十英里宽，全部或部分囊括了六个县，人口约九十万。一共有五个不小的镇子，还有大约十二个小村子。山顶高度和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战地钟声》一书中的马德雷山脉差不多。毛在山顶修筑了一个堡垒，周围有五个哨兵，每个哨口都有石头砌的枪眼和石头掩体，各面安放着几挺重机枪和三门迫击炮，其中只有一门能打响。三条陡峭山路通向供哨兵使用的石头小掩体。顶峰几乎无法攻占的。

毛泽东对山下的镇子很感兴趣，在这里，他建立了司令部，和部下们忙于组织地方苏维埃，宣传共产主义，招兵买马，扩大根据地。

但是，他首先必须和土匪们搞好关系。袁文才、王佐一伙活动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一九二一年。还有一些土匪的历史更长，人们多记不得他们到底存在多久了。每一股土匪都有二三百人，五六十支步枪。毛泽东先从袁文才入手。从理论上讲，袁文才这时早已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了。但他处处提防着毛。和这偏僻地方所有的人一样，他对陌生人怀着戒心。开始只要一提起毛泽东，人们就纷纷逃跑。但是，出于好奇心并看到这支队伍的行为规矩，人们又开始返回自己的住地。毛泽东的头发又长又乱，与其说是中国人，不如说更象个莫霍克

族人。他常和人家拉家长，和农民处的很好。他会走到一个男人面前，问：“你叫什么名子，大哥？”或者对一位妇女说：“大嫂，怎么称呼你？”人们的恐惧感很快就消失了。但袁文才还是很谨慎，他担心，毛泽东想消灭他，然后吞并他的队伍。

一九二七年十月六日，毛泽东在茅坪附近的大仓村和袁文才会面。毛解释说，他是共产党，他的部队在那里不是要干涉袁的活动，而是要和人民一起改善他们的命运。他的军队不是国民党军队，不会压迫老百姓。袁终于同意支持毛——但是要有个代价。毛给他一百支步枪。袁付给毛一些银元，并且同意在毛的司令部所在地茅坪的原攀龙书院的房子里建一所小医院。

茅坪是一个环境宜人的山麓小镇，有一百多户人家，大约七百人。毛找到一所漂亮的带院子的老房子作为自己的住处。这个院子就是谢家祠堂（茅坪几乎所有的人都姓谢），房子的顶层是一个很少见的八角形小楼，毛把他当作书房。星转月移，他在这里写出了两本小册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这是他第一次阐述关于使用武装力量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理论。

王佐就比较难对付了。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荆竹山停留并会见王佐一些人。王同意第二天在靠近山顶的大井村和毛会面。井冈山由山上的“五井”而得名。五个村子象九子棋一样排开，分别叫做大井、小井、中井、上井和下井，每个村子都是四周峭壁，危崖高耸。一些想象力丰富的中国人认为，从上往下看，这些村子都象水井似的。

王总是心猿意马。最后，毛派了一个可靠的人——何长工去做他的工作，把他争取过来。何长工发现王佐面临着一

个棘手的问题：他有个难以制服的对手——土匪头领尹道一，控制着赣州附近的三个县，妨碍他的利益。王表示，如果共产党能帮助他除掉尹，他就可以帮助共产党。何长工答应了，并于一九二八年二月率领两支小队和王的一些人在拿山伏击并活捉了尹和尹的一些部下。据一位现代历史学家说：

“王佐手下的人高兴之极，他们把尹道一的脑袋砍下来，连夜带给了王。”王当然也很高兴。这件事使他对共产党的信誉和能力确信无疑，他投到了他们一边，并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加入了共产党。

井冈山绝不仅仅是个盗匪出没的地方，后来很快变成了一个大有作为的革命根据地，一九二八五月四日，朱德带领队伍来到宁冈，同毛的队伍会合，宣布成立工农红军第四军。党代表陈毅也和朱德一起来了。毛和朱在龙江边的一片空地上见了面。这里四面空旷，登上附近一座庭院的屋顶平台，可以看到带有飞檐的灰色槽形的屋顶，他们坐下来，谈了很多很多，在这里开始一起建立朱毛军队和军事政权，这个军事政权后来成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核心。

朱德带来了近一千人的队伍，毛泽东原有一千二三百人。朱和毛逐渐扩大了根据地，奠定了一个独立的苏区的基础，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最初贡献。这个基础在赣南的中央苏区得到发展，又在陕北的延安进一步完善，后来成了中国革命政权的摇篮。

初上井冈山的日子是相当平静的。地方军阀相互争斗，无暇顾及这片荒山里发生的事情。但不久形势就开始紧张了。广西的李宗仁和湖南的唐生智握手言和，把部队拉回来要打“赤匪”了。还出现了另一个问题。朱毛部队实力倍增，根据地容纳不下了。他们现有四千一二百人的第四军和八百人

的第五军，山里没有足够的食物养活这么多的部队，必须另找地盘。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朱毛军队开始向山下转移，留下彭德怀（他后来成为红军最优秀的指挥员之一）和滕代远领导的第五军，任务是尽可能坚持保卫根据地，然后同大部队会合。这个阶段很快就结束了。在敌人强攻之下，第五军溃散，幼年的苏维埃被压垮了。到了一九二九年三月，住在山顶苏区村庄里大约二千人当中，一千人被杀害。有些村子的房屋全部被付之一炬。这都是吴尚和他的湖南军阀干的。

有一点要说明。毛曾告诉埃德加·斯诺，红军撤离井冈山后，袁、王二人又恢复了他们的土匪习气，被农民杀了。他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故态复萌。在他们进行了一次烧杀掳掠之后，湘赣边区的地下特委会决定处决他们两人。决定是一九三〇年一月中旬作出的。二月下旬，可能是二月二十五日，这两个人被请去参加永新县特委会的一次会议。他们带几个随从去了，在当地一个旅馆下榻。半夜，执行小队包围了旅馆，破门而入杀了袁。王跳出后窗，骑上马在夜色中飞驰而去，但掉到河里淹死了——至少传说是如此。

当地的土匪就这样被瓦解了，其中一些人——但不是所有的人——参加了共产党队伍。这有的人回到山上投奔了王的兄弟王云龙。井冈山又落到了土匪手里。从那以后二十年之久，直到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没有任何一个共产党人，没有任何一个红军战士能够进入这个革命圣地。只是在二十年之后，共产党才又回到井冈山顶。然而，在这里，毛曾建立了中国农村第一个苏维埃，并开始了名垂中国史册的长期斗争。

时至一九四九年，王的兄弟早已去世，由他的儿子统治

着井冈山。后来红军捉住并处死了他。对于袁和王，特别是对于他们的结局，迄今还有争论。毛告诉斯诺的是这两人碰巧被觉醒的农民杀了。然而，现在井冈山地区的官员却把这件事描述得比较正式：特委会开了会，正式决定处决他们，等等。“文革”期间，又出现了另一种说法。大字报指责彭德怀“谋杀”了袁和王。这是韩素音提到的，但她并不相信红卫兵的话。

（摘自《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担架上的“阴谋”

一过于都河，毛泽东便开始坐担架长征。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他不习惯在乡间走路。红军的领导人中大概没有谁比他在中国的穷乡僻壤翻山越岭走过更多的路程。从孩提时起，不论到哪里，他都是徒步行走。一个农民的孩子是没有其他交通工具的。在长沙师范学习期间，他与朋友肖瑜在星期六里步行周游了湘南的六个县。他们沿路乞讨，这是肖瑜的主意。两人身无分文，衣衫褴褛，带着破伞和小包，装着笔记本和换洗内衣。他们靠农民、偶尔也靠城里人的施舍为生。这次外出周游既是一次探险，也是一次考察。他们发现，依靠自己的机智和人们的慷慨可以生活下去。这时，毛泽东第一次开始用分析的眼光来研究农村。

这次与肖一道外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他一九二七年一、二月考察农民运动的预演。当时中国革命正风起云涌，共产党和国民党在蒋介石的旗帜下一同北伐。毛这时回到农村，开始进行历时五个星期、足迹遍及湖南五个县的旅行。正是在这次旅行的基础上，他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他对农民运动的态度，报告了党的中央委员会，而中央委员会对此表示怀疑和反对。

毛预言：“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

他写道：“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

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

只能选择第一条道路，这在他的心目中是没有丝毫疑问的。“一切革命同志须知”，他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无须为“过分”问题担心。“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暴烈的行动。”

至于这些调查的结果，毛泽东才坚定地高举农民运动的旗帜、后来，他对埃德加·斯诺说：“谁赢得农民就赢得中国，解决了土地问题就能赢得农民。”

毛泽东和肖瑜的旅行以及历时五个星期的农村调查，也为日后的长征做了准备。从秋收起义开始，他就一直住在农村，有时骑马，有时步行。他身上的肌肉变得坚韧发达。可是目前他由于长期患疾病而身体虚弱、傅连璋用最好的奎宁药，治好了他的病，但未能有效地使他恢复体力。傅大夫一直鼓励他多吃点东西，一天晚上，他给他带来一只炖鸡。但他说这是特殊化，一定要傅分吃了半只。

而这时和后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坐着担架赶路。担架是由两根坚韧的长竹杆和绳网组成的，既轻便，又有弹性，就象水手的网状吊床一样上下左右地晃荡。他那足有六英尺长的瘦高个儿，深深地陷在担架里，在睡觉时不会被晃出来，因此也没有必要绑在担架上。两名年轻力壮的战斗抬着担架，把竹杆扛在肩上。竹杆很长，因此他们可以看清脚下的路——在羊肠小道上走路，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有的担架上盖着油布或油纸，这样，在细雨蒙蒙的山区，担架上的人就免遭雨淋。毛泽东因此可以在雨中睡觉，而且常常如此。

差不多所有坐担架的都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那时患了肺病，不时地吐血，长征的大部分时间她也是在担架上度过的。

一九八四年身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一九三四年是青年团的领导人。长征开始后三天，他便患了疟疾，一个多月才康复。他说自己能够活下来应归功于担架和良好的医疗。

有意思的是，担架变成了讨论政治的舞台，为毛泽东重新掌权、领导长征免遭覆灭铺平了道路。

这些谈话就是毛泽东和曾在旧金山当过编辑的洛甫，以及伤口未愈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关键的“布尔什维克”王稼祥之间进行。王稼祥在整个长征途中都由担架抬着。长征初期，他与毛泽东形影不离，晚上一起宿营，谈呀，谈呀，谈个没完。王平时沉默寡言，酷爱看书。和毛泽东一样。他也出身于一个富裕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想让他接管家业，但他却执意要上学，结果到上海，进了进步的上海大学。他参加了激进的青年运动，并于一九二五年前住莫斯科。他不能算在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内，但他支持过他们的观点。

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三人被称为“核心小组”，或者用李德的话来说是“三人核心”。不管叫它什么名称，这三个人正渐渐地夺取着长征的领导权。

在担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处，使毛泽东和王稼祥互相越来越了解，并有机会分析在江西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

途中的情况。毛谈到战术上的错误。特别是导致广昌惨败的错误。他的论点给王稼祥留下深刻的印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王便倒向了毛的一边。后来，毛泽东认为在击败李德和博古的斗争中，他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洛甫几个月一直在向毛泽东靠拢。他们夏天在云石山上多次谈话已使洛甫相信毛是正确的。四月在广昌遭到失败后，他说伤亡太大，对红军来说，打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是不明智的。他指出，照这样下去，红军不可能取得胜利。

李德不懂中文，因而听不懂他们的讨论。但他猜到了大意，劝解这两人说：“你们两人都是从苏联回来的，你们必须齐心协力，中国革命需要你们齐心协力。”

李德的劝说没有奏效。洛甫和博古等人愈来愈疏远了。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他们不能光打蒋介石，还要同“左倾机会主义”和片面维护苏联的观点进行斗争，矛头是指向博古和李德的。

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不久便取得一致意见，他们都认为应尽早要求召开会议，以解决军事领导权的问题。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李德和博古注定要失败了。

李德对于担架上的“阴谋”一无所知。但是他知道毛正在同别人谈话，而且也知道这对于他的事业没有好处。在回忆录中，他抱怨毛泽东四处活动，一会儿找这个指挥员谈，一会儿找那个指挥员谈，引来了对博古和他本人越来越多的批评。

（摘自《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失 传 的 资 料

从某种意义说，这二十个人在这里开会，是为了正式确定长征的领导和方向的彻底改变，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说，则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领导和方向的彻底改变。后来很多人都说，这是整个中国革命史上最重大的一个事件。

屋子正中坐着三个人，在历时三天的会议里，他们始终坐在那里。会议主持人是二十六岁的中国共产党书记和名义上的领袖博古。他长得很瘦很瘦，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他由此得了个绰号叫“黑面木偶”）。他聪明、用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四年使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他早年曾在共产党在上海办的一所大学里学习过，所以英文也不错。他受共产国际中国处的苏联领导控制，是德国军事顾问李德的亲密伙伴和坚定拥护者。第二个人是毛泽东，第三个人是周恩来。其他与会者不断地掉换座位，哪儿方便就坐在哪儿，椅子的摆放没有什么既定的次序，而且始终有位子空着。

李德坐在门旁边，他的椅子放在一个很别扭的地方，“处在一个被告的位置”。翻译伍修权挨着他坐着，他的地位也不舒服。他心烦意乱，随着会议的进行他越来越生气。伍十年后也承认，他那次没有译出正常的水平。

有两个人是躺在担架上来开会的，其中一个就是王稼祥，他自一九三三年四月、第四次反“围剿”时在乐安县古公村负伤后一直躺在担架上。那次战斗中他带领周恩来、肖华等几十个去防御工事的路上被一颗国民党炸弹击伤了。一

块弹片穿过他的臀部进入肠子，伤势很重。外科医生在不施麻药的情况下为他做了八小时的手术也没能缝合伤口，只好塞进一根橡胶管。他一直发着高烧。因为要经常使用吗啡止痛，结果上了瘾，直到一九三六年被送到莫斯科治疗时才断然戒掉了。

大家都知道，王稼祥是要支持毛泽东的。人们普通传说“王、毛成亲了”。

这些人相互知道底细，甚至连大便的情况都知道。例如，大家都知道，只要时间允许，周恩来就要拿着一叠文件到厕所去，经常在那重读上一个钟头。他们也都知道，毛泽东患有慢性便秘。他经常一个星期才大便一次。后来在延安时，只要人们一听说“主席大便了”，就要欢呼一阵。他曾告诉埃德加·斯诺，一打仗，他的大便就正常了，最正常的是他早年攻打长沙的时候。

直到一九八四年春天，人们对于遵义会议的一些细节——例如时间和与会者的身份——还是不甚了了。然而，从未有人对遵义会议的结果产生过疑问。一九八四年三月四日，党中央的历史学家们透露，他们在档案里翻译出了一份很早以前的备忘录，提供了很多失传的资料。

按现在的说法，参加会议的有：

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他的丢失多年的回忆录提供了很多失传的细节）、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和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安全保卫负责人）、刘少奇（多年后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牺牲品），共青团领导人何克全（凯丰），共十人。

七位红军指挥员：刘伯承、李富春（他接替受伤的王稼祥，担任红军政治部代主任，一直是毛泽东的伙伴）、林

彪、聂荣臻（林的政委、毛泽东的坚定的追随者）、彭德怀（第三军团司令，态度强硬，反对李德），第三军团政委杨尚昆以及第五军团政委李卓然。

红军报纸《红星报》的编辑、新任命的党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也出席了会议。在场的还有李德和翻译伍修权，他们是列席代表，总共有二十人出席会议，中国的前途就取决于他们做出的决定。

博古首先发言。

他谈了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把共产党的失败归咎于国民党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和中央苏区以外的共产党军队配合不灵。博古没有稿子，是即席发言。他着重讲了形势的客观一面。据翻译伍修权说，他相当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军事形势，并批评自己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但他同时又力图为自己辩护和开脱。

秘书们不得参加会议。可能除了邓小平以外，与会者都没有做记录。大部分发言都是即席的。甚至到今天，这些发言的内容也未全部公布。现在在世的几个与会者凭记忆也很难把内容凑全。

博古显然没有赢得听众的同情。他的同志们说他企图推卸责任。李德列席会议，但态度并不客观，他的看法与众不同。他认为博古干得不错，他强调蒋介石正在从“帝国主义列强”那里得到贷款、武器和军事顾问。（博古显然没有特别提到冯·塞克特）。李德在回忆时还说，博古认为，共产党的战略是正确的，只是在执行中有错误而言。

第二个发言的是周恩来。他承认政策不对头，特别是不应当打阵地战。他说，这是造成红军第五次“围剿”失败的原因。他自我批评的态度很坦率，丝毫不想推卸责任。他

愿意承担责任的态度给同志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周恩来的发言使李德感到不安。他认为周强调了主观因素，巧妙地使他自己同博古、李德保持了一定距离，并为毛泽东把周和博古、李德之间划清界线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一向总是等到最后才发言，这次一反常态，他首先讲了话。他作了一篇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发言，比任何其他人都讲得长。他点名批评了李德和博古，指责他们无视红军打运动战的传统政策。李德的“短促突击”取代了朱、毛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战术。毛反驳了李德认为失败是由于数量上的劣势造成的这一观点。第一、二、三和四次反“围剿”中红军都是同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并取得胜利的。所以问题不是数量，而是战术。伍修权回忆说，毛泽东坚持认为军事路线错了。博古和李德的政策是“防守中的保守主义”、“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毛泽东发言说，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军事方针问题。而博古和李德根本不顾这样明白的现实，即战士也是人，也要用双脚走路，也要吃饭、睡觉。假如一个指挥员不了解实际地形和地理情况，只知道根据地图布置阵地和决定进攻时间，他“肯定要打败仗”。

毛泽东还猛烈抨击了未能和十九路军联合这件事。他说，这就使红军失去了一个迂回到国民党防线背后、从后面攻击敌人的大好时机，而周恩来、洛甫和他本人都曾经主张和十九路军联合。

毛泽东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他说出了大多数指挥员长久以来没有说出的心里话。

李德被毛泽东的话深深地刺痛了。三十年后，他对遵义会议只讨论军事问题而没有同时也讨论政治问题的做法表示

了极大的不满，指出会上根本就没有提及苏联和世界政治。但是，中国人早在会前就已决定只讨论军事问题，因为他们知道，一讨论政治问题，会议很可能会开崩。

李德的处境很不利，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远远地坐在门旁，被有意地排斥在中国人圈子之外了。他只能通过伍修权的翻译来了解他们在说什么。而入夜以来，伍修权变得愈来愈不安和疲乏，翻译的内容也越来越简短，有时完全停了下来。李德长得体阔肩圆，平时总是不动声色，除非要发言，否则总象块石头似的坐在那里纹丝不动。而现在他却怒形于色了。博古发言时，他的脸涨得通红，当毛泽东开始抨击他时，他的脸又变白了。他表面上一点没有失去控制，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把刚在遵义没收而分配给他的烟卷也抽了不少。看起来他变得越来越沮丧和抑郁了。

王稼祥接着毛泽东发言。他已经对聂荣臻说过：“到时候要把他们轰下去，把李德拉下台！”他拥护毛和毛的立场是大家意料中的事，因为他们一直注视着王稼祥在担架上与别人讨论的情况。他明确地说，博古和李德必须让位，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

李德在回忆录中声称，他在遵义会议上没有发言，因为他对当时的发言情况没有全面的了解，所以他决定在研究了会议记录或至少是总结性决议之后再说。看来并没有会议记录，而决议也是到了一九四八年才公开发表。斯诺一九三六年在保安同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长篇谈话中，也没有人提起过遵义会议。

李德回忆自己没有参与讨论的说法和别人的回忆不一致，翻译伍修权记得李德为自己作了辩护，坚持说，他只是作为一个顾问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这一点完全正

确)。他为总的作战路线进行了辩护，但却说任何责任都应由中国领导人承担，是他们把事情搞糟了，应受谴责的是中国人，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等等，他没承认有任何错误。伍修权认为李德问心有愧，但是读过他的回忆录的人却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事情过去三十年了，可他的态度似乎还是和他在遵义时一样坚决。

李德一再说，他只不过是个代表。他确实提出过各种各样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是否被采纳就是你们的问题了。”根据中国的档案材料，胡华教授说，李德断然拒绝了一切批评。

批评火力持续了三天。会议一般都是晚上七点开始，持续了四五个小时。措词越来越激烈，翻译伍修权也感到越来越紧张了。

白天主要是处理军事事务。这期间正在对部队进行一次重大的改编。解散了中央纵队及其庞大累赘的挑夫队伍。剩下的重型设备或者被破坏，或者被埋藏起来以备后用。必须携带的东西都分散到各个部队去了，中央纵队的年轻人和留下的挑夫都尽可能被编进战斗部队里。第三梯队的政委李林凯病了，所以这些工作大都由小刘英负责。

征兵工作正在积极开展，又增加新兵四千人。清点人员后证实，红军现在只有三万人。

随着会议的进行，越来越多的人站到了毛泽东的一边。很多指挥员指出长征缺乏思想准备的问题。他们认为，部队的严重损失，特别是因开小差而造成的损失，主要是由于新兵在思想上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和往常执行任务不同，这些新兵不知道自己要到哪儿去，也不知道为什么打仗，为什么必须作出牺牲，指挥员们认为保密工作做得太过分了，连很

多指挥员都不了解情况，这样就影响了战斗意志和官兵们的士气。

洛甫和朱德坚决支持毛泽东。周恩来再次发言，认为毛泽东对博古和李德的“左”倾路线的批评是正确的，并提议毛泽东任红军总指挥。

李富春的发言给伍修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富春是毛泽东在湖南时的老朋友，他和毛的另外一位老朋友、才华横溢的蔡畅结了婚。聂荣臻的发言也使伍修权深受感动，聂荣臻对李德的表现非常生气。伍修权同意聂荣臻对李德的批评，因为他本人也经常领教李德的粗暴态度。有一次，他曾对一个部门的领导说，“李德是个帝国主义分子，如果让我自己选择，我绝不给他当翻译。既然分配我给他当翻译，我只好干。”

聂荣臻是躺在担架上来开会发言的（过湘江时，他的脚负了伤，尚未痊愈）。他说话时很气愤。每次见到李德，他就恼火，因为使他想起李德的瞎指挥，李德对每门炮的位置以及哨兵设在哪里等具体部署都作指示，而这些细节连军团指挥员也无须亲自过问。聂荣臻对李德的尖锐批评，伍修权至今仍然记忆犹新。聂荣臻作为第一军团的政委，对李德的那种只允许和敌人正面作战的命令，并不是一概照办的。有时，他们用传统的朱毛战术诱敌深入，因而仍然打了一些胜仗。

彭德怀在发言中坚决支持毛泽东，并严厉批评博古和李德。刘伯承也是如此。令人奇怪的是，李德倒觉得，和其他人的发言相比，朱德、彭德怀和刘伯承还是比较“温和的”。

看来林彪在遵义会议上并没有起多大作用。当然，他在

“文化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未遂政变可能歪曲了人们的记忆。和我交谈过的大部分军人都曾受害于他。伍修权断言说，林彪在会上——一言不发，他因支持博古和李德而受过批评。聂荣臻同意伍修权的说法。可是其他有些人还记得林彪在会上支持毛泽东主张解除博古和李德的职务的建议。据说，在湘江战役和第一军团遭受损失后，林彪就开始公开批评这两个人了。临到开会，他讲了很多意见，对他们表示了很大的敌意。

会议所有的参加者当中，只有何克全几乎完全支持博古和李德。他曾在莫斯科学习过，是个“正统”的“布尔什维克”。他承认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但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聂荣臻认为何克全“相当狂妄自大”。何对毛说：“你根本不懂马列主义。你只读过《孙子兵法》。”尽管遵义会议采取了行动纠正错误，何还是一味坚持己见，直到后来，才勉强承认他是错了。

聂荣臻和刘伯承建议红军改变路线，打过长江，在四川西北部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他们认为，那里的条件比贵州好得多，——四川省比较富裕；而（公路）交通极不便利，这就使得靠两条腿走路、且行动迅速的红军占了点优势；那里的军阀一般来说对蒋介石怀有敌意；另外，四川省人口较多，可以补充兵员。

最后，周恩来建议停止目前由博古、李德和他本人组成的“三人团”工作。这个建议得到一致通过，据说没有进行表决，整个会议期间一次正式表决也没有。军事指挥权现在落在朱德和周恩来两个人身上。没有提到毛泽东。但在另一项决议里，毛被选为领导核心——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不管纸上写的如何，大家都知道谁当家。另外一项决议写进

了洛甫为毛的批评发言所作的摘要。最后一项决议指出，常委内部的分工以后再讨论决定。

这时彭德怀已经离遵义去对付国民党将军吴奇伟了，吴正在威胁着他的第六师。打点行装，收起帐篷，毛泽东和司令部的人马也于一月十九日离开了遵义。出发前，在罗马天主教堂召开了一次军事指挥员会议，博古（做政治报告）、周恩来和毛讲了话。可惜，发言稿未保存下来。

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确定了。

（摘自《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向何处去

一九三四年十月，在苏区的首府瑞金，人们神秘地进进出出，气氛日益紧张，震动越来越大，红军中究竟在酝酿些什么，他几乎无所不知。这个根据地是五年前由毛泽东及其盟友朱德率领的共产党军队创建的。毛与朱的关系非常密切，在农民们看来，这支军队就是“朱毛”军队。许多农民坚信朱毛是一个人。这也并非完全说不通，实际上，身材魁梧、举止缓慢、纯朴忠厚的共产党将军朱德自己也曾说过朱毛是分不开的。中文中这两个字是双关语，“朱”意味着猪（不同的另一个字），“毛”指的是体毛。

没有人同毛商量，也没有人征求他的意见，这毫不夸张。在党的领导层中占统治地位的“苏俄”派里，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要把毛开除出党，早在两年前，他就失掉了军事和政治决策权，仅剩下了有职无权的一个头衔——中央苏区政府主席。

这时，红军高级领导层的每个人都知道部队即将转移，但是他们不知往何处去。一些人猜湖南，另一些人猜江西的其它地方，一些人说是贵州，还有人说是云南或四川。除了最高领导之外，其他人都不了解。为了躲避蒋介石飞机的轰炸，红军总司令部迁到了瑞金以西的云石山地区。在那里，”干部们见面时总是互相会意地说：“转移的时间就要到了。有时他们互相问：“你走吗？”回答不一。一些人答：“当然。”另一些人则说：“不知道。”说这话的往往意味着不

走。蔡晓乾回忆说：“这消息传来，就象在一池清水里投下一块大石头”，激起了人们的不安。很快，走留人员名单开始列出来了。一些家属带着柜子、箱子回了家乡，说是“他要走了”（但不说去哪里）；不少伤员从医院回到了原部队。关于谁去谁留的小道消息也开始流传了。起初，有人说徐老将留下来。徐老就是徐特立，他曾是毛在长沙师范的老师。人们说他年纪太大，经不起未来的艰辛。但后来又传说他也走，并被指定与休养队同行。已替他找了匹马，但尚未找到马夫。爱传小道消息的人此时还不知道，有人悄悄地已让毛泽东看了一份留守人员名单。毛的许多亲近的人都在名单之中——他的弟弟毛泽覃及其妻子贺怡（毛的弟媳又是妻妹，因为她是毛夫人贺子珍的妹妹）；毛的朋友、湖南同乡、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何叔衡；早年担任共产党总书记、现已被罢免的瞿秋白（据说他肺病严重，难于同行）；陈毅司令员，共产党早期党员、毛的支持者，贺昌毛的另一个拥护者、宁都起义部队后来的领导人之一刘伯坚等等，许多人。毛的建议似乎一个也未接受。甚至他请求带上瞿秋白的意见也未采纳。与毛泽东的关系成了留在苏区的特许证，而根据当时留下来的陈丕显将军的看法，留下来的人只有十分之一能幸存。

一九三四年秋，毛泽东四十岁。他双颊深陷，憔悴消瘦，黑发长得几乎齐肩，两眼炯炯发光，颧骨高耸，看上去很难受。他患疟疾，经常复发，一病数月。尽管教会医院出身的傅连暉医生使尽了浑身解数，他还是处在半恢复状态，感到虚弱和乏力。他知道红军将要采取什么行动，因为作出决定之后周恩来给他报了信。

疾病缠身、面容憔悴的毛泽东仍在接受傅连暉医生的治

疗。这时他正在对一群党员干部讲话，他尽力使自己的口气充满信心。他的讲话内容没有被保存下来，不过，无疑是传达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说明部队要冲出包围圈，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建立新的根据地计划；号召干部要照常工作；告诉大家部队进行了分编，红军留下了很大一部分兵力保卫苏区，他们不会永远离开，他们会回来的。毛泽东坚信，革命最终必定胜利。

这是一次高、中、低三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对这些干部讲话的时候，周恩来、朱德、博古、李德，所有部队的首长和党的整个最高领导机关已经上路了。中央机关十月十二日到达于都，又附夜色朦胧穿过了于都，几千名挑夫（一天付一块银元），挑着苏区的大量财物——印刷机、纸币铸版、造子弹的机器、重新装填空弹筒的压床、爱克斯光机、满载重要（及不重要）文件资料的箱子，红军储备的银元、金条、大米、药品、备用的枪炮、收发报机、电话设备、大卷的电话线，等等。毛泽东后来说：“就象大搬家一样”。埃德加·斯诺则称之为“整个国家走上征途”。这太夸张了，还是毛说得确切。

十月十八日傍晚，毛泽东和大约二十名随从，包括警卫员、他的秘书和工作人员，在于都北门旁一所房子的石板地小院子里集合。他们走出院子，和中央纵队的其它单位会合了。毛带了一袋书、一把破伞、两条毯子、一件旧外套、一块旧油布，留下了他那有九个口袋的旅行包。

毛泽东明知危险乃至致命的撤退就这样开始了。红军离开了共产党在过去几年中赖以生存和蓬勃发展的根据地。他们悄悄地行动，希望蒋介石的飞机不要发现并轰炸这支蜿蜒而行、前后长达六十英里的庞大而杂乱的队伍。现在是需要

坚韧不拔，下定决心的时刻，不允许提任何问题。没有人知道他们将去何方，没有人知道走到哪里才是尽头。毛泽东不知道，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也不知道。谁也猜不出再过多久蒋介石就会发现这些蠕蠕而行的队伍。没有一个指挥员不为那些如牛负重的挑夫们担心，他们中间很多人挑着他们能够肩负得起的最大重量，一天挪动两英里都很困难。

工兵营在于都河上架起了五座浮桥。当时正值枯水季节。在于都一带，河面不过二百五十英尺或三百英尺宽。河面宽些的地方，河水很浅，人和马匹可以毫不费力地涉水而过。五座浮桥分别架设在于都两侧几英里长的河面上。

毛泽东和他的队伍沿着河岸没走多远，月亮就升起来了，河面很平静，没有一丝风。一会儿他们来到渡口，踏上喀喀作响的桥板，顺利地过了河。很快，这支队伍就到河对岸向西行进了。这静谧的夜，这月光，这河水拍击浮桥的声音，激发了男女战士的兴致。他们成一路或两路纵队沿着狭窄的小道行进，很多人轻轻地哼起了流行的红军歌曲。究竟走向何处，谁也捉摸不透。

（摘自《中国红区内情》，解放军出版社新版）

毛泽东说林彪：“你还是个娃娃”

用现在的话来说，毛似乎一直是个赢家。他一切如愿以偿。但他的同事并不都这么看，特别是林彪不这么看。自从毛重返领导岗位以来，林彪一直干得很出色。他几乎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就攻克了遵义。他虽未能在黔西北突围打过长江，但这对任何指挥官来说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他出击昆明的大胆行动，他回师金沙江时的神奇速度，无不显示出他的才能。

但是林彪内心对毛的指挥十分不满。几个星期前，他曾抱怨说，毛变化无常的运动战术把部队搞得精疲力尽。现在拿出来的一些证据表明：在毛指挥部队迂回前进的过程中，林彪多次对毛的命令感到不快（尽管他总是执行这些命令）。

“文革”期间，林彪迫害了不少老红军，他们提供上述情况时可能言过其实，但由于林彪玩弄的阴谋，使他们当中确有不少战友死于非命，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长期坐牢，甚至还受过刑。

五月十二日晚，毛泽东在城外的一家铁匠铺里召开了会议。

会议集中讨论了林彪的意见。这位二十七岁的指挥官起草了一封信交给毛泽东，要求毛把战场指挥权交给三十七岁的彭德怀。

林彪看上去不象彭德怀那样直率和精力充沛。他比彭年轻十岁，长得十分瘦小。他的脸是椭圆形的，肤色浅黑，显

得很清秀。彭经常和部下交谈，而林却同他们保持一段距离。对许多人来说，林似乎生性腼腆和含蓄。找不到说他对部下热情和爱护的故事。他在红军指挥官中的同事都尊敬他，但他一开口就是谈正经事。

长征期间在林彪司令部的警卫连里任排长、一九四八年担任师长的吴兴说：“林会打仗，是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又说：“林对那些同他一起工作的人很好。”吴也承认，林彪这个人不健谈，吴回忆说：“林喜欢单独行动。”

红军到了延安后，每逢星期六，就在枣园院子里举行跳舞晚会。毛泽东和朱德常拥着舞伴跳起华尔兹，他俩不停地带着一个又一个兴奋的年轻舞伴转圈，彭德怀也是一样。周恩来舞姿优雅。但是，林彪却从不上场，尽管有许多从上海、北京跑来延安投奔革命队伍的年轻女子劝他跳，他最终还是和一位外来的美人结了婚。

林彪是毛泽东的宠儿。林在著名的广州黄埔军校受训期间，也曾是蒋介石和后来成为苏联元帅的勃留赫尔的宠儿。那是在蒋于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对共产党翻脸之前。林彪的父亲在湖北开厂，因无力纳税而破了产。林彪这个工厂主的儿子竟把自己的命运同共产党连在一起，他投奔周恩来后，参加了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的“南昌起义”。一九三二年才二十四岁，但已成为第一军团的军团长。召开会理会议时林才二十七岁，他的胆量和善用疑兵超过任何人。不过，据说他只在有十分把握时才出战。

毛手下的高级军事指挥官们，虽然秉性各异，但在长征中他们配合得很好，林彪善于声东击西和隐蔽自己，善于奇袭和伏击，善于从侧翼和敌后发起进攻和使用计谋。而彭德怀总是从正面进攻敌人，他打仗极为勇猛，对手一次又一次

被消灭。彭认为打一场战斗，必须使得失相抵，或得大于失，要多缴获枪炮，多抓俘虏，并更多地把战俘转化为红军，这才能算打好了仗。

毛挽救了红军，然而问题依然存在。他们未能同贺龙和肖克会合，未能建立一个新的苏区。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还在转移中，离开遵义以后，就失去了同他们的通讯联系。下一步怎么办？人们在议论。

使林彪感到不安的正是这些问题。他曾和一些指挥员讨论过这些事，其中包括他的同级第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参加议论的还有参谋长左权、保卫工作的负责人罗瑞卿和高级参谋朱瑞。

林彪建议把战场指挥权交给彭德怀，让毛集中精力与周恩来和王稼祥等军委其他成员一起考虑全面政策和规划。

林抱怨说，毛迫使部队走冤枉路。他把红军的路线比作一张弓，说部队是沿着弓背而不是弓弦行军，走的不是捷径。

林说：“在此情况下，部队的精力已消耗殆尽，毛这样指挥不会成功。”

聂荣臻激烈反对。他说：“我们是在敌人的口袋里。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出其不意地迂回行动，怎么可能突围？”

林建议让彭德怀担任前敌指挥，负责作战。

据聂荣臻回忆，彭断然拒绝了这一意见。彭在监狱里写的材料说，他在会理会议时看了林的信。彭说：“当时也未在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他指出，林指挥的第一军团和他指挥的第三军团常在统一指挥下行动。

毛泽东轻而易举地就把这些对他的权威的挑战对付了过去。他讥笑林彪道：“你知道什么，你还是个娃娃。部队绕

道前进是必要的”

用彭德怀的话来说，毛认为林彪的建议以及刘少奇和杨尚昆的电报代表着一种“右倾情绪”，这里毛显然是指他们没有表现出进取精神。彭德怀当时作了一些自我批评。这件事后来给彭德怀、杨尚昆和刘少奇（但不包括林彪）都带来了不幸和严重的后果。当时，这件事似乎就这样过去了。彭德怀在狱中自述里写道，“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然而结果并非如此。

（摘自《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解放军出版社新版）

两个互不信任的人

阴雨连绵，道路泥泞。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于六月十五日晚抵达懋功，在那里耽搁了几天。六月十六日晚，毛在懋功河边的天主教堂里发表了一次演说。他就住在教堂对面的一所漂亮房子里。周恩来、朱德、博古和洛甫住在附近的另一所房子里。毛几乎总是与他的同志们分开住的。

通往懋功的高山隘口几乎终年积雪。一九八四年五月下旬与一九三五年六月一样，残雪点缀着绿色的草原，爬上高达一万一千英尺，山坡的杜鹃花也披着银装。

毛及其同伴策马沿狭窄的懋功河谷走着。气候温和的山谷里，丁香色的杜鹃花已从墨绿色的叶子中探出头来。山坡上长满了一片片的紫罗兰——或者是在外行眼里看上去象紫罗兰一样的花朵。山谷不很宽，没有多少土地可以耕作，房子也很少。尽管下着雨，但比起翻越夹金山来要轻松愉快得多。

与毛同行的指挥员只有几个。这大概不是偶然的現象。他已派三军团的彭德怀和一军团的林彪率领大部分人马向不同的方向前进。也许他并不是不相信张国焘，但他在采取防范措施。这两人已有十二年没有见面，关系历来不密切。

毛于六月二十四日抵达两河口镇，可能在一座相当壮观的喇嘛寺的底层住了下来（这座寺院的底层现已被拆除，用来堆放木材）。

六月二十五日上午仍在下雨。毛一直在等待，直到有消

息说，张国焘就要到了。于是毛和他的一行便前往离镇约三里多路的一个叫作抚边的村庄。那里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墙上刷着口号，街上贴着标语，红旗上用白字写上了欢迎口号。村与村之间装上了电话，这样，两支军队可以保持联系。还在草地上搭起了一个讲台，以便举行仪式。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两支主要的共产党军队及其领导人第一次会师。五年来，张一直率领第四方面军在作战，建立了一系列根据地。毛自一九二七年以来，除博古和李德让他靠边站的一段时期外，也同样地一直在战斗。

大雨倾盆而下。毛在路边的油布帐篷下等待着。下午五时左右，张国焘骑着一匹白色骏马，在十来名骑兵的护卫下，沿着泥路，溅着泥水过来了。毛及其一行走出暗褐色的帐篷，迎上前去。一会儿，马队便来到了跟前。张身材魁梧，面色与毛久经风霜的脸色比较起来显得白净，他翻身下马，和走上前去的毛拥抱。

红军欢呼起来。数千群众欢呼起来。两人登上讲台，制服上滴着雨水。毛致欢迎词。张作答词。接着两人肩并肩一起走进城里，在喇嘛寺里举行了宴会。当时在场的目击者李群，一九八四年时已六十四岁，依然十分壮实，整齐的外衣下面露出一件衬衣。他是亲眼看到他们两人一道行走和这一切的，他兴奋极了。当时他才十五岁，是第四方面军的一名红小鬼，他认出了张国焘。有人喊道：“那是毛泽东！”他曾多次见过张国焘，认为张说话温和，对部下战士和气。

一切庆祝的表面排场都有了——旗帜、标语，大碗热气腾腾的鸡和肉，大堆的饭和菜，大锅的汤和大罐的酒，还有当地酿造的类似贵州名酒茅台的烈性白酒。

但是骨子里——而且就在浅浅的表皮下——流淌着另外

一股潮流，怨恨，敌意，猜疑。

双方都对对方部队的人数提出了疑问。张国焘一度曾走到周恩来面前说：“你们有多少人？”周先生是位外交家，反问道：“你们有多少人？”张说：“我们有十万。”周回答说：“我们有三万。”周的夸张程度比张的要大得多。

双方都保守秘密，都不坦率和公开。但是第一方面军与江西时期比起来显然只剩下很少一点力量了——大概不超过二万人，尽管张国焘不可能作精确的计算，因为毛已将其部队分散到好些地点。张也夸大了自己的实力，就象长征开始时第一方面军夸大自己的实力一样。但是不难看出，第四方面军比第一方面军要多得多。张有七万至八万战斗部队，可能还有几万名非战斗人员。他与毛的力量大约是五比一。

从两位领导人身上也可看出明显的差别，张的脸面丰满红润，虽不肥胖，但身上肉滚滚的，脸上毫无饥苦之色。毛呢？很瘦，面色憔悴，皱纹很深，举止十分拘谨。张的灰色军装十分合身，而毛仍穿着他长征时的老军服，又破又旧，缀满了补丁。

有位红军战士由于见到四方面军的马长得膘肥体壮，忍不住夸了几句。毛斥责道：“别羡慕那些马！”那天晚上对四方面军确是赞声不绝。后来在参加长征的人员中产生了一种感觉，认为张是个野心勃勃可能不讲原则的人，是故意在炫耀自己的成就，对毛的部队流露出傲慢之意。也许是毛的人过于敏感。但是使他们感到恼怒的是，毛及其司令部人员站在雨里等候，而张骑着马象旋风一般地驰来，下马之前差一点溅了他们一身泥。四方面军还把张叫作“主席”，他们听来也很刺耳。“主席”这一头衔是他们专留给毛泽东的。四方面军的军帽也比一方面军大，于是四方面军的人被

叫作“大脑袋”，一方面军的人被叫作“小脑袋”。

宴会上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张国焘认为欢乐只是表面现象，毛三句不离吃辣子，他说，不能吃辣子就不是真革命。祖籍江西的博古表示异议，他坚持说，江西人中不乏伟大的革命者，而他们并不喜欢吃湖南的辣子。毛勉强但笑呵呵地承认了这一点，张国焘听后觉得很“无聊”。他感到不快的是，似乎无人有兴趣请他讲四方面军的成就，也没有人告诉他遵义会议的细节。而毛的人则声称，张国焘对第一方面军的经历不感兴趣。

晚宴后，张请朱德进行谈话。两人一直谈到清晨三点。张是否试图把朱拉到自己一边来呢？也许有可能。或者他只是想向朱探听消息，朱对此未作任何记录。张写的回忆录是在他与共产党的同志们决裂以后很久才写下来的。他引用朱的话说，中央红军只剩下一副没有肉的“骨头架子”。他说朱估计一方面军的人数为一万，这点与实际情况相差不太远。所有的大炮都丧失了，机枪所剩无几，每人只有五六颗子弹。

这些与事实相当接近，张国焘的回忆录中引用朱德批评毛和赞扬张的四方面军的那些部分则不那么可信。

不少参加长征的人还能记得张国焘柔弱与自负的特点。李德写道，张“四十岁左右，身体魁梧，仪表堂堂。他象主人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在一方面军战士眼里，张的这种态度与他们一方。

连日来表面上的平静仅是假象。毛泽东和张国焘都在进行着紧张的勾心斗角的政治活动。两个阵营之间出现了尖锐的分歧。造成分歧的原因还是政策、个性和权力，这也是长

出现其他重大分歧的根源。

张国焘多年来自处一方开展斗争，而且颇有建树。他同毛泽东之间没有那种使人亲近的个人关系。尽管他也在莫斯科住过很长时间，但他并不喜欢那些“布尔什维克”。他同一方面军所有的政工和军事领导干部都谈过话，但看来他没有找到同盟者。他同朱德的关系算是最和谐的了。尽管朱德的态度似乎有点模棱两可，尽管他曾设法使张和毛观点一致起来，但到了摊牌的时候，事实证明，他是毛的人而不是张的人。李德的回忆录表明，虽然他从不信任也不喜欢毛，但他对张国焘并无好感。博古也是如此。聂荣臻和彭德怀的回忆录都表明，张未能把他们争取过去。

反过来也是一样。毛的人也试图争取张，但也 没有成功。只有周恩来能够凭借自己的外交手腕使大家的意见趋于一致。可是他的病使他无法这样做了。

（摘自《共产国际代表》）

危急时刻

据杨尚昆将军五十年后回忆，那是一个美丽的月夜。雨停了，雾散了，满月当空，星光闪烁。午夜两点，他踏着洒满月光的小道去执行一项紧急的秘密任务。

“那是九月十日。”毛泽东在一九六〇年对埃德加·斯诺说，那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关系到党的命运的“千钧一发”的时刻，毛为之奋斗的一切可能在这短短的一刻丧失殆尽。那天夜里，毛觉得长征可能中途而废，天亮之前，红军也许就要自相残杀了。

麻烦事越来越多。毛和张国焘的谈判进展很不顺利。人们不安地悄悄议论着。谣言四起。毛为了谨慎行事而预先更换了密码，并限制部队之间的通讯，以保证安全。

把部队莫名其妙地分为右路军和左路军这种作法并不成功。毛在右路，张在左路。张手下的徐向前将军和陈昌浩政委指挥右路。支持毛的朱德和刘伯承在左路部队，分别担任总司令部的总司令和参谋长。张和毛对对方的指挥都很不习惯。许多证据表明，在左路军的“统一指挥部”里，真正发号施令的是张国焘。同样，毛（只要他能做到）在右路军中的原一方面军各军团里也是如此。

从好的方面看，这样做导致一种不稳定的休战，而糟糕的是，它助长了各种阴谋诡计。这种编队本身就孕育着摩擦和猜疑。

红军这时正分散在藏区草地的边沿一带。张国焘和总部

工作班子驻在藏民最大的居住点阿坝。他的大队人马停在白河的西岸。这时正值汛期。按预定计划，张的部队如要继续向东北方向行进并和右路军会合，就必须渡过白河。

右路军的指挥部设在班佑，一个不那么讨人喜欢的地方。这里是一片藏民的毡包，其中有一些呈传统的圆锥形，在相互交叉的格状支架上铺上毡子。藏民从一个牧场转移到另一个牧场，这种可以迅速拆装的毡包很适用。其他都是用牛粪砖垒起的、外面用泥抹光的永久性建筑。在棚舍之间肮脏的小道上，到处是圆锥型的干牛粪堆。在夏天，人们把牛粪摊在篱笆围墙上下凉晒，干燥后的牛粪既可充作燃料，又可当作建筑材料。如今，藏民都跑光了，毡包里一空如洗。

快到班佑的时候，队伍里传开了要在“洋房”里过夜的笑话。在一些红军战士看来，这没什么稀罕。他们说，如果真的要睡洋房，那最好是日本房子。

结果，队伍穿班佑而过，直抵巴西，人们才松了一口气。巴西是个村子，有一百来所茅草房和一座大喇嘛庙，这景色使杨定华想起了上海的查尔斯顿电影院。这里有不少房子可供红军过夜，粮食供应也不错。庙里有一座很大的佛像，左右两侧各塑有一对相互拥抱的男女。杨说这表现了两性的热恋。据说这是一座爱情之庙。不断有红军战士进来看一眼。

右路军指挥部设在班佑，不在村里，而在村旁的一片柳林里，但村里几座较大的毡包已打扫干净用来开会。那片林子一九八四年还在，既干净又美丽。那时大约有七十户人家住在这个村子里。除增加了一所二年制的学校以外，村子从一九三五年红军到过之后直至目前没有什么变化，到处依旧是散乱的毡包和牦牛粪堆，小巷里垃圾成堆，恶狗游荡。我

们到达的五月三十日，地上还积着残雪，一群群身着藏袍的男女和花花绿绿的孩子前来参加马市和观看赛马。下雨了，骑手们打开了黑色的雨伞。

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和杨尚昆就把指挥部设在这里。毛单独住在小河对岸一箭之遥的地方。彭德怀的第三军团在约四英里外的巴西。第一军团继续向前到达俄界，刚刚进入甘肃的境界，离此地有两天的路程。

毛有时在班佑指挥部，有时在巴西。周恩来和王稼祥都住在巴西，两人的身体渐渐康复，但仍不能下床，由第三军团照料。

九月三日出现了重大危机的首次迹象。那天，张国焘发来了一份电报，说因为白河（噶曲河）河水上涨，他无法渡河，他已命令部队停止行动，建议放弃北上和东进，而重提他原来向西向南推进的主张。

张的电报在毛一派人中引起了恐慌，人们认为这是张的一个计谋，企图推翻毛儿盖决议，并将共产党的全部力量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毛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所有的中央委员都同意他的观点），发报给张，要求他继续北上，并服从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电报一个接一个。杨尚昆记得，在一份电报里，中央委员会提出派人支援张，帮助他渡河。

由于担心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形势更加紧张了。李先念率领的第三十军在前往班佑和巴西的路上，和在松潘的胡宗南指挥的四十九师相遇，在包座的大戒寺战斗中把他们一举击溃，胡宗南身受重伤。红军缴获了大批饼干、罐头和香烟。香烟送给了烟瘾很大的毛和他的同事们。李先念回忆说：“他们高兴极了，说这可比鸡还要好吃。”这期间红军还和国民党马鸿逵的一支凶悍的回民马队打了一场遭遇战。

国民党的军队愈来愈多，引起了红军领导的担忧：假如红军在此地滞留过久，蒋介石很可能就要发动一次强大攻势。而张国焘也开始把蒋进攻陕甘的这种可能性作为反对进入甘肃和陕西的理由。

根据彭德怀的狱中自述，那时人们愈来愈担心两支红军队伍之间会发生冲突，当彭德怀的第三军团到达巴西后，他把十一团隐蔽在毛住处的附近——以防万一，并且从那时起每天去看望毛。他担心会和第一军团失去联系。据他说，由于没有向导，第一军团在俄界附近被困了。因为密码已经更换，他无法进行联络。他编了一本新密码，交给了武亭——一个可靠的朝鲜族党员。还给了他一个指南针，让他去同林彪和聂荣臻去联系。聂荣臻记得，当时第一军团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接到的唯一电报就是原地待命。

九月九日上午，张国焘给他的心腹助手、右路军指挥部的陈昌浩发了一份密码电报。电文本应由陈昌浩本人亲自译出，但他正在一个政治会议上发言，结果，电报由一名译电员译出并交给了参谋长叶剑英。

叶剑英是个忠实可靠的参谋，他没有看那份电报，而直接带到了会场。陈昌浩正在台上，人们还在发言。叶想把电报递上去。陈说：“等一会儿，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呢？”

电报似乎很紧急，所以叶剑英就看了一眼。他立即领悟了它的重要性，尽管“叶并不了解其中的阴谋”，据杨尚昆说。

这份电报的电文从未公开发表过，但中国的历史学家们经常引用它。电文可能是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他们可去查阅，电报的主要内容是命令右路军改变方向，重新穿过草地，和四方面军会合后召开一次会议消除分歧。李先念记

得，电文里有一句关键的话，指示陈昌浩：“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正如谢伟思指出，总的来看，这些话“明确地包含了不祥的、威胁性的意思”。“斗争”这个词在党内通常用来指互相对立的路线之间展开激烈的斗争，或者用在象“阶级斗争”这样的词里。

叶剑英借口上厕所，走开了。其实，他转身来到一二百米开外的毛泽东的办公室，把电报交给了毛。毛抄了一份，告诉叶别让别人知道他已了解电报的内容，并对他说：“你干得漂亮。”

叶回到指挥部。陈昌浩还在台上讲话，会议仍在进行。叶机灵地把电报交给了陈昌浩的秘书。

根据彭德怀的回忆，他在听说这份电报之前就曾敦促毛采取预防措施。毛的部队早已分散。第一军团距此有两天的路程。附近还有张的两个军。“如果四方面军要缴三军团的械，我们该怎么办呢？”彭问。他敦促毛“抓住一些人质，以防止出现红军部队自相残杀的不幸局面。”毛拒绝了这个意见。空气里充满了火药味。

九月九日下午，大约是应陈昌浩的要求，毛和陈见面了。陈向毛泽东转告了张国焘的命令。杨尚昆认为，毛竭力设法争取陈昌浩赞同他的主张。但是，杨说，陈“对张唯命是从，毛根本劝不动他”。

于是，毛对陈说，假如部队要改变路线，他必须和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同事们商量。他说，周恩来和王稼祥正在第三军团司令部养病，“让我和洛甫、博古去他们那儿开个会。”陈昌浩同意了。彭认为，这只是毛为了摆脱指挥部和陈的“势力范围”而使的一计。

毛泽东火速赶到巴西附近第三军团所在地牙弄。常务委

员会紧急会议决定不改变方向，并且又给张国焘发了一份电报，要求他坚持执行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原定计划，前来和他们会合。会上还议论了各部队的力量对比——第三军团只有四千人，第一军团人数也大致如此。张占有很大优势，毛及其同事们认为，张很可能强迫他们服从他的意志。

刻不容缓。第三军团受命于凌晨二时出发。为了给即将进行的活动打掩护，派叶剑英去通知陈昌浩，如果部队要回头再过草地，需要准备更多的粮食。已动员整个部队在十 daylight 就去地里割青稞。陈没有表示反对。

“陈昌浩一点也不担心，”杨尚昆将军说，“他未感到需要特别警惕：毛只有那么点人，不敢自行离去。”

最危险的任务落到了杨尚昆和叶剑英身上，他们必须离开指挥部，但又不能引起别人的怀疑。如果有可能，叶还答应带上由一方面军的人组成的二局，即带上情报局的地图和人员一起走。

杨尚昆还要让他的工作班子和政治部里尽可能多的人去“筹集粮食”。刘英记得，一个接一个人地把命令传下去。她半夜里被叫醒，让做好立即出发的准备。谁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后来，洛甫传话说，张国焘企图分裂党，所以，他们必须离开。杨尚昆还有个私人问题：他的妻子李伯钊不在班佑，到四方面军李先念的三十军去教战士们唱革命歌曲了，他俩分离了一年多。杨不能用明信片通知她，这将泄露机密。但他终于给她捎了个信儿。李伯钊回忆说，她那时被“看管得很严”无法脱身。

凌晨二时，杨尚昆和叶剑英悄悄地溜出了指挥部营房。叶还搞到了一张地图。地图是钉在作战室墙上的，有一张掉在地上，他把这张地图放在自己的背包里。叶和杨走出营

房。他们让警卫员带着驮有行装的骡子先走一步，二局和政治部工作人员在半夜一时三十分就离开了。

杨和叶正在明亮的月光下赶路，后面忽然传来马蹄声，二人赶紧躲到阴影里，一队骑兵疾驰而过。显然，他们在搜寻叶和杨，他们认为这两个高级干部一定骑在马上，并且有人护送，所以根本没有理会阴暗处的步行者。

在第三军团司令部里，毛给林彪和聂荣臻发了电报，让他们作好准备：原命令可能有变。彭德怀紧张万分，生怕叶和杨脱不了身，天亮时分，他们终于赶到了，彭德怀这才松了一口气。

杨记得，他看到毛、周恩来、王稼祥和彭德怀都在等着他们。毛说：“我们真为你们担心。”

这时，陈昌浩已发现毛的人逃走了。他先打了几个电话，然后拿着听筒回头看了看徐向前司令，说：“出了一件怪事，一方面军开拔了。我们是不是派部队追上去？”

徐向前回答说：“你见过红军打红军的吗？”他的话就是这么说的。不能打。换了陈昌浩，也许是另一种回答。徐向前的话在以后的五十年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再地被引用。

党的历史学家胡华一九八四年说：“这是党的历史中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徐和叶为制止一场冲突立了功，他们两人都有功劳。”

他这句话的意思是，毛保护了这两人免遭“文化革命”之苦。

陈昌浩没有派部队，而派了红军大学的一个学生团和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人到巴西去。其中有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李特是留苏学生，曾在列宁格勒学习过，习惯持一把大左轮

手枪。人们都知道他脾气暴躁，喜欢骂人。他最后死在苏联。

毛决定对四方面军派来的代表团和四方面军留下的人讲话。三军团的人正朝俄界方向前进。

会议在“查尔斯顿剧院”式的半山腰的一座喇嘛寺里召开。三军团的司令部设在旁边一个村子里，俯瞰着白龙河的支流巴西河（其实是一条小溪）。

年轻的红大学员们举着写有“反对毛泽东逃跑”的字样的标语旗在开会的喇嘛庙前示威。他们喊口号时就象和尚在念经。

毛对他们说，想南下的，请便；愿北上的，也请便，绝不强迫。然后，他请六七十名四方面军的干部来见他，其中也包括李特。这时，李德很警惕。他身高体壮，站在近处盯着李特，以防他拔枪向毛射击。

毛对干部们说，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他说，至于不愿意和党中央一起北上的人，可以等一等。“我们可以作为先头部队先走一步。”

“我们先走，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我相信，一年之后，你们会来的”（毛说对了，几乎一天也不差）。

毛刚刚讲完，李特跳了起来，大声指责毛犯了“逃跑主义”和放弃江西苏区等罪行。李德很担心，以为李特已控制不住自己。他把李特紧紧抱住。李特挣扎了一下，但摆脱不了李德那铁一般的手臂。

上午八点，大局已定。不想北上的人回班佑去了。想继续前进的人向北进发。这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发生的事一模一样。那年，毛在井冈山前，面对一批不听指挥的人 and 不愿跟

他走的人也这样告诉他们，让他们回家，他率领着剩下的人继续向井冈山行进，从而平息了一场动乱。

杨尚昆还记得他自己哭笑不得的处境。四方面军的人把政治部里所有的炊事员、脚夫和后勤工作人员都带走了。虽然给他留下了一只饭碗，可是没人给他做饭。他只好加入了中央纵队，同历史学家徐梦秋和后来担任宣传部长的陆定一等人在同一个伙食单位吃饭。

不到一小时，毛也出发了。他没有和别人走一条路，而是在警卫员及几名亲密战友（周恩来和王稼祥躺在担架上）的陪同下从喇嘛庙下山，通过一座木桥过了巴西河。那时（今天仍如此），桥板下接近水面的地方悬挂着一只牦牛头，保佑木桥免遭洪水、恶熬之害。过河之后，直上对面的大山——纳日寨，踏上了自己新的征途。

今天很难判断毛认为张要发起进攻的威胁是否真实。或许没有那么回事。但毛认为确实存在这种威胁，因而不愿冒险。他一面上山，一面把后卫部队留守在每一个山口和要塞，以防四方面军追上来。杨尚昆说：“这是红军历史上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如果真的打起来，我不知道今天我们这些人还在不在。”

向青教授——一位保守而谨慎的学者——指出，至今没有找到任何客观证据或文字材料可以证明张国焘准备以军事行动迫使毛及其部下就范。他认为，假如确有此事，后来在延安处理张国焘问题时就会摆出来。他补充说，张国焘确实野心很大。中国的历史学家们至今对这个问题还在激烈的争论。

军事博物馆的秦兴汉将军也说，没有发现张国焘准备武力解决中央的证据，他也没见到过这份出了名的电报。但他

相信张国焘确有野心，想接管整个红军。这一点在延安时曾批评过他。李先念说：“从最坏的方面讲，这是张国焘夺党权的一次公开尝试。”

党史专家王年一在《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三年第三期中仔细分析了那份电报（但他显然没有看到电文）。他的结论是，没有确切证据表明张公开威胁要“军事解决”。但是他说，党内很多人都认为张确曾这样威胁过，或者说张的行动暗含着这样的威胁。毛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一个附注里强烈地暗示张打算“军事解决。”

王年一举出两位权威人士，他们曾毫不含糊地说张打算采取“军事办法”。一位是李安葆，他在《话说长征》中肯定地指出，张曾“秘密下令进行军事解决”。另一位是吕黎平，他在回忆录《严峻的时刻》中写道，当值班军官陈茂生在翻译那份“出名的电报”时，他也正在通讯室，并帮忙翻译了电文。他说，电报里有这样的话：“如果他们坚持错误思想，坚持北上，那就采取军事办法武力解决。”但是，经查阅所有的官方文件，王年一认为没有证据表明电文里确有这样的话。他指出，任何中央文件里都没有提出这种指控，延安开会期间或是张国焘逃离延安后的公报里也没有提到这种指责。

毛的行动使张国焘勃然大怒。他把部队拉回阿坝，根本不提要释放毛的部下。他在阿坝那所大藏庙里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大会的口号是：“反对毛一周一张（洛甫）一博北逃。”张号召红军干部批判毛，并要朱德表态。

朱德说：“北上中央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我本人不能违背这个决定，我也不会带领红军反对这个决定。让朱批判毛，对世界舆论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世界上都认为朱——

毛是一个人。至于决定北上一事，我已举手赞成，不准备放弃自己的观点。”

“你竟然是这么个老顽固！”张国焘怒气冲冲地吼道。

刘伯承被激怒了。“你这样对待朱德是什么意思？”宋侃夫回忆称，当时对朱和刘使用了非常刺耳的语言。宋是张国焘指挥部的电报电话员，开会时在场。在会上，毛的人都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逃跑主义分子。”

有人在会上喊：“打倒朱德！”

张国焘很快就南下了。他的三十军和四军再次穿过草地同他在卓克基会合。侯国祥——一个大个头、沉默寡言和秃顶的六十八岁的干部（一九三五年，他才二十岁，是四方面军一位热情奔放的政治干部，属李先念的三十军）——还记得，离开卓克基不久，部队行军的口号就改了。原来的口号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周、博古。”现在改为“打倒成都吃大米”。

张国焘南下了，毛泽东则北上。

（摘自《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解放军出版社新版）

《红辣椒》，毛泽东最爱唱的一首歌

小村庄在西北很多，但是城市不论大小却不常见。除了红军草创的工业以外，西北完全是个农业区，有些地方，还是半游牧区。因此，纵马登上崎岖的山顶，看到下面苍翠的山谷中保安的一片古老城墙，确实使人觉得十分意外。

在唐朝和金朝的时候，保安曾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边防要塞。至今人们犹可在一条狭仄的隘口两旁，看到堡垒的残迹，被下午的阳光染成一片火红色。当年蒙古人的征略大军，就是通过这条隘口大举倾入这个山谷里来的。保安还有一座内城，从前驻扎过边防军；最近经过红军修缮的一道高大的用作防御的砖墙，围绕着约莫一英里见方的地方，就是现在保安城所在。

我（斯诺）在这里终于找到了南京同他打了十年仗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用最近采用的正式头衔，就是“中华人民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旧名“中华工农苏维埃共和国”已在共产党开始实行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的时候放弃了。

周恩来的电报已经收到，他们正等待着我，“外交部”里已替我预备好一个房间，我暂时成了苏维埃国家的客人。我到了后，保安外侨的人数顿然剧增。另外的一个西方侨民就是一个称做李德同志的德国人。关于前德军高级军官李德，中国红军的这个唯一外国顾问（这使希特勒极为恼火），下文还要提到。

我到后不久，就是见到了毛泽东，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象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霎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几天里面，我总没有证实这一点的机会。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着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关于毛泽东，我可以单独写一本书。我跟他谈了许多夜晚，谈到各种广泛的问题，我也从士兵和共产党员那里听到关于他的许多故事。我同他谈话后写的访问记录就有大约两万字。他幼年和青年时代的情形，他怎样成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一个领袖，为什么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红军怎样成长壮大起来，他统统告诉了我。他向我介绍了长征到西北的情形，而且写了一首关于长征的旧诗给我。他又告诉我许多其他著名的红军战士的故事，从朱德一直到那个把藏有苏维埃政府档案的两只铁制文件箱背在肩上走了长征全程的青年。

从这样丰富的未经利用、不为人知的材料中，我怎么能够用寥寥数百个字把这个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家的故事告诉你们呢？我不想作这样压缩的尝试。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我以后还要根据他所告诉我的情况，把他个人历史的那个丰富的激动人心的纪录写进本书。但是我在这里想要谈一些主观的印象，还有关于他的令

人感到兴趣的少数事实。

首先，切莫以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决不会有一个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认，你觉得他身上的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末，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但是我并不想宣布历史的判决。同时，除了他的政治生活以外，毛泽东作为个人也是一个使人感兴趣的人物，因为，虽则他的名字同蒋介石一样为许多中国人所熟悉，可是关于他的情况却很少知道，因此有着各种各样关于他的奇怪传说。我是访问他的第一个外国新闻记者。

毛泽东有能够从死里逃生、大难不死的传说。南京曾经一再宣告他死了，可是没有几天以后，报上的新闻栏又出现了他的消息，而且活跃如昔。国民党也曾经好几次正式宣布“击毙”并埋葬了朱德，有时还得到有千里眼的传教士的旁证。尽管如此，这两个著名人物多次遭难，可并不妨碍他们参与许多惊人壮举，其中包括长征。说真的，当我访问红色中国的时候，报上正盛传毛泽东的又一次死讯，但我却看到他活得好好的。不过，关于他的死里逃生、大难不死的传说，看来是有一些根据的，那就是，他虽身经百战，有一次还被敌军俘获而逃脱，有世界上最高的赏格缉拿他的首级，可是在

这许多年头里，他从来没有受过一次伤。

有一个晚上，一个红军医生——一个曾在欧洲学习、精通医道的人——给他作全面体格检查，我正好在他的屋子里，结果宣布他身体非常健康。他从来没有得过肺病或任何其他“不治之症”，象有些想入非非的旅行家所谣传的那样。他的肺部是完全健康的，尽管他跟大部分红军指挥员不一样，吸烟没有节制。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和李德（另一个烟瘾很重的人）进行了独特的植物学研究，遍尝各种的叶子，要寻出烟叶的代替品来。

毛泽东现在的夫人贺子珍——从前是小学教员，现在本人也是个共产党的组织者——却不及她丈夫幸运。她受到过十多处伤，是炸弹碎片造成的，不过都是表面的伤。正当我离开保安以前，毛氏夫妇新生了一个女孩子。毛泽东的前妻杨开慧曾生了两个孩子。她是一个中国名教授的女儿，数年前被何键杀害。

毛泽东现年（1937年）四十四岁。在第二次中华全国苏维埃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这次大会的出席者，代表着当时生活在苏区九百万左右的人民。说到这里，我要附带插入几句话。据毛泽东的估计，中央苏维埃政府在一九三四年直接控制下的各区最高人口数字如下：江西苏区三百万；鄂皖豫苏区二百万；湘赣鄂苏区一百万；赣湘苏区一百万；浙闽苏区一百万；湘鄂苏区一百万；总共九百万。有些估计高达此数的十倍，令人难以置信，大概是把红军或红色游击队所活动的各个地区全部人口加在一起而得出来的。我把中国苏区人民有八千万的数字告诉毛泽东的时候，他就笑了起来，并且说，要是他们真的有这样广大的面积，革命就差不多胜利了。不过当然，红色游击队的地区，人

口还有好几百万。

毛泽东在中国的共产党势力范围内的影响，今天大概比什么人都要大。在几乎所有组织里，他都是一位委员——如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政治局、财政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以及其他等等。他的实际影响是通过在政治局的支配地位发挥出来的，因为政治局有着决定党、政、军政策的大权。不过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他而且尊重他，但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一套。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口中老是叨念着“我们的伟大领袖”。我没有听到过有人把毛泽东的名字当作是中国人民的同义语，但是，我却也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不喜欢“主席”——一个人都这样叫他——或不景仰他的人。他个人在运动中的作用，显然是很大的。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这一点——大概是对的。然而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

略家，这是令人很感到兴趣的事。

红军正在保安盖起几所新建筑，但当我在那里的时候，住处是非常原始的。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比这更差的他都经历过了，但因为是一个湖南“富”农的儿子，他也经历过比这更好的。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他虽然除了主席以外还是红军的一个指挥员，他所佩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的两条红领章。

我曾几次同毛泽东一起去参加过村民和红军学员的群众大会，去过红色剧院。他毫不惹眼地坐在观众的中间，玩得很高兴。我记得有一次在抗日剧社看戏，休息的时候，群众一致要求毛泽东和林彪来一次合唱。林彪是红军大学的校长，只有二十八岁，他以前是蒋介石参谋部里一个著名的年轻军校毕业生。林彪象一个小学生似的涨红了脸，讲了几句很得体的话，请女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唱支歌，逃脱了“点名表演”。

毛泽东的伙食也同每个人一样，但因为是湖南人，他有着南方人“爱辣”的癖好。他甚至用辣椒夹着馒头吃。除了这种癖好之外，他对于吃的东西就很随便。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我听到他发挥爱吃辣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论。他首先举出他的本省湖南，就是因产生革命家出名的。他又列举了西班牙、墨西哥、俄国和法国来证明他的说法，可是后来有人提出意大利人也是以爱吃红辣椒和大蒜出名的例子来反驳他，他又只得笑着认输了。附带说一句，“赤匪”中间流行

的一首最有趣的歌曲叫《红辣椒》。它唱的是辣椒对自己活着供人吃食没有意义感到不满，它嘲笑白菜、菠菜、青豆的浑浑噩噩，没有骨气的生活，终于领导了一场蔬菜的起义。这首《红辣椒》是毛主席最爱唱的歌。

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自大狂的征象，但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生过气，不过我听到别人说，他有几次曾经大发脾气，使人害怕。在那种时候，据说他嬉笑怒骂的本领是极其杰出和无法招架的。

我发现他对于当前世界政治惊人地熟悉。甚至在长征途上，红军似乎也收到无线电新闻广播，在西北，他们还出版着自己的报纸。毛泽东熟读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他对英国的工党很感兴趣，详尽地问我关于工党目前的政策，很快就使我答不上来了。他似乎觉得很难理解，象英国那样工人有参政权的国家，为什么仍没有一个工人的政府。我的答案恐怕并没有使他满意。他对于麦克唐纳表示极端的蔑视，他说麦克唐纳是个“汉奸”——即英国人民的头号叛徒。

他对于罗斯福总统的看法是令人很感兴趣的。他相信罗斯福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以为中国可以跟这样的人合作。他又问到许多关于美国新政和罗斯福外交政策的问题。他所提问题表明他对于这两个政策的目标都有很明白的了解。他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看做走江湖的骗子，但认为墨索里尼能干得多，一个真正的权术家，有历史知识，而希特勒，却不过是资本家的没有意志的傀儡。

毛泽东读过许多关于印度的书，对于那个国家也有一定的看法。主要的一点，就是认为印度不经过土地革命是永远

不会实现独立的。他问到我关于甘地、尼赫鲁、查多巴蒂亚以及我所知道的其他印度领袖的情况。他知道一些美国的黑人问题，把黑人和美国印第安人所遭受的待遇，跟苏联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相对照。我指出美国的黑人和苏联的少数民族在历史和心理背景上有着某些很大的不同，他对此也表示有兴趣。有兴趣——但是并不同意我。

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化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

我常常在想毛泽东自己对于武力、暴力以及“杀人的必要性”等问题的责任感。他年轻的时候，就有强烈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倾向，从理想主义转到现实主义的过渡只能是在哲学上开始的。虽然他出身农民，但在年轻的时候，本人却不曾怎么受过地主的压迫，象有许多共产党员那样；还有，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他思想的核心，但据我的推想，阶级仇恨对他来说大概基本上是他的哲学体系中的一种理性的产物，而不是本能的冲动。

他的身上似乎没有什么可以称为宗教感情的东西。我相信他的判断都是根据理性和必要作出的。因此我认为他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大概基本上起着一种节制的作用。我觉得他想把他的哲学，即“长期观点”的辩证法，作为任何大规模行动中的权衡标准，而在这个思想范围内，人命的宝贵只是相对的。这在中国的领袖人物中显然是

不平常的，因为从历史上来说，他们往往置权宜于伦理之上。

毛泽东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他认为这要归因于他在少年时代在父亲的田里干过苦活，要归因于他在学校读书的刻苦时期，当时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组织斯巴达俱乐部一类的团体。他们常常饿着肚皮，到华南山林中作长途的徒步跋涉，在严寒的日子去游泳，在雨雪中光着脊梁——这一切都是为了要锻炼他们自己。他们凭直觉知道，中国的来日需要他们有忍受最大的艰难困苦的能力。

有一次，毛泽东曾经化了整整一个夏天走遍他的家乡湖南全省。他靠挨家挨户替农家做工换饭吃，有时候甚至靠行乞。有一次他几天不吃饭，只吃些硬豆和水——这又是一种“锻炼”肠胃的方法。他早年在这次农村漫游中所结交的友谊，日后对他是有很大价值的，因为十年以后，他开始把湖南的成千上万的农民组成了有名的农民协会，这到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成了苏维埃最初的基础。

毛泽东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二次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润湿的。在那次暴动中他的省里有几个饥饿的农民因到衙门要粮而被砍了头。有一个战士告诉我，他曾经亲眼看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给一位在前线受伤的弟兄穿。他们又说当红军战士没有鞋穿的时候，他也不愿意穿鞋的。

然而我非常怀疑，他是否能够博得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敬仰，也许这并不完全因为他有非凡的头脑，而是因为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巴莱托的中国门徒们也许要嫌他粗鲁的吧。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

地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不过话得说回来，巴莱托要是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可能也非搜寻一下不可。但我可以断定，巴莱托决不会当着红军大学校长的面前松下裤子的——我一次访问林彪的时候，毛泽东却这样做过。小小的窑洞里非常热。毛泽东把身子向床上一躺，脱下了裤子，向着壁上的军用地图，仔细研究了二十分钟——偶然只有林彪插口问他一些日期和人名，而毛泽东都是一概知道的。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完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一点相一致，虽然他完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将军和《中国名人录》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样。

在六千英里的长征途中，除了几个星期生病以外，毛泽东和普通战士一样都是步行的。在最近几年中，他只要“叛变”投向国民党，就可以升官发财，这也适用于大部分红军指挥员。这些共产党人十年来忠于主义的坚定性，你如不知道中国收买其他造反者“银弹”的历史，是无法充分估计的。

在我看来，他说的话是真诚、老实的。我有机会核对他的许多话，结果往往发现这些话是对的。他对我进行了几次不太过分的政治宣传，但是同我在非匪区所受到的政治宣传比起来，却算不得什么。无论对我写的文章，或拍的照片，他从来不加任何检查，对这优待，我非常感激。他尽力使我弄到能够说明苏区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材料。

由于在今天中国政局上的极大重要性，他的关于共产党政策的一些主要讲话，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因为在今天，西北全境以及其他各地武装和非武装的中国人民似乎都拥护他们的许多政策，因此，这些政策很可能成为造成中国命运发生根本变化的重要手段。

（摘自斯诺：《西行漫记》）

致 蒋 介 石

介石先生台鉴：

去年八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曾屡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先生始终孤行己意，先则下令“围剿”，是以有去冬直罗镇之役^①。今春红军东渡黄河，欲赴冀察前线，先生则又阻之于汾河流域。吾人因不愿国防力量之无谓牺牲，率师西渡，别求抗日途径，一面发表宣言，促先生之觉悟。数月来绥东情势益危，吾人方谓先生将翻然变计，派遣大军实行抗战。孰意先生仅派出汤恩伯之八个团向绥赴援，聊资点缀，而集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孙震、万耀煌、杨虎臣、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高桂滋、高双成、李仙洲等二百六十个团，其势汹汹，大有非消灭抗日红军荡平抗日苏区不可之势。吾人虽命令红军停止向先生之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积恨之心。吾人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军队与抗日根据地计，不得已而有十一月二十一日定边山城堡之役^②。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亟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即如先生之嫡系号称劲旅者，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所以者何，非该军呆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

红军耳。人心与军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今者綏远形势日趋恶化，前线之守士军队为数甚微，长城抗战③与上海一二八之役④前车可鉴。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綏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毛泽东 朱 德 张国焘 周恩来
王稼蔷⑤ 彭德怀 贺 龙
任弼时 林 彪 刘伯承 叶剑英
张云逸 徐向前 陈昌浩 徐海东
董振堂 罗炳辉 邵式平 郭洪涛
率中国人民解放军同上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注释

〔1〕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陕西郿县（今富县）直罗镇全歼东北军第一〇九师和第一〇六师一个团，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这次战役称直罗镇战役。

〔2〕 山城堡之役，指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四方面军一部，在第二方面军配合下，在甘肃环县山城堡击败国民党军进攻的战役。这次战役全歼敌主力胡宗南部一个多旅，使敌军基本停止了对陕甘宁苏区的进攻。

〔3〕 长城抗战，指一九三三年三月中国军队在喜峰口、古北口一带长城线上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役。由于蒋介石集团坚持对日妥协政策，中国守军被迫撤离长城各口。这次抗战以签订卖国的《塘沽协定》告终。

〔4〕 一二八之役，又称淞沪抗战。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坚持抗战一个多月，给敌军以沉重打击。这次抗战因国民党政府的破坏而失败。

〔5〕 王稼蕃，即王稼祥。

（摘自《毛泽东书信集》人民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给法庭的亲笔信

1937年，在延安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黄克功事件，国内外一些报刊把它当作“桃色新闻”抢先发表。由于党中央处理的十分得当，即使反动报刊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人是坚持民主与法制的。

黄克功，经历过井冈山斗争和2万5千里长征，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时，已是红军旅长。1937年，他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刘茜，年龄不到20岁的爱国女青年，“七七”事变后，奔向延安，先在黄克功任队长的抗大四大队学习，后编入陕北公学。当时，女青年找对象，有所谓“走长征路线”之说。刘茜选定了黄克功，他们的关系仓促地定下来，公开化了。但，在恋爱、婚姻和家庭问题上，黄、刘二人多少都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观点，相处久了，便发现生活情趣、习惯爱好方面有许多不同。黄、刘二人却没有据此端正自己的恋爱观，以致酿成悲剧。

悲剧发生在一个月明之夜，黄独自到陕北公学找刘，约她到延河边散步，作最后“谈判”。黄认为刘不忠贞，刘则认为双方都有权另找对象，在越来越尖锐的口角、争吵、顶撞与激怒中，黄先是持枪威胁，逼婚未遂，便完全失去理智，在一阵混乱中开了枪。刘死了，黄没有自首，回到了营房。案发后，延安保卫处发出通报，寻找破案线索。黄的警卫员发觉黄的可疑形迹，向抗大校部作了汇报。领导找黄谈话，这时黄已恢复理智，毫无保留地坦白了犯罪经过。经抗

大罗副校长向中央报告并得到批准，陕甘宁高等法院便把黄逮捕收监。

在延安，这种骇人听闻案件是绝无仅有的，人们议论纷纷，在是否应判黄克功死刑上，形成两种意见。老同志认为，黄自恃有功，无视法纪，杀人者必须偿命；青年同志认为，黄是红军的重要干部，民族解放战争正需这样的人，主张给以戴罪立功机会。分歧很难统一。

公审大会设在陕北公学的大院里，各机关、部队、学校至少有一万人参加，高等法院刑庭的全体成员都来了，以刑庭审判长雷经天为首，各就各位。党的总书记张闻天坐在后面。审判长宣布开庭后，起诉人与证人先陈诉黄克功事件的全部细节，各单位代表发表了对这一事件的群众意见。黄毫不隐讳地向法庭陈诉了他的简历，坦白交待了犯罪经过，他没有为自己辩护，只是“认为她破坏婚约是污辱革命军人。”当审判长问他有什么请求时，他只是说，如果是被判死刑，但希望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他要求给他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督阵，死在与敌人的冲杀中。他还说，如果不合刑律就不要了。

雷经天庄严宣布，处黄以死刑，立即执行。黄没有表示任何反抗、抵触、激动或消沉情绪。他面向群众，举起双手，高呼口号：“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随后，跟着刑警队，向刑场走去。

恰在此时，法庭收到毛泽东同志的亲笔信，因为信上建议要当着黄本人的面向公审大会宣读，审判长与张闻天同志商议后，命令将黄追回，重新站在犯人的位置上，听审判长宣读毛主席的信。毛主席来信的内容是——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到。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如此卑鄙、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失掉革命立场，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不可以教育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请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请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予安慰与抚恤。

毛泽东

1937年10月10日

重返会场的黄克功，当他知道毛主席有信，要向他当面宣读时，呈现了希望和感激的表情。当听完了毛主席的信后，他深深地低下了头。人们看到，黄是以认罪服从的态度离去的。

会场上，渐渐地从几个方向传出了低声哭泣，哭声由低而高。远处传来几声枪响时，大会主席宣布张闻天同志要向大会作重要讲话。张闻天同志讲话的题目是《民主、法制与共产主义的恋爱观》。张闻天同志说：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影响很不容易清除。在恋爱、婚姻及家庭问题上，尤其是这

样。男尊女卑、重男轻女、大男子主义、买卖婚姻等，一直是革命与妇女解放的课题。大家应该读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及马、恩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的有关论述。在恋爱、婚姻及家庭问题上，要重视政治与生活两个方面的协调，不能只卿卿我我，一味追求性爱关系。爱人与夫妻，第一应当是同志关系，在政治上互相帮助，第二应该是朋友关系，工作、学习上互相帮助，第三才是爱人与夫妻关系，在生活上互相体贴。旧社会歌颂才子佳人、英雄美人，那不是共产主义恋爱观；在黄克功、刘茜身上都有它的痕迹，在剥削压迫阶级当权的社会里，民主与法制是虚伪的。在我们这里它是真实的。延安的人们，在恋爱与婚姻问题上，就享有完全的民主与自由权。它是由法律和纪律保障的。黄克功自恃有功，无视刘茜的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刘茜坚持自己的自由与自主权，遭到杀害，民主政权依法为她惩办了凶手，新社会的新女性，已不是男人的奴隶、工具和私有财产。任何领导人、干部、战士和群众，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

总书记的讲话，使分歧消除了，思想统一了，异常严肃的公审大会，不再象个深山幽谷，恢复了延安每次开会那种欢腾的景象。散会的时候，响起了雄壮的歌声。

（摘自《福州晚报》）

她远离了毛泽东，另一个她 又亲近毛泽东

一九三八年一月间，西安办事处接到一份从延安发来的电文，这是毛泽东发给夫人贺子珍的。

贺子珍是不久前来到西安的。这时，她坐在房中，哄着才三岁的女孩子娇娇。她知道腹中又已怀孕了。心情很不正常。几天来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暴躁。

这次为一点小事情，向毛泽东发了脾气，可能是怀孕期间的生理反应，理智压不住感情的冲动，不但毅然决然地向毛泽东提出离婚，而且在一气之下离开延安，只身来到西安。准备候车赴苏联治病。

电文上完全是毛泽东的诚意劝告，清楚的写着请她回延安，不要离婚。一点没有错，电报是机要科的同志译出来亲手交给她的。她读了这几个字以后，心中十分矛盾。她在一气之下来西安。毛泽东日理万机，忙碌异常，而这次发生矛盾，又完全有自己的错误。

毛泽东批评了她，又原谅了她，叫不要离婚的电报也送到她的手中了。

她犹豫不定，但是，执拗的性格主宰了她的举止，倔强的性格使她决定离婚，不回延安。她远离了毛泽东。

几天之后，贺子珍动身去苏联了。

中央党校设在延安城东边的桥儿沟，这地方原是外国人传教的场所，有一栋大教堂，许多平房；最近又添建了新屋

和新窑。学员们全是中共党员，来自国民党地区，各个根据地和各方面军。江青混入党校，是她取得政治资本的重要一步。

今天吃午饭之前，各班组通知大家，下午两点钟在礼堂听报告。按时入座，不得迟到。一点多钟的时候，礼堂里已开始有学员进来。

江青最早来到，找了一个前排位子。她想，一定要坐在显眼露面的地方，不管谁做报告，做报告者必是党中央领导人。

礼堂里坐满了学员。

两点钟了，忽然响起热烈的掌声，全体起立。

台上出现了毛泽东，几百双眼睛放出喜悦的光芒。

江青也站起来鼓掌，对准台上招招手，拍拍手，再拍拍手，又招招手。她清楚地知道，这几下可以使毛泽东发现自己在前排，听报告时，她一时似乎在认真地听报告，一时又像是在思考报告的内容，有时急速记笔记，有时又以手支颐，偏着头看台上的人。姿态变化无穷。

两个钟头的报告结束了，同学们有的兴奋得没有心思去玩，马上整理笔记；有的互相交换学习心得。晚上，全校分组讨论。江青坐在那儿，不多发言，她的心早飞了，私心杂念，不能告人的隐情，一齐涌上心头。今天是和毛泽东第二次相见了，马上要来一个行动，否则心愿依照渺茫。学习小组会快结束时，她巧妙地作了十分钟发言，把会上同学们的发言加以归纳整理，作为自己的意见，加上漂亮的形容词重复一遍。言词动听，似乎有条有理。

晚上，等大家都睡觉了，她独自一人坐在灯下，提笔写道：

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今天专心地聆听了你的有着伟大历史意义的报告，你指明了光明的方向，使我鼓舞。

我是一个木工的女儿，从小受生活的折磨，在三顿吃不饱的苦难中又遭父亲酩酊大醉殴打成性的逆运；母亲受压，家破人亡，流落他乡；我被迫学京戏，登台谋生；后到上海加入左翼文联，于一九三三年入党，先后当电影和舞台明星，这是党给我的培养，是你的光辉思想哺育了我，才有今日。

我向往延安，追求真理，现在是党校十二班的学员，我因理论水平极低，革命斗争经验极少，有许多政治思想上的问题缺乏先进者的指教。

我请求，敬爱的毛主席，请你在百忙之中接见我一次，这是我这个苦孩子一生的唯一的希望！我思想上有许多问题，如能得到你的当面教诲，我当获益不浅！其中一部分是今天听你的报告之后，有关目前形势的分析。在某一点上，我还不甚明白。

敬爱的毛主席，我想你会欢迎我，你是一位善于联系群众的伟大人物，我这个纯真的女孩子只不过向你提出区区小小的要求。如果准见，我将于后日（星期日）下午三时来到你的居处。

啊！我写至此，全身热血沸腾！我将亲耳听到你的教导，的确：我已经见过你三次了，这幸福的第四次即将到来……

中央党校十二班学员 江青

一九三七年冬

第二天，她亲自把信送进城，送到毛泽东居处的门口。

又转身赶回党校。

她不准再追求别人了。她已经选定了奋斗的目标。

星期日下午，她不等接到回音，就按时到了毛泽东住处，见警卫员就开口笑道：

“警卫同志！我们不是陌生的人，上次我来见过主席，你忘记了吗？今天，我预先约会了，请不必阻拦。或者，请你先行通报，我随后跟来。”

警卫员赶紧报告毛主席，还没有来得及回话，她进了房门，急忙喊道：

“毛主席！你好吗？又有很久不见你了！”

她伸出右手，灵活地与毛泽东握手。

毛泽东让坐之后，问江青，有什么政治问题要解释吗？

“啊！主席！一个困扰着我的问题，我长时间得不到解释，只有大胆来请示你了，请主席原谅。蒋介石既然不抗日、假抗日，我们为什么还要争取他，与他合作，形成统一战线呢？主席！我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子哩！”她娇滴滴地说着。表示很关心国家大事。

毛泽东告诉她，叫她翻阅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发表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中国共产党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前途》等文章，就全清楚了。

“啊！谢谢主席指教，主席叫我从文章里去找答案。主席！你从我的信中得知，我是早年进步的女青年，很早参加革命。为了反抗旧社会，也为了解放女权，我闯过无数暗礁，达到能在上海站住脚，为工厂工人传播马列主义，又跃上舞台和电影界，这都是你的精神力量在鼓舞着我！”江青

不但以娇嫩的声调说着，而且扭脖，送媚眼。

毛泽东手中仍握着文件，一边看一边听，没有回答。

房子里生了一盆木炭火，因为不是严冬，炭火不旺。

毛泽东看完了手中文件，按了铃，秘书应声进来。

“把这文件退回原机关。”毛泽东交给秘书。又握笔伏在桌上写东西。

江青仍在滔滔不绝地讲话，秘书走进来，请毛泽东三点半钟开会，说另一房里已到齐了参加会议的同志。

江青不得已，只好笑嘻嘻地站起来说道：

“啊！毛主席，今天能见到你，简直抑制不住我心头的愉快，下次我再来看望你。关于文艺方面，我今天没有说透自己的粗浅的观点。”

在返回学校途中，她想毛泽东今天太忙，真不逢时，只好等待下次了。回到学校以后，江青四处打听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的情况。她既然下了决心，就不能不了解贺子珍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在党校，她有意识地接近一些老干部，以关心的口吻，探得贺子珍是一九三三年和毛泽东结婚的，是共患难的夫人，生了小孩子。贺子珍出身很好，为人朴实、纯洁；革命意志坚强，能吃苦耐劳，接近群众。毛泽东很喜欢她。虽然性格上有些不相融洽，她的文化程度略低；然而，这些都是次要的。毛泽东很理解她。江青又继续探问贺子珍的长相。大家都回答五官端正，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她探听到他们性格上不相融洽，对这一点抱有很大的希望。隔了一个时期，她又探听到贺子珍不知何故离开了延安，准备到苏联去，还带着小孩子。现在，他们已经分开了。江青听到这个消息，心中窃喜，又在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去见毛泽东。

在江青的鼓动和组织之下，话剧《锁在柜子里》和京剧《打渔杀家》正在排演。她看准了延安同志整日埋头苦干，没有文化娱乐生活，这正是她上台露面、一显身手的机会。于是，她积极地和一些男女青年天天排练，这两个戏的主角都是她担任。

演出的这天，剧团邀请毛泽东和中央首长亲临指导。毛泽东和中央首长出席了晚会，观看了这两个节目。当演出京剧《打渔杀家》时，江青扮演的箫桂英出场，坐在一旁为她打小鼓的“打鼓佬”，正是那位山东省诸城县的张大少爷——现在的名字叫康生。原来，他不久前才从苏联回到延安，担任了中央情报部的负责职务，又同阔别多年的李云鹤重逢了。演出结束后，他带头给江青鼓掌、极力捧场。

几天之后，江青抓住这次演出的机会，以请毛泽东指示，谈“观后感”为名，又跑去见毛泽东。这一次，她发表了许多看法，评论许多戏剧；古今中外，东拉西扯。从此，她以积极进步的思想为外衣，以谈工作和学习为名义，一步挨一步接近毛泽东。有时候，只见一面，讲两句话。有时候，挨到吃饭仍不肯走。

这时候，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筹备召开，听取刚从莫斯科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关于共产国际指示的传达。毛泽东忙于会议工作。江青却更频繁地找毛泽东，使毛泽东不得休息。组织部负责人曾找江青谈话，告诉她少去找毛泽东，毛泽东的夫人是贺子珍；指出人民的领袖，大家爱戴，劝她少纠缠。她不服从，而且在心里记下了仇恨。

在校外的田野上，江青和“朋友”亲密地交谈着。

“你还真是我在上海时代的好‘朋友’！只有你才是我

唯一的患难之交，将来我不会忘了你的！”

“小妹！到那时，首先是我感到幸运，感到光彩！”

“朋友”拍拍江青的肩膀，亲热地说着。

“这件事，除你之外，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情报部的康生同志。”江青得意地说。

“什么，情报部的康生同志？”“朋友”有些惊奇地说
“有这样的大人物暗中保护你，力量不小呀！”

“老乡又是老熟人，当然，我对他的恩德铭记在心。不过，因为地位的关系，我们不便多来往。请你保密。”江青警告她。

“可是，时日这么久，你怎么还不……”

“哈！你的心比我还急，急不得的！在大人物面前不能施诡计，不能献殷勤，不能那么简单地追求，也不能企图一气呵成。你知道，毛主席稳重极了！他轻易不扯闲谈，不浪费一分一秒；也不随便上女人的钩子。我为了求得机会多，接近多，使他逐渐愿意和我谈话，不能不忍耐。更重要的是，每次见面带着富于思想政治性强的，和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去找他，把他当为我的导师、教员，请他为我这热心学习的小女孩子……”

“当然！你比他小二十二岁”“朋友”插了一句。

“请他当面教育我，帮我分析各种矛盾，解决各类糊涂观点。一言以蔽之，我要使他对我的政治思想、观点发生兴趣，使他认识我有一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政治水平，争取不拒绝我去会见他，这才是第一步啦。唉！不容易呀！每次见他，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是不行的呀！”

“哟，还这么复杂！难为了你。你在用九牛二虎之力。以你的能力，我相信你能成功！”“朋友”睁大眼，张着嘴。

“譬如，那次我找他，整个的时间花费在上海文艺界的阴暗面。我把我在上海《大晚报》发表的，富于反抗旧的、提倡新的文艺创作背诵给他听，这倒使他听得很感兴趣。他说他看过这几篇署名蓝苹的小品文，当他知道就是我写的时候，他的眼神虽然发亮，却没有讲什么，但我完全理解他在暗中惊奇。”

“你这手段不简单，那篇文章不是有人帮助你才写出来的吗？”

“当我和毛主席谈到目前延安文艺工作如何开展时，他也很愿意听。你提的问题，算是有了答案吧？现在，他在政治思想问题上已愿意和我聊聊了。只要有机会让我接近，就好办事。万一受到逐客令，那我这辈子完了！所以，我总是注意这一点，严肃地，没有一处破绽，绝不让他讨厌我。一定要达到欢迎我去谈问题的目的。”

“你从哪里找来这么多的有意义的、必须具有水平的政治性问题？”“朋友”听得出神。

“怎么会没有呢？他的著作、报告，不断地发下来，大家学习、讨论，问题不就拣来了吗？得来毫不费功夫，再去问他，他不能置之不理，因为，这样就是不脱离群众，就是丰富了他的思想，不得不对我发生兴趣。告诉你，第一步，我已走到了，毛主席不会拒绝我去谈问题了。对不会谈情说爱的政治家，就只能走这条路子，去抓他的心，别无他路可寻。”江青说来头头是道，连自己也感到这一手厉害。

“那么，什么时候扯到爱情上去呢？”

她们一路走得很慢，天渐渐黑下来，是晚自习的时候了。她们加快步子，朝校门走去。

“这不能预先决定，要见机而行。要细致而稳重，要像

一个纯真的、追求真理、弄通马列主义的女孩子，不能露一点私心杂念，连脸上都要一本正经。眼睛正视，声音诚挚，态度大方。如果凑巧遇上他吃饭，那就是我的运气来了，吃饭的时候，他倒随便些，我可以加上一些引人发笑的话题。

“呵，你和他同桌吃过饭！”

“就是不知道他吃饭的时间。有一次，我们正谈一个问题的时候，饭来了，他只好问我吃了饭没有，我当然回答愿意陪他吃这顿饭。”

江青满脸高傲气色，“朋友”十分羡慕她。

“好！祝你一帆风顺！不要忘记请我吃喜酒！”

“那一定！请你天天为我祈祷吧！再见！”

她们互相笑着，招手而别。

此后，江青在毛泽东面前使出各种手段和许多花样，就无法尽述了。

毛泽东被她缠紧了，请示中央书记处，书记处以多数通过同意他们结婚。

毛泽东又要情报部负责调查江青的历史。一九三八年，原上海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向中央情报部揭发江青在上海曾被捕，历史上也有不清楚的地方，需要审查。可是被情报部的负责人，那个嘴唇上留胡须，鼻梁上带着眼镜的、早年就熟悉江青的康生包庇着，而且向毛泽东打了保票，写了书面证明：“经调查，江青同志政治上无问题，其历史清白。”

六中全会之后，江青来见毛泽东更频繁，书信如雪片般飞来，她从党校转到马列学院不久，十一月底就完全达到了目的，和毛泽东结了婚。

（摘自《无冕女皇》，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

毛泽东为何爱玫瑰

李敏的乳名叫毛娇娇，1940年，娇娇从延安到莫斯科来到母亲身边。那时毛泽东已经与江青结婚，贺子珍在国际儿童院给中国孩子教中文。女儿的到来，象一股清流注入她干涸的心田。在苏联，母女俩度过最艰苦的战时生活。1947年，妈妈带着11岁的娇娇回到哈尔滨。

娇娇去苏联时年幼，对爸爸印象不深，她真正明白爸、妈不能生活在一起的原因，还是在妈妈同舅妈李立英的叙述中听到的。那时她只觉得妈妈白天在人多时妙语横生，而一到夜阑人静就满面愁容，一根接一根抽烟。

贺子珍回国时身材苗条，婀娜多姿。每次周末晚会，请她跳舞的人很多，都夸她跳得好。一天妈对她说：“我给你找个新爸爸好吗？”娇娇心情沉重。她认为妈妈如果当真再结婚，可能重新获得幸福。

根据毛泽东的口信，娇娇来到爸爸身边。贺子珍后来也从东北到了上海，住在舅舅的家里。很自然，娇娇成了沟通爸、妈间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贺子珍病了，毛泽东寻找治病良药。娇娇回北京，贺子珍让她给毛泽东带东西，每次都给江青的女儿李纳带一份。但江青对此仍不能容忍。

一次娇娇画瓜，另外还画了一块三角形的西瓜，她把这幅画寄给妈妈。贺子珍见后联想翩翩，那个大西瓜象毛泽东的家庭，三角形的西瓜象自己。看后作诗的愿望油然而生，她把诗写好后寄到北京。一天江青气冲冲责问娇娇说：“你

用西瓜拉什么线？”“你妈用诗来讽刺我，我要请组织处分你妈。”诗的风波以后，贺子珍再也不给女儿写信了。以后有江青在身边，毛泽东和娇娇不能谈贺子珍。这竟使父、女俩有了一个共同的爱好：爱玫瑰。因为贺子珍原名叫桂圆，桂、瑰同音。毛泽东对娇娇说：我知道，你妈生病是为了我，只有我才能治好她的病，可我有什么办法呢，李纳已经18岁了！”

贺子珍一直牵记着毛泽东。当她得知江青和他分居，她为毛泽东生活孤寂而忧愁。当她得知毛泽东患病去世的消息，她责怪女儿、女婿不去看爸爸。其实她是错怪了她们。自从女儿一家搬出中南海后，他们见毛泽东都要取得江青的同意，所以临终前，娇娇只见过毛泽东一次，毛泽东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圆圈，说了一句听不清的话。这圆圈不就是妈妈桂圆的圆字吗？

（摘自《追求》1988年第2期）

为了女儿，贺子珍被送进疯人院

1940年，4岁的娇娇（即李敏）从延安到莫斯科，才认识了自己的妈妈贺子珍。那时，贺子珍在东方大学学习完毕，留在国际儿童院，给那里的中国孩子教中文。在苏联生下的小儿子，因肺炎死了；在国内，毛泽东已经结婚。他丧子失夫，孤苦凄凉。女儿的到来，犹如在她干涸的心田注进了一股清流。

贺子珍宠着女儿，但也很严厉。

她被关进疯人院，就是为了娇娇。

有一天，她听说娇娇在国际儿童院里生病了。她真害怕发生在儿子身上的一幕，会在女儿身上重演。她越想越害怕。

这时，已经是半夜了，她披衣起床，穿过森林，向国际儿童院走去。她走进娇娇睡觉的屋子，把正熟睡着的娇娇，连被子一起抱起，就往外走。她要把娇娇带回家去自己护理。值班的保育员不答应这种违反院里的要求，两个人争执起来。贺子珍没能说动这位保育员，只得自己回家了。

第二天，娇娇体温更高了，被送进了医院。娇娇病情日重一日。医院规定，患病的儿童住院抢救时，不让家长探视。这真把贺子珍急坏了。当她获准去看女儿时，医生告诉她，娇娇已经无救了，被推到太平间的外间，只等着她一断气，马上推进太平间。

她看着娇娇奄奄一息的模样，一阵风似的跑回家，拿出

自己几件值钱的衣服卖掉，买回一小包白糖和一瓶牛奶，又直奔医院。她坐在娇娇的床头，喂娇娇喝这杯带糖的牛奶，娇娇终于苏醒过来了，在妈妈悉心照顾下，她一天天好起来。

这时，贺子珍又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娇娇接回家，由自己亲自护理。过不久，新的打击又向她袭来。国际儿童院的负责人找她谈话说，娇娇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回到集体中生活，你也要马上上班去。贺子珍忙解释说娇娇身体还没好，不能回儿童院去；她要照顾女儿，也不能上班。这个负责人轻蔑地说：“你们不劳动，难道让我们来养活你们这些懒家伙吗？”

听到这句污蔑的话，贺子珍这些日子经受的委屈、积攒下的不满，一下子迸发出来。她声音颤抖，言词激烈地数落着这个负责人搞大国沙文主义，没有一点同情心。那位负责人恼怒地说：“你是不是发疯了？当心我把你送进疯人院！”

贺子珍完全没有估计到这场争吵的严重后果。事过不久，果然来了个彪形大汉，把她捉到精神病院去了。

娇娇再次见到自己的妈妈，是在1947年。

（选自《追求》1988、2）

娇娇看妈妈

8月初的一天下午，毛主席把我叫到了办公室里。进办公室一看，娇娇正在沙发上坐着。毛主席先让我坐下，然后对我说：

“小孩子们都放暑假了，娇娇想到天津去看她妈妈，我托你和她去一趟。她还小，来回的路上我不放心。现在家里工作很忙，人也很多，你向他们交代一下，就去一趟吧。一块去，一块回。暑假的作业，娇娇已经完成了，她想住几天由他定，开学以前赶回来就行了。天津离这里很近，买普通座位就行了。”

稍停了一下，毛主席问道，“你个人有什么事吗？”

我说：“没有事，我可以去。”

毛主席说，明天就去。你去了，代问贺子珍同志好，希望她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保重身体。娇娇在我这里很好，我很喜欢她。她住在学校里，每个礼拜六都回来，我们都能见面、说话，还在一起吃饭。请贺子珍同志放心。以后，每年放暑假，娇娇都可以去看她。你到了天津，如果和贺子珍同志谈起话来，你就说我从转战陕北直到现在，我的身体很好，多安慰她，这里的其他事情，不必多谈。

我说：“我一定按主席的指示办。”

第二天，我和娇娇就由前门火车站上了火车。我们坐的是普通硬座，车厢里的人很多。坐下以后，我跟娇娇说了一会儿话之后，她就拿出一本俄文小说看了起来。

这时，娇娇才十三岁，个子比较高，穿着一件白底蓝点的花布连衣裙。因为她是刚从苏联回来的，穿件连衣裙是很自然的，可是在火车上没有其他的女孩子穿连衣裙，娇娇坐在那里，当然就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另外，他还有引人注意的地方，就是在看外文书。娇娇长得俊秀，穿得也漂亮，还看外文书，有好多人就投来了惊奇和羡慕的眼光。

坐在旁边的一位老人问娇娇：“你看的是什么书呀？”

娇娇也可能听懂了，也可能没听懂，她没有说话，只是转过脸来看了看我。

我告诉那位老人：“她看的是俄文书。”

老人惊讶地说：“这么个小孩，就能看外国书呀？真不简单！”

一个女青年走过来问：“她是谁家的孩子呀？不简单，真有出息！”

另外一个女孩子问娇娇：“你在哪里学俄文？你这么小的年纪，就能看这么厚的俄文书呀？你是在中国学的，还是到苏联学的？”

娇娇说：“我是在苏联长大的，在苏联五年制小学毕业的，等于中国的高小毕业。”

一听她是在苏联长大的，又在苏联上过学，人家更是羡慕了。有的人问她，苏联人吃什么？穿什么？有的人还问她，姓什么？叫什么？是谁家的孩子？有的情况，娇娇就跟人家说了一下，有的情况，她就不好讲。比如，她是谁家的孩子，她就不好讲。她越不讲，别人就越问她。我对大家说：她家在天津，她就是老红军的子女。”

一路上，在我们乘坐的这节车厢里，气氛显得非常活跃，有说的，有笑的。有些人和娇娇聊天，有些人在一边夸

娇娇，有些人还在猜测她的父母是谁。

我们到天津，来到了市委招待所里。在这里，娇娇看到了她的妈妈。贺子珍同志一见了娇娇，激动的流出了眼泪，忙拉住娇娇的手，把娇娇搂在了怀里。贺子珍同志呜咽着对娇娇说：“你可回来了，你知道妈妈是怎样想你吗？你现在还不知道妈妈的心，你将来长大了就知道了……”

看到这一切，我心里觉得挺不是滋味。

我这是第一次看见贺子珍同志。以前，只是听别人说过她。说他是红军时期的女同志，怎么怎么好。这回见到她，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她和其他红军时期的老同志一样，对人热情，诚恳直爽，没有架子，平易近人。这次和她见面时，他和娇娇说了几句话，然后就和我握手，给我倒茶水，又把我拉到卫生间里叫我洗脸。中午吃饭时候，她把我送到食堂里，并对服务说，给我固定一个地方，三顿饭都在那里吃。

当天晚上，贺子珍同志和我谈了很久。

在谈话的过程中，我首先转达了毛主席对她的问候，并希望她保重身体。

我告诉她：“主席说，他很喜欢娇娇，娇娇在主席身边很好，学习期间住在学校里，每星期六回家，能和主席见面、说话，在一起说话。希望你放心。以后，每年学校放了暑假，娇娇都可以回来看望你。”

贺子珍同志说：“娇娇愿意跟主席在一起，我也同意。但是，我知道主席的工作很忙，娇娇还小，只能希望你们工作人员看在主席的情面上，对娇娇多多关照。这次回到天津来，娇娇愿意住几天就住几天。你也没有来过天津，可以到处看看，天津是个工业城市，在中国也是有名的大城市，你

来了就好好看看吧。”

我说：“来时主席说了，娇娇还小，来回路上不放心，叫我在这里等着，和娇娇一块回去。她愿意多住几天也可以，作业已经完成了，开学前回去就行了。”

贺子珍同志说：“那就好了。娇娇也不会住的太久，她说了，她想早点回到主席身边去，好好复习语文。他在国外光学俄文，汉语的基础差，在这方面要好好努力才能跟上呀。娇娇还小，她在主席身边，给你们工作人员增加了不少麻烦，你请转告大家，我也特别感谢你们。”

我在天津住了十多天。在那里，贺子珍同志对我非常关心。当时天气很热，她经常劝我多洗澡，勤换衣服。她说，这样可以少生痱子。

我第一次在卫生间里洗完澡以后，贺子珍同志就把我换下来的衣服，从床上拿走了。第二天，她就把衣服给我放在了房间里。我一看，洗得干干净净，叠得平平整整。我很受感动。从此以后，我洗澡的时候，就先洗衣服，怕她再把我的衣服拿去。有一次，贺子珍同志看见我的上衣掉了一个扣子，她很快找来了一个扣子，给我把扣子缝上。

那时，我们经常在一起闲谈。贺子珍同志问了毛主席的身体、工作和在战争中的生活。我也讲了些毛主席在战争中遇到的一些艰难困苦，以及一些危险的场面和情节。看来，贺子珍同志也非常关心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

贺子珍同志还对我说：“我们的大孩子毛岸红，在长征路上因为环境恶劣，情况紧急，就寄放在一个农民的家里了，现在还没有找到。全国胜利以后，我还要亲自去找。我带着娇娇到苏联去学习，主席同意，我也愿意。我想，我学习一段回来以后，一定能够更好地协助主席工作。以前，我

和主席在一起也很好的。因为我的脾气不好，有时因为一些小事情，事后也感到对不起主席，这些事情，主席也没有放在心里，我也没有当作什么问题。总想好好学习两年，回来好好协助主席工作。可是……”说到这里，她再也讲不下去了。

这时，我想起了刚进城不久，贺子珍同志的妹妹贺怡同志找毛主席的一件事。那时，毛主席刚进城不久，还住在香山，贺怡同志便来对毛主席说，在长征路上丢掉的毛岸红，现在已经找到了。毛主席听了特别高兴，就详细问了一些具体情况。贺怡同志说完以后，毛主席认定和他记忆中的地点、时间、照片、岁数都不相符。

毛主席说：“他不是岸红。如果是长征路上红军寄放到农民家的孩子，一定是哪一位解放军同志的孩子，想办法找到他的父母。要赶快给他家送去。”

我在想，贺子珍同志心里难过，毛岸红的丢失，也给她的心灵留下了永远难以医治的创伤。

离开天津的头一天晚上，贺子珍同志又和我在一块谈了很久。她让我代向主席问好，还说：

“希望主席保重身体。娇娇还小，希望主席有时间多关心一下娇娇的学习。”

她再一次让我转达，她对主席身边工作人员的谢意。

回到中南海以后，当看到娇娇的时候，毛主席非常高兴。

我在院里见到毛主席，就向他传达了贺子珍同志的问候，希望主席多关照娇娇的学习。我本想这么一说就行了，不多耽误主席的时间。可毛主席对我说：

“你到屋里来坐一坐吧。”

我随主席进到办公室里，坐在了沙发上。

毛主席问：“贺子珍同志身体还好吗？”

我说：“她身体很好，她精神也很好，我在天津住了十几天，我们谈了三个晚上，她最关心主席的身体，我把撤离延安后的一些艰难紧张情况给她说了，她也很愿意听。她说，那个时候，她也为主席担心。我告诉她现在主席的身体比在延安时还好呢，她听了很高兴。贺子珍同志很关心娇娇的学习，她说，娇娇在苏联主要是学习俄文，汉语的基础差，她希望主席多关照娇娇的学习。”

毛主席说：“是呀，星期六晚上和孩子们在一起吃饭，既是欢乐，也是督促他们学习的好机会。别的时间我就顾不上了。这些孩子们的事情，还要靠你们帮忙呀。”

我说：“贺子珍同志也讲了，主席的工作忙，希望我们工作人员多照顾娇娇。”

毛主席问：“她没有谈别的事情吗？”

我说：“贺子珍同志还谈到过去因为一些小事，曾经与主席争吵过几句，事后很后悔，感到对不起主席。贺子珍同志还问了许多事情，我不好回答她，我没有说什么。”

毛主席说：“好吧，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吧。”

毛主席站起身来，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孩子们的事情，你就多照顾一下吧。”

（摘自阎长林《毛泽东生活实录》，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重庆谈判详细内幕

蒋介石的既定方针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即发动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并吞解放区。但是，遭受八年战乱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各民主党派，要求民主、和平的呼声很高。蒋介石为避免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国内外舆论的谴责，企图把发动内战的责任推卸到共产党身上，又由于蒋介石的军队还远在西南、西北后方，有的嫡系部队还远在缅甸、印度。要把全部军队运到打内战的前线，尚需一段时间。于是，蒋介石在加紧准备内战的同时，又摆出一幅“和平协商”的姿态。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蒋介石致电毛泽东：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事，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 八月十四日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

题。

毛泽东未铤八月十六日

朱德在八月十六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批驳了蒋介石八月十一日命令八路军“就原地驻防待命”，不许向未放下武器的日军进攻、受降的错误，同时提出了中共关于制止内战的六项主张。

八月二十日，蒋介石复电毛泽东：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现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于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愿惠诺为感。”

蒋中正寄八月二十日

从蒋介石的这封电报中看出，他借重美帝国主义的势力，向中共施加压力。并坚持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如果毛泽东不去，就可借此宣传中共没有诚意，把发动内战的责任推卸到中共身上。

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进謁，希予接洽，为慰。

毛泽东未养八月二十二日延安

蒋介石接到以上这封电报的第二天，即复电毛泽东：

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电速驾！

蒋中正稜八月二十三日

蒋介石以“时间迫切”、“问题重要”，要求毛泽东与周恩来“偕临”重庆。并准备了飞机迎接。同时，蒋介石给毛泽东的电报，每次都在报刊、广播中宣传。这分明是“将中共一军”。

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即复电蒋介石：

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鉴：

极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造聘，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二十四日

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通知蒋介石他“准备随时赴渝，”但仍决定周恩来与蒋介石先行接触，当了解蒋介石对和谈的诚意如何之后，再赴重庆，因延安的广大军民对毛泽东去重庆非常担心。张学良到南京遭软禁，李济深、胡汉民被扣押于南京汤山，蒋介石的这些手段，人们记忆犹新，至于蒋介石杀害共产党人与爱国民主人士的罪行尤为昭彰，此次他主动邀请中共主席和谈，孰知所设是否“鸿门宴”。

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认清蒋介石此番目的不在诱捕他，而在于利用和谈，争取备战时间，推卸内战责任。八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告诉全党、毛泽东将赴重庆谈判。同日，中共中央给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魏德迈发去一封电报，要求美军派出专机，并请驻华大使赫尔利乘专机同往延安迎接毛泽东赴重庆。中共的这一要求是必要的，如果蒋介石派出的飞机在途中“失事”，那蒋介石是可脱卸责任的。

八月二十七日，赫尔利与张治中乘专机抵延安迎接中共和谈代表。二十八日下午五时，迎接毛泽东的专机抵达重庆。中共另两名和谈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也同时到达。

毛泽东亲临重庆和谈，出乎蒋介石的意料。毛泽东的专机降临重庆机场时，蒋介石召集各院院长会议，应急讨论国共和谈事宜。

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晚间，蒋介石在他的林园官邸设

里宴，欢迎毛泽东。这是自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事隔十八年后，毛泽东与蒋介石方再次见面。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心诚挚待之。政治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

八月二十九日下午四时许，蒋介石亲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住处拜会。这次会见了大约二十分钟，双方宣布了和谈代表团名单。蒋介石委派的代表为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毛泽东委派的代表为周恩来、王若飞。随后，双方举行了多次会谈。

蒋介石对谈判毫无准备，因他没想到毛泽东能去重庆，临到谈判，国民党方面竟拿不出任何谈判方案。邵力子辩解说：“国民党没提出具体方案”是“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倘若政府先提具体方案，也许使中共方面认为政府已有一种定见，而有碍于会谈的进行。”

九月三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对需要谈判的各项问题，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方案，即《谈话要点》。同一天，蒋介石与毛泽东二人也单独进行了会谈，对军队、解放区、政治、国民大会等重要问题交换了意见。

九月四日上午，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三人去见蒋介石，将中共所提的《谈话要点》文件交给他。蒋介石见到这个文件、加之昨天他与毛泽东的会谈，蒋介石自己说：“脑筋深受刺激。”因为谈判中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解放区的政权和人民军队问题上。蒋介石企图在“统一军令、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中共则坚持必须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合法地位。当天，蒋介石将他自己拟定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他的四位代表，在蒋

介石所拟的谈判要点中，把中共的方案说成“实无一驳之价值”。关于全国军队缩编，蒋介石只允许中共整编为十二个师之数，“乃中央所能允许最高限度”，而他的军队则整编为一百一十四个师。关于“中共方面所提解放区，为事实所绝对行不通者。”

九月十二日与十七日，蒋介石两次约毛泽东会谈，主要目的仍是减缩人民军队整编的数额。

重庆谈判，历经四十三天，是国共两党的一场严重尖锐的政治斗争。共产党为了使谈判顺利进行，避免内战的爆发，一再提出积极的建议：人民军队可缩编为二十四个师以至二十个师，并同意退出八个解放区，表明了和谈的诚意。毛泽东、周恩来在此期间还做了大量的统一战线工作。多次会见和访晤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妇女、青年、文化界、工商业界人士。宣传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基本政策，及关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介绍了谈判情况，表达了共产党对和平谈判的诚意，从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形成了一股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要求和平民主的强大舆论力量。

十月十日午后，在张治中家的客厅里，签订了《国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协定上签字的国民党代表是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中共代表是周恩来、王若飞。签字时毛泽东在场。签字后蒋介石才姗姗来迟，他穿军装，佩特级上将领章，挂着佩剑，与毛泽东握手，坐了大约十分钟，算是为中共代表团送行。十月十一日，毛泽东由张治中陪同，乘专机飞返延安，周恩来、王若飞留在重庆谈判。

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对《双十协定》有如下几点看法：“第一，中共在这个会谈纪要和以前多次所提出的条款

始终表示愿意接受蒋的领导，实行三民主义，这是使国民党内大多数人认为非常满意的。第二，政治协商会议终将召开，就可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了。第三，军队数字始终是最棘手的问题，但也有了结果，中共愿意由四十八个师减到二十个师，这是很大让步。第四，解放区问题在历次协商中始终没有达成协议，这次虽然没有解决，但双方都表示愿意继续商谈的诚意。实在说起来，凡是具有远见的人，对于这个协议，应该感到满足。”

（摘自《蒋介石生平》）

戴季陶宴请毛泽东

1945年8月28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身系国家安危，亲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在重庆谈判期间，除了同国民党左派人物和民主人士广泛接触外，毛泽东还数度造访了国民党上层人物中的顽固反共的右派人物。

戴季陶是国民党中顽固反共分子，早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就积极参加“西山会议派”进行反共活动。1927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他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毛泽东对戴季陶是很了解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写过很多文章批判戴。9月3日下午，原定去“桃园”拜访于右任的毛泽东，突然闯入同处“桃园”中的戴府。戴季陶万没想到，毛泽东会来看他，王炳南回忆说：“戴在毛主席面前局促不安，诺诺连声，好象无地自容似的，从戴府出来回头去见于右任时，正值蒋介石也去看戴季陶。”

二人狭路相逢，蒋介石先是一怔，随后佯笑说：“好，见见好，见见好。”这次拜访后，据张治中回忆说：“戴季陶反共坚决，思想保守，但他对毛泽东来到重庆，和对他的拜访，“表示敬重”，并对毛泽东的重庆之行“寄予热切的希望。”戴季陶还请张治中代约时间宴请毛泽东，9月13日晚，毛泽东同周恩来、王若飞应邀出席了戴季陶的宴会。

陈立夫，国民党反共头面人物之一，C·C系的头子。对于国共两党进行和平谈判，他极力反对，对这样一个人物，

毛泽东仍不放弃接触。王炳南回忆说：“一见面，主席先以回忆往事的口气，谈起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情景，然后批评国民党实行反共剿共的错误政策。主席说：十年内战，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而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同时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一教训难道不发人深省吗？……面对毛主席坦荡的胸怀，机敏的议论，陈立夫无以措词，不得不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

（摘自《中华英烈》1987年第5期）

毛泽东爱跳舞

毛主席来到西柏坡没几天，工作人员就提出要组织一个晚会，想借晚会的机会，见一见首长们，和首长们在一起娱乐娱乐。这样，经有关领导同意后，就确定要举办一次舞会。因为大家都觉得跳舞这种形式比较自由，气氛也显得热烈。过去在延安的时候，每个星期六也有组织舞会的习惯。

舞会的时间定下来以后，有关同志就开始选择场地。经过比较，场地确定在毛主席、周恩来和任弼时同志的住房门前。这里，原来是老乡们的打谷场，比较宽敞，也安全，就是地皮松软了一些。

选择这个地方当舞场，就是怕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不参加，如果他们不来，就要影响他们的办公。因此，举办舞会的同志也做了两手准备，如果他们参加舞会，乐队就在舞场里伴奏；如果他们不参加舞会，就让乐队到附近的一间房子里去伴奏。把声音压得低一些。

尽管做了首长不来的准备，但大家还是积极地想办法让首长们来参加，因为同志们都非常想见见首长们，他们要是不来，光跳舞也满足不了大家的要求。

在举办舞会之前，我曾经把跳舞的事向毛主席报告了。

我说：“我们来到了西柏坡，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已经汇合了。为了对首长们表示欢迎，庆祝这个大团圆，今天晚上要组织一个舞会，大家希望主席也参加。”

毛主席当时正忙着看文件，他只说了一句：“好嘛，我

也去看看机关的同志们。”

这一天吃过午饭，同志们开始忙了起来。有打扫卫生的，有抬桌板凳的……很快就把舞场布置好了。

毛主席吃过饭，来到门外散步时，他已看到同志们在布置舞场，但他也没有说什么，很高兴地在门外转了转，又回到了屋里。

吃过晚饭，中央机关各部门的同志，都陆陆续续来到了舞场。来得最早的，是在东柏坡、家裕村驻的中央统战外事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南庄中央组织部和机要处的同志。

不管是从哪里来的，一到了这里，又说又笑，热闹得很。

夜幕降临了，舞场里的汽灯一下子都亮了，灯光照着一张张笑脸，照着五颜六色的彩旗。乐队的同志们在轻轻地拨弄着琴弦。

因为已经知道刘少奇同志和朱总司令要来参加舞会，人们都在殷切地等待着他们，也在殷切地盼望着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来参加晚会。

汽灯亮了不久，朱总司令第一个走过来了。一见到朱总司令，大家都使劲地鼓起掌来，许多青年人跑上去抢着跟他握手。青年们请朱总司令坐下以后，都围在他的身边，一个个有说有笑，就象小孩子一样天真。

突然，舞场里又响起了一阵掌声。接着又是一群青年男女蜂拥而上。原来是刘少奇同志来了。大家见到了刘少奇同志，同样很亲热，把他围起来，问这问那。因为，不管是转战陕北和留在山西的中央机关的同志，都有一年多没有看到过刘少奇同志。

见朱总司令和刘少奇同志先后来到了舞场，大家就盼着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也能来。几个心急的小青年老催着让我们去请毛主席跳。

叶子龙同志说：“好吧，我先派我的小兵请去主席，他们请不来了，我再去。”接着，他就对毛主席的孩子李纳和他的孩子燕燕与二娃说，“李纳、燕燕、二娃，你们回去把毛主席拉出来，叫他到这里来玩一玩。你们就对他说，外边可热闹啦，大家都在跳舞，叫他出来休息休息，他要是来，你们就拉着他，一定让他出来。”

李纳她们很听指挥，扭头就往毛主席的住处跑去。叶子龙同志就在后边跟着。叶子龙同志还没走到毛主席住处的门口，就见三个小兵拉着毛主席走了出来。

叶子龙同志迎上去对毛主席说：“休息休息吧，机关的同志们都想看看你。”

毛主席说：“我有什么好看的呀。”

叶子龙同志说：“撤离延安以后，到河东来的同志们说，有一年多没有见过你了，都想见见你。今天来的人特别多，有几百人。有的不会跳舞也都来了。”

毛主席说：“那好吧，今天要听你们的指挥了。走吧，咱们走吧。”

毛主席已经答应走了，可孩子们还是拉着他没有松手。

见毛主席来了，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大家都抢上前跟毛主席握手，并热情地向毛主席问候。

毛主席坐下以后，一大群女孩子又把他围起来了。

有一个姑娘对毛主席说：“在陕北战争时期，我们在河东，听说主席在河西带的武装部队很少，都是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被几个旅的敌人追了好几次，很危险，我们真担心啊。我们光想到河西的情况，但那时的情况又特别少，真是

急死人了。”

毛主席说：“你们为我担心，我还为你们担心呢。延安十多年没有打过仗，战争一来，你们能不能安全地到达目的地？那时还担心，阎锡山来向你们捣乱。因此，就让贺老总特别保护你们。现在我们见面了，你们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吧？我也没有想到这么快，现在看来，整个形势的发展都比我们预料的要快。咱们要加倍努力工作，争取全国的胜利早日到来啊。”

“这主要靠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我们做不了什么事。”

“你说得不对。你们都是做重要工作的人啊。比如说，我们写了一份作战计划或作战命令，离开你们机要处的人，就不能指挥全国的作战。如果你们耽误了时机，错过了机会，敌人可能逃跑，也可能转胜为败，我们吃亏。这样一来，战争的胜利就要推迟了嘛。”

年轻人听着主席的谈话，都很受鼓舞。他们越听越起劲，好象把跳舞这件事给忘了。

毛主席来了以后，人们就盼着周副主席能来跳舞。邓大姐知道同志们的心情，她就把周副主席动员来了。周副主席刚一出门，就被一些年轻人围住了。当他来到会场上，这里的气氛就更加活跃了。周副主席刚坐下以后，又是一群女孩子把他围住了。

和同志们说了一阵话以后，周副主席就对大家说：

“今天晚上是舞会，不要把这个舞会变成分片座谈会。你们看，主席那里那么多人，少奇同志那里、朱总司令那里、任弼时同志那里，都有好些人，跳舞场里都空了。你们快请主席他们跳舞嘛。”

经周副主席这一提醒，勇敢的女青年们，就一个个拉着首长，在音乐的伴奏下，欢快地跳起舞来。

我知道，毛主席是喜欢跳舞的。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就经常跳舞，有时还和斯特朗在一起跳。毛主席去跳舞，多半是他主动去的，有时是我们动员他去。我们总认为，毛主席的工作很忙，又没有什么业余爱好，让他跳跳舞，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休息。事实也是这样，他每次跳舞回来，都显得精神很愉快。

这次伴奏的不是专门的乐队，只是十几个机要处里的小青年。也没有多少乐器、只有胡琴、锣鼓、口琴什么的，还有一个旧手风琴。尽管乐器不多，演奏技术不高。但他们个个都很认真，也非常卖力气。

首长们也好久没有跳过舞了，这一次跳起来也就特别高兴。在“嘞嚓嚓……嘞嚓嚓”的乐声中，他们和同志们跳呀，跳呀，跳得是那么轻快，那么高兴。

看到毛主席跳舞，我心里不由得想起了转战陕北的艰难岁月：毛主席手拄木棍，艰难地跋山涉水；毛主席在敌人包围的情况下，锁眉思考对策；毛主席拿电话机 and 彭总共同指挥着战役……形势变化得真快呀。如今见到毛主席跳舞，我心里是多么高兴呀。

舞场因为是沙土地，地面很干，一跳起舞来，尘土到处飞扬。尽管这样，首长和同志们也不在乎，仍然兴致很浓。

跳了几场以后，周副主席对大家说：

“我提议把延安晚会的那个热闹劲，也带到西柏坡来，会唱歌的多唱几首歌嘛，有的同志表演得不错，也可以在这里表演一下嘛。”

周副主席这么一说，晚会的气氛就更加活跃了。接着，

大家就鼓掌，欢迎一些同志出节目。因为有的节目在延安就很有名，象《兄妹开荒》、《小二黑结婚》，还有陕北秧歌等等，大家都知道谁会演唱。这样，有些同志就出了拿手的节目，有的还出来表演了京剧清唱。

等这些节目演完了，接着又跳起舞来。跳着跳着便刮起风来。毛主席仍然跟一个小青年在跳着。还是在毛主席休息时，这个小青年就抢先和毛主席说好了，下一场她要陪毛主席跳。她跟毛主席跳舞特别高兴，因为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

风越刮越大，五颜六色的小彩旗，一个个不翼而飞，汽灯摇晃得很厉害。为了保证大家跳舞，负责组织晚会的警卫科指导员毛崇横同志，就站在舞场中间，用手扶着灯。两只手轮换着一直扶了很长的时间。

毛主席走过去对毛崇横同志说：“你是实心实意地为大家服务。”

周副主席也称赞他说：“谢谢你，你为大家服务真周到呀。”

因为时间比较晚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便和大家告辞，回到了各自的住处。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刚走不久，刘少奇同志和周副主席也说该回去工作了。在他们临走之前，他俩还对大家说，很久没组织过舞会了，希望大家多玩一会儿

舞会在继续进行。因为演奏的同志们太累了，后来就改用留声机伴奏。

这次舞会，一直跳到十点多钟才结束。在这两个多小时的跳舞过程中，大家始终情绪饱满，喜气洋洋。尽管当时的条件不好，但大家对这次舞会都非常满意。因为大家不仅参

加了一次多时没有参加过的娱乐活动，而且还见到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

从此以后，西柏坡中央机关的所在地，就经常在星期六的晚上举办舞会。

进北平以后，机关每个星期六的晚上，也要组织跳舞晚会。机关跳舞的地方，多是在南海的春藕斋。为了把舞会组织得更好，在跳舞的间隙还穿插演些小节目，如唱歌，京剧清唱，舞蹈表演等等。

来春藕斋参加跳舞的人，除了本机关的人员以外，还邀一两个外单位的男女同志来参加。外单位来中南海跳舞的同志都特别高兴。因为不仅可以在中南海见到中央首长，而且还可以和他们一块娱乐。

进北平以后，有相当一段时间，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忙于工作，抽不出时间来参加舞会。每到星期六的晚上要组织舞会的时候，大家都希望毛主席和其他首长都来。因此，凡是听到毛主席在星期六的晚上想要安排会议，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和机要室的叶子龙主任，就提醒毛主席，他们对毛主席说，星期六晚上有舞会，小孩子们都回来了，应该休息休息，还是跳舞去吧。有时，这么一说还真管用，只要不是太急的会议，毛主席就往后安排。

有时候，为了让毛主席出来跳舞，孩子们也帮了很多的忙。当时，娇娇、李纳和叶子龙主任的孩子燕燕、丽亚，经常在毛主席的身边。

有一次，要举行跳舞晚会了，因为叶子龙主任知道毛主席晚上没有太急的事情，他吃过晚饭，就对几个孩子说：“主席吃了晚饭，你们先拉着他出去到海边散步，八点钟拉着他到春藕斋去跳舞。你们不要光叫主席给你们讲故事，还

应该叫他去跳舞。主席如果不跳舞，就会长大肚子，肚子大了，就走不动路了。你们不是关心主席吗？你们要有具体行动。八点钟的时候，就看你们的行动了。”叶子龙主任这么一说，几个孩子可当真的了，都表示为了不让主席长大肚子，一定拉着他去跳舞。

毛主席吃完晚饭，几个孩子就拉着他到海边散步了。散了一会儿步，又回去休息一下。一看快到八点了，孩子们就拉着毛主席往外走。

毛主席问：“干什么去呀？”

几个孩子谁也不说话，还是拉着毛主席走。

毛主席连着问了好几句，孩子们才说：“叫你跳舞去。”

毛主席说：“那好，去跳舞也要换双鞋呀。”

一听毛主席要换鞋，有的给他找胶底皮鞋，有的给他脱布鞋，有的给他把鞋穿上。等给毛主席换好了鞋，孩子们就拉着毛主席走出屋门。

在路上，毛主席问孩子们：

“你们又不会跳舞，为什么要拉我去跳舞呀？”

娇娇说：“叶叔叔说，你不跳舞会长大肚子的，肚子长大了，就走不动啦。”

她这一说，把毛主席逗笑了。

毛主席一走进舞场，舞场里立即响起了一片掌声。

毛主席跟年轻人说了一阵子话之后，就指着准备好了的冷饮说：

“小同志们，这里不是摆着吃的吗，咱们一块来吃。希望你们多吃点。”

朱总司令跳舞是慢步慢行，不论是三步、四步还是五

步，他总是一个跳法，就是推行。这种跳法对他来讲很合适，不容易头晕。

毛主席的孩子和叶子龙的孩子，当时都才十来岁，不会跳舞。但看到大家跳得那么起劲，那么热闹，他们也手拉着手，跟在朱总司令的后面边学边跳。这几个孩子，是舞场里年纪最小的舞伴，她们一跳，就更增加了舞场里的欢乐气氛。

朱总司令基本上是有舞必到，按时到舞场，按时跳舞。但他跳舞的时间不长，到九点半钟左右，一定要回去休息。有时，因为开会晚了，他也到舞场上跳一会儿。有的年轻人不知道他的习惯，已经到他离开舞场的时候了，还想和他跳。这时，朱总司令就说：

“实在对不起，我回去了，下一次再和你跳吧。”

朱总司令非常喜欢扬琴，有时他还当场演奏。在他的伴奏中，大家高兴地跳了起来。

刘少奇同志跳舞也比较活跃，慢四步、快三步、五步、探戈都会跳。他的地方离舞场也很近，如果没有急事，他到时就前来参加舞会。刘少奇同志跳舞，也喜欢跟别人交谈。因为每一场舞要换一个舞伴，他在舞场里认识了不少年轻人。他说，利用跳舞可以进行调查研究，可以了解很多的事情。他的记忆力也很好，只要和他在一起跳过一次舞，他就能记住这个人的姓名。因此，不仅在中南海里他认识了好多人，外单位的也认识了不少。

有一次，舞场里正热闹的时候，周副主席来了。一见周副主席来到了，舞场里的气氛顿时更加活跃起来。

周副主席最活跃，他能适应任何场合的舞会。他平时来南海跳舞少，多数是在中海紫光阁、北京饭店、国际饭店跳舞。那里有党内的高级干部，更多的有党外人士。国际饭店

里，外国专家在那里跳舞的人也很多。

除了在集体舞场跳舞以外，周副主席有时还去参加家庭舞会。比如宋庆龄、张治中家，他都去过。

（摘自阎长林《毛泽东生活实录》、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毛主席特别高兴的一天

为了指挥解放战争，毛主席连续紧张了几天几夜。这些日子，他没有一次很好的睡过觉。一天上午，毛主席还在日以继夜的办公，秘书就给他送来一份电报。毛主席接过电报一看，就高兴地站起来说：

“北平和平解放已经达成协议了，这真是了不起的胜利，是一件特大喜事呀！”接着，他又对秘书说，“告诉机关里的同志们，北平和平解放已经达成协议了，北平和平解放具有世界意义。这不仅减少了敌我伤亡的损失，更重要的是保护了历史文物古迹免遭战争的破坏，对我们子孙后代大有好处，全世界的友人也都会拥护我们这样做的”。

毛主席说完，就高兴地走到了院里，和正在院里的几个工作人员说了这件事，让他们也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其他的同志们。见毛主席那个高兴劲，我们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打了那么多的胜仗，我们还没有见过毛主席象今天这样高兴啊。

“走！”毛主席转身对我说，“我们到李家庄去。”

“这些日子你很少睡觉，昨晚又紧张工作了一夜，现在该睡觉了。”

“先不睡，咱们看符定一先生去。”

“李家庄离这里很远，坐汽车去吧”我无可奈何地说。

“好。时间宝贵，坐汽车去，回来再睡觉。”

符定一先生是湖南人。毛主席当年在湖南省高级中学读书时，他是这个中学的校长。后来，曾任北大的教授。1946年，符定一先生应毛主席的邀请，带着他的女儿符德芳一块到了延安。

在汽车上，毛主席问我，“张瑞歧同志走了没有？”

我说：“没有走呢。他说要把毛主席送到北平，看看北平的城市，看看过去皇帝住过的地方，然后再回陕北。到那时，他好给陕北的乡亲们讲故事呀。”

毛主席说：是呀，我是给他这样说的，就怕他回陕北心急，不等北平解放就回陕北。现在可好了，北平已经成了我们的了，我们很快就要进北平了，进北平的这个愿望很快就实现了。

汽车沿着滹沱河北岸，往东开了十几里路，就来到了李家庄。当时，在李家庄和苏家庄一带，住着很多从各地来的民主人士，因为毛主席还没有睡觉，就没有去见别人，汽车直接开到了符定一先生的住处。

一进院，就看见了符定一先生的女儿符德芳同志，她一见毛主席来了，就大声喊她的爸爸，说毛主席来了。符定一先生走出屋门，毛主席亲热地同他握手。然后，两个人就到了屋里。

毛主席说：“好久没有见到你老人家了，你的身体还好吧？”

符定一先生说：“身体还好。”

毛主席说：“你来了很久了，我太忙了，没能来看你，请你多加原谅。今天一方面来看你，一方面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

毛主席说到这里，符定一先生便往毛主席跟前移动了。

下身子，显得注意力特别集中。

“已经接到了指挥部的电报，昨天傅作义将军已经赞成我们的条件，他不抵抗我们了，北平和平解放了，交接即将举行。我军日内进城接管一切。接管工作我早已着手准备了。傅作义将军的军队将开到指定地点接受我军的整编。傅作义将军有一个特别的要求，他要来这里亲自见我。我们当然答应他了。”

“出人预料，这可是大家的希望，这都是毛主席胸怀广阔和共产党的英明使然。否则，北平怎能和平解放？”

“这是民心起了决定作用。傅作义这样做很好，北平的人民、北平的古建筑都可以免遭战争的损失。这次傅作义决心与蒋介石决裂，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算他立了一大功，人民不会忘掉他。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也都会拥护我们这样做的。”

“还是毛主席伟大，中国共产党伟大，做出了伟大的奇迹。”

“你们在城市里呆惯了，这里的条件太差了，再过一些日子，北平稳定一下，你就可以早一点回北平去了。那里还有家嘛。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找叶剑英同志，他现在已经被任命为北平市长了。你和他很熟悉。不要很久，我们都要去北平的，到那时就可以经常见面了。”

“这就好了，回到北平就没有精神负担了。过去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没有民主，没有生活保证，更没有安全感，生命财产随时都可能遭到不幸。”

“现在好了，这次你回去，你就放心地睡大觉吧！好了，我不多呆了，我该回去睡觉了。”

当符定一先生知道毛主席两天两夜没有休息，今天来看

望他的时候，他使劲的握着毛主席的手，感动得流出了眼泪。

他激动地说：“毛主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多么伟大的贡献呀！”

毛主席说：“符先生夸奖了。”

临分手时，毛主席又对符定一先生说：“这里的条件差，连一个软坐椅也没有，我回去让他们给你送一件来。你的年纪大了，坐这些硬木家具会腰疼的。”

我们回到西柏坡以后，毛主席亲自指定了一件沙发，给符定一送了去。

（摘自阎长林《毛泽东生活实录》、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与护士小刘

八路军120师政委关向应同志患严重肺病，住在延安中央医院，这天，毛主席到医院去看望他。

毛主席推开病房的窑洞门，握住关向应的手刚亲切地问：“身体好些了吗？……”还没有来得及坐下，护士小刘进来了。她看到毛主席，愣了一下，觉得有些面熟，却又一时想不起来，她也顾不得多想，走到毛主席面前就说：“同志，对不起，医生说了：病人需要安静，现在不能会客。”毛主席一听，马上谦和地微笑着说：“呵，对不起，我不知道医生有这个吩咐。”又对关向应说：“好吧，你安心养病好了。”说完，走出病房。但他还是放心不下，还想了解一下关向应的病情，转身走进了护士办公室。办公室里没有其他人，只见小刘在身后跟了进来。毛主席向她详细地询问了关政委的病情和治疗情况，还关心地问了医院的工作、医生护士的生活和学习情况，然后才和小刘握手告别。

事后，当小刘从关政委口中知道刚才来的是毛主席时，不由得吃了一惊。毛主席严格遵守制度的品格和待人谦逊有礼的风度，给她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摘自《回忆毛泽东》 人民文学出版社）

白胖子变成了黑胖子

1946年1月，毛泽东的大儿子毛岸英离开苏联回国，到延安后安排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三月的一天，毛主席和毛岸英在王家坪的住地作了一次长谈。毛岸英详细汇报了离别十八年来自己的经历、思想、学习和生活情况，毛主席听完后沉思了一下，说：“你在苏联大学毕业了，还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可是你还没有上过中国这个革命大学，你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得很少，缺乏实践，这一课应当补上。理论只是知识的一半，你光有外国的书本知识还是不够的，还要把书本知识变成自己的才行哩！你还应当上中国这个大学，到农村去拜农民为师，你可以学到在外国学不到的许多有益的东西。”他指示毛岸英自带一斗半小米和一些菜种，背了行李，到模范村吴家枣园去学习农业劳动。毛主席又指着身边的参谋、警卫战士说：“这些同志都参加革命好多年，你以后也要多向他们学习。”还嘱咐说，到乡下去，要和农民一起住，一起吃，一起劳动，要锻炼得和农民一个样。

第二天，毛岸英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背上小米和行李出发了。在农村，他吃苦耐劳，干得很好，受到乡亲们的称赞。1946年下半年，胡宗南进攻延安，形势越来越紧张。要学的各种农活也基本上学会了，村干部就把他送了回去，毛主席见了高兴地说，白胖子变成了黑胖子，又看了岸英结满老茧的双手说：“你学习的成绩不错嘛，不过今后还待继续锻炼。

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同志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作为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同志对此十分悲痛，几天吃不下饭，伤心地责备自己说：我没有照管好岸英，怎么向毛主席交代……当彭总回到国内，当面向毛主席报告了岸英光荣牺牲的经过后，毛主席眼里噙着泪花，没有责备彭总，却既是安慰彭总又是自慰地说：我的儿子死了，我当然很悲痛。可是，战争嘛，总要死人的，朝鲜战场上我们有多少优秀的儿女献出了生命，他们的父母难道就不悲痛吗？为了革命，为了保家卫国，他们死得光荣，我们做父母的也感到光荣……

（摘自《红旗飘飘》、中国青年出版社）

米高杨秘密会晤毛泽东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来到了阜平城南庄。

来之前，我们接到晋绥军区发来的电报，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晋西北开完土地会议后，决定同中央机关一起由晋西北到晋察冀来，要我们派人到五台去接。

大家都知道，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从战争全局出发是不愿离开陕北的。许多同志的劝说都没有用，他不愿在敌人重兵压境之际，离开同甘共苦的陕北人民。同时，他表示，他与党中央留在陕北，就可以拖住胡宗南的主力，以减轻敌人对我军其他战场的压力。此后，他就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带着一个小小的指挥机关，继续转战陕北地区，而且，有意使蒋介石知道，他同党中央仍然留在陕北。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指挥下，彭德怀同志率领西北野战军，艰苦奋斗，连续大量歼灭敌人。直到陕北局面好转之后，毛泽东同志这才从容地离开了陕北。

看了这份电报，我心里自然非常高兴。因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中央机关的到来，对我区工作的指导，将会大大加强。这对我以及许多干部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在兴奋的心情下，我立即派晋察冀中央局副秘书长周荣鑫同志，带着保卫干部和警卫人员，赶到五台去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

临行前，我找周荣鑫同志谈了话，交待了路上注意的事

项，第二天他们就出发了。

在战争年代，我们的住房是很简单的。当时军区新盖了三栋房子，我和作战科住在村西新盖的那个小院里。我住的那栋房子，里外两间，比较大一点，最靠南，是一明一暗，外间办公，里间住宿，北面紧挨着作战科。这在军区机关来说，算是最好的房子了。我把那两间房子腾出来，准备让毛泽东同志来住，我搬进了作战科的那栋房子，作战科搬出了小院。

毛泽东同志来的时候，是从五台山北麓的鸿门岩上山的。听说，中途遇雪返回，停了两天时间，才上了五台山。

我熟悉那个地方。上鸿门岩，有一条盘山路。山下还没有什么，一上山巅，风疾云驰，气候就有很大不同。不要说路上有雪，就是好天通过它，也得花费一点力气。

毛泽东同志坐的是中吉普，汽车走在崎岖的山路上，轮子打滑，走得很慢。他看见山路难行，就从中吉普上下来，徒步走在山路上。同他一起来的周恩来、任弼时同志，也下车走在毛泽东同志后面。

他们时而乘车，时而步行，用了不少时间，才翻山越岭，过了龙泉关。

四日十一日傍晚，大约在离城南庄五六里远的地方，我们迎上了毛泽东同志的车队。同毛泽东同志一起到城南庄的，除了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外，还有一些随行工作人员。我把他们迎进了小院。

江青也跟着来了。她下车伊始，到处张罗，提出来的问题，别人都来不及回答。

那时候，毛泽东同志显得有些疲劳。听说，他从重庆回来时，身体就不太好。前一段，又在陕北拖了一阵子，身体

没有得到恢复。但是，看上去精神倒不错，我们希望他在城南庄期间，能够休息一下，恢复健康。

毛泽东同志住下之后，就忙起来了。按他的老习惯，晚上彻夜办公，直到第二天凌晨。我知道白天睡眠是睡不踏实的。为了让毛泽东同志休息好，在他睡眠的时候，我们尽量不去干扰他。

过了两三天，周恩来和任弼时同志离开了城南庄。因为党中央机关设在西柏坡，他们到那里工作去了。

毛泽东同志同我住在一起，每天都有接触，经常谈一些问题。有一次，他越谈兴致越浓，同我进行了彻底长谈。

这次谈话的内容，有许多已经记不得了，有些则至今记忆犹新。

看来，毛泽东同志对晋察冀边区的群众有颇为深刻的印象。他说，一过龙泉关，觉得群众很热情，就好象当年在江西到了兴国一样，群众都是笑逐颜开。他回忆说，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试一试，在敌后究竟能不能站得住，结果你们在敌后还是站住了。

我对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能不能站得住脚，关键是执行党的政策，把一切抗日力量团结起来。

接着，我们的谈话内容，就集中在过去执行政策上的经验教训。我们回顾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时候，由于王明的错误路线，实行了许多“左”的政策，结果在根据地周围，造成了严重的赤白对立，我们每向外走一步都有困难，这是自己孤立了自己，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给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

我对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在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是接受了这个历史教训的。我们认真执行了党的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地团结了各阶层的群众，再没有出现那种对立情况。所以，我们到处都可以走，自由得很，安全得很。每到一个地方，群众都欢迎我们，工作起来，非常方便。

关于当时的中心工作土地改革问题，我们也谈了许多。我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晋察冀的土改情况，和土改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说，在土地改革问题上，有人批评我是右倾。原因就是我没有搞“左”的那一套。那时候，有的地方出现了消灭地主、富农的现象。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不符合中央的土改政策，我们不能那样子搞。过去，在王明路线时期，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甚至侵犯中农利益，这个教训太深刻了，无论如何不能再重复了。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在根据地先平分土地，然后再进行复查，发现了问题就用“抽肥补瘦，抽多补少”的办法解决，对地主不搞“扫地出门”那一套。因为我们搞土地改革，是要消灭封建的剥削制度，消灭地主阶级是消灭它的剥削，不是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所以，我们平分土地的时候，对地主、富农一样看待，该分给他们多少土地，就分给他们多少土地，使他们能够自食其力。

毛泽东同志对我说，斯大林曾经讲过，苏联当年搞富农吃了亏，我们应该记取这个教训。

我对毛泽东同志说，有的人还主张挖浮财，我说不能强调挖浮财。因为经营工商业的，有地主、有富农，甚至还有中农。对此，在工商业上你很难分得清楚。我们党的政策是在土改中不损害工商业，这是从革命利益出发的。尤其是在战争时期，我们可以通过工商业者，从敌占区买回需要的东西，如果我们强调挖浮财，必然损害他们的利益，就把这条渠道挖掉了。

毛泽东同志完全同意我上面的意见，批评了那些错误的做法。除了谈土地改革的问题，我们还谈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毛泽东同志充分肯定了这一政策的作用。后来在解放战争的后期，我军打到蒋管区的时候以及建国初期，还是先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然后再进行土改。

谈罢土地改革问题，已经过了午夜时分。可是，毛泽东同志毫无倦意，他还要我搞一点酒来。

我让警卫员搞来一点酒，又搞来一点菜，同毛泽东同志继续畅谈。

我陪着毛泽东同志，边饮边谈。从土地改革问题又谈到王明路线、党内斗争、遵义会议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最后，毛泽东同志谈了对解放战争的想法。他说，抗日战争打日本，是要持久的，解放战争打蒋介石，不能拖得太久，解决的越快越好，这样对我们有利。第一步，先解决东北、华北。为了引开国民党的力量，让刘邓大军出大别山，陈粟大军打过长江去。第二步，西北野战军到西北、西南去。华北除抽调部分兵力增援西北、西南外，其余部队仍留在华北地区，准备在华北搞两三个兵团。那时候，因为华北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了，敌人只固守着几个城市，部队建制用不着那么大，待解决了东北敌人之后，再解决华北剩下的城市。这就是当时毛泽东同志对战争进程的一些设想。

我们结束那次谈话的时候，村里已经是鸡鸣报晓了。

关于陈粟大军打过长江去的问题，后来粟裕同志来见毛泽东同志，提出过长江有困难。我听了这个意见之后，曾经向毛泽东同志建议，他们可以在黄河以南作战，同样可以拖开敌人的力量。毛泽东同志同意了 this 建议。

在这次谈话之后，有一天毛泽东同志问我，因为他的身体不太好，斯大林要他去苏联休养，他是去好，还是不去好？

我说：“斯大林邀请你去莫斯科，这固然是一番好意，如果主席要去的话，我们可以护送到东北。但是，如果主席征求我的意见，我觉得还是不去为好。因为根据现在的情况，护送主席到东北，一般说没有问题。不过处在战争环境，难以有绝对把握。其次是你现在的健康状况已经相当差，再长途跋涉，就更不利，请主席三思。”

毛泽东同志听了我的意见，表示考虑一下再作决定。后来，毛泽东同志决定不去苏联了。他搬到西柏坡之后，斯大林曾派米高扬来了一趟。

米高扬来的时候，非常秘密。来之前，任弼时同志给我打电话，要我们准备好石家庄飞机场。不久，米高扬经大连乘飞机来石家庄，又换乘汽车到了西柏坡。

原来，斯大林派米高扬来，是要他亲眼看一看，亲自和毛泽东同志谈一谈，中国革命究竟还有多大力量，还有多少人能打仗，有点杞人忧天的味道。因为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经过连年战争，恐怕已经没有什么人了。这说明，他们对中国的革命力量，始终是估计不足的。

在城南庄，毛泽东同志虽然身体不好，仍然日理万机，工作精神十分感人。这年五一节，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了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通知，指示我用电话口述给在西柏坡的周恩来同志。以后中央将这个通知通电全国，许多爱国民主人士热烈响应，纷纷从蒋管区或国外来到了解放区。这对扩大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当时的大好形势起了重要作用。

（摘自《聂荣臻回忆录》）

毛泽东获奖

延安大生产运动一开始，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警卫员、勤务员和通讯员，很快就组织了生产队伍，制定了生产计划。毛主席也要求给他分一块地，开荒种菜。同志们劝道：“主席工作很忙，身体又弱，不一定参加生产啦！”毛主席坚决地说：不行！生产是党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劳动生产。于是，同志们就在他住的窑洞下面，给他划了一亩地。当天下午，毛主席休息的时候，就拿起镢头挖起地来。警卫员们跑来帮忙，他忙阻止说：你们有你们的生产计划，我有我的生产任务，这点地，你们都挖了，我没有挖的了。警卫员们哪里肯住手。于是，毛主席便和大家一起干起来。毛主席干的很认真，衬衣都被汗水湿透了。地挖完后，他又和警卫员们一起垒了一个小水坝，准备引水浇地。几天后，毛主席和大家在地里种上了西红柿、辣椒等蔬菜，并和勤务员一起抬大粪，给菜地施肥。经过毛主席的精心管理，蔬菜长得很好。

毛主席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大生产运动中作出了贡献，和另外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一起，被评为特等劳动英雄。大生产运动的第二年二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中央大礼堂举行了生产总结发奖大会。毛主席因被评为特等劳动英雄而获得了奖章、奖状和纪念巾等物品。

（摘自《回忆毛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

毛泽东一语醒刘斐

刘斐，湖南长沙人，在国民党将领中颇有声望。抗战胜利后，他告退还乡，李宗仁执政时，邀请刘斐担任国共和平谈判代表，与张治中等同赴北平。

和谈失败后，刘斐思想斗争激烈，是回南京呢？还是留在北平？他思来想去，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茫然，一时难以抉择。在一次宴会中，他和毛泽东谈话，以打麻将为题，试探道：“打麻将是和清一色好，还是平和好？”毛泽东似乎觉察到刘斐的用意，答道：“清一色难和，平和容易，还是平和好！”毛泽东的话，形象地说明革命总是团结的人越多越好。刘斐听后，豁然领悟道：“平和好，那末还有我一份。”于是，他就下决心留在北平了。刘斐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受到党的礼遇，在全国政协五届四次会议上当选为副主席，他常常谈起当年毛泽东“清一色难和，平和容易”，这句话对他起到指点迷津的作用。

（摘自1988.10.20《文摘周刊》）

“我毛泽东独龙能下雨吗”？

五十年代初期，红军老战士李伯钊同志创作的歌剧《长征》上演后，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特别是剧中出现毛泽东同志的场面时，剧场里掌声雷动，一片欢腾。中央许多领导同志看了这出戏，纷纷给予好评。有一次，毛泽东同志感到盛情难却，应邀看了这出戏。事后，毛泽东要自己的女儿向李伯钊转达了他的意见。他说：写革命，写长征我都赞成，但不能拿我毛泽东当菩萨拜哟！党内有那么多好同志，许多人还牺牲了生命。就拿长征来说，有几个方面军哩，有那么多领导同志哩，应当写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写几个方面军的同志，没有他们，我毛泽东独龙能下雨吗？光写我怎么行哩？

（摘自1984年第2期《人物》）

“为有牺牲多壮志”

毛岸英不幸牺牲了！这沉重地震撼了毛泽东的心灵。他是一位领袖，也是一位感情极其丰富的爸爸。当彭德怀内疚地对他谈起没有照料好岸英时，他久久地沉默着，一支支抽着烟，抬头凝望窗外那已经肃杀的柳枝，轻轻地念叨着《枯树赋》：“昔年移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他长长地叹口气，深沉地回忆了岸英短暂的一生。稍停，毛泽东昂起头，轻轻走了几步，激昂地说：“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岸英是一位普通战士，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事业而牺牲。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父母所生？”

彭德怀默默地听着，眼里饱含泪花。他深知岸英的牺牲，对党，尤其是对毛泽东，是个无法挽回的损失。

毛泽东强忍着悲痛，把心血倾注在党和国家的大事上。然而，儿媳刘思齐每周必到的拜晤，这对他简直是一场感情上的灾难。思齐每次来，都要问爸爸收到岸英的信没有？岸英为何几个月不给我来信？……爸爸总是强颜欢笑，装得若无其事地宽慰她。

无情岁月增中减，毛泽东作为爸爸，不能也不愿一直扮演世上最难堪的角色。两年后，他终于向思齐诉说是为革命牺

牲了的烈士：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毛楚雄，还有韶山党支部的毛福轩……思齐越听越不对劲，朝鲜停战协定都签订了，为何岸英没寄片言只字？难道他……她不敢想下去了，反而安慰起年迈的爸爸。这天，她离开中南海时心慌意乱。

思齐又一次去中南海。毛泽东把周恩来请来一起跟她谈心。周恩来委婉地告诉思齐：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无数牺牲了生命的战士，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岸英也是其中之一！”这句话总理说得很轻，传到思齐耳内却如五雷轰顶。她痛不欲生，伏在毛泽东肩上哭呀，哭呀。毛泽东木然地坐着，脸色苍白，心潮翻滚。周恩来让思齐躺在沙发上，他的手碰到毛泽东的手，心里一惊，急忙对思齐耳语：“思齐，你要节哀，你爸爸的手都冰凉啦！”思齐一愣，重又哭着去安慰爸爸……

岸英的牺牲对刘思齐刺激太大了。她寝食难安，神经衰弱。而过去一再怂恿岸英“代表父亲去朝鲜”的江青，此时却放出谣言，给思齐落井下石。思齐刚20出头，经受不了这致命的打击，给爸爸写信了。毛泽东复信说：“谣言不足信，可以置之不理，因为不胜其理。你的心要清闲些，把身子养好要紧。”

为了学点技术，刘思齐经组织上批准赴苏留学。毛泽东也同意她换换环境，写信给思齐，要她“争口气，学成为国效力。”刘思齐在苏学习期间，常给爸爸写信，毛泽东化名“德胜”复信，给她以循循善诱。

思齐回国后，江青很快派人把她出入中南海的特别通行证没收了，还气势汹汹地说：“刘思齐不是我们家的人！”刘思齐不能去看爸爸了，内心十分痛苦。

1957年以后，毛泽东也搬离中南海丰泽园了。他常给思齐写信。请看1959年写的一封信：

思齐：

不知你的情况勤何，身体是否有起色，极为挂念，要立雄心壮，注意政治理论，要争一口气，为死者，为父亲，为 人民，也为那些轻视、仇视的人们争这一口气。我好，只是念你。祝你平安。

父亲 一月十五日

毛泽东出巡外地。他仍掂着思齐。

娃：你身体是否好些了？妹妹（注：指邵华）考了学校没有？我比在家时好些。你愁闷时可看点古典文学，读诗句，可起消愁解闷的作用。久不见甚念。

爸爸 八月六日

1961年，岸英牺牲10年了，思齐仍然孤单一人。毛泽东多次劝她找个合适的男朋友。早些结婚。他把思齐当作亲生女儿女儿：你好！

哪有忘记的道理？你要听劝，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是你们这一类女孩子的通病。是不是呢？信到回信给我为盼！问好。

父亲 六月十三

崖泉滴透石玲珑。毛泽东给思齐的这些信。充满了父亲的慈爱。在他的催促下，刘思齐终于同空军航校一位姓杨的同志建成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有了四个孩子。每当节假日，他们全家常去探望爸爸。毛泽东乐不可支。心里充满了无限温暖。他对诗人李白的名句增添了新的感慨，高吟着：“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摘自《老区建设报》）

毛泽东和他的干女儿

1983年5月1日，我写的报告文学《毛岸英之死》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第二天，正巧刘松林从军事科学院调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我有些惶恐，怕文中万一有不尊重逝者或有什么与事实相出入之处，会引起她的不满。后来，她读了，没提什么意见，还说其中有些材料她也不知道，是我的文章告诉了她。

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想不到从那以后，我们一直在一个编辑部共事，历时四年之久，直到她离休。

在相处的四五年中，我感到她有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因此，当《家庭》杂志的同志来京组稿时，我便报了采写刘松林一家的题目。

二

刘松林和杨茂之是在毛主席的关心下，于1962年结婚的。现在，他们有四个孩子。

大儿子是1963年10月生的，为了纪念去世的毛岸英，取名小英。现在在经贸部下边的一个公司工作。大女儿和二女儿，恰好都在今年考大学。小儿子，是林彪摔死后三天生的，今年要考高中了。忙事儿全集中到一块，这逼使刘松林的心掰成两半，一半给杨茂之，一半给儿女们。

“如果两个女儿都上自费大学，那我要吃不消了”刘松林向我诉苦。

“主席没给你钱？”我问。

“没有。要有，就用不着我和老杨一点一点地积蓄了。”

“这样吧。我们替你掏了。”

她明白，我们早就约她写一本回忆录，从毛泽东、杨开慧写到毛岸英、再从她父亲刘谦初写到她今天的家庭，以及她两次坐牢……我想，如果这书要有20余万字，能得稿费不是可以供她的两个女儿上大学了吗？

“你那份钱那么好拿嘛？”她说，“老杨生病，孩子忙着应考，我心里如一团乱麻，哪有时间静下心来写作？”

这倒是实情，如果今年我逼她拿出这本回忆录，我就是逼她把心、把精力和时间分成三份。我真有些不忍心这样做。但是，她的选题早已列入今年编辑计划。

三

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死于朝鲜战场的志愿军司令部里，是美国飞机丢的燃烧弹将他烧死的。对于这一情况，刘松林开始一无所知，所以谈不上悲哀。她依旧在中学里上学，忙于自己的功课。脑子里只记住毛岸英临别时对她说的话：“我明天将要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出差，所以急急忙忙赶来告诉你。我走了，通信不方便，如果你没有接到来信，可别着急呀！”她信任毛岸英，料想他在远处正忙于自己的工作，不便给她写信。她还记得，毛岸英是在李克农那里做翻译工作的，想是有什么特殊使命，保密性极强，她就不多问。她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父母都是老革命，都做地下工作，不该知道的就别问，这一点她懂。

然而，有时她也在暗暗奇怪，从朝鲜战场归来的老首长、战斗英雄，见了她以后都特别客气，又相当谨慎。比如

有一次开英模代表大会，她遇见了一些战斗英雄，这些英雄象是怕她似的，谈了几句话，就赶快躲开了。

三年之后，她知道了毛岸英战死这一不幸的消息。

她蒙在鼓里三年，当了三年的“大傻瓜”。

1954年，她高中毕业了。为了进一步深造，恐怕更主要是为了让她换一个环境，毛主席让她去了莫斯科大学，就学于数学系。她不喜欢数学，身体又不好，两年后回国，又进了北京大学俄文系，一上就是四年。如果加上出国前上的一年俄专，她总共上了七年大学，到1961年方毕业。

在苏联，她见过杨茂之的。那时他在苏联红旗空军学院学习指挥，是1954年和张积慧等人一起出国的，比刘松林早一年，由于都是中国人，在集会时相互见过面，但没有说过话，更想不到这个人后来成为她终生的伴侣。

那时，刘松林年纪已经不小了，她自己似乎还不着急，毛主席却在为她着急，想帮助她早点找到称心如意的爱人，好了却既作为公公又作为干爸爸的一桩心事。早在延安，毛主席就认下这个干闺女了。

托了好些人，这些人也向主席介绍了好些人，可是主席听了都不中意。一天，空军副司令兼空军学院院长刘震对主席说：“我们空军学院强击机教研室有一个人，叫杨茂之，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这个人老实正派，我觉得可以，主席是不是……”毛主席答应了解一下再说，而且立即请人去作了了解。可见主席的确已经十分着急了，因为这时刘松林已经29岁。

经过了解，杨茂之的人品和刘震介绍的一般无二，于是主席马上走出“第二步棋”，叫刘松林与杨茂之来往一段时间，让他们相互了解。杨茂之那时已30出头，是个大高个，精

壮结实，父母都是海边上的渔民，他有着中国农民传统的忠厚老实的品格。经过一段时间相处，刘松林点头了。

已经到了1962年的2月，爱情之花第二度结出硕果，那是刘松林毕业分到工程兵科研部搞技术情报翻译半年之后，婚礼是在她家的四合院里举行的，那院子座落在北京的南池子，隔墙是罗瑞卿的家。毛主席此时刚创作了《咏梅》词，给他们随手抄录了一幅，算作贺礼。还给了300元钱，叫松林代他买礼品。老杨的父母远在海边，没能赶来，来的都是刘松林的亲朋好友，还有一些老一辈的革命者，如谢觉哉、伍修权、刘震、以及刘松林父亲的朋友，如董秋斯、孟用潜等人，当然也有空军学院老杨的朋友。前前后后足有上百人，把小院的房子全挤满了。当时毛岸青在大连，没有来，岸青的夫人、松林的亲妹妹邵华从大连赶来参加了大姐的婚礼，她和岸青是1959年结婚的，比松林的这次婚礼早了三年。

四

刘松林始终记得毛岸青告别她时说的话，“江青她只顾自个，根本就不照料岸青，她也不爱我爸爸。我曾经骂过她，既然你不爱我爸爸，滚开就是了，何必赖在这里？你也得小心，她这个人是很记仇的。”所以，她从来不敢去招惹江青，怀着又讨厌又怕的心情，远远地避着她。

松林结婚的时候，既没有告诉江青，江青也没有来参加。婚后个把月，松林和老杨一起到中南海去见主席。那次，主席和杨茂之谈得很投机。看得出，主席对这个干女婿是很喜欢的。就是那次，也没有见到江青。刘松林知道，从1959年开始，主席和江青就分开居住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邵华等16人在北大写了一张保张承先的大字报，江青通过其他人了解到了写大字报人的

名单，于是公开点名批了邵华，还把邵华的整个家庭，从老母亲直到姐姐妹妹，全诬蔑到了，这对于刘松林她们，是一个信号。她们全家都预感到，江青的打击报复，立即就要开始。

因此，邵华及小妹——那时在北大上西语系，连夜骑自行车逃跑。

刘松林深知自己也在江青开列的黑名单之中，所以她尽量少惹事，夹紧尾巴做人，哪派战斗队都不参加，成了一个逍遥派。

不巧，正在这时，毛岸青病了，住进了301医院。江青估计邵华会去医院看他，就派人在医院门口堵截，邵华因此始终不敢到医院里去。岸青见邵华不来看他，病情加重，这样也使江青有了告状的口实，她在主席面前挑拨说：“你看看，岸青病越来越重了，邵华连看都不去看看他。”

那时江青大有权倾朝野之势，松林、邵华最怕的是江青掌权，要是她真当上了“女皇”，她全家包括她老母亲在内，就都只有死路一条了。因此，有一次，她姐妹俩去见主席，悄悄问道：“听说江青要接班，是真的吗？”

毛主席明确回答道：不会的，她不行，她是两面派！”

到1969年，形势对这家人越来越严峻。刘松林的母亲已被关押起来了，罪名是“新疆叛徒集团的成员”。那是她与老伴携带女儿刘松林，想绕道新疆去苏联被盛世才抓住，坐了四年监牢。老太太的表现是异常英勇坚定的，但信口雌黄的江青，却把她定成了叛徒。毛主席对这位老同志是十分关照的，让她住在毛岸青那里，对外保密，嘱咐她哪里都不要去，包括她自己工作的单位，因为那单位是在康生的魔爪之下。但主席终于没保护住她，她遭了江青的毒手。

刘松林失去了保护，也失去了主意，在北京随时有被捕

的危险。中南海进不去了，江青早已下令将她与主席的联系隔断。她写信给杨茂之，问怎么办。头脑简单的杨茂之回信道：“你带着孩子上我这里来吧！”

刘松林别无他法，只得拖着一儿一女，带着将降生的老三，比歌词里唱的“胖大嫂回娘家”还狼狈，去到了江苏盐城，去到了杨茂之身边。

空四军早已没有了刘松林的容身之地。

一次，空军学院来了几个人，带了几只广柑，说是北京的林立果副部长亲自送给部队的。

这时的林立果已成了空四军的太上皇，因此这几个广柑，自然成了“圣物”。宣传科长说道：“刘松林，你把广柑送到门诊部，用药水泡起来，外面再扎上红丝带。”

刘松林早就在心里将这个林立果同毛岸英作了比较，也把主席对岸英的教育和林彪对林立果的态度作了比较，觉得这个林副部长实在太猖狂、霸道了。“送几个破广柑，买人心，仅此而已。”她虽然不敢将看法说出来，行动上已有了简慢之意。她说道：“司机同志，你把广柑送到门诊部去，我就不去了！”

早想寻找岔子的人这下总算找到了一点“罪证”。某领导在党委会上不点名地却又十分气愤地说道：“今天，有人对林副部长不忠。林副部长派人专程为我们送来广柑，这是对空四军的极大关怀。可是这么重要的东西，有人只让司机带到门诊部了事……”

下班回到家中，身为副师长的杨茂之对刘松林说道：“今天出事了，林立果送来的几个柑子，不知道是谁只叫司机带到门诊部去。”

刘松林接话道：“是我，我让司机带的。”

“哎呀，是你干的！”

杨茂之知道自己的处境，因为岳母是“叛徒”的问题，材料也早已转来了部队，他懂得必须处处小心谨慎从事。可哪里知道，这个一向小心翼翼的人，竟会表现出最大的不慎重，以致让人抓住了他“维吾尔姑娘的小辫子”。

江青迫不及待地抢班夺权已成为司马昭之心。路人尽知。空四军有人多次做老杨工作，要他“认清形势”。他听得不耐烦了，就把自己老婆枕头边告诉他的悄悄话卖了出去：

“不会的，她不会接班！主席说过她不行！”

这在那时，当然是件大逆不道的事。那些本来就看风使舵，怀着个人小心眼的领导，在1971年，林彪摔死后立即将这些话报告了上去。为此，杨茂之与刘松林同时被送到上海，关进了监狱，她不知道那是个什么监狱，只听人说，前一段这里关过电影演员赵丹和秦怡。

她与老杨是分别关押。在她的囚室里，这有两个专门看她的女人，连站起身来，都必须经过她们的批准。窗户是全部用报纸糊住的，不分白天黑夜，都点着100瓦的大灯泡。手表不让带，睡觉时被子不许全盖上，只准盖到腋下——怕她自杀。而门外，看守的士兵故意穿着硬底的大皮鞋来回地走，那每一步都象踩在她的心上。她还经常被提审，有时候是王洪文亲自出马。因为老实巴交的杨茂之已无意讲出来主席对江青的评价是听自邵华和松林，所以王洪文拍着桌子大骂：“你敢诬蔑江青，就是诬蔑毛主席，你就是十足的反革命！”

她刚生小四不久，生活压力又这么大，身体十分虚弱。吃不好，睡不着，精神和肉体都受折磨，人很快消瘦了一圈。她现在的两手风湿，就是那时得的，没有满月就逼着用

凉水洗衣服，使所有小关节全部红肿，落下了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个毛病。

她提出要给母亲写信，获得批准。可当她铺开信纸时，眼泪一串串地流，将信纸全打湿了。

——杨开慧带着毛岸英蹲监狱，我母亲又带着小小年纪的我蹲监狱，而现在，我竟然又和丈夫一起被送进来蹲监狱。这可是三个不同的时代呀！为什么历史转了几个圈子，又返回了原地呢？

她把这种想法如实倾诉在信纸上：“我小时候坐国民党的监狱，想不到现在又坐了监狱。”谁知这封信不但未到母亲手中，还被他们拆了。提审她的人大骂：“他妈的，你竟敢把我们和国民党相提并论！”

四个月过去了，她实在受不了，又看不到希望，于是心生一计，给毛主席写信，指名要通过王洪文转，看他到底敢不敢转。果然，王洪文没有胆量扣押这封信，这信终于被主席收到了。

她被放出来了。但处境并没有得到改善，她仍在王洪文“监护”之下，只不过从监狱进了“批林学习班”，不提审了，却要她没完没了地写揭发材料。她火了，质问学习班的组长：“你去问一问，我到底有什么问题？”组长说了老实话：“我也不知道，关于你的材料一个字也没有。”

母亲给她来信，说你如果身体不好，可以申请到北京来看病，保外就医也行，许多老同志都是这样干的。

这是暗示，母亲在教给她解脱的办法。她立即写报告，说自己身体不好，要求去北京就医。在叶帅的关怀下，她“荣幸”地获得了批准，于是收拾包袱，飞快逃离了魔窟。

在北京看了半年病，休养了半年，她提出再也不回空四

军去。她想在北京找一个工作，当个普通工人也行。可是，到哪里去呢？有人说帮她活动到总政治部来，她一想不行，张春桥的弟弟在总政，这依然是“四人帮”的地盘。没有办法，她只得去找叶帅。经叶帅努力，她被分配到军事科学院工作。

五

她是去年离休的。离休之后，一直到今天，仍没有停止翻译文学的编稿任务。想到这样一位老大姐和我们一起工作四年，从未提出过个人的要求，也从未有一丝一毫特殊化的想法和表现，我常常为此十分感动。

杨茂之同志是1973年才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出来后又到“五七干校”呆了一段时间，后来被安置在蚌埠某师帮助工作，继又调到涿县某航校任副校长，直到1983年才重回空军学院任研究部副部长，今年也已58岁了。他找刘松林，不但没有享到什么清福，反而受到了不少牵连，历经不少坎坷。应当说，他们是一对患难夫妻。

（摘自《家庭》杂志）

毛泽东和他的两个儿媳妇

毛岸英烈士的爱人刘松林同志和毛岸青同志的爱人邵华同志，她俩是一对同母异父的姐妹。她们的父亲刘乾初、陈振亚先后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1937年的一天晚上，在延安党校的礼堂里，话剧《弃儿》演得感情真挚，催人泪下。戏演完后，毛主席把那位小演员拉到身边，亲切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呀？你的父母是谁？”这个小演员就是刘松林，当了解到她是刘乾初烈士的女儿时，毛主席脸上的表情严肃了，他沉思着说：“刘乾初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呀！可惜牺牲得太早了。”他对她的继父陈振亚（邵华的父亲）说：“这是烈士的后代，我们有责任好好教养她。”毛主席还弯下腰笑着对刘松林说：“我做你的爸爸，你做我的女儿，好不好啊？”松林高兴地喊了一声“爸爸”。

松林第二次在延安见到毛主席时，是1946年。她和妹妹邵华跟着妈妈被党中央刚刚从新疆盛世才的监狱里（陈振亚同志就牺牲在那里）营救出来，一天，毛主席来看她们。毛主席高兴地拉着松林的手说：“七八年不见面，长大成人了。你还是我的女儿，记得吗？”松林激动地点头说：“记得。妈妈常常提起你呢！”邵华就是这时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

（摘自《趣闻集萃》）

毛岸英和毛岸青的岳母——姗飞

姗飞出身于一个湖南大地主家庭，在封建家庭里受尽折磨：不许出家门，不许读书，要学旧道德，要缠小脚。幸而11岁那年，专制的父亲死了，但她已缠足五年，趾骨折断，很难恢复天然足的形状了。在她16岁时到武汉一所男女同校的中学读书。但由于她父亲生前便把她许配给一个富家子弟，男家要求结婚。她先是到处躲避，终于被抓获了，关闭在男家，后在两个男同学的帮助下，才越墙逃走。姗飞走出学校，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和一位农民运动的领袖人物结了婚。从此，她的生活就紧紧和祖国土地的斗争结合在一起了。白色恐怖开始后，她的丈夫和孩子都先后遭到了屠杀。

姗飞就是张文秋同志。1930年山东省委被破坏，省委组织部长刘乾初牺牲了。当时在山东省委工作的张文秋逃回上海，寄居在董秋斯夫妇家。刘乾初原是董秋斯夫妇的大学同学。董听到张文秋的战斗生活非常感人，便把张文秋介绍给史沫特莱。史沫特莱便把这些革命事迹记录下来。

抗日战争爆发，姗飞即张文秋携带女儿思齐到了延安。在延安认识了长征红军干部，不久便结了婚。因为丈夫有病，经组织批准，由她母女二人照顾，经新疆去莫斯科治疗。不料在迪化（乌鲁木齐）等候飞机的时刻，法西斯德国侵入苏联，他们一家去苏联已不可能了，便在新疆住下。这时生下第二个女儿。不料新疆地方军阀盛世才揭下假面具，

对共产党人开刀了。在新疆的共产党人遭到逮捕，张文秋和带着残病的丈夫、两个女儿以及尚未出生的第三个孩子一起被送进监狱。不久，丈夫折磨而死，她在狱中生下第三个女儿。她忍着万般痛苦，在狱中哺养着三个女儿，经过四个春秋，在党的营救和张治中将军的帮助下，才和难友们一起返回延安。孩子们是从难以忍受的磨难中活下来的。她们养成坚韧、耐劳、沉着的性格，深受周围同志的赞赏，也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关怀。在征得张文秋的同意后，把她的大女儿刘思齐介绍给毛岸英，后来结成夫妻，毛主席很满意这个大儿媳妇。后来也经毛主席的支持，毛岸青和张文秋的第二女儿邵华结婚了。

（摘自《文汇报读书周报》）

一九五三年的一桩公案

这桩公案发生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共10天时间。开始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后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梁漱溟当时是会议列席者。

9月8日，周恩来总理给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次日上午，梁漱溟即在小组讨论会上发言说：“这一总路线原是人人意中所有的。路线既无问题，那么就看看怎么去做了，要把事情做好，全靠人人关心这一事业，发现不论大小问题，随时反映给负责方面，以求减少工作上的错误。只有自始至终发扬民主，领导党又能认真听取意见，这建国运动才能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其效就能倍增。”

9日下午，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散会后，周恩来请梁漱溟准备大会的个人发言。

在11日下午的大会上，梁漱溟即席发言。他说：“我想重点提出的，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从进入大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依然艰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住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却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

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共产党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他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梁发言后的第二天，参加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的人们又列席了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在彭德怀作抗美援朝情况报告后，毛主席讲话。他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的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梁漱溟听完毛主席这番话，一方面甚感意外，一方面是不服气。梁漱溟提笔给毛主席写信。信中说：你说的一些话，是说我，你说我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得不对，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信里还特别指出，他发言时毛不在场，希望毛给个机会，由他当面复述一遍他原来发言的内容，以求指教，解除误会。

9月13日上午，梁漱溟将信在会场上当面交给毛，毛约他当晚谈话，但时间仅20分钟，梁匆匆说完后要求毛解除对他的误会。而毛则坚谓梁是反对建设总路线之人，只是不得自明或不承认而已。梁漱溟十分失望，但态度坚决，言语间与毛频频冲突，不欢而散。

19日，梁登台发言，复述小组会发言和11日的大会发

言，再三陈述自己不反对总路线，而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

到了9月17日的会上，有位中共领导人作了长篇发言，中心内容是联系历史上的一些事实，证明梁漱溟的反动是一贯的。其间毛主席作了若干份量很重的插话，主要有：

“你（梁漱溟，下同）虽然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

“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

“假若言明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

梁漱溟在现场听到这些话，深感自己因出言不慎而造成的误会已经很深很深了。

9月18日下午，梁漱溟在会上发言答辩，又与毛主席发生争执。大多数人反对梁漱溟发言，于是他被轰下台。事后，梁漱溟请了长假。闭门思过。但他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也未受到任何处分。

（摘自1987年第1期《文汇月刊》）

授元帅衔的前台与幕后

1955年9月27日，秋高气爽，盛大的国家授勋典礼在中南海举行。怀仁堂雄伟壮丽，将军们身穿威武的海蓝色礼服，济济一堂。主席台上，当宋庆龄副主席、周恩来总理、刘少奇委员长和各位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座后，台下又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毛主席健步走上主席台了。他身材魁伟，气魄恢宏，不断向台下挥手致意。

典礼开始，先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衔和历史勋章，以朱德总司令为首，彭德怀、刘伯承、林彪、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十位开国元戎，身穿元帅礼服，走上主席台排成一行。毛主席依次授予国家元帅肩章和金灿灿的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并一一握手问好。人们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致以由衷的敬意。

接着，宣读毛主席授勋命令，宣读了千余人的授勋名单和授予的勋章，台上台下全体肃立。

对将军授勋时，也是每十人一排上台，先是十位大将，继之上将、中将、少将。将军们个个容光焕发、精神振奋，接过主席授予的勋章，向主席致以崇敬而幸福的注目礼。我是工作人员，端着放勋章的托盘，看着毛主席接过勋章，从容地依次授予。他老人家满面红光，精神十分饱满。

授勋结束后，在休息室里，老师们海阔天空，谈笑风生。

“元帅阁下，”陈毅问贺龙，“当初您在南昌同叶挺打响第一枪时，可曾想到要当元帅？”

“元帅？”贺龙用手摸一下胡子，“吓！我连这打的第一枪也未想到，我只想到怎么打好这一枪。”

叶剑英插话问陈毅：“要是叶军长还在，贵军——新四军就会有两位元帅出现了，不是吗？”

“不！”陈毅爽朗的笑声带着严肃的口气：“要是他还健在，我就把这元帅的桂冠奉送给他。那时，在十大元帅中有两个叶帅倒是真。”

当周恩来走向老师们时，陈毅故意向他敬个军礼：“周副主席！”叶剑英却叫他：“我们的总参谋长。”贺龙纠正说，他应是“未授军衔的元帅”。周总理听了，边仰天大笑边摆手：“不，不，我只是政府的一个工作人员，为诸位元帅当后勤。”

听到这里，我不由想起在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听到的，有些常委提出，毛泽东应授予大元帅衔，就象斯大林大元帅那样，同样，周恩来和邓小平也都应授予元帅衔。对此，刘少奇委员长和彭真副委员长兼秘书长都在会上作了说明。他们说，这个建议是合理的、正确的。在酝酿建立军衔制的过程中，就有很多人建议如此做。但是毛泽东已任党和国家主席，周恩来已任政府总理，邓小平已任党中央总书记，而现在又是和平时期，他们三人都表示不要军衔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反复考虑，同意他们的意见。当然，将来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发生了大规模战争，有了必要，仍可授予他们军衔，比方毛泽东就可出任大元帅，统率全军战斗。这个说明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所接受。

（摘自1988年第1期《新闻三味》）

和毛泽东生活的日子

“你们不要看眼色行事，尤其不要看我的眼色办事……”

1956年，毛泽东到武汉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开座谈会。中心议题是对农业合作化的经验进行总结。会前，毛泽东说：“第一，还有没有‘小脚女人’？第二，在现在的基础上搞一个全面发展的规划。我想编一本书，希望你们能提供材料。中国有句老话：‘湖广熟，天下足。’林彪在华中局，我曾对他说，希望他带头，但看他送来的通讯，没有做到，失望呀！这就使我想起来，到底是我的主观主义，还是下面仍不认识？看来是先要明了情况，才能有正确的方法，才会下最大的决心；情况不明，方向不对，下决心是胡闹。我上井冈山之前，同几个朋友走访了罗霄山脉各段。经过实地考察，才下决心以进可攻、退可守的罗霄山脉中段作为根据地。现在中央的东西很可能在中间被隔断，不能直达人民的心里，中央的政策就是再正确，也不能变为无穷无尽的物质力量。”

座谈会在下午三时开始。记录席在毛泽东旁边，其它的人面向毛主席。地委书记为第一排，省委坐第二排，王任重坐在主席身边。刚排好，主席进来了。他以湖南口音说：“这不是搞三堂会审吗？还是圆桌会议好，没有主席台，不要记录席。”

毛泽东首先问：“同志们接到提纲没有？”同时又说：“现在不按提纲发言，各人畅所欲言。一不划右派，二不划

帽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否则我就会上当，就会浪费时间。”

会上足有十几分钟无人发言，后来发言的人也大多是一个调子，毛主席听得很不耐烦，说：“休会，明天再讲。”

毛主席叫我留来说：“小梅，今天的会议开得怎么样？是否言无不尽了？”我说：“没有。”他又问：“何以为据？”我答：“都谈合作化。”当时我发现毛主席在纸上写了两行字，写的是：“真可惜，时间浪费了。”毛主席继续说：“可惜呀，大家说一样的话，千篇一律，这个不是党的传统。开一大时就有争论，二大、三大、四大、五大等都是如此。党魁这么讲，下面就跟着讲。大家不用自己的语言讲，而用领袖的语言讲话。所以第一，我还是不能死掉，我还得搞一段；第二，怎么提高我们党的理论水平。延安整风以后，我快活了一阵子，指导思想统一，领导机构改善了，七大开成了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今天开的是重复发言的小会，耽误时间的小会。你把我的意思转告王任重同志，明天开会，中心议题是否能搞生产规划，要畅所欲言。”

省委连夜召开了书记处会议，认为主席想的比我们想得都远，我们要跟上，但不能亦步亦趋。

第二天接着开会，湖北省委当时已编好了农业生产发展规划。我把规划送给主席几本，王任重发言说，这些规划都是符合实际的，第一是可能的，第二是必要的。组织起来后，有无规划大不一样。有了规划就可以知道社会主义怎么搞，使社员看到未来以及眼前的利益。

毛泽东在笔记本上连续地记着，脸上露出笑容。连声说：“好？”别的同志在发言中都说出了心理话。十一点半，毛泽东宣布休会，并说：“昨天的会议使我失望，今天的会

议使我高兴。你们不能看眼色行事。尤其不要看我的脸色办事，我的脸色是千变万化的，蒋介石是以不变应万变，我是以万变应蒋介石的不变的。”

会议结束后，我陪毛主席吃饭。主席说：“我身边的李医生不许我喝酒、吃辣椒，可这里的饭菜不咸不淡，你能帮助腌点湖南辣椒吗？”我就设法从湖南韶山冲买来二斤辣椒，通过化验、制作，送到主席那里备用，由于有了湖南辣椒，主席每餐多吃半碗饭，后来被李大夫发现了。我说：“请你不要在党小组会议上批评主席，你批评我吧！”

“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

1958年，李达同毛泽东有过分歧，这件事得从我兼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说起。当时，学校要我带学生到黄冈搞党史调查。我推辞说，问题很复杂，说不清楚。学生们找了些人采访，把稿子送到李达那里，李达要我审稿后付印。我看了三稿，劝他不要印，但他还是打印了。其中引用了鄂城县委门口的两条标语。第一条是：“宁肯少活十年，不愿落后一天！”第二条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李达认为第一条是表决心，害处不大；第二条是唯心主义，属于哲学问题。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有条件的。李老要我陪他去“找润之”。当时主席在陈毅陪同下，正和卡斯特罗谈话，我请陈毅转告主席，说李达求见。不料，李达一见毛泽东就发起火来：“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句话通不通？”我赶紧说标语是武大学生在调查中发现的。毛泽东要我写出这个口号来。我说：“我也收到群众来信，请求公开批判这个口号，我以‘龚同文’名义写了：《论口号不能乱提》。”毛泽东看后说：“这个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也有

两重性：一重性不好理解，一重性是讲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且又用红军长征等历史来加以说明。李达听得不耐烦，打断了毛泽东的话，说：“你的时间有限，我时间也有限，你说这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这口号是不是？”毛泽东当即反问：“肯定怎样？否定又怎样？”李达气冲冲地说：“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无限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我虽然没有当过兵，没有长征，但是我相信，一个人要拼命，可以‘以一挡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要有地形作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润之，现在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我见李达越讲越激动，未等他把话说完，我便碰了李达的脚，示意他不要再讲了。恰好被毛泽东发觉了，他也生气地说：“小梅，你不要搞小动作，你让他说，不划右派。”李达继续说：“你脑子发热，达到 39°C 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 40°C 、 41°C 、 42°C ……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大灾大难，你承认不承认？”毛泽东听到这话就坐不住了。

我见天气已晚，就叫李银桥（卫士长）准备饭菜。李达执意要走，说：“我不吃饭，我是校长，大跃进饿不了饭……。”毛泽东只好说：“小梅，你送老校长回家。今天他火气很大，我火气也不小。”说完，又对李达说：“你说我发热 39°C 。看你也有华氏百把度了。在成都会议上我说过，‘头脑要热又要冷’你问梅白。”李达说：“对，现在你先下马！”

在我送李达的途中，李达说：“My dear younger Mej, 毛主席的‘两论’都好，却想不到现在把主观客观颠倒至如此程度！他说斯大林‘三七开’，他自己将来如何开？他的根本东西是创建了党，创建了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不

仅开辟了革命根据地，而且强调了统一战线，这都是无可非议的。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就在于它充满了矛盾而善于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而能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但是如果不能正确地说明世界，就不能正确地改造世界。首先得弄清楚情况才好下决心，你劝劝毛主席吧！”

我送李老回来，毛泽东对我说：“小梅，今天我们两个老家伙很不冷静，这在你们青年同志面前示范作用不好。我肝火大，但我还是压制，差点与李达干起来。”我问主席：

“你是否要把你对李达的评价公开发表？象对鲁迅那样？”

他说：“这与鲁迅的情况不同，我现在在认识论上发生了问题，离开客观走向主观唯心主义。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我向主席转达了李达临走说的那些话，主席听后：说

“很好！”他要我教他说英文My dear brother Homing，即：我亲爱的鹤鸣兄。毛泽东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三，但不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这是我的过错。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刷唯心精神。”毛泽东还叫我通知李达再谈，转告李达“六十而耳顺”，感激他的帮助。

我如实向李达同志转述了以上意见，李达说：“还是润之的气量大。”

“多好的人民啊，我们对不起人民……”

1958年10月25日凌晨三时，彭真同志给我打电话说，“现在有个紧急通知，毛主席的专列将在本月29日下午四时左右在湖北孝感站外叉道停车两三小时，与十五军座谈。请告知廖冠贤同志，并要同孝感地委、县委、区委和一位生产队长、一名妇女代表座谈。任重和你参加，请告诉任重同志

准备好。”当时，我问彭真同志：“谈什么内容？”彭真说：“毛主席对中央向湖北提的今年年产六百亿斤粮食要摸个底：究竟能搞多少？”

我立即告诉任重、张体学(主管财经工作)并作好了准备。

主席要了解湖北六百亿斤粮食的底，我吓得一身冷汗。因为我刚从黄梅秘察调查过六十个生产队(包括平原、高山和丘陵地区)，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数字。而且在端午节的一个多月，平均每人只有四两二钱粮食、李家湾的支部书记说实话，平均每人四两四钱。黄冈地委还要从黄梅调出四十万斤粮食，老百姓就会饿肚皮。我提出取消这个决定，经姜一和任重同志同意，停止了调粮。从调查情况看，我估计全省58年能搞到二百亿斤左右，至多二百二十亿斤。当时张体学同志对我说：“梅白，你一向是‘冒失鬼’，这一次可办了个稳妥事。”他自己摸底本年大约可产粮二百六十亿斤。

体学和我商量如何办。当时任重同志发低烧，体学要我向主席汇报。省委书记处提出的意见是报四百亿斤，我认为这必将卖过头粮，全省三千万人可能饿肚子。最后任重同志还是决定由我代表省委，向主席汇报。

26日下午，任重和我按时到达孝感车站的东段叉道上的“一号专列”，出席座谈会的还有孝感地、县、区、乡、大队书记和孝感地区的全国劳模官木生同志。以及妇女代表晏桃香同志。我先问主席说：“任重同志低烧，我代表任重同志向主席汇报可否？”

主席说：“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现在我们的日子不好过，自己骗自己，这也许是下情不能上达。日子不好过，也许是我们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使下级党委的日子不好过。”我接着说：“彭真说主席对湖北六百亿斤粮食要摸

个底，允不允许讲真话。”主席说：“你为什么不敢讲真话？”我就一五一十把我到故乡黄梅调查六十个生产队的情况如实作了汇报，主席就说：“毛泽东啊毛泽东，脑子发热，决定一切呀！”然后伤感地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我又问主席，六百亿斤粮食完不成怎么办，粮食是从地里长出来的。“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主席说：“讲的好。”

我又向主席反映：“1958年只能产粮食二百亿斤左右，李达说是发热39℃，我们下面县区还有的超过了42℃。”

主席问老百姓几度？我说老百姓正常，37℃。主席问任重有几度？我说任重是低烧38℃。我讲完了又问主席：“是否要一个一个讲？”主席当即说：“要讲，如果你一个人包了，我就成了偏听偏信。”

在座的地委书记王家吉说：“梅白同志说的符合我们孝感实际情况。”县委书记王振民说：“高指标是中央压省委、省委压地委、地委压县委。”

说到这里，妇女代表晏桃香来了，她是一个农村小姑娘，正闹感冒打喷嚏，叶子龙同志怕她传染给主席，不让她进来，主席知道了即说：“怕什么，少奇肝炎多年也没有传染给我。进来，小姑娘，请坐。”

她刚坐下，不料打了一个大喷嚏，喷得主席和我满脸，我们顿时都紧张起来。然而主席和蔼地说：“不要紧，我是六十多岁的老头子，不怕死，人家说身经百战，我也是身经百战不死，你的一个喷嚏打得死我吗？你比美帝国主义厉害？比日本侵略者厉害呀？比蒋委员长厉害吗？”主席这样说，气氛缓和了。

这时，主席问小姑娘：“你为什么感冒？”晏说：“报告主席，”主席立即打断说：“不要报告，大家平起平坐，随便谈心。”

晏桃香说：“昨晚我开通宵夜车锄棉梗，天亮通知我开座谈会，一直打喷嚏，来这之前我吃了药片。”主席问她：

“你们开夜车点灯吗？”晏答：“300瓦电灯，20盏气灯。”

“你赞成开夜车吗？”

“说实话不赞成，但上面要我们开夜车，我是妇联主任，不能不开。我认为开夜车划不来，花钱很多，浪费很大，第二天还打不起精神，大家都不愿意。”

主席又问：“你认为你所在的生产队粮食产量能达到指标吗？”

晏回答得很大胆：“差十万八千里。”主席问：“那么你想如何办呢？”晏很恳切地说：“希望上面实事求是。”

她说这话很简单，我和官木生都鼓了掌，这时我又请劳模官木生讲。主席说：“你就是官木生？国计民生的‘生’啊？”

官说：“现在的生产指标不造假不见报，省委书记都有责任，省压地区，地区压县，县压到我头上。我解放以来是劳模，都带头干，但是粮食产量我不敢带头，带这个头是无良心。老百姓就要饿饭。我同意梅白同志的汇报，我们现在不实事求是，要求中央实事求是，事实上有的已经开始饿饭了。老百姓耽心‘算盘一响，眼泪一淌’。”

主席听着听着便流下泪来说：“你们要我实事求是，我就看到你们实事求是。我不该同意给湖北六百亿斤的意见。六百亿斤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不了解这个问题，不怪任重，不怪你们，怪我，怪我这个中央主席。”

主席当时没有擦过脸，并且说：“不要同叶子龙讲打喷嚏的事。对‘皇帝’脸上打喷嚏，那还了得啊！我毛泽东是久经考验的人嘛。”这件事，这位小姑娘回家一说，全家都流了泪。

当时，主席反复三次说：“多好的人民啊！我们对不起人民。”还说：“唐代诗人钱起说，‘邑有流亡愧俸钱’，我现在的心情是国有流亡愧此生。”

毛泽东这种实事求是和自我批评精神当时是从国家和人民利益出发的，我是记忆犹新的。

（摘自《春秋》1988年第1期）

不听话的病人

搞好毛泽东的医疗，对我来说责无旁贷，这是部队某医院院长对我说的话。

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期间，他很少生病。他生病少，不等于我的工作好做。有时甚至很使我紧张为难。我遇到的最大困难有两个：一是劝主席吃药难；二是应付江青难。

一次，毛泽东精神不大好，经常皱起眉头吸凉气，饭也吃不下，时时用手捂住腮帮。我马上想到他的龋齿。坚持替他检查，他只好坐在藤椅上，张开了嘴。

果然是牙床发炎。肿得厉害，已经化脓。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了命。”我想起主席说的话。他笑了。我说：“这次可是真病了，牙床化脓，淋巴肿大，你得吃药，吃抗生素。”

毛泽东疼得直皱眉，却仍然在笑：“你们这些医生呀，就喜欢用药。”

“是呀，有病不用药怎么行？”

“我不用药。”毛泽东有时很象一个固执的孩子，连连摇头，一边还疼得吸凉气。

“别讳疾忌医呀，这是您常讲的话。”我知道跟主席打交道难，最好的办法是用他的话去攻他。

“我不忌医我忌药。你有不用药的办法吗？”

“病重了不行，重了必须吃药。吃抗生素很快可以好。”

毛泽东经常是凭直觉办事，而他这样伟大的领袖人物的直觉有时看事物确实能入木三分。他说：“我不用药。靠吃药，自身的抵抗力就没发挥作用，就得不到锻炼。应该调动自身抵抗力对付外来侵略。总用药抵抗力就会衰退，再有细菌侵入就要出大乱子。只有经过斗争抵抗力才能变强大。”

我问：“照这样说，还生产药干什么？”

毛泽东说：“只有抵抗力不行时，才用药助他一臂之力，反败为胜。这次我要看看我的抵抗力能不能战胜。”

我说不过他，只好妥协：“那好，我要多观察，你的抵抗力不能战胜，我还得用药。”

几天后，毛泽东没用抗生素便好了。他得意的笑道：“怎么样？我的抵抗力战胜了。自力更生么，不能光依靠外援。天下万物万事，都脱不出这个道理。”

我的记忆中，毛泽东患小病，我给他药，他全给我顶回来了。他不止一次对我说：“徐医生呀，你这个医生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全听你的我就完了，全不听你的我也不行。”

他病若较重时，也有听我话的时候。但是用药也是再三询问。我是大学毕业，可以讲出一套一套道理。他信服了，便自觉用药。早在1953年，他便多次问我说，中药和中国饭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不信你往后瞧。”

说服毛主席用药难，毕竟是医生和病人的配合问题。何况，多数时候毛泽东是正确的。应付江青难，就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难了。

我和江青争吵，多次闹到毛泽东那里。罗瑞卿、汪东兴、傅连璋等同志都知道这个情况。最初，事情并不是从医疗上引起。

江青十分霸道。卫士和护士没有不受欺侮的。我正年轻，看不惯，便去毛泽东那里告状。毛泽东每次都是支持我，严厉批评江青，有时批得相当厉害，甚至发脾气喊：

“滚，你给我滚出去！”

江青发现是我告状，记仇了。她找不出我医疗上的毛病，便随意扣帽子。

江青有时也吃安眠药，是我们会诊后，经研究给她的。有一次，她突然大吵大闹，说让她吃安眠药的全是反革命，想用毒药害她。这条罪名安头上是要坐牢杀头的。事情闹起来，她拿不出证据，我也无法澄清，她就是说她中毒了，定不了案，她便赶我走：“让他走，这里不要他，马上让他给我走！”

戴这份嫌疑，我虽离开，日子也不好过。吴旭君同志便将这件事报告了毛泽东。她说：“徐涛同志如果是反革命，那么我也是反革命了。要处理就一起处理我们两个。”

毛泽东听说了这件事，异常气愤，发了脾气。当即叫来江青，斥问：“徐涛是我的医生，你有什么权力赶走？”毛泽东一旦真动怒，江青轻易不敢吵闹顶撞，有时还要作点自我批评。毛泽东非常严厉地说：“他们为我看病为我服务，从根本上说不是为我个人，而是为党为人民工作，你凭什么就能赶他走？你怎么赶走的就怎么给我请回来！你要给我向他当面道歉！”

江青退出来，不敢公开违抗，只好又请我回来，并且当面向我道歉。她原以为我也会做做自我批评，至少也会说几句客气话。可是，她加给我的全是莫须有罪名，我怎么可能说客气话呢？为此，江青更恼火我，逢人便大讲：“徐涛那么大架子。我都向他道歉了，他就不做一点自我批评。”有

的同志便将话传给我，劝我去讲几句，我那时血气盛，自认没错，到底不曾说一句客气话。

于是，这件“不做自我批评”又成了她下次整我的罪名之一。我曾几次被她赶走，都是毛泽东命令她把我请回来。当时，副卫士长孙勇等同志也常向毛泽东告江青的状。毛泽东多次当面批评江青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对我和卫士们不止一次说过：“江青这个人哪，我跟她搞不来，谁跟她也搞不来！”

1959年，江青在广州又一次发脾气赶我走。她常为一些小事发无名之火，有时她自己心情不好也找身边的人撒气，你就是再小心也不行。她外出散步，问外边冷不冷？卫士说不冷。她一出去就发脾气：“这么冷你说不冷！你安的什么心？”回来打扑克，又怪卫士出错牌，喊起来：“出去，你给我出去站着去！”

卫士在走廊里罚站几小时，我劝他走，我说我给放哨，江青什么时候出来我再叫你出来站。卫士非常忠厚老实，就那么站着不走，后来这名卫士给北京打电话，报告卫士长，卫士长又报告了毛泽东。这件事把毛泽东气坏了。他当即指示，让这位卫士回北京，不要再给江青服务。

江青肚子里更憋火，便朝我发。就象世上某些常见的情景，她开始是生闷气，当着我的面摔门，出出进进把门摔得很响。我也一时气盛，便反过来也用力摔门。声音更大。这下子她发作了，喊叫起来：“徐涛，你摔谁？不想干你就走，马上给我走！”我看了她一眼，什么话也不说，拿起药箱就走。可是，她又喊起来：“你走你的，把药给我留下！”我说：“那不行。这药是我负责的，我是医生。我不能留。留下来你再中了毒，我负不起责任。”她说：“我叫

你留下药！”我说：“医生不能这样做。”后来，由省公安厅为她另派了卫士和医护人员。

这件事后，我考虑与江青结怨已深，留下继续工作已经不方便。过段时间，寻找一个机会，向毛泽东提出希望回医院工作。

毛泽东不愿我走。但是，他还是理解了我。他曾手指江青说：“你这个人非常资产阶级，是个人主义。很少有人能跟你搞到一块！”

那时，要想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下去，就得适应江青。否则，她总闹事，对毛泽东精力牵扯很大。毛泽东整天考虑国家大事，这样牵扯怎么受得了？所以，后来毛泽东与江青分居，我是完全理解的。

毛泽东最后说：“这样吧，你这么个好医生只给我一个人办事也太浪费，你还是到群众中去，到北医。但我们熟悉了，我有病有事就找你。”

毛泽东始终相信我，关心我。我和吴旭君同志结婚，他向我们贺喜，并送我们一套新出的他的选集。我们生了一个女儿，他又祝贺说：“我祝贺你们为新中国增添建设者。”孩子会走了，他让送到他那里去玩。孩子由家里老太太照看，毛泽东向老太太表示谢意：“小徐和小吴在我身边工作，你老人家也是作出了很大贡献。”我离开中南海后，还经常被毛泽东叫去看病或者聊天。我爱人吴旭君一直在他身边工作了20多年。

从延安时代起，毛泽东始终警惕并严厉禁止江青介入政治领导，为此，我和卫士们都目睹过江青向毛泽东大吵大闹，毛泽东不曾让步。但是，1963年后，江青逐步插足党的政治活动。诸多原因中，林彪、康生等人是起了不少作用

的，同时，外人也难看出，她的野心和政治阴谋活动，是随着毛泽东年事日高、身体健康状况日下而愈演愈烈。

由于过度劳累和生活的无规律，饮食的随意性，毛泽东相对而言是较早开始衰老了。这种衰弱最初并不是表现于闹病。1965年，一位外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在毛泽东接见后，这样写道：“自从谈话开始以来，毛只是把烟送到嘴上或放在烟缸上，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动作……他忽然向天空扬起双臂，又一下子放了下来……毛慵懒地挥挥手，然后两手支着椅子扶手站起来。他的身体比我们所有的人都直，犹如一块巨石，他身后跟着女护士，一步一步地走着，僵硬得似乎没有曲膝……”

这不是疾病，却是比疾病更难缠的衰老。毛泽东对物质并不眷恋，敢于作最艰苦斗争的选择。他在所有对手面前都是强者、胜利者。然而，面对衰老，他便如同芸芸众生一样，无论多么伟大也奈何不了自然法则。作家安德烈·马尔罗研究写作过世界许多著名的领袖人物，对毛泽东是钦敬的，和毛泽东交谈之后曾暗暗震惊，因为大脑哪怕出现微小的梗塞，也总是首先表现在行动的僵硬上。丘吉尔曾患这种病，当他去巴黎接受解放勋章的时候，走起路来和毛泽东一样。

年复一年，毛泽东渐渐衰老。象灯一样，油慢慢地耗尽。“9·13”事件后，毛泽东几天睡不好觉，吃二三次安眠药睡不好。护士长吴旭君异常焦灼。这种情况过去虽然也有，毕竟主席现在年事已高。他渐渐衰弱的身体骤然垮下来，党的“十大”召开时，毛泽东已经不能健步走上主席台，他的行动已经不便，闭幕时，全体代表退场后，他才离开。

1972年，毛泽东患了一场大病。是在尼克松总统来华访问的前夕。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毛泽东的医疗救护工作。

尼克松访华是件大事，毛泽东必须接见。中央成立了医疗组进行抢救。由周恩来亲自掌握。他把我找去，说：“徐涛，你了解主席过去的情况，你也参加治疗工作。”

抢救中，输液使用了大量抗生素。望着主席重病虚弱的身体，我想起他牙床化脓不肯吃抗生素的往事，想起他在北戴河游泳，向惊涛狂浪挑战时的气魄和体魄，我心如刀绞，泪溢眼眶。

然而，抢救之后，江青不满意结果，把参加会诊的医生扣上反革命特务集团的帽子，并且吓人地举出苏联的“白衫阴谋”为例。那件公案曾登在1953年1月13日的真理报上：“不久前，国家安全部门发现一个由医生组成的恐怖集团，他们想通过有害的疗法达到缩短某些苏联领导人生命的目的，”当时有五位医生被指控、逮捕。

江青宣布我们是反革命特务集团时，已是令人望而生畏地站在了国家政治领导顶峰上的“大人物”。当时的政治气氛，这一句话足以叫我们人头落地。还有谁能阻止她？我几乎要绝望了。

毛泽东终于得知这个消息。他以虚弱之声，抬手指着江青问：“你说这些医生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

江青张张嘴，没敢贸然回答。

“我知道。”毛泽东忽然以手指鼻：“就是我！”

一句话救了我们这些会诊医生，使苏联医生的悲剧不曾在中国重演。毛泽东说：“他们跟了我这么多年，要害我早就可以害。我知道自己的病，我也知道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好

的同志！”

病后，毛泽东的天地渐渐变小，记忆力减退，最近的事情最易忘记，反而是青少年时的记忆保留多些。人老了都是这样，毛泽东也不例外。他的精神活动不断缩小，判断力和注意力松弛，它是语言困难的前奏。

那以后，毛泽东再没写过多少东西。他的诗词手稿都是由吴旭君保管。从1963年3月一直到1971年冬，毛泽东对全部诗稿重新看过数次，对有些诗词作过多次修改。每次修改都有吴旭君作记录，等毛泽东反复推敲将字句确定后，毛泽东再亲自改到手稿上。然而，到了1973年冬，他已不愿抓笔了。

那天，毛泽东叫吴旭君把卷宗里的全部诗词用毛笔都抄写一遍。抄完第一遍，与毛泽东一起核对，毛泽东对其中有的诗词又再作修改。但对《贺新郎·读史》一词未改。核对时，他的手稿是“为问何时猜得？”吴旭君特意问：是“为”还是“如”？毛泽东说：是“如”不是“为”。吴旭君请毛泽东在手稿上改一改，毛泽东说：“不要改了，随它去。”词的下阙有一句“盗跖庄跻流誉后”，毛泽东叫吴旭君在盗字上加引号，即成“盗”。吴旭君又请毛泽东在他的手稿上也改一下，毛泽东说：“不要麻烦了，就这样。”吴旭君抄完第二遍（将第一遍抄稿烧毁了），再与毛泽东核对，特意又问：是“如问何时猜得”？毛泽东点点头。一个伟大的诗人，10年推敲不肯“随它去”，不厌其烦。现在却“随它去”、“不要麻烦了”。毛泽东当时的身体状况可想而知。现存的抄稿和手稿留此差异，虽然有吴旭君的回忆证明，后人大概仍要打一番考证研究的笔墨官司，诗人的心虽然始终不死，那火焰却随着生命的接近消逝而渐渐熄

灭。医务工作者面对毛泽东的衰老束手无策，只能竭尽全力给他一些生活上的照顾。

吴旭君累病了，住一段医院。出院后，在1976年春节，毛泽东请她去吃饭。饭前看了一场电影，看的是达式常主演的《难忘的战斗》。毛泽东生前本来不爱看电影，这次例外，越到晚年他越时时想起共和国诞生之前那遥远的波澜壮阔震撼世界的斗争。他在悄悄流泪。当演到人民解放军入城受到群众无比热烈的欢迎时，毛泽东问吴旭君：“那欢迎的学生里有你吗？”

吴旭君是上海学生，毛泽东是知道的。当年她确实是在欢迎之列。她流着泪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

这时，毛泽东泪如泉涌，再也无法控制，全场哭成一片。不等电影结束，医护人员赶紧把毛泽东搀扶走了……

（摘自《炎黄子孙》第3期）

啊，毛泽东的女儿也在挨饿

毛主席很喜欢李讷。李讷小时候，毛泽东回到家里常抱起她轻拍后背：“娃娃，我的好娃娃。”象所有作父亲的人一样，毛泽东愿意满足女儿的要求。他高兴时总是说：“那好，那好。”

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前两年，也是一个星期六。我利用到茶的机会提醒毛泽东：“主席，李讷回家了。两三个星期没见，一起吃顿饭吗？”毛泽东停下批阅文件的笔望着我。目光柔和，含着感激。他嘴角微微一翘，流出笑：“嗯，那好，那好。”

毛泽东没有专门吃饭的饭厅，每次都是卫士用食盒把饭提到卧室或办公室吃。今天搞了四菜一汤，还有辣子、霉豆腐等四个小碟。炊事员得意地说：“今天我多下了一倍的米！”

饭菜摆上桌。李讷正在毛泽东卧室里同父亲谈话。她委婉地说：“我的定量老不够吃。菜少，全是盐水煮的，油水还不够大师傅沾光呢，上课肚子老是咕噜咕噜叫。”毛泽东轻声细语说：“困难是暂时的，要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要带头，要做宣传，形势一定会好转，要相信共产党……”

我轻轻走进去，说：“主席，饭好了。”“嗯，今天一起吃饭。”毛泽东拉了李讷的手来到饭桌旁。李讷抓起筷子，鼻子伸到热气腾腾的米饭上。那是红糙米，掺了芋头。她深深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啊，真香啊。”她望着父

母倏然一笑，那么天真可爱。江青望望女儿，望望毛泽东，想说点什么，可是又看到我，便忍住了。勉强笑一笑，夹一筷子菜放进女儿碗里。

那时的江青只是毛泽东的夫人，不曾登上中国政治舞台表演。她并不如相声中所言，需要戴假发。她有一头浓密的黑发，皮肤光洁白皙。她比毛泽东年轻21岁，我们看得出，她本心是想多关心毛泽东身体，希望能讨毛泽东欢心，希望他能与她协调一致。但是他们总是不一致。

毛泽东眼睛有些湿润，望着女儿：“吃吧，快吃吧。”话音刚落，李讷已经向嘴里扒饭。饭太烫，她咝咝地向外吹热气，吹几下便咽下去，烫出了泪。“吃慢点，着什么急。”毛泽东尽量平静地说。他轻轻地笑着，但是笑得越来越有点不自然，似乎嘴唇在哆嗦。李讷瞟了我一眼，腼腆地说：“在学校吃饭都很快，习惯了。”“现在是在家里么。”毛泽东说话声音很低，已经变成苦笑。“吃菜，多吃菜。”江青不停地往女儿碗里夹菜。她脸色有些苍白，嘴唇依然保持刚才的样子，但是僵僵的。她望着李讷吃饭，那目光神色是母亲特有的。

李讷在父母面前不多拘束，也无须保持“形象”，慢吃不了几口，又开始狼吞虎咽。我愣住了，她几乎嚼也不嚼就把一嘴的饭菜吞下去。在她朝嘴里扒饭的时候，偶而掀一下眼皮，目光沿着上眼皮匆匆扫过桌面，她在看饭菜还剩有多少？我忽然一阵心酸，喉咙立刻堵塞了。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啊！谁能相信她会饿成这样子？

开始，毛泽东还在慢慢陪女儿吃。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点什么。渐渐地，他不说话了，默默地夹一筷子菜或饭往嘴里送。嚼得那么慢，那么慢……终于，他停下了筷子，停了

咀嚼，怔怔地望着女儿出神。

江青早已停了筷子，看看女儿，又看看毛泽东。她接连几次大喘气，便盯住毛泽东不动了。她有时心里也有想法，并不说，而是希望毛泽东能够理解，能够先说。如果经历多次，毛泽东仍不有所表示，她才会按捺不住地爆发，甚至又哭又闹。

“哎，你们怎么不吃了？”李讷好不容易把嘴离开饭碗，诧异地问。“哦，”毛泽东身体一抖，漫不着边际地笑了笑，说：“老了，吃不多。我很羡慕你们青年人。”他说着，并不看女儿，也不看江青，抓起报纸，侧了身看，头轻轻晃动几下，仿佛是念念有词。江青胸脯微微起伏，瞥一眼毛泽东，动作象赌气。

江青又瞟一眼毛泽东，便起身离开了。她转身很快，低着头，但我看到她眼眶里已溢满了泪水。她从毛泽东身边走过时，拼命抿住了嘴唇‘把头微微侧仰，再不多看一眼。

毛泽东始终埋头看报纸，似乎什么也不知道。可是，江青刚走进她的房间，毛泽东便抬头望着女儿，慢条斯理地讲：“我年轻时候在湖南农村搞社会调查，有次饿了一天，弄到一决番薯……”

他没有讲完。李讷的心思只在饭上。她吃得正香，说：“你们不吃我全打扫了啊。”打扫完。毛泽东目光在女儿脸上稍触即离。好象不敢多看。重新盯住报纸，只是左手在桌上点了点：“三光政策，不要浪费。”

其实，李讷也不了解她的父亲平时吃什么？吃多少？如果她知道父亲有时只吃一盘马齿菜，她一定不会这样“放毛”了。她把饭菜吃得干干净净，仍然没有离开的意思，两眼可怜巴巴朝桌子上转，连一片葱花也不放过，仔细地夹起

往嘴里送。

李讷坐在椅子上绕山绕水地说：“爸，我可能还要发育呢。饭量特大。这么大的窝头我能一下子吃三个。”她比划了碗口那么大。“今天的饭真香啊，可惜……”李讷瞥一眼父亲，目光又在桌上扫。她带着孩子气的狡黠望着我：“尹叔叔，还有汤吗？把这盘子涮涮。别浪费。”

我猛地扭开脸，泪水夺眶而出，直朝厨房跑去。

“唉，李讷这女孩也真受苦了。”炊事员咕噜着，找出两个白面掺玉米蒸的馒头。我不等他放到火上热，忙拿了一个赶回饭桌旁，递给李讷。

李讷摇晃着身子，不好意思地看看父亲又看看我，掰一决馒头擦擦盘子往嘴里塞。我拿来热水瓶将开水倒进菜盘，帮她一个盘子一个盘子涮。毛泽东喉咙里咕噜响两声，站起身，什么也没说便走开了。他好象也不知自己要干啥，先朝院子走，到门口又折向卧室，没有进卧室又走向院子。在院子里缓缓踱几步，便停住脚。抬起头，凝视那七株古老的柏树，久久不动一动。

晚上，江青走进了主席的卧室。我忙退出门，在外面侍立。我估计是为李讷的事，可能会哭闹。严重时我就进去劝。可是，没有吵闹。半小时后，江青出来了，眼睛红红的，明显是哭过。我想了想，便进去替主席倒茶。

“主席，李讷太苦了。我想……”毛泽东皱着眉头：“同人民比较来说，她还算好些。”“可是……”

“不要说了。我心理并不好受。她妈妈也不好受。我是国家干部，国家按规定给我一定待遇。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该享受就不能享受。”毛泽东深深叹了两口气，不无忧伤地说：“还是各守本份的好。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现

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

毛泽东抬起右手，由里向外轻轻一挥，我便悄悄退出了屋。我觉得，他感情丰富，但他更注意自己的代表性。他主观上始终站在大多数人民一边。

（摘自《炎黄子孙》）

毛泽东和邓小平

邓小平是在阴影的笼罩下开始长征的。那时他才三十岁。他被撤销了军政职务，受到了严厉的“斗争”，被武装看押和公开批判。连妻子也跟他离了婚。虽然这还不是他生涯中的最低点，但确实也是一个低点。有关这一时期的某些传说肯定是不真实的。看来没有证据表明，象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他真的被送去劳改了。他作为红军总政治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像数以千计的其他红军战士一样扛着自己的行装，开始了长征。但他并不是象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成了五千名用肩膀扛装备的挑夫中的一个。然而，这些都是有关邓小平的早期典型情况的传说。

遵义会议改变了邓小平的低级地位。就如在他的生涯中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情况那样，他从政治上的底层上升到参与毛泽东的高层梯队。

邓小平降职后又东山再起的所有细节在参加长征的人的记忆中并不都十分清楚，但是他的提升却是毫无疑问的。他支持毛泽东。但因为脾气急躁和心直口快而吃过苦头。人们形容四川人是有名的辣椒罐子，邓小平恰好就是这种人。

邓小平有位弟弟叫邓垦，后来任武汉市市长，一九八四年已退休。还有位妹妹，一九八四年仍在北京的一所科学研究所工作。他们的母亲在孩子们幼年时便去世了，孩子们是由继母抚养长大的。

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冬，邓小平的日子又不好过

了。众所周知，他是毛泽东的积极支持者。此时，博古及其反毛派开始接管中央苏区，发起剥夺毛的剩余权力的运动。

邓在一九八四年的回忆说，他担任三个县委书记之职约半年之久。尽管邓告诫他的同事们对于编写和研究历史必须精确，但他却拒绝写自己的回忆录，也反对别人为他写一部正式传记的建议，这也许是因为他厌恶以毛为中心的个人崇拜。

那时的反毛运动是由党内刊物一篇不署名的文章掀起的，这篇文章大概是由博古或洛甫写的。“布尔什维克”们不取公开攻击毛，而是采用中国政治中指桑骂槐的方法批评福建省委书记、毛的坚定支持者罗明。文章没有提及邓小平，但是谁都知道，邓与罗明的观点相同，并且都拥护毛泽东。

罗明几乎立即被解除职务。邓小平被调至江西任省委宣传部长。

四月十五日，洛甫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一篇文章。由此，反邓的运动便公开了。洛甫公开点名，首先指责邓小平是“罗明路线”的追随者，被点名的第二个人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还有帮助邓反对清除AB团歇斯底里运动的谢唯俊和长期支持毛泽东的古柏。四人均被解除了职务。红军开始长征时，其中毛、古两人被留下来，而且都丧了命。

此时，邓被送到了红军的总政治部接受“批斗”。有关这次“批斗”的报导是相互矛盾的。斗争绝不是温良恭谦的。用暴力伤害肉体是司空见惯的事。挨斗的人被关押起来，显然，邓也不例外。五月六日党中央局杂志《斗争》上发表罗迈（李维汉）的一篇文章，文章号召对邓和“罗明路级”的其他追随者进行“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罗迈是党

的组织局书记。他激烈要求对邓进行处分。正是在这个时候，邓的夫人阿金（金维映）和邓离婚，改嫁给高大英俊、深思熟虑的罗迈。这是否促使罗迈对邓采取严厉的态度，无法证明。阿金是广东人，人们记得她是一位颇具天资的女人。和邓一样，她在瑞金时是党的一位书记，而且据说有点个人主义。阿金和罗迈一起完成了长征，但他们在延安离了婚。

邓小平被指责执行了一条“富农路线”，因为他主张没收富农的土地分给穷人，而不去触动中农。他还认为应当在各县保留地方武装力量，而不应当象“布尔什维克们”所坚持的那样，把所有的武装都统一到中央指挥之下。他还支持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战术。

邓小平在被批斗时写了两三份检查，承认他低估了“进攻路线”。但指控他的人对此还是不满意。他坚持说：“我再没有别的可说了。我说的都是实话。”说罢，他把腰板一挺，直直地站在那里，不愿为此再费口舌了。

一天，在被卫兵押回禁闭室的路上，他遇上了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陆定一是苏区宣传部长。“文化革命”期间，红卫兵曾把他打成重伤。

“我饿坏了，”邓小平对她说，“肚子根本吃不饱。”她可怜他，花一块银元买了两只鸡。做好后，她给卫兵捎了个信，要他们把邓小平带到她的住所吃饭。邓小平吃了一只，把另外一只拿回禁闭室留着下顿吃。红军撤出苏区时，唐义贞被迫留在苏区。

由于人员减少，红军再次进行了整编。第一军团从三个师的编制减为两个师，第三军团从三个师减为四个团，第五和第九军团取消了师一级的编制。

毛决定从中央直属队中裁减人员，把所有身强力壮的人都充实到战斗部队中去。邓小平便是其中之一。免去了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职务后，邓调往第一军团。

没有一个人象毛泽东那样使邓小平经历了那么多的大起大落。毛有一次发脾气说，每次他讲话，邓就故意坐在屋里很远的地方，邓耳聋，反正也听不到毛在说什么。可是，在一九七三年，当周恩来身染重病时，毛把邓小平从文化大革命的练狱中解脱出来，并热情地称他为“棉里藏针”，意思是邓柔中有刚。毛还说，邓“行方思圆”。

（摘自《为捍卫党的路线而斗争》，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与彭德怀庐山之争

1959夏，庐山。彭德怀沙哑、厚重的湖南口音，不管是吼虎岭下一声久未闻听的虎啸。“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冲昏头脑喽！”西北组的会场就设在吼虎岭北面的一幢西式平房里。7月3日开始小组讨论。彭大将军在小组会场中央的一张沙发上，冷着脸，锁着眉，微抬起那张线条四楞四方的下颚，一股不肯通融，不甘罢休的倔相。

“把那些个经验好生总结一下，不要丢掉了！也不要埋怨，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嘛。我去了解实际只增产了13%。我又问了周小舟，他说那公社增产只有14%，国家还给了不少贷款和帮助。主席去过这公社，我曾经问过他，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谈过的！”彭德怀第一次发言就涉及毛泽东，认为他不说实情，掩饰……

7月4日上午，彭德怀在西北组继续放炮：“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在内。”

第二次发言依然涉及毛泽东，而且直呼其名了。

彭德怀似乎还是粗中有细。他知道他在批评谁。因此，先把自己亮出来，当众承认犯过四次错误，谁也不是圣人，对谁的错误也不必讳言。然而长期以来，在党内竟形成一个惯例：无论任何人，不管地位多高，绝对不敢指责毛泽东犯

过什么错误。此乃党内第一大忌。此忌在解放以后又扩展而为中国第一大忌，这在1957年使第一批数十万中国优秀分子在它面前悲壮地纷纷栽倒，从此二十年不得翻身。这个巨大的封建阴影笼罩了中国大地几十年，以致后来在一场大悲剧终于演完后，人们对毛泽东功过的评论还是战战兢兢。

因此，庐山会议近3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评价彭德怀直言“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这句听似平淡的老实话，便可窥见它那光彩！

毛泽东住在美庐，然而美庐沉默着。二楼大套间的灯光照例是天天亮到子夜以后，也不见毛泽东频频召人来谈，只是一个闷在房里读书。午后，美庐的工作人员常见他或坐在阳台上对着残阳抽烟；或在后面的竹林里独自徘徊；或者绕着长方形的水池踱步。

吼虎岭下那个嘶哑、浑厚的稔熟乡音依然不留情面地频频传来：“农村四个月不供油，办得到吗？完全是主观主义！我一回国看到这个电报，就打电话提意见。你们提了意见没有？抵制了没有？”

“毛主席与党中央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也是不行的。去年乱传毛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国家那样穷，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搞什么名堂？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

7月8日晚上八九点钟，正在南昌闲居的贺子珍，由水静、朱旦华陪同抵达庐山。

贺子珍直到此刻，对这场神秘的安排还毫无所知。自从她1938年离开延安去苏联后，中国和她个人的命运都发生了乾坤扭转的巨变，人民获得了一个共和国，她却失去了丈夫。而她的丈夫正是这个共和国的最高首脑。这种命运的残酷捉弄，

对她个人来说固然是终生失悔的悲剧，然而，由于首脑人物的婚姻无论怎样都要带上政治色彩这种必然性，也由于后来取她而代替的另一个女人极为罕见的阴毒残忍这种偶然性。竟使得毛泽东的这次婚姻的改弦更张，无意之中给中国政治舞台引入了一股潜伏很久而又为祸剧烈的恶。因此，命运便通过这两个女人的更迭也残酷地捉弄了整个中国。这是一种善与恶的更迭。真正的不幸则在于，倘不是几千年封建幽灵的作祟，毛泽东娶一个什么样的夫人又与中国老百姓何干系？无情的历史偏偏在这样偶然的小事上同中国开了一个毛骨悚然、深创剧痛的大玩笑。善良的贺子珍，今年才五十岁，头发却大把大把地枯白了。她烟抽得很凶。永远无法医治的抑郁症死死地攫住了她。

美庐有反应了。7月10日下午，毛泽东把各小组组长召来。对前一段的讨论，他和颜悦色地讲了几点看法，弦外之音是有人在“犯规”了，他出示了“黄牌”。

7月12日晚上，正在彭德怀苦苦思索的时候，按照毛泽东安排的时间，水静、朱旦华同贺子珍乘一辆小轿车驶进美庐。

“你们可以走了。”毛泽东轻声说。而后警卫员又下来把贺子珍领上楼。毛泽东对警卫员说了一句：“你也走。”毛泽东同贺子珍谈了不到一个小时。他又把水静、朱旦华叫来，让她们送贺子珍回住所去。后来，毛泽东说：“看来不行了，她的脑子坏了，许多话答非所问。”

当晚深夜，美庐里忽然响起急促的电话铃声。江青从杭州打来长途电话，宣布她明天要来庐山。这么快，她就知道了？毛泽东再无睡意，起身枯坐到天明……宁静的庐山之夜，头一次伴他捱到尽头。当晨雾已经渐渐稀薄起来的时

候，他才在孤寂中睡去……

这时，彭德怀偏偏踩着露水朝美庐走来。他也整整苦熬了一夜。是写信，还是请求面谈？谈，怕是已生嫌隙，反会谈崩；写，又怕反问，为什么不来当面谈谈？现在他下了决心，找主席谈谈。谁知，他一走到美庐门口，警卫员就告诉他：主席昨晚一夜没睡，刚刚躺下。对彭德怀和毛泽东来说，今天早晨无疑是失去了一次彻底决裂前的缓和或通融的机遇。撇开历史的必然性不谈，就这两个人的关系和秉性而言，这次相遇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

“26”号别墅里，她也一夜未眠。22年后的突然重逢，对贺子珍刺激太强了。要知道，在那漫长的岁月里她是一只要听到毛泽东的声音就会昏厥的。这一夜，她在猛烈抽烟和痴迷的回味中，捱到天明。毛泽东说了，我们明天再谈。她发了一夜的誓：明天见他决不再哭。她恨自己昨天语无伦次，她要告诉他，她整整想了一夜才拣出的那些最要紧的话。她要把那隔在他们之间的万恶的空间撤掉。她要告诉他当年离开延安的苦衷。她要向他倾诉在苏联带着娇娇所饱尝的万般艰辛。她要向他叙述解放以后她的苦苦思念。她要再次请求让她回到他身边去。

敲门声把她惊醒。来的人不是永静和朱旦华。她不认识。

“哦。毛主席有事已经下山了。请你也马上下山。”

“怎么？毛主席下山了？他，昨晚上没说呀。他上哪里去了？他说了今天还要见我的呀……”贺子珍急得几乎哭出来。

“组织上没有说什么，贺子珍同志。只说请你马上下山。车子已经停在门口了。”

“组织上”——她忽然明白了。十年前在山海关车站也出现过这样的“组织上”派来的人。她呆呆地站起来。手哆哆嗦嗦地想去拿烟，又缩回来，慌乱地理理那一头枯发。她浑身都在颤抖。一滴浑浊的泪水无声地爬上那张已经再也不会抽动的面颊……她和彭德怀一样，哪里知道昨晚传到美庐的杭州电话。如果说，毛泽东在和江青结婚以后曾经多次萌动过同贺子珍破镜重圆的念头的話，这次恐怕是最后一次了。

7月14日晚，雷声、风声、雨声伴着彭德怀写下了他那封著名的致毛泽东的信。

7月16日上午，毛泽东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位常委召到美庐。他说，昨天收到彭德怀14日给他的一封信。他已经给这封信加上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标题，并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

“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毛泽东带着漫不经心的笑意，夹着香烟的大手，在空中划了个弧形。“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同志也上山来参加会议。如果林彪同志身体还可以，也请他来。”

7月23日上午九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庐山交际处直属招待所西餐厅举行。毛泽东坐在台前，黑色的漆茶盘里，一听“熊猫”香烟，一盒圆筒茶叶。衬着雪白台布，象一幅版画。“你们讲了那么多，充许我讲点把钟点，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困不着！”

他的眼球里隐约可见缕缕血丝。一贯高亢的嗓音里有些辟裂的嘶哑声。难道是他的威望还不够？难道是那些批示还不够明白？难道是那么一些人故意装糊涂？康生此言极是：

“再这样下去，人都要被彭德怀同志拉光了！现在又出来一

个洛甫同志：好哇。”

“不分什么话。无非是讲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我们在整风中创造了‘硬着头皮顶住’这样一个名词。我和有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顶好久？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些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样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难听是难听，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同志腰杆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头发卡子太少，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以至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

“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都登出来，一年登到头，登得完登不完？还有文章长短，我看至少要一年，这样结果如何？我们的国家就垮台了。那时候帝国主义不来，国内人民也会起来把我们统统打倒。你办那个报纸天天登坏事，无心工作，不要说一年，就是一个星期，那也要灭亡的，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就不是无产阶级了，这就是资产阶级国家了；资产阶级的，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了。当然，在座没有人这样主张，我是用夸大说法。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事，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也会跟我走！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基本要正确，部分不妥。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坚定：要别人不动

摇，首先自己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到了一些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仅有30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个论调。现在这种同志的论调右派不欢迎才怪。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谈锋越来越凌厉。“众神仙”鸦雀无声。空气近乎凝固。动摇、立场、方向问题、垮台、右派……这些可怕的政治术语，在当年就象鼠疫和霍乱一样令人不寒而栗。在南宁会议就说过周恩来他们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这次讲是三十公里，似乎还是嘴下留情的。但凡是一沾上“右”字，性质就严重了。

“但是，同志们，1958年、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责任在别人，现在应该说我，实在有一大堆事没管。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说六百万吨。以后我找大家谈，也觉得可行。我6月讲一千零七十万吨，后来去做，北戴河搞到公报上，从此闯下大祸，几千万人上阵。所谓始作俑者，应该断子绝孙……”

毛泽东谈到这里哽咽了。全场一片肃静。

“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大炼钢铁，你们赞成，也可给我分一点，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

掉，主要责任在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虚的，实的。你们分一点。见之于行动是工业、农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谭老极，你那大炮也相当多，放得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共得快。要说快，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天天想着欧洲革命来了，又没来，反反复复，一直到死了，还没有来。到列宁时才来了，那不是性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开始反对巴黎公社，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后来被杀了。马克思是否也杀呀？巴黎公社起来了，他又赞成，估计会失败，看到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这划不来。我们也有广州公社，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否也会象1927年那样失败？象二万五千里长征，大部分根据地丧失，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现在失败没有？到会同志都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不是，是一部分失败，多付了代价，刮了一阵共产风，全国人民受了教育。如讲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的发明权有没有责任？（柯：有。）是否比我轻？你那是意识形态问题。我是一个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几千万人上阵，这个乱子就闹大了，自己负责。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毛泽东戛然而止。

第二个谁讲？全场在失去了知觉般的盼望。一个巨大的心理磁场，仿佛把人们都钉在原地。然而，毛泽东宣布散会！

27日。毛泽东的秘书，把彭德怀引上了楼。

他走到会客室的门口，立即愣住了。靠窗的大沙发，坐着毛泽东。左右的单人沙发，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

彪。在山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来了。主席对面的墙根旁的沙发，是空的。显然，是留给我的。不是主席一个人和我谈心，而是在山的所有常委。比预感还要严重，恐怕如此。

彭德怀从口袋里掏出中华牌香烟。

“老彭，你怎么也抽烟了？”毛泽东的眼神显出真实的惊异。“抽我的，老彭。”

这是决定我命运的关键时刻，先听！先听！彭德怀的右手的大拇指甲，使劲地掐了一下左手的“虎口”。这个穴位能制怒。从北伐战争起，他就晓得这么点中医知识。

“……我和彭德怀同志共事三十多年，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你呀，北戴河会议不讲，郑州会议不讲，上海不讲，庐山会议快结束了，怕没有机会了，就下战书了……”毛泽东任随他的意识流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奔逐。

坐他沙发后面的两位秘书，不作记录，只用一双耳朵听。彭德怀惊异地注意到这个细节。没有录音机。迅速地环顾四周。他相信自己看得真切、细致。噢，今晚这次中央常委会批判我，没有记录，没有录音。主席为什么这样？

常委们按照他们的法定次序一个个地批判彭德怀。

“彭德怀同志前不久访问了东欧各国。上山你急于发难，是不是有背景？赫鲁晓夫对你评价那么高，你答应了他什么？”林彪把批判推到了崭新的阶段。

“我一句外国话也不会，跟赫秃子说了些什么话，你们找翻译调查嘛！”他忍不住了，嗓门渐大。

“老彭，你是延安整风以来就不服气。”毛泽东正色道，“憋了那么久的气，这次发到庐山上来了。好家伙，简直要把昆仑山脉推下去……”

“主席，为什么不允许我对问题有个认识的过程？去

年，北戴河会议，我也赞成了共产风。上海会议，我才提了浮夸风的问题。这次给你写信，丝毫没有有什么恶意味。”

“你骂了二十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呢？”

“我——”彭德怀猛地站了起来，扯开嗓门吼道：“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的娘不行？”他完全失去控制了。脸色铁青。

毛泽东停住了手中的烟。面不改色。

常委们都没料到彭德怀会说出这等粗话，惊愕了片刻，随之纷纷严厉批评他的态度。

彭德怀又坐下了。意识一片空白，浑身血液都仿佛开锅似地要从嘴里喷出来，他用抖得很厉害的手指夹着烟去堵。一切对他都不存在了……

彭德怀的这句粗话，作为他“记仇”的一个证据，永远刻在毛泽东的记忆中。反过来，毛泽东则比他“记”得更结实。

事隔三年，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不行？’这一操，就被扰乱了，工作受到影响。”

事隔五年，1964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又重提此事：

“七大前，开了斗争彭德怀的会议。他在庐山会议不是说，你们骂了我40天，我也骂你们20天。”

彭德怀的警卫参谋景希珍回忆道：“隔了两天，浦安修同志到了庐山。她是自己跑到庐山度暑假的，并不知道庐山发生了什么事情，来时，还嚷嚷着到处去走走看看。第二天

早起，她的眼睛红肿着，什么话也不说了。彭总的办公室主任正式通知我，首长犯了错误，会议正在解决他的问题，要更好地关照他的生活起居。”

其实，浦安修并不是自己跑上来的，而是由当时的中办主任杨尚昆悄悄安排的。毕竟二十多年前在长征中，杨尚昆是彭德怀的新三军团政委，即使在今天这种非常时刻，他也还是要给落难的老战友委婉地送去一点安慰。

一个祭坛终于架设起来了，它将以诚实、理智、良知、清醒的头颅、传统的忠诚和辽阔苍茫的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的痛苦呼号，作为牺牲贡献到这个祭坛上去。为的却是祭奠一个原本也是属于人类自己的、世世代代都在梦寐以求的乌托邦之梦。为了这个梦，彭德怀被架上了这个祭坛。

元帅“死”在建军节前夜。

（摘自1988. 9. 24《文汇报》）

《海瑞罢官》受批判的内幕

是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上海召开工作会议。作为会议的文化生活，每天晚上都有晚会：或戏剧、歌舞演出，或电影，或跳交际舞，或者同时并举，谁愿意怎样就怎样。

一天，毛泽东主席看湘剧《生死牌》的演出。这出戏的末尾有南包公海瑞出场。这个人物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第二天，他叫人搬来《明史》，专心阅读了海瑞传。之后，毛泽东在会上说，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说“嘉靖”“家家皆净”也。他还把这个话写进上疏里头。后来被送进了监狱。有一天，牢头给他端了酒、菜来，才知道嘉靖已经死了。他大哭，把刚才吃的东西吐了。可见海瑞对嘉靖忠心耿耿。

毛泽东号召大家学习海瑞这种精神，他说“刚直不阿，直言敢谏。”

事后，宣传海瑞的文章就作了起来。当时，《人民日报》的一位负责人向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传达了要宣传海瑞的精神，并约请吴晗为《人民日报》写一篇文章。这位学究不仅欣然从命，还提出要写一部以海瑞为主人公的大型历史剧。在南方，京剧大师周信芳正上演《海瑞上疏》、《海瑞背纤》，北方，马连良就心急如焚，恳请吴晗早日动笔。如此，他在写完《海瑞骂皇帝》、《谈海瑞》这些文章之后，于一九六〇年岁末，完成了新编历史剧《海

瑞》。吴的老友、云南植物研究所所长蔡希陶读罢剧本三稿，建议吴晗将剧本改一下，以区别于其他海瑞戏。于是，第四稿，定名为《海瑞罢官》。一九六一年，剧本发表并演出。

从《生死牌》引出了《海瑞罢官》，这一出悲剧到此也就完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几声闷雷，几道闪电，这一出艺术舞台上的悲剧，却导演到现实人世之间。

“我不过是一个小兵。”江青这样说自己，“不过是毛主席的一个哨兵，在思想战线经常巡巡逻，放放哨，有什么情况向主席报告一声，我就做这么点工作。”

有一天，这个“哨兵”看了《海瑞罢官》的演出。她认定，这不是花丛，而是正在窥测方向，等待时机，以求一逞的敌人！她越看越是，越看越近，不是司机而动，而是已经扑了过来。她把这个问题报告了毛泽东。她说：《海瑞罢官》有问题，是个大毒草，非常大的毒草，现在社会上正埋怨粮食定量低，没有肉吃，在这个时候，台上抬出海瑞来，臭骂皇帝，是什么目的？要批判他！作者是哪个单位的？要查他的出身成分，不批不得了。

毛泽东没有同意。只是告诉江青，有空多读几本书。

江青也没有指望一说就能得到同意，但他也知道，七说八说之后，也不会不同意。

为此，江青又串通了康生，她气愤地向康生表示：“我看出有问题的，那就一定有！不解决，我决不罢休！”

康生注视了江青好一阵子，才说：“时机不对。全国人民正在瓜菜代，谁也没精神关心这个问题。不用慌，经济形势好了以后，政治问题自然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眼下，你只管用心地看，自然有说话的时候。”

就是这样，到一九六四年，吃上几餐米饭了，有了点劲头了，又开始闹腾了。

一天，康生见毛泽东主席，他说：“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过：现在风行写小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他们一大发明。由此，我想到当时的一出戏，叫《海瑞罢官》。我考虑了近两年，我看这个《海瑞罢官》跟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有关。是替彭德怀鸣冤叫屈，替彭德怀翻案哩！海瑞在戏里边逼着土豪退田，当时彭德怀不是叫嚷着要我们准许农民单干么！”

起初并没有很注意的毛泽东，听到这里，他的神色变得比刚才严肃了。

康生看到了这个态度的变化，但他不能确定是自己说错了，还是说对了。沉默了好一会之后，仍没有听到回音。于是，他忙为自己寻找退路，说：“我这个想法，只是提出来供主席参考。”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他把浓烟吐出来，烟雾在他的面前轻轻飘动，在这轻烟的后面，他自己注视着那一点火光，做着思索。

当晚，江青跑去问康生，情况怎样？康生告诉她：“一言未发。”江青嘿嘿地笑了两声：“我要找笔杆子写文章了，准备开战了！”

江青一跳到了上海，找到了当时的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柯庆施向她推荐了张春桥、姚文元。自此，从一九六五年初，八个月的时间，他们完成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由姚文元署名，于当年十一月十日发表在《文汇报》上。

“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此拉开。不就是一篇评论吗？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事情就硬是这样的怪。

从中央政治局到书记处，没有谁知道这篇文章的来由。而且，当时中央已经决定由彭真同志主持成立了五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其主旨在于提高全民族文化科学水准，提倡学术讨论自由，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对于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完全没有理会，在十九天的时间里，中央、北京各大报没有一家转载。

江青把此事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有些动怒了，他说：“印小册子。”

在征求订数时，北京新华书店也同样不以为然，只要了几千本。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杭州，陈伯达谈及此事，他向毛泽东说：“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也是谈及此事，毛泽东向陈伯达和另外两个在场的人说：“这出戏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戚本禹又根据这个精神，突击写了“要害是罢官”的文章，但是，中央宣传部又没同意发表。

面对汹汹来势，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彭真同志召集会议，要求在思想战线，稳定局面，仍然要坚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当时的中宣部长、无锡人士陆定一在会上强调：“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说。”一月四日，陆定一在他主持的中宣部召开会议，他向部属们说：“当前这场讨论，是学术性的。社会科学，文学方面的题目多得很，对古人的评价，历史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形象思维，美学，一个题目一个题目的来，解决这些问题，要一、二百年。”

姚文元的文章没有转载，戚本禹的文章没有发表，吴晗的《海瑞罢官》要纳入学术探讨的轨道。毛泽东动怒了，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三十日，几次向康生、江青、张春桥，说：“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军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我们共产党人真有敢于说话的。已经身着污水的彭真，当面向毛泽东主席申明：“据调查，吴晗与彭德怀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也没有其他直接联系。吴晗不是政治问题。”

就是在三月间，陆定一到了江西。他说：批判《海瑞罢官》引起一系列的问题，对古人应该怎样评价？究竟还有好人没有？是不是一团漆黑？有没有清官、赃官？有没有民族英雄？”

整个知识界里真正的知识分子，为历史一片不平。

然而，在劫难逃。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已经胜券在手。

江青说：“要‘引蛇出洞’。让他们讨论这篇文章，把观点都暴露出来。”

张春桥说：“有反对的，就有靶子了，这样一搞，就热闹起来了。”

于是《文汇报》就组织了公开讨论。人家已经张好了网，就有瞎着眼往里投的。经学家周予同说：姚文元的文章是乱箭射人！历史学家周谷城愤怒了，这是姚文元陷罪于人！有学者李平心，他认为：姚文元说旧时代的清官比贪官要坏，这是荒谬的；主张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研究历史科学。一时间，竟有三千人向《文汇报》投寄稿件，反对、批驳姚文元的文章。结果，所有这些都“没有好下场”，他们的罪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文化大革

命”。《海瑞罢官》的剧作者、明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直接死于这篇文章，李平心因对这篇文章的态度获罪之后，不堪凌辱，愤然自杀。前面发过言的周子同，“批倒批臭”以后，罚他打扫街道，已经八十高龄的老人，站立艰难，就跪在地上，每日打扫垃圾。

此外，还有主演了《海瑞上疏》的一代中国文化艺术大师周信芳，也被牵连进来，批斗、坐牢，直到最后折磨至死。

甚至，牵连到周信芳的爱妻；那个饰演海瑞的，被揪斗得忙不过来，就拿他的老婆来顶代，一批批的红卫兵，前来周家讨伐：软的有绳索皮带，硬的是棍棒枝条，当着她儿女甚至孙辈的面，一遍一遍的毒打！终于，这位“海瑞之妻”，也被革了命！

以致，波及到了周信芳的孙女：这个带着红领巾的女孩，眼看着自己的好外婆被活活打死，她突然觉得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自此精神失常了。她清醒时，眼前清晰地映现着死者的痛苦；她失常时，向活着的人映现着她比死去者还要痛苦的苦痛。十五年后，她已成为一个少女，由父母带到海外，是想使她能散去一心郁积，但是，在那里不久，却跳下高楼……但是，她还没有受尽人间苦难，只是跌残了身体。从此，每每昏迷时候，总是呼喊“你们别打我的好外婆了！别打了！”她，一个历尽苦难的少女，就是带着这样的哀求，含着悔恨，丧于异土……

这几位，就是祭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大旗的第一批牺牲者。呜呼，“文化大革命”否定了，他们的英灵何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镇压海瑞和海瑞有关系的人开始了；已经死去四百多年的清官海瑞本人被革伐为比赃官还坏，

彭德怀又加新罪名，他也是海瑞。写海瑞演海瑞，以及赞扬过演与写的……凡与海瑞有牵连者，统统都罪恶滔天！

海瑞何罪之有？刚直不阿。那么，不正是毛泽东自己提倡过这种精神吗？那可能是海瑞还没上来那股“精神”的时候。悲剧就悲在这里。

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开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就一步步走向了北京长安街正义路一号特别法庭的被告席。当然，这之间，还有着曲折、漫长的路程。但是，当时，谁敢想象，历史会向我们中国老百姓开这样的大玩笑？

（摘自《十年动乱》）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几次交锋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本人写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攻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注意到了吗？毛泽东特别标明：“我的第一张”，其势将有接二连三。当时，没有公开发表，但广泛传抄，真正是家喻户晓。

一年以后，在《人民日报》上正式公布。是没有再写，也用不着第二张了，发表时，把“第一张”三个字去掉了。

大字报全文不过二百三十几个字。可是，实在是字字千钧。谁个担得起？

就其中提到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周恩来总理大费思索。那时，从实际可能出发，在他主持制定年度钢生产计划时，曾一度压缩指标，与上、下年份相比，形成一个“马鞍”。就此，毛泽东也做

过批评。看了大字报，周恩来找到了毛主席，询问：

“主席是不是指我那个‘马鞍形’的问题？我要重新加深认识吗？”

毛泽东否认说：“那算不得一回事。”

那么，所指者何？

刘小奇，邓小平。

很快，毫不含糊地称他们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最高层，换上这样的标牌，当然是非同小可。

现在，我把那些曾经激起“革命群众”“革命义愤”的雪片般的“揭发批判”，罄竹难书的文字，倒进这理智的风车……

是一九五九年，毛泽东主席本人提出：我不能再做国家主席，我应该退到后台去了，让别人干。

他没有提名由谁来担此大任。

大家都不吭声。

邓小平说话了：“都不提，我提，刘少奇。”干脆、严肃，在大事上，凭主见，不顾盼左右；关键时刻，他敢。这就是邓小平的性格。

没有人不同意。毛泽东主席也没有反对。大家都鼓了掌。

那时，我们这辆车，在反对了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之后，又继续顺着‘左’的路线，勇猛地往前颠簸。

不久，一些地区，就有成批的饿殍，或陈道边，或倒街上。

面对严重的现实，政治局决定，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以统一对形势的估计，以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

训，起初定为地委级参加，毛泽东指示扩大到县委书记一级，这就成了后来名之的“七千人大会”。

形势到底怎样？经验教训究竟何在？刘少奇认为：

当前的经济困难严重，比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时严重得多。从那时以后，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继续发展，加上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和赫鲁晓夫撕毁经济协议并撤走专家，造成现在的经济困难，是全国解放以来所没有的。

这几年的经济计划一直不符合实际，计划虽然一压再压，但仍然是高指标，基本战线过长，工人增长数目过大过快，都超过了能够负担的能力，这种情况如果不扭转过来，困难还会更加严重。

目前农业也非常困难，大跃进对农业生产破坏很大，人力、畜力、地力都下降了，要纠正共产风，而且实行退赔。

这几年大刮共产风，只讲不断革命，不讲革命分阶段。只讲主观能动性，不考虑客观可能性。

这几年反右倾过了火，党内生活不正常，民主作风很少。党内的过火斗争，使干部不敢发表不同意见。反右倾扩大，是这两年没有能纠正错误的主要原因。

地方上有错误，中央也有错误。

造成困难的原因实际上不是天灾，也不是赫鲁晓夫的破坏，主要是我们自己的错误。

之所以犯错误，因为不谦虚，不谨慎。

经验教训要自己取得。这几年学费花得太大了，现在如不吸取教训，学费就等于白花了。

这些意见，邓小平表示同意。

大会期间，刘少奇自己拟了个提纲，作了一个临时性发

言。他进一步说：“我国的经济临近了崩溃的边缘……我们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我们动不动就给自己的同志扣反上党的大帽子，其实，人家只是对某一个具体领导有意见。反对某一个人，怎么能说就是反党？你反对毛主席，也只是反对毛主席个人嘛。”

与此同时，为着具体地总结经验教训，彭真组织了几个人，集中住在北京动物园内的畅观楼，查阅一九五九年以来中央下发的文件，看其中提过哪些“左”的口号，制定过哪些“左”的政策和规定。彭真说：要冷静地研究，“三面红旗是红旗？灰旗？白旗？”——此即文化大革命之初轰动北京的“畅观楼”事件。

掌管意识形态的陆定一。早在七千人大会的半年之前就说过：我们现在的政治空气怎么样？“谁要实事求是，就给谁扣帽子，什么‘三论’：条件论、悲观论、神秘论。什么‘五派’：伸手派，算帐派，观潮派，摇头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是主观精神，总要建立在客观的基础上吧！没有客观基础，就只剩下一个主观精神了……”

“一定要改正自己的错误，如果不改，连无产阶级专政也要翻掉。”

“九个指头一个指头，但一个指头可能是杜勒斯的癌症。”

“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这几年还不够，可是这几年左倾错误的经验够了。”

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属于中央的问题，我有责任。

这时，林彪上台讲话，他语音颤抖，感情激动，几乎声

泪俱下，说得痛心：

“回顾几年来的革命实践：凡是我們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我们就胜利，革命就发展，凡是我們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遭受挫折，事业就受到损失，我们应该记住这个根本教训。”

七千人大会，终究统一了认识。国民经济建设方针应该是：调整、充实、巩固、提高。“大跃进”不再提了；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明确“以队为基础”，过了的要退，而且要退够。

会后，毛泽东遍游名山大川，他自称“做了徐霞客”转眼三年，经济情况奇迹般基本好转。困难时期已经过去。

什么办法？

有限度的放宽，有限度的自由。

同时，也出现了“四不清”：经济不清，政治不清……

毛泽东指示，针对农村的“四不清”，要进行“四清”运动。在制定文件时，特别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讨论文件时，刘少奇发表了不同意见：“不要提‘派’。一提‘派’，就会从上下到下一大片。可以提‘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分子’，比较恰当，符合实际。”

毛泽东坚持说：“是‘派’”。

于是，下达了一个《十条》，又一个《二十三条》。中心主题，“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果然又扩大化。农村基层干部，前几年是“忙人”，是

“新人”，现在成了“罪人”！谁个干的多，谁的错误大。
“看的又是一次整干的”。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找到毛泽东，汇报了情况，建议采取措施，纠正偏差。

刘少奇说：“开个会，纠正‘左’的倾向，使运动正常发展”

毛泽东说：“不是‘左’，是形‘左’而实右。”

邓小平建议道：“这个会，只讨论具体政策，主席年纪大了，不一定非参加不可吧？”

毛泽东参加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提出：当前农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广大群众的矛盾，是主要的。是敌我矛盾。

刘少奇仍不同意，他认为：不能这样绝对，还是各种矛盾的交叉，敌我、党内外……主要的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

毛泽东再次强调：首先要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又说：“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毫不思索地顺口说出：“张霖之就是。”

本来已经异常紧张的气氛。突然凝固了。

再开会时，毛泽东带来一本《党章》、一本《宪法》。

在面前，然后发言：“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一个不让我来开会，一个不让我发言……”

空气不仅凝固，而且浓缩了，高强度地浓缩了。面临爆炸的严重危急！

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受多数同志之托，找刘少奇谈话，

局面已经非常严重了，千万不能跟毛主席发生矛盾，你们两位主席发生矛盾，下边就乱了。你要多考虑，对毛主席可不能不尊重。

接着，开了一次中央生活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检讨，并向个别同志征求了意见。从此，就不再不一致了。

当然，也就更不正常了。

毛泽东说了几次：干部要下去。

但是，因为没有人落实，干部也就没能下去。

刘少奇到南方视察工作途中，偶然想起了干部怎么没下来？于是，他发电报回北京，责成中央组织部具体安排，并声称：不下去的，不能作中央委员。

雷厉风行：国务院、中央各部长，全下。司、局长又有一千多人。

毛泽东笑笑：我说了多少次，也没有人下，还是少奇厉害，一句话，就都下去了。

是很久以后，毛泽东对这一个时期，又作了另一次自我批评：大权旁落，责任在我。

一九六二年，一九六四年，本来可以成为关系我党、我国、我人民之命运的转机，历史没有给我们那种恩赐。

（摘自《十年动乱》）

毛泽东同刘少奇的最后一次会见

一九六六年七月，文化大革命发起时，也还只是说刘少奇、邓小平在派工作组上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实话，那时谁也不明白“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怎么回事。

八月，毛泽东亲自出马，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没有点名，实指刘少奇，还有邓小平。其中，由五十多天，扯到了一九六二年、一九六四年。

到了一九六七年四月，康生在林彪的授意之下，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报告。这个报告，就扯得更远了：刘少奇的错误路线，不仅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仅是解放后建国时期，早在抗日战争之前，内战年代，就跟毛主席的路线相尖锐对立了。

但是，再严重，也还不过是路线斗争。路线斗争，属于党内，不是敌我。

呵，你看，一月十三日夜深时候，毛泽东还派了秘书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谈话。他亲切地接待他，一上来就关心地询问：“平平的腿好了吗？”刘少奇告诉毛泽东：“没有的事，是个骗局。”

是个骗局：一月六日，王光美在中南海家中，接到一个孩子的电话：“平平在学校作完检查，回来的路上，被汽车把腿轧断了，现在送到了北大附属医院，要马上截肢，请你赶快来医院！”

事关儿女，牵动心肠。也是在阶级斗争上，他们还处在被动与落后状态。王光美拿着电话，两眼直了；女儿，腿断了，截肢……面前是鲜血、伤残……，天灾人祸，怎么一起来了！

刘少奇说：“马上到医院去！”

王光美醒过来：“总理不让我们离开中南海呀！”

刘少奇一片儿女情长：“你不去我去，这么小的孩子，为了我挨斗……”

他们调车，赶到了医院。不见平平，却看见另外两个孩子被当作人质，扣在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手里。几个造反派一见刘少奇来到，也都麻了手脚。这时一个孩子跑到王光美身前：“妈妈，他们就是为了要抓你！”

王光美只身迎上去，向人们说：“不是王光美的都走。”回头，他向造反派们严肃、气愤地质问：“你们为什么用这种手段骗我？”造反派们不敢正视，望着天花板，回答：“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们搞的……”

你们，刘少奇、王光美，对阴谋诡计，也少提防呵。

现在，毛泽东关心到平平的腿，看来，他老人家还是听说了一些情况的。

刘少奇主动谈到自己犯了错误，之后，郑重向毛泽东提出自己反复考虑过的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回湖南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沉吟不语，只是一个劲儿地吸烟。

注意，刘少奇又犯了“错误”：一、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尽快解放出来；二、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这两点，和毛泽东当时的思想，正好又是反其道。

毛泽东听罢，笑了笑，过了好一会儿，他向刘少奇建议说：借这个机会，认真读几本书，德国动物学家海洛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狄德罗的《机器人》。”

刘少奇应诺。

临别时，毛泽东把刘少奇送到门口，又亲切地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刘少奇为之感动，回来叙述：“对于我的错误，毛主席一句批评的话都没说。像过去一样亲切。”全家人的心头，都燃起了希望之火，感受到一种万分难得的温暖。

有什么不祥之兆呢？是接去送回的那辆车？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专坐的“保险红旗”了，是“华沙”牌——卧车中顶一般的“平民百姓”。对于国家主席、革命元老，这是一种明显的预示，但是，刘少奇没有在意。他也不晓得，在毛泽东约他见面，一句批评话也没说的前三十五天，已经成立了专案组，对他开始进行审查。对他刘少奇是个秘密。

康生、江青知道，怎样才能置人于死地。刘少奇不是被捕过吗？打他个叛徒，没跑。王光美不是上了大学的吗？打她个特务，不会错。把王光美并入刘少奇专案，一起打，互为作用。

这个“打”字，学问深深，法力无边。

为着把刘少奇打——你看，开始了——成叛徒，康生派专人去找已经揪出来、并且押起来的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要他办假事，说的是真话：“如果你写个能证明刘少奇是叛徒的材料，马上就可以去钓鱼台和中央首长谈话，现在，车

子就等在门口。”

这位安子文问：“你说的那个中央首长是不是康生？”

“对。”

安子文从容答道：“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二十一年，也没有听别人讲过刘少奇是叛徒，从未见过哪一份材料说刘少奇是叛徒。”

这是在一九六七年四月间，此后，又两次来人，说服动员安子文，能出具一纸证明。

安子文最后告诉他们：“如果我了解，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早就讲了。以后你们不要再来问这事了。”

为着把王光美打成特务，一九六七年五月，关押了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崔月犁，一九四六年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曾在北京做地下党工作。他和别的同志通过周密的手续，介绍王光美担任了军调处执行部我方翻译。崔是关键人物之一，当然要严加审讯，首先得把他打成跟特务机关有联系。下面是审讯问答：

“你知不知道美国在北平的特务机关所在地？”

“不知道。”

“东四，六条。门牌多少号？”

“我也不知道。”

你数数字，从一数起。数！”

“一、二、三、四、五……三十八……”

审问者们，听到“三十八”这个数字一出口，就猛扑上去，一顿毒打，并不住嘴地骂他。

崔月犁蒙头转向：“我又有什么罪？”

审问者们更打得凶：“你还装糊涂，东四，六条，三十八号，你不知道，怎么说出了三十八？你早知道三十

八，为什么不说？！”

审问者又拿出一张照片，问：“认识吗？”

崔答：“不认识。”

“《百家姓》会背吗？”

崔月犁知道又有名堂，但不知道名堂何在，于是从头背起《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魏，蒋沈韩杨……”

审问者们刚听到崔月犁背出“杨”字，又齐扑上来，从皮肉也狠触了他的灵魂。

崔月犁更加糊涂了：“你们不能这样子乱打一气！”审问者把照片翻过来，背面写着该人的姓名，令崔月犁：“念！”

崔月犁念那三个字：“杨承祚。”

“你为什么说不认识？”

崔月犁苦不堪言，更加摸不着边际。但是，文书上已经写明：崔月犁是杨承祚介绍王光美作特务的证人。他自己又是介绍王光美打入我们内部的当事者。

杨承祚，解放前辅仁大学教授，王光美的老师，杨的岳父又和王光美的父亲有莫逆之交，杨承祚夫妇有亲属在美国，海外关系，那就是特务，国际间谍。一九六七年七月，为着把王光美，也为着把杨承祚夫妇打成特务，并指定要打成“美国特务”，将杨承祚逮捕投入监狱。这位教授，一九七〇年就从监狱走入天国，他不是共产党员，走的是另一路：没去找马克思，去见上帝了。

我不必再写为着什么，只记下事实，就会大白天下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江青亲自批准，派人去沈阳，查阅伪满时期的档案，一九二七年，刘少奇曾在那里被警察

局拘留。组织了四百人，查了十六个档案馆，历时两个月，翻了二百四十五万卷档案，但是，没有发现片纸只字能说明刘少奇叛变的材料。

找到了与刘少奇当年同时被拘留的孟用潜。如今，又把他与刘少奇一样：隔离审查。这个孟用潜起初没乱说，态度也老实，人吆，不能讲瞎话。

专案组递上去一份报告。江青看过，提笔一挥：“当心他骗我们的审讯人员。他是在演戏给我们看。”

康生则具体指点专案组：“要用小型批斗会的办法制服他，专案组全体人员参加，一个人提问题，别的人打态度，要摆好阵势，要有气氛，要形成压力，要拍桌子，再不老实就升他的级，逮捕、枪毙。”

如是，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斗了孟用潜一整天，中午也不休息。

孟用潜还是坚持住了，没有乱说是叛徒之类。

如是，又一连斗了七个夜晚，七个白天；斗的人轮流作战，叫做车轮战术，被斗的对象当然不得喘息。

孟用潜违心——那时，也难说这‘心’还有多少作用了——他承认了。瞎话不讲不行了，他也分不出白天还是黑夜。

但是，当他的心又正常搏动之后，就立即推翻了被逼出来的口供，并正式申述：“都是编造出来的，没有事实根据的。”先后写了二十份，但是，专案组回答他：

“你再对一九二九年的叛变问题翻案，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在这一片网里，不是进来容易出去难，而是进来就别想出去！

又一网，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拘禁了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肝癌晚期的张重一，只因为他曾代理辅仁大学秘书长，对于这样一位根本没有与王光美打过交道的垂危老人，江青指示：“在狱内一边治疗延长其生命，一边突击审讯。”二十七天，审了二十一次，最后一次审讯的两小时之后就……又一个……

张重一死后七天，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日，监护审查原中共中央监委专职委员王世英。这时的王世英，已经半身不遂，但他的骨头甚硬：

“你们要的东西，枪毙了我也写不出来！”“我没有什么可写的！”“你们把我拖死算了！”

硬抗了五个月，“因肺癌皮下及肺脏腹腔转移死亡”——报告上这么写。

江青又跳起来大嚷：“我很不满意！王世英说他半身不遂，还能全家去照相？摔了一跤也没死，你们右倾！”

她发狠地跺着脚，抖擻着全付精神，说：“要审讯，死就死，要狠狠地斗，集中火力，一个人不行，要一、二十人狠狠斗。有的要死，是他自己要死，阎王爷请他吃烧酒！”

呵，她也是个女人吗？她也是母亲吗？怎么会是这样一付心肠？这样一付嘴脸呢？她这般仇恨，真的是出于阶级吗？民族吗？主义吗？路线吗？她自己最说实话吗？

就在这个时期，还先后逮捕、拘留了刘少奇家的厨师郝苗，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重庆医学院讲师冯国钧，北大地球物理系主任苏士文……

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晚，康生给“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组长肖，打了一个电话：“立刻到钓鱼台来。”

肖，放下电话，上了汽车，疾驰进钓鱼台，到了十一号

楼前。一进门，被康的秘书挡住：“首长楼上有客人，请在这等一等。”

康生指点过他们，在搞专案对象时，怎样制造气氛。他们对审查对象，也曾如法制造过，一片紧张。眼下，康生把这一手直用于肖了。

等，这就是气氛。要你立即来，但不立即见。在等之中，等的人要东想西猜，心神不定，这时再一见，一问，就六神无主。

等了很长时间，康生在楼上问：“肖来了没有？”

“来了。”肖答应着跑上楼去。

没有客人，只有江青，她从沙发上站起来，语气比脸色还……阴冷：“你这个人很难请啊，我们等你很久了。”

肖忙解释说：“我早就来了，秘书叫我在……”

江青打断他，那威风和气氛就在打断对方时显示出来。她不容反驳地交待说：“今天晚上，你们就写一个逮捕王光美的报告，明天早晨，把这个报告交给我。”

康生从旁做点睛般的补充：“王光美的特务问题，可以定了。逮捕王光美的报告要很快地搞出来。”

没有，实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不敢不写。专案组连夜突击起草出一个文件，要害的话就一句：“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特务。”

第二天，把报告呈送江青，江青看后，拿过红色铅笔，在上面画了一个大×，并批回：“搞的不好，退王专案组。”

那种紧张气氛的浓度，急速加重，专案组知道江青发怒了，又不敢去问，经紧急研究，去请示康生。

康生看了文件，放在一边，说：“根本不能用。你们没有体会我和江青同志的意思，不能说明问题。”他显得很为难，很勉强的样子：“报告你们不要搞了，由我亲自写好了。”

康生亲自写了逮捕王光美的报告，要害就一条：“王光美不仅是美国特务，还是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

报告经江青签字，上报。

于是，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正式逮捕王光美。那一天，上午十点，看守人员通知几个小孩，收拾行李，各自回到学校去，接受批判。他们要求最后看一眼爸爸和妈妈，都被拒绝，他们想拖到中午，借吃饭的机会，看一眼爸爸，但是，不准，三个小行李卷被扔上卡车，凄惨惨，离开了中南海，离开了家。

对于这一天，他们有所准备，那是厨师郝苗被逮走的时候，刘少奇、王光美不能再幻想了，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刘少奇唯一不放心的家事，就是他们的幼女萧萧，才只六岁，一年来的狂风恶浪，使那天真无邪的心灵，饱受摧残，再有更大的苦难，她这个小生命，还能活得下去吗？

又一个愁闷的日子，王光美压抑不住心头的痛楚，对刘少奇说：“如果咱们被捕了，能不能跟他们提提，让我把萧萧带到监狱里去？”

刘少奇摇摇头：“怎么可能？”

王光美还是觉得很有希望，说：“不是有很多革命先烈把孩子带进国民党的监狱吗？”

“那是在监狱里边生的。”刘少奇说，托给阿姨吧，要记住孩子的特征，将来一定要把她找回来。”

九月十三日下午，阿姨和萧萧也被赶出了中南海。

晚上，王光美正式开始监牢生活，她怎样度过呀？那十二个周而复始的春、夏、秋、冬、……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一家，妻离子散……

（摘自《十年动乱》）

一个未解开的谜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杨成武同志从总参五所打电话给黄杰，说有要事找我谈，但他来我家不方便，要我和黄杰去五所谈，见面后他即向我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由向前同志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我有点吃惊，万万没想到这副担子要我来挑。沉默了一会儿，我说：“我多年有病，身体不好，对干部情况不了解，请转告毛主席，这个工作我干不了！”他说：“不行啊，这是江青提议，毛主席批准的。”听到是江青提议，我愈加莫名其妙。就说：“我的确干不了，你还是把我的意见报告主席吧！”杨成武同志大概很为难，说他马上要去开会，便夹起皮包，匆忙告辞了。回来我和黄杰同志反复琢磨，怎么也理不出个因由来。江青其人，我们对她不了解，平时毫无来往，只是在延安住柳树店和枣园时，见面打打招呼而已。她那时照顾毛主席的生活，毛主席找我谈工作，她极少在场。现在她忽然提议我当全军文革组长，不知出于什么用心。想来想去，觉得既然主席已经决定，恐怕推是推不掉的，只好硬着头皮干。后来，我见到毛主席，当面又表示过自己确实干不了，请主席另选贤能。毛主席说：天塌不下来，你就干吧！

一月十日，江青派人送来全军文革小组名单及改组军委文革的通知，征求我的意见。并说：中央文革对这个名单也很关心，也想看看，已送他们征求意见。我阅后提了三条：
(一)新的全军文革未组成前，是否请中央文革出面，先与

各派群众代表座谈，交代一下政策。（二）要讲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军队搞“文化大革命”，不要党的领导不行。尤其是海、空军，担负保卫海空防的任务，要随时准备战斗，指挥失灵了不好。现在有些机关干部，要求成立“战斗组织”，机关如果形成几派，就不好办了。（三）部队中哪些人是“牛鬼蛇神”，建议在适当范围内讲一讲。北京军区抓了廖汉生，又要抓杨勇、郑维山；空军也把王辉球、成钧、常乾坤抓走。这个问题应研究解决，否则大家没有底。我提出这三条的基本想法，就是部队的“文化大革命”要有党的领导，要保持军队的稳定，不能象地方上那样，无法无天，乱揪、乱斗、乱冲。十一日，又送来正式通知：全军文革小组名单已经“军委通过，中央批准”。十二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正式成立，成员共十八人。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肖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组员：王宏坤、余立金、刘华清、唐平铸、胡痴、叶群、王峰、张涛、和谷岩。下设秘书组、简报组、机关组、院校组和联络站，办公地点在三座门。

我刚刚上任，正赶上“一月风暴”，局面混乱不堪，简直没法收拾。以上海“造反派”领头掀起的“夺权”浪潮，波及全国各地、各行业、各部门，并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和支持。他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林彪则鼓吹对军队领导干部要普遍地“烧”，说：“真金不怕火炼，不是真金烧掉了更好。”军队院校的，“造反”组织，纷纷夺权，两派群众开始武斗；解放军报社“小将”掌权，总部机关的战斗组织出现；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省军

区相继受到猛烈冲击，领导同志被揪斗的事件越来越多；全军文革被“造反派”包围，有些文革小组成员被揪走挨斗，不知下落；上访的群众一批又一批，少则几人、几十人，多则数百人、上千人，有时一天达二百余批。各单位的告急电话不断，我家原有两部电话，又增加两部，还是不够用的。五个工作人员日夜轮流值班，忙得不可开交。我除了开会，还要接见“造反派”。不论白天、晚上，一纠缠就是好几个小时，害得我的头疼病经常发作。我那时常感疲劳，火气也大，说话难免“出格”。周总理对我说：“你和他们打交道，要掌握八个字，就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后来接见群众组织，我就采取这种对策。

（摘自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七·二〇”事件揭秘

这也是一个小的巧合，今天，七月二十日（一九八五年）我正要写文化大革命中的“七·二〇”，又一个震动过全国的事件。哦，已经过去十八年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他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运动。

为看眉目，毛泽东决定视察大江南北。他说：杨成武跟我去。

当天晚上就出发了。同行者，有余立金，据说，还有江腾蛟。到了武汉，江腾蛟要回南京了，向毛泽东告别，毛还风趣地说：江腾蛟，蛟龙要顺江而下了！

毛泽东听了武汉地区情况的汇报，他又指示：文化大革命要在六八年春天结束，或者稍迟一点，接着开九大，不能再搞了。

为安排毛泽东的行止，十四日，周恩来又飞临武汉。在这里，远离中央文革的地方，又有一种不同的气氛，周总理向毛泽东谈到了几位老师的处境。

毛泽东逐个地都做了评论：聂荣臻同志，那可是个厚道人。

周总理又提到：徐向前同志的家被抄了三次了，搞得他不能正常生活和工作了。

毛泽东说：徐老总过去的事情不能搞了。河西走廊失

败，他要饭回到延安。在过草地时，他反对红军打红军。

讲到陈毅。

毛泽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

陈老总就用这句话，向批斗他的小将们做过一次反击。

是外交学院的“革命师生”，正批斗外交部长陈毅。周总理、杨成武从武汉回来，赶到批斗现场。陈毅问杨：“有什么消息？”

杨成武回答：“有。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

陈毅叮问：“主席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表情？”

杨成武告诉他：“毛主席当时坐在沙发上，抽着烟，很高兴。”

陈老总有了精神，他突然向全场高声宣布：“请打开《毛主席语录》二百七十一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陈毅是个好同志。”

下面的造反者们立即炸锅了：“你造谣！”“根本没有这一条！”

陈老总开心地望着娃娃们吵闹。稍为平静下来，他说：“杨成武同志传达，有周总理证明，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陈毅是个好同志。请同志们跟我一起念这条最高指示！”

周总理当场证明了：“主席是这样说的。”

这就是陈毅。大难之中，以神圣为笑谈，实在是千古风流。

毛泽东是要结束这场文化大革命。他的心情有时十分烦乱：“谁封我四个官呀？伟大舵手，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他告诫

随行者：“你们不要宣传这个，要宣传马克思主义万岁，要宣传马列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

同全国的形势一样，武汉地区的两大派，迅猛形成，急剧发展，长矛对着大刀，机枪对着大炮。

四月五日，首都大专院校职代会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总部，发表《对武汉目前局势的严正声明》最后一条宣称：“谁为刘、邓翻案谁就是反革命，必须坚决镇压。”

五月十五日，周总理曾忧心忡忡地说：“今天全国有三个地方在打仗，武汉也打起来了！”

随着盛夏的来临，武汉地区的革命温度不断升高。最后，在汉口闹区六渡桥地段，双方都“森严壁垒”、“众志成城”。激烈地对攻，紧张地僵持。

武斗的辉煌战迹——死尸，倒在大街上，谁也不得收拾。武汉不是有名的“火炉”吗？尸体，那还不容易化吗？

武汉军区正式表明态度：支持“武汉大专院校红卫兵”、“三学兵”、“职工联合会”、“乌拉西”——后来号称的“百万雄师”。于是，形势急转直下。造反派：“新华工”、“新潮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钢二司”等等，退守在华中工业学院，在那里“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们日夜思念您。”——那时，只要谁一倒霉了，就日夜思念毛泽东。

询问、安排、检查了毛泽东住地的安全，领会所有细节之后，周恩来调查、了解了武汉三镇的文化大革命现状，按照中央文革的观点，没有费多少工夫，就对全局做了基本分析。

与周恩来到达的同一天，七月十四日，谢富治、王力同

办事组人员张，“北航红旗”红卫兵战士尹，也从重庆飞临武汉。

周总理根据形势，向他们做了四点指示，说明了哪些组织属造反派，哪些又属保守派，军区的观点跟中央文革是对立的，他们支左，有方向性错误，但是，周恩来强调说：你们不要公开表态。”因为中央一旦公开表明态度，局势会更加恶化，“要对双方做政治思想工作”。

但是，王力并没有把周恩来的指示放在眼里。第二天，他独自乘车，直驱华中工学院，一进大门，他就高声宣布：华中工学院现在是武汉的红色革命根据地！“新华工”是真正的造反派，我来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向你们表示慰问！

困守在这里的所有的造反派的勇士们，全都哭了，热泪在脸上横流，热血在胸中翻滚。他们把王力抬起来，在校内欢呼，游行。胜利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了！

王力进一步说明：“工人总部”必须翻案，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被捕的，一律释放。他正式表示：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如同报导的那样，全武汉的革命造反派，一遍又一遍地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谢富治、王力以自己的调查，向毛泽东直接报告了武汉地区两大派的营垒状态，以及谁是谁非。报告头头是道，有条有理。

毛泽东简而言之：“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不要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

“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不要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那是在没有“冲突”的时候，那是在没有“分”以

前。如今已经形成潮流，成了气候，它不大可能随心所欲了。它也要完成自己的历程。

轮到另一派“日夜思念毛泽东”了。他们思念了五天六夜，到了七月二十日凌晨，终究不能明白，于是开了三辆大卡车满载“百万雄师”的战士，直抵东湖宾馆二号楼——谢富治、王力的住地，要找他们问个究竟：“百万雄师”错在哪里？武汉军区不对在什么地方？

起初还只是少数代表进到楼里，以座谈的形式，向谢、王陈述下情。

不久，聚集在军区大院的军人和“百万雄师”的群众，闻讯，随向东湖宾馆拥来，那把守此要地的警卫部队，八三〇一，也正和他们是一派，敞开了大门，犹如长江分洪，汹涌澎湃，势不可当。

谢富治给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打电话：“这里要出大乱子，你赶快到东湖来！”

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飞车来到二号楼前，那阵势已是一触即发。

谢富治原是陈再道的部下，但现在是他的“太上皇”，一见面，便怒斥道：“这里什么局面？你下命令，所有人员，立即撤去！全部撤！马上！”

陈司令道：“事情是由你们中央文革引起的，这回可要靠你们做工作罗！我们是无能为力了。”

研究、商议、进？退？犹豫徘徊，直到早晨六时，几位半军半民的“百万雄师”的“铁杆”，不管三七二十一，冲进二楼走廊，直奔谢、王的住房，并高声喝问：“王力在哪里？出来见群众！”

眼看着逼到了眼前。谢、王从房间里走出来：

“我就是王力！”

“我是谢富治，你们要干什么？”

“跟你们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

“我们不去。”王力说，“有什么问题等下午接见你们代表的时候再谈。”

“群众在等你！”先冲进来的，后拥上来的，把谢富治、王力、陈再道、钟汉华紧紧围住，立地形成龙卷之势，几个旋转，一彪人等，都刮到了楼前的草坪上。

聚集在这里的人流，又形成一个大漩涡，不由分说，上去便揪，便抓，便打。而首先被打倒在地的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他躺在地上，呼喊，叫嚷：“我是陈再道，乱弹琴。”

不知为什么，一时竟平静下来。

谢富治不失时机地向在场的群众说：“我们是中央文革的代表，是代表中央来处理武汉问题的，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但是不能搞武斗！”

有人问：“武汉地区，谁是造反派？！”

“谁是保皇派？”

“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在哪里？”

谢富治、王力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后面有人喊：“别跟他罗嗦，拉到军区大院去。”说着，那些人就拥到前面来，把提出问题的一批挤到了一边。他们问：“王力在哪里？哪个是王力！”

推开了谢富治、中央文革办事员张、北航红旗的尹，七手八脚，把王力捉上了卡车，在一片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卡车往军区大院开去了。在车上，人们把王力戴在头上的帽徽揪下来，把领章扯掉。斗起来，无所顾忌。

到了军区大院，先是围攻，后是“喷气式”、接着就是游斗。

那口号也响亮：“中央文革滚出武汉！”绞死王力！”

就在王力坐“喷气式”的当口，他鼓舞过的“新华社”，派来一位“探马”，那人化妆成八三〇一部队的一般干部，乘混乱之机，挤到王力跟前，也似批斗的模样，低声告诉王力自己的身份，并请示说：“要不要我们调力量来冲进这个大院，把你抢救出去。”

王力紧张地嘱咐：“千万不要，你们不要插手，千万！”

事到临头，只能这样挨着，果真另一派再冲来，乱军之中，死于非命，那才叫惨。

险恶的情况，报到了北京。周恩来首先想到的是毛泽东主席正在武汉，他当机立断，连夜安排毛飞往上海。他自己又带了两架飞机，飞临武汉。行前，曾秘密通知军区，不得走漏消息，但是，飞机离武汉一百公里时，有二十五辆大汽车，满载“百万雄师”成员，开进了机场，不知道是来欢迎，还是要闹事，在空中，周恩来决定，一架空机，按原计划着陆，他自己的座机，改在附近的山坡机场降落。他在那里，布署着解救谢富治、王力出围。

周总理首先在电话上找到陈再道、钟汉华，分别向他们严厉命令：“你们要保证谢副总理，王力同志的绝对安全！出任何不测，都要对你们军法从事！这是我给你们下的命令，听清楚了没有？”

命令就是命令！陈再道、钟汉华，立即向司令部传达，当即组织了人员、车辆，迅雷不及掩耳，把王力拉到车上，就转移到了三十九师驻地。

就像那汽车卷起的烟尘一样，“百万雄师”的群众，尾追而来。

三十九师政委，见势头不对，他亲自率领两个半连队，马不停蹄，又把王力护送到部队驻地的山头上，但是，不到十分钟，“百万雄师”又包围上来了。

这位师政委，乘包围圈没有紧缩的时机，把王力转到了附近的珞珈山上——武汉大学。他在这极其危险的地带，为王力寻了片刻安全。

终究不是办法。这位师政委又找到一个分散执勤的小分队驻地，他把三十名干部、战士集合起来，作紧急战时动员：

“同志们，现在有一个光荣伟大的任务要交给你们，毛主席党中央派来的一位首长，他的安全正受到严重威胁！我们是毛主席的革命战士！我们能够不挺身而出吗？革命战士，头可断，血可流，决不能对不起伟大救星毛主席！”

战士们为得到这样的信任，深深感动了，他们都失声痛哭，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毛主席万岁！下命令吧！为保卫毛主席党中央派来的人，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那时，这些话都是成套的，一说就是一串，而且真情实意，并且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同时迸发出来。真神了。

王力被安排到这个小分队驻处，已是午夜时分，但是，危险并没有过去。

我们是有丰富的武装和武装斗争经验的，特别是武装斗争，它的哲学高度，在人们的意识中，还领先于任何别的领域。偏远的落后的农村小孩子，都知道“仗”该怎么打。

在王力惊魂未定，“百万雄师”还没觅见踪影的时候，又有空降部队的两个班，把王力转到洪山。也就是刚刚转出不大的工夫，那个小分队又被包围，并有人发觉晚了一步，

连声喊道：“王力跑了！王力跑了！”

来到洪山一个雷达站，王力换上了兰裤子，变成了下山买菜的给养员，几个人撇开大路，踏着荆棘，潜行到山下。他的脚被野花椒树刺伤，踝骨也碰肿了。这就是后来无比光荣的标记。天安门开大会时，不得不坐在大藤椅上。

那时，谁都演戏，谁都能演戏。

啊，“革命”、“造反”、“井冈山”、“红旗”、“毛泽东思想”、“兵团”、“作战部”、“伟大”、“宣言”、“声明”、“叛徒”、“兵变”、“阴谋”等等这些庄严的带血的字眼，统统都突然贬值了。连同人们的信念，眼泪，以及各自的尊严。

王力成了英雄，你看，又一个贬值。

毛泽东是想要结束文化大革命，但是，哪里可能？

江青、林彪，都还没有热闹够。

中央文革动员了二十万人到机场迎接王力和谢富治，还加上了没有跟毛主席去上海的余立金，为增加隆重气氛，周恩来先行从武汉返回，站在机场的欢迎行列里。

江青挽着王力和谢富治的手臂，绕场一周，她也沾光。

然后，就在天安门开大会。

七月二十七日，中央文革直接出面，批斗陈再道。他现在才知道事情被看得有多么严重。不住地说：“搞错了，完全搞错了。”

江青拍着桌子叫喊道：“你站起来！向毛主席革命路线交待你的罪行！”

陈再道只是说：“错了，搞错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错的。”

江青等人七嘴八舌：“这是暴乱！”“是反革命兵变！”

“这是武汉地区匈牙利事件！”

批斗的调子一个比一个高。渐渐地有人推，又渐渐地有人吐唾沫。

一贯冲在前面的吴法宪，动手打了陈再道的脸：“你反革命！反革命！你逼得毛主席半夜离开武汉，总理的飞机都不得落地！和我们不共戴天！深仇大恨！”

休息了。周总理慢慢地走到吴法宪身边去，伤心地对他说：“你怎么动起手来了？又不是小孩子！”

江青也来到吴法宪身边，心花怒放，说：“吴司令，不错，是造反派的风格。”她转脸见陈再道正在椅子上喘息，对工作人员们说：“你们斗他呀！轮流作战！你们看他，比我们健康多了，斗不死，斗他！”

刚才批斗时，站在外圈的秘书、警卫人员，现在一哄而上，表示他们的革命义愤。

这边，江青、康生、叶群，又向各军、兵种首脑们做进一步动员。

康生说：“气氛不足，关系到毛主席的安全，阶级感情不充分。要猛、狠！”

江青站着说：“要对王力同志表示慰问。这次斗争会可不同以往！要揪后台！”

叶群插话：“后台就是徐向前！”

康生猛然间被提醒，他一针见血地说：“这是‘二月逆流’的继续！陈再道‘八大’时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就对党怀恨在心！”

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出动了一千七百辆军用汽车，在北京来了一个大游行。

若干群众组织，就贴出大标语：“打倒徐向前。”

同时，又有若干组织，在京西宾馆周围，插红旗，搭帐篷，要揪出陈再道，要揪出徐向前。

从此开始，全国大揪军内一小撮带枪的刘、邓路线。

毛泽东的及早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打算，仍然没有变。他此刻的总方针是：不再扩大任何事态的规模，大化小，小化了。七月二十三日，他在武汉军区拟发公告的请示上批了几句话：“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谅解之后，包括陈再道同志在内，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

陈再道，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们，都在准备喘一口气。又一个但是，这口气也还没喘过来，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权威康生，指着陈再道的鼻子说：“你先不要自己解放自己。注意看这一句：‘并为广大革命群众谅解之后’，懂了吗？有的人直到死都没有得到群众的谅解，你现在就高兴起来了，不是早了点吗？”

这才是真正的“活学活用”。

如此，那必须要得到的“革命群众的谅解”，成了无边苦海，渡也乏舟。

江青以为她又抓住了一个时机：陈再道的批斗会，连开数天。她觉得太不过瘾，于是跟叶群商议，组织各总部、各军、兵种的群众组织，由她们两人带头，有关锋、戚本禹左右，围绕京西宾馆，来了一次大示威。高呼的口号是“徐向前不倒，挖山不止！”这一举动，不仅把批斗陈再道推向高潮，对“二月逆流”的反击，又掀起一层巨浪。

结束文化大革命？哪能！

“七·二〇”事件发生的期间，正处于另一个盛大节日——七月十六日，伟大领袖毛主席畅游长江一周年。当时，

他老人家顺江而下，上岸后说：“长江又宽又深，确实是游泳的好地方。”工作人员为他披好浴衣，他又说：“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为纪念毛主席同大自然搏斗的这一伟大实践（当时报导的语言），革命人民要举行纪念活动。这一天，武汉的革命造反派先来到了江岸，但是，还没下车，就被对立面赶跑了。七月二十日，又有一派试图纪念，仍没有办成。到了八月一日，大局已定，上十万的群众和部队，拥到江边当年毛主席下水的地方。正是汛期，长江也宽，正是革命高涨时节，人也多。人们争先恐后，眼前已经不是水，而简直就是革命；投身下去罢！我们要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

悲惨：又一个事件中的事件。当天，就在下游打捞上来二百具溺死的尸体。

叫我怎么说，该死的们。

是的，毛泽东真心地要结束文化大革命了。去年夏天，他的情绪是抛物线的前半段，有力度地向上。现在，是这条线的后半段了。

从武汉，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上海。在这里，杨成武向他报告：“八一建军节快到了。因为七·二〇事件的波及，有人要砸‘八一’军徽，说‘八一’不应该是建军节。”

毛泽东问：“谁说的？”

杨成武报告：“他们要把秋收起义那一天，作为建军节。”

毛泽东说：“‘八一’，是八日一日。秋收起义是九月九日。秋收起义是在南昌起义之后嘛。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把秋收起义那一天作为建军节的意见，是不对的。”老

人家情绪激动起来，他指示杨成武说：“你记，我讲。”

毛泽东口授道：“南昌武装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炮。”

杨成武看看记下的文字，说：“不提你，有人会发难，提意见。”

毛泽东思索了一下，说：“那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后面加上一句‘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

杨成武记下了。

毛泽东说：“这件事，一九三三年，中央苏维埃做过决议。他们不晓得历史。”

周恩来又经请示毛泽东，在“八一”建军节的招待会上，让四位老帅全部出席。这有很独特的作用。这几个人在场面上一坐，人心就稳定许多。而几位老帅的神态，倒使我想起文化大革命中常常引用的一句：“我自岿然不动。”

是要结束的样子，可以感觉到一些气氛了。

也是在上海，一天，毛泽东问杨成武：“许世友现在在哪里？”

杨成武回答：“在大别山里。”

毛泽东说：“把他接回来。”

杨说：“我去。”

毛泽东摆摆手：“派张春桥去，你晓得这是什么意思吧？张是反许的。”

派了一架伊尔——18飞到合肥，又派直升飞机把许世友接来，转到上海。

许世友一见到毛主席就跪下大哭。

毛泽东说：“起来，没事，回来好好干。”

许世友高兴了，他向在场的杨说：“成武，我要打个豹

子送给你。”他又对在场的张春桥、姚文元说：“我打个兔子送给你们俩。”

毛泽东说：“许世友是个标兵，打倒许世友，其它大军区，杨得志、韩先楚、陈锡联，都得倒。”

“七·二〇”的时势造出来的“英雄”王力，八月七日向外交学院的造反派讲话，为什么红卫兵就不能办外交？红卫兵的事情比国际上的关系复杂得多！夺外交部的权没什么了不起。夺陈毅的权，红卫兵照样可以干。

王力、关锋、戚本禹起草的社论发表了：揪军内走资派，揪带枪的刘、邓反动路线。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向全国各地派四十多个“联络站”、“记者站”，策划冲击各大军区。戚本禹又组织策动几万人围困中南海；同时，煽动一些人火烧了英国代办处。

这些活动的直接关系人是王、关、戚；而王、关、戚的后台是中央文革。

周恩来请杨成武向在上海的毛泽东报告，请示怎么办？

毛泽东考虑了两天，下了决心：“先抓王力、关锋，后抓戚本禹！”

哦，是要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约在九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准备过国庆节。他又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再讲决心：明年春天结束文化大革命，接着开九大。专案要赶快清理，除了有问题是，很多老同志都要参加九大，贺龙、乌兰夫……这些老同志都要当中央委员。

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但是，那是在毛泽东下定决心的八年之后，而且是随着他的去世才最终结束的。

我乘着岁月之舟，逆流而上，向历史询问：毛泽东终生

大权在握，为什么对于结束文化大革命一事，他这样一代伟人则显得软弱无力呢？

江青、林彪的干扰、破坏？

是他自己深陷在不可解决的矛盾之中——立足于现实生活，应该结束文化大革命，而他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战鼓，却不住地催征，因而是欲罢不能！？

之所以欲罢不能，还因为这场运动，是用“阶级斗争”“继续革命”的理论、学说发动起来的，这理论和学说又为当时的一代造反者们信奉、掌握，本身就具有了动力。那形势，如同上足了发条的动物玩具一样，它自己要跳，要跑，这时，你喊也没用。

毛泽东一再表示了他要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决心，但是，根本不灵。

（摘自《十年动乱》）

轰炸与陷害

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刚闭幕，我就因为肺炎发高烧和心脏病复发，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

我住院之后，陈毅同志也因病住进了医院。

有一天，陈毅同志来到我的房间，很愤慨地对我说：“聂老总，我看到那个简报，毛发悚然，心都冷了，真为你捏一把冷汗哟！”

我一时摸不着头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把大致的情形告诉了我。过了两天，我在医院也看到了家里送来的这份简报。

原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江青对我没有别的文章可做，就在会后别有用心地补发了一份会议简报，这份简报上登有江青的发言。她竟歪曲事实真相，诬陷我蓄意谋害毛泽东同志。江青发言的大意是：一九四八年，毛主席刚到阜平县城南庄，不几天就遭受敌机轰炸，炸死了许多人，毛主席险些遇害。事后查明，这是有人阴谋暗害毛主席，指挥敌机轰炸的特务电台就设在军区司令部，后来又把与此事有关的特务分子处决灭口。

我听陈毅同志说的时候，心里就很坦然，付之一笑。我对陈毅同志说：“你放心吧！这件事毛主席最清楚。那次敌机轰炸城南庄，包括当地人民群众在内，没有伤亡一个人。”

看了那份简报，我觉得江青这个人真阴险毒辣，当面不

说，背后却来这一手。好在毛泽东同志最清楚事情的经过，我也就没有理睬她。

敌机轰炸城南庄的准确时间，我已经记不清了。大约是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初。

多年来，我养成一种习惯，每天早晨，按时起床。起床后，第一件事是出去散步，第二件事是收听新闻广播，然后才去吃早饭。

那天早晨，收听完广播，我正在吃早饭，听到有机群的轰鸣声，这时我思想上特别警惕，因为毛泽东同志住在这里，必须对他的安全绝对负责。

我急忙走到院里，敌机的隆隆声，越来越大了。

我循着声音望去，有一架敌机已经飞来了，在城南庄上空盘旋侦察。接着，后面传来一阵轰鸣，声音很沉重，不多时又飞来了两架敌机，这时已经看清是B—25轰炸机。于是，我快步向毛泽东同志的房间走去。

由于毛泽东同志通宵都在工作，我走到他屋内的时候，见他身穿蓝条毛巾睡衣，正躺在床上休息。我以很轻而又急切的声音说：“主席，敌人飞机要来轰炸，请你快到防空洞去！”毛泽东同志坐起来，若无其事，非常镇静，很风趣地对我说：“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

不知什么时候，参谋长赵尔陆同志也来了，他站在我的身后。我看毛泽东同志不想进防空洞，心里急了，一连声地说：“主席，敌人的飞机来了，你必须立刻离开这里，我要对你的安全负责。”

可是，毛泽东同志坐在床上，还是不愿意走。

我想，不能再迟延了，就当机立断，让警卫人员去取担

架，取来担架以后，我向赵尔陆同志递了个眼色，便把毛泽东同志扶上了担架。我们两人抬起担架就走，在场的秘书和警卫人员，七手八脚地接过了担架，一溜小跑奔向房后的防空洞。

江青害怕，一听到飞机声，早就跑了，等我们抬着毛泽东同志走进防空洞时，她已经在防空洞里了。

我和毛泽东同志刚走进防空洞，敌人的飞机就投下了炸弹，只听轰轰几声巨响，我们驻地的小院附近，升起了一团团浓烟。

这次敌机轰炸城南庄，一共投了五枚炸弹。一枚落到驻地的东南，一枚落到房后山坡上没爆炸，一枚落到小院里爆炸了，其余的两枚炸弹落到了离驻地较远的地方。

敌机投完炸弹，就飞走了。我出来一看，敌机投下的是杀伤弹，我们小院里别的房子完好无损。但是，毛泽东同志住的那两间房子，门窗的玻璃震碎了；房里的两个暖水瓶，被飞进去的弹片炸碎了；还有买来的一些鸡蛋，也被弹片崩了个稀烂。看到这些，我心里未免后怕起来，如果不是刚才当机立断，事情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这件事情发生后，我反复地思考，毛泽东同志来到城南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虽然我们加强了保卫工作，也有可能传出了消息。但是，我们对毛泽东同志住的地方，进行了严格的控制，除经过审查的服务人员外，一般人不会知道准确位置。而从敌机轰炸的情况来看，敌人不但知道毛泽东同志来了，还知道毛泽东同志住的地方，所以，我怀疑内部有奸细。

为了保证毛泽东同志的安全，应该让他离开城南庄，到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才好。什么地方安全呢？我想起了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军区曾经住过的小村子花山。花山在城南庄以北不远，很隐蔽，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很适宜的。

第二天，我吃完早饭，就把这个想法报告了毛泽东同志，他表示同意。这样，毛泽东同志搬到花山去住了几天，就转到了西柏坡。

敌机轰炸城南庄这件事，保卫部门查了许久，一直没有解开这个谜，有几个被怀疑的对象，也缺乏应有的真凭实据。只好把这件事搁了下来。直到解放了大同、保定，通过查阅敌伪档案，才把这个案子搞清楚。

原来，当时军区司令部管理处，在王快镇开设了一个烟厂，这个厂的经理孟宪德，不知是在什么时候，被国民党特务收买了，暗中加入了特务组织。以后，他把军区司令部小伙房的司务长刘从文也拉了进去。这两个家伙被任命为上尉谍报员，他们除了向敌人提供情报外，在毛泽东同志来以前孟宪德还曾经把几包毒药亲手交给了刘从文，命令他寻找适当时机，把毒药放在我和别的领导同志的饭菜里，企图毒害我们。但他由于害怕被发现，没敢下手，这个阴谋没有得逞。毛泽东同志来到城南庄之后，我指派专人给毛泽东同志单独做饭，采取了比较严密的防范措施，其他人员无法接触，这就保证了毛泽东同志的安全。

这个案子查清楚了。敌机轰炸城南庄，是孟宪德、刘从文给敌人送的情报。经查对，犯罪证据确凿，罪犯供认不讳，由当时的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同志主持，经过正式审判，依法判处了死刑。案件报到我这里，我看一切都符合法律手续，就批准枪毙了这两个特务。

这就是敌机轰炸城南庄事件的始末。真没想到多年前的这件旧事，倒成了江青陷害我的材料，然而也不过是枉费心机而已。

（摘自《聂荣臻回忆录》）

毛泽东保老师

毛泽东同志对“二月逆流”的态度，与林彪、江青是有区别的。

自从掀起反击“二月逆流”的邪风以来，他虽然没有反对“炮轰”，但也没有赞成打倒。一九六七年“八一”招待会，他同意总理的意见，让我们这些老同志出席。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晚，他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几位老师谈到军委八条命令时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个八条是不行的。但是，八条下达后，下面抓人确实多了点，比如四川、武汉。”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的讲话里，他没有涉及“二月逆流”问题。闭幕式的讲话中，他一方面说，“二月逆流”他过去不大了解，现在才比较了解，实际上认可了会议的所谓“揭发批判。”但另一方面又说：这些同志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或军委副主席，有意见公开讲出来是党的生活所允许的，不是秘密活动，应该参加“九大”。这样，就使林彪、江青一伙疯狂陷害“二月逆流”的同志，企图进而剥夺我们出席“九大”的权利的阴谋，宣告破产。

然而，林彪、江青一伙决不死心。全会结束后，张春桥在《关于传达十二中全会的几个问题的报告》里，提出传达时应点“二月逆流”几个人的名。后来的会议简报里，还点了黄杰、张瑞华（聂帅夫人）二同志的名，诬陷她俩是“叛徒”，要组织专案审查。黄永胜在总参亲自布置，让下面批判我们几个人，包括黄杰和张瑞华在内。我的办公室党支部正

式写了报告，请示如何批判徐向前和黄杰。周总理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将报告转呈毛主席。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毛主席亲笔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林彪无可奈何，只得批示：“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障碍。”所谓“不要制造新的障碍”，显然是对我进行露骨威胁，与毛主席的批示精神根本不符。林彪一伙在“九大”前夕起草政治报告时，仍坚持塞进批判“二月逆流”的内容。毛主席说：“我对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来”，“报告上不要讲二月逆流了。”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他们根本不听，千方百计封锁和抵制毛主席的指示，因而在“九大”又掀起围攻“二月逆流”的新高潮。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党的“九大”开幕。首先引人注目的，就是大会主席团的座位排列。主席台上，右边全是“二月逆流”的成员，左边全是中央文革和中央碰头会议的成员。这种泾渭分明的精心安排，显然是为了说明我们是右派，他们是左派。会议的议程有三项：（一）林彪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二）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三）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林彪的政治报告，说“二月逆流”是“党内最大的一次反党活动”，“为刘邓翻案”，“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党夺权阴谋”等，真是杀气腾腾，誓不两立。在分组讨论政治报告时，即转为批判“二月逆流”。上海组的代表是带着预先准备好的材料来的，围攻陈毅同志。朱德同志那个组，逼他作检讨。我在军队组，又遭受批判。

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气氛下，我们这些人，能不能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已成问题。毛泽东同志觉察到这一点，出面做工作。他在十一日的大组召集人会议上，回顾了党的历史上

的经验教训，强调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不要打击面过宽，搞扩大化。还讲了“右派”也能进中央委员会，主张这些老同志应继续当选。但在选举时，林彪、江青一伙又玩了鬼把戏。他们采取各组分配票数，指定人投票的办法，对付“二月逆流”的人，票数控制在不超过半数太多的范围，既让你当选，又让你难看。这种肆意践踏党内民主，侵犯党代表民主权利，操纵党代表大会的恶劣手段，充分说明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的野心家、阴谋家。选举中共一千五百名代表投票，我得票最少，仅八百零八票，其他老同志多些，但也多不了多少。事后，我说笑话：这次会议我得了“五个鸡蛋（808票）”。

（摘自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她与毛泽东没有共同语言

每年的冬天，有一些干部到广州来休息。这一年，周丽和朱嘉仁也来到广州。由于江青经过子宫放射治疗，周丽作为医生，准备看看江青。

经过保卫科联系，周丽获准去看她。

“听说你和朱嘉仁到广州了，住多久？”江青的声音小，周丽尖着耳朵才听清楚。

“住一个多月。”

“我在苏联经过放射治疗，全身衰弱，现在白血球只有三千多！还加上右肋间神经不停的痛。”

周丽同情地点头。

“我在北京的生活，度日如年，我和毛主席年纪相差太远，如不是政治上的因素，是无法生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之间只是政治夫妻而已。”“这几天李纳和小豆子运新会来过寒假。”

“政治夫妻！”这个名词十分响亮，特别是挂在毛主席的名义下。周丽分析起来，全身起着鸡皮疙瘩。她心里反驳着：连生活上的夫妻也是形式上的。名为“毛主席爱人”，无“毛主席爱人”之实，事实证明她不能与毛主席同甘共苦，同关心国家大事，为人民鞠躬尽瘁。个人独享富贵荣华，养尊处优，生活奢侈。毛主席长期对她的谆谆教导和告诫，她只作耳边风。当面承认缺点和错误，背后任意横行，利用毛主席的威望抬高自己，滥用特权。

“夫妻之情建筑在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上、建筑在伟大的无产阶级的事业上，那当然是很合理的，“政治夫妻”的名称，使人会感到……”周丽直言不讳。

“我就是指的这一点而言嘛！不然，连这‘政治夫妻’四字也消失了！”江青有些愤怒了。

周丽也紧张起来。

江青停了会儿，又告诉：“远新这孩子，他大了，到不好意思叫我妈了。我很喜欢他。由于我在国外治病，很少见面……”江青又把病情重说一遍，问了周丽许多治疗的问题，然后她看了一下手表。

“你疲倦了吧？我告辞了！”周丽马上站起来，走过去穿大衣。

“护士！给我量体温。”

小圆来了。当周丽走出来时，江青靠在沙发上，口中含着温度表。护士弯身俯首摸脉搏。她今天试体温表不放在腋下。

“刚才我说话多了，好似头部又发热了。”

小圆已取出体温表察看。

“三十七度二。”

“你为什么不出来阻止我？为什么不叫周丽早退下？我发低烧了！”她示意进内屋躺下。小圆扶她进去。一天三变，比气候变化还快，昨天在院子里玩猴儿时，还拍掌哈哈大笑，一身的劲。前天星期六，舞会上，只怪舞伴不好，音乐简单，灯光黯淡。这会儿又换了一个真假不分的面具。

周丽这次来看江青，又听她说了对“政治夫妻”的怪话，加深了对她的认识。正如朱嘉仁悄悄地对周丽说的，江青没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所以在生活上不愿和毛主席住在一

起。她不是毛主席的战友，不是毛主席的学生，更不配当毛主席的夫人，她与毛主席之间，有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没有共同语言。

江青六月回北京，计划七月到北戴河……。

几个人坐在秘书房里，神色紧张。刚才护士进毛主席办公室拿东西，只见江青在生气，毛主席在批评她。她吓了一跳，没有拿到东西就往外跑，一直跑到秘书房里。大家关心毛主席，心情紧张、沉重，迟迟不见江青出来。秘书有意拿着文件送进房。毛主席满脸通红，接过秘书送来的文件。秘书站着不走，说道：

“请主席批示。”

“好。”毛主席温和地回答，聚精会神地阅读文件。

江青一气冲出来，回到自己房中，躺在床上看天花板。

她发誓长时间内不见毛主席的面，也不讲话，不和毛主席一桌子吃饭。

居然，她实现了她的誓言。

毛主席到南方巡视，她在北方休养；毛主席回到北方，她又去南方。毛主席出门是从地上走，一路上坐的是火车。她出门是从天上飞，坐的是专机。

一九五九年的夏季，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在庐山开会。这时，江青按原计划在北京住了一个月之后，来北戴河歇暑。她玩厌了水，突然想去庐山游玩。她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给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叫准备居处，派飞机来接她。她已有了一架专供她使用的最新式的飞机，一个电话马上就行动。

会议结束了。毛主席要由庐山去长沙巡视。江青则要回北京，一南一北，不足为奇，江青却在这时候冒出了新问

题。那就是随行保健大夫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她放肆地对毛主席身边的保健大夫说：“毛主席身体素质很好，不像我，你跟我回北京，路上照顾我的健康，他身边不需要你。”

保健大夫回答道：“这，我要请示毛主席。”

江青脸色沉了下来，知道毛主席不会同意。“那我怎么办？我以前的大夫走了，新派来的保健医生在哪里？”

保健大夫去请示毛主席了。

“主席，江青同志叫我明天跟她回北京，请你指示。”

毛主席坐在藤椅上，一只手拿文件，另一只手将香烟送到嘴边，瞧着保健大夫问：“你的意见呢？”

“我的意见是跟随你。”保健大夫笑笑回答。

毛主席微笑着说：“那好。”

田大夫把毛主席的指示告诉了江青。江青气得火冒三丈急道：“那你即刻催问保健局人事科，即日派出新大夫来！”

保健大夫这才放了心，跟随毛主席到长沙。

保健局被江青三催四促，天天几个电话，要派新大夫来。十几年来，换旧的派新的，几乎没有停止过。身体不好的不行，政治条件不理想的不合格，脾气不柔顺的无条件，动作迟钝的不称职，业务不熟悉的无资格……甚至长相好不好，身型美不美都列入选择条件。现在，人事科找到了一位性格直爽的年轻大夫姓汪，和他谈后，他很为难，不想做这个工作，向组织表示了自己的意见。汪大夫是革命家庭出身，自幼生长在延安。父亲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即献身于革命事业，是一位忠于党忠于毛泽东的革命干部。但江青立即同意，组织决定他立刻赴任。

（选自《女皇梦》、东方出版社版）

一条迟迟披露的内幕新闻

1966年夏，毛泽东来到广州，住在一个小岛上。

天气燥热，毛泽东的不宁静是显而易见的。他思想特别活跃，常常突然冒出一些使人吃惊的念头。他叫来卫士长李银桥，吩咐：我们走吧，到长江边上去，我们去游长江。

当时，罗瑞卿、汪东兴、王任重以及保健医生都坚决反对，用毛泽东的话讲，阻力很大。

罗瑞卿匆匆来劝毛泽东。毛泽东不听，坚持要游。罗瑞卿不答应，说这不是毛泽东个人的事。毛泽东大声说：无非你们就是怕我死在那个地方么！你怎么知道我会淹死？罗瑞卿吓了一跳，显得很不安。他怎么敢想毛泽东被淹死？他热忱地解释，主席，不是那个意思。保护你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我的任务，我是不同意你冒风险。哪怕是一点风险也不许有。毛泽东冷笑：哪里是一点风险也没有？坐在家里，房子还可能塌呢！

继罗瑞卿之后，其他一些负责同志又轮番地劝。

相持不下，毛泽东便采取策略，命令一中队韩队长去实地考察，长江到底能不能游？

韩队长也是反对毛泽东游长江的。他去长江调查一些人，这些人都说不能游漩涡太大太多。他有了证明，便匆匆赶回来汇报，将沿江群众的话学舌一遍。

毛泽东早已沉下脸，皱起眉头问：“你下水了没有？”

韩队长一怔，脸刷地红了。喃喃地说：“我没有下

水。”

毛泽东怒气冲冲地说：“没下水你怎么知道不能游？你别说了！”

毛泽东转身吩咐：“把孙勇叫来。”

孙勇是负责警卫工作的副卫士长。毛泽东指着孙勇说：“你再去，你亲自去看看长江到底能不能游？”

孙勇是带着毛泽东的意图去调查，自然一去便下水。游一趟回来，向毛泽东报告：“完全没有问题，可以游。”

“这就对了么，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毛泽东故意说给那些“阻力”听：“谁说长江不能游？孙勇不是游了吗？”

毛泽东有了实证，形势明显变得无法阻挡。王任重匆匆赶回武汉，亲自组织游泳选手护泳，并且探水情，选地点。

出发前，毛泽东说：“这个老韩哪，不讲真话。他没有下水去体验他就说不能游。我们去游不叫他去，叫他离开这里。”

于是，韩队长便离开了一中队，不让他见毛泽东了。事过一段时间，毛泽东消了气，说：“老韩是个好人，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唉，就这件事办得不对……”他似乎有些后悔赶走韩队长。但是，韩队长已经调离。

毛泽东乘飞机从广州到长沙，游过湘江，算是准备活动吧，又乘飞机飞到武汉。“阻力”排除，毛泽东兴致勃勃，跃跃欲试。他谈笑风生登上一艘客轮。

“走开，都走开，不许那些船靠近！”毛泽东指着围绕过来的小木船下令。这些小木船是负责救护工作的人乘坐的。小船划走了，只留保健医生的一条船，不远不近悄悄尾随。

孙勇已经下水，一边蹬腿踩水，一边伸出双臂，扶毛泽东下到江水中。地点就在准备建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墩处。

（摘自《炎黄子孙》第3期）

毛泽东一半是虎，一半是猴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回忆

在周恩来陪同我（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走进陈设着大批书籍的毛泽东的书房时，我想起了动身来北京之前几天在白宫一次晚餐上，法国作家莫尔劳克斯曾对我说：“您将与一位巨人打交道，但他是一位面对死神的巨人。”毛泽东和我见面之后，我和他没有进行谈判，他是在试探我的想法，我也在试探他的想法。他想知道我的全球观点是否和他的观点一致。他很想辨明美国的富裕是否已使美国人变得软弱无力，以及我们越南遇到的麻烦是否已使我们元气大伤。

他的身体显得十分虚弱。在我进屋时，他的秘书扶他站立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的话不能说得很清楚。后来周恩来告诉我，这是由于他患支气管炎之故。但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病的后遗症。原先中国方面安排我和毛泽东的会见仅约十五分钟。后来由于毛泽东被我们讨论的话题吸引住了，一直谈了一个小时。我注意到，由于毛泽东开始感到疲倦，周恩来越来越频繁地看表。

这两个人之间的不同之处也是很明显的。周恩来的外貌、言行和举止，表现出他是一位具有高尚文化素养的，雍容大度的外交家。毛泽东则是一位健壮的、朴实的人，具有一种天生的吸引力。他是中国的主席，即使到了晚年，仍然被公认为领袖。周恩来则是最高的行政官员。

毛泽东谈吐随便，言简意赅，常常省去不必要的字眼。这给我以他想在顷刻之间把许多思路揉在一起的印象。他以

安详而又平和的语调阐述自己的观点。这在小型的会议上会给我以深刻的印象。……

即使在谈论严肃的问题时，毛泽东也喜欢发出令人骇异的话语。他开怀大笑说，“在您上次的竞选中，我投了您一票。”我说，那您一定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吧。他高兴地回答说，“我喜欢右派。人们说你们是右派——共和党站在右的一边，还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我随便说出了戴高乐的名字。毛泽东表示异议，说，“戴高乐是另外一回事。”他接着又说，“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右的。比较起来，我喜欢这些右的人掌权。”在谈到我们的外交关系正常化时，我把话题扭了回来，说：“我认为，在今天的美国，值得指出的最重要之点是，右派做到了左派只能说说而已的事情。至少目前是如此。”

毛泽东常用自谦之词来委婉地说明他的观点。我和毛泽东开始会谈之前，当摄影师在拍照时，我们进行着轻松的交谈。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当教授时，曾经指定他的学生阅读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回答说，“我的这些著作算不了什么。我写的东西并没有什么教益。”我说：您的著作已经推动了国家，也改变了世界。毛泽东回答道：“我一直没有能力去改变世界。我顶多只能改变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而已。”

1976年我再度到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了。他的话语听起来就象是一些单音字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的话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地抓起笔记本，写出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息了。

在那些年月里，美国正遭受越南战争综合症之苦，并力图摆脱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所应承担的责任。毛泽东向我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和平是美国的唯一目的吗？”我回答说，我们的目的是和平，但是和平不只意味着停止战争。我对毛泽东说：“它必须是公正的和平。”

由于怕金森氏病的侵袭，毛泽东的行动当时已很困难。他不再是体魄健壮的人了。这位八十二岁的、步履蹒跚的农民，现在变成了一个拖着步子的老人。毛泽东象晚年的邱吉尔那样，仍旧非常自尊。我们谈话结束时，他的秘书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让他和我一起朝天门走去。但是，当电视镜头和聚光灯对着我们，要录下我和他最后握手的镜头时，毛泽东推开他的助手，独自站在门口和我们告别。

罗斯·特里尔在他写的毛泽东评传中说：“从外表看，毛泽东的不宁静是显而易见的。他的举止的平衡如果确实存在的话，也是对立的性格特征互相冲突的结果。”毛泽东在讲到自己的性格时说过，他一半是虎，一半是猴。无情的一面和狂热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在他身上交替出现。他没有象周恩来那样把自己的各种性格特征融为一体，而是任其发展，把毛泽东本人推向各个不同的方向。

作为国家政策的决策人，毛泽东是容易冲动的。他每天起床很晚，睡得很迟。毛泽东象斯大林一样，常常为了一些琐事，在天不亮的时候就把他的下属找去。他经常从日常工作中摆脱出来，独自作长时间的内心自省。有时，他会花几个钟头去征询政策问题专家的意见，然后又信步踱进花园，就同一问题向卫兵求教。

法国作家莫尔劳克斯对我说，毛泽东有一种“信教者”的性格，他富于幻想，并为此而着迷。毛泽东把中国社会看

成一个大家庭。当有人告诉他，他的儿子已经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时候，他平静地回答说：“没有牺牲就不会有胜利。我的儿子牺牲了，同别人的儿子牺牲是完全一样的。”如果毛泽东的身上有猴气的话，就意味着他为这种幻想所支配。他身上的虎气则表现在他竭力去实现这种幻想，从而震撼了中国。毛泽东希望人民点燃起自己的革命热情。但是，只有这种热情符合于毛泽东的想法时，他才能够容忍。当他们偏离他的轨道时，他就会用合法的约束和严酷的国家警察机器来达到他的目的。直到最后，毛泽东似乎还没有领悟到这样的高压统治会产生官僚政治、窒息人民的创造性和挫伤他们自觉性。

作为中国的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毛泽东以其高超的战略洞察力，灵活的战术和令人望而生畏的暴力手段，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他把农民阶级当作一个革命的阶级，以取代产业工人，从而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他采用把士兵组成军队的办法，而不是组织秘密集团进行武装暴动的办法来进行革命，从而修正了列宁主义。

单凭他的洞察力和冷酷无情，毛泽东是不可能在中国取得成功的。他同时还具有能够吸引狂热追随者的领袖人物的超人魅力，以及藐视巨大困难的意志力。毛泽东的领导才能来自于他的坚强意志。我见到他时，感到他们的意志力或多或少是天生就有的。他大部分生动的诗歌是在长征途中或长征以后写成的。他在描写使人振奋的斗争场面，特别是描写残酷的斗争场面时，运用了鼓舞意志的手法，使人读起来感到增添了力量。由于具有这些品质，他才有可能激励他的同志们去完成象长征这样的史诗般的业绩，使他的同志们成为一支几乎是不可战胜的队伍。

（摘自尼克松《领袖们》、世界知识出版社版）

尼克松谈毛泽东和蒋介石

1972年，毛泽东与我的晤谈中用他的大手在我的面前一划，以一种概括我们的晤谈甚至是概括中国全貌的姿态，对我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大元帅不赞成这次会谈。”稍顷，他接着说，“我们与他之间的友谊的历史，比你们之间的友谊的历史还要长得多。”1953年，我第一次见到蒋介石。这位大元帅在谈到中国时，也做了一个类似的手势，清楚地表明，他的谈话不但适用于中国大陆，也适用于他的堡垒——台湾。

我觉察到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个人在谈到他们的国家时，所用的手势和语言，似乎都表明他们国家的命运是和自己浑为一体的。这两位领导人在历史上同时出现了。他们之间没有妥协，只有冲突。一位成为胜利者，一位成为失败者。

说来也奇怪，毛泽东和蒋介石在许多方面都很相象。他们都是东方人；毛泽东一生只有两次离开中国，1949年和1957年，他先后两次去莫斯科会见苏联领导人。蒋介石也只有两次出访，离开亚洲：一次是1923年受命去莫斯科，一次是1943年去开罗出席四强会议。他们两人经常长期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毛泽东利用这一时间写诗；蒋介石则经常一边在山间散步，一边背诵古诗。

他们两人之间，既有表面上的差别，也有实质上的差别。毛泽东懒散地躺在椅上的样子，就象是不留心丢在那里的一口袋土豆；蒋介石笔直地坐着的姿态，则好象他的脊梁骨是

钢制的一样。毛泽东很随和，无拘无束，说话很有幽默感，使谈话气氛很轻松；我与蒋介石会见时，却从未发现他有任何幽默的话语。毛泽东的书法是信笔成书、不拘俗套的；蒋介石的书法则笔直字方，一望成行。

他们二人的差异，更深刻地反映在他们爱国的方式方面。他们都爱国，毛泽东力求把过去的一切推倒重来；蒋介石则力求在旧的基础上建设新的国家。胜利之后，毛泽东简化了汉字。这不仅是为了便于书写，而且是为了铲除造形复杂的汉字所写成的历史。蒋介石在溃败之时，还在接送难民的分舰队中腾出地方，抢运了近400,000件中国古代艺术品（去台湾），而把他的许多忠实助手和士兵留在大陆。

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他提到蒋介石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这把共产党领导人称为“匪徒”。我问毛泽东：“你们怎样称呼蒋介石？”他笑了笑，周恩来接过话头回答：“一般说来，我们叫他们为‘蒋帮’。在报纸上，有时我们也称蒋介石为匪？”；他们用“匪”的称号来回敬我们。当然罗，这不过是彼此相骂罢了。”

（摘自尼克松《领袖们》）

毛泽东的一桩憾事

毛泽东著作了《矛盾论》，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敢用《矛盾论》来研究毛泽东。是历史的影象还没有显现出来？还是在等待外来的和尚？或者我们的子孙？不管是谁，我只提醒他一点，别忘了《矛盾论》，毛泽东本身也充满着矛盾。他终究不过是一位具体的生活在矛盾世界中的人。

但是，这个人，毕竟是毛泽东。

大局在胸，抓住几个关键环节，采取了几个战略性措施，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在八亿人口的大国之内，发动起来了。

为了进一步加温，十月九日，在北京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

十月十六日，陈伯达在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那个讲话，当时把多少人带到历史的高度，俯瞰眼下的这场狂风暴雨，感到壮丽，觉得伟大！原话是：

……“红卫兵运动的战果辉煌。可以无愧地说，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国历来几次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都来得更深刻，更汹涌澎湃。这是国际上更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今天，我们终究比那时候长大了，当年使我们为之热血沸腾的宏论，现在……就是我所写到这里到现在，只想淡淡地苦笑一下而已。是的，知到得多一点了，不声易相信，不瞎

激动了。

但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是：世界上总有一部分人年轻。

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他一向具有以自己的情绪感染别人，又影响周围气氛的能力。当然，这里写下的只能是对话的大意。

毛泽东问周恩来：“这个会已经开了半个月了吧？”

周恩来回答说：“差不多了，明天再开半天，具体问题回去按大原则解决。”

毛泽东问西北局的同志：“你回去打算怎么办？”

那位领导同志说：“回去看看再说。”

毛泽东问西南局的同志说：“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搞。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Q正传》。”

毛泽东转问康生：“聂元梓怎么样”？

康生说：“还是要保。”

毛泽东提出关于这场运动的时间，大家议论一下，有个大的安排。

对这个问题，没人吭声，沉默了片刻之后，周恩来说了自己的想法：“机关到春节（一九六七年的二月），大、中学校到明年暑假（一九六七年七、八月）。”

毛泽东没有表示自己的意见，他又问当时的副总理李先念：“你们的会，今天开得怎么样？”

李先念副总理回答说：“财经学院说他们要开声讨会，我要检讨，他们不让我说话。”

毛泽东说：“你明天还去检讨，不然人家说你溜了。”

“我明天要出国。”

“你也告诉他们一下。”毛泽东向李先念扫了一眼：“我看你有点精神不足。”接着，他又讲：“要准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合稀泥，我就是合稀泥的人。我没料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来了这么大的事。”

他好象疲倦了。精神显得松弛，语气缓和。与两个多月之前《炮打司令部》时的状态很不一样。

十月二十五日，林彪讲话，他指名道姓地说：“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路线的尖锐对立。”

“什么路线错误，改了就算了。”毛泽东最后讲话时明白地说，“我的责任是分一线二线，为什么分一线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我想在我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大权旁落，我是故意地大权旁落，万没有想到走向反面。去年九、十月份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我就感到我的意见在北京不能实行。”

康生插话说：“八大政治报告里就有阶级斗争熄灭论。”

毛泽东紧接着纠正道：“报告我们看了，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个负责。”他又强调：“刘少奇不能一笔抹杀。”

在十分严肃的政治领域，也偶而出现非常普通、形象的语言。这个“合稀泥”，是平衡？是调和？是缓解？但终究这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尹文子·大道上》有载：

“道不足以治则用权，法不足以治则有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

合稀泥可以使一切不了而了之，也可以是一片糊涂，在

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常说：“要吃透上级（或文件）的精神。可见，精神非常丰富，往往是各吃各的，因此就各有体味不同。文化大革命中又兴起了一个口号：“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前进！”什么部署，有的时候明白，有的时候不甚了了，甚至，有的看别人贴这条大标语，自己也赶去贴，以表示“我也吃透了那精神。”

十月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个明显的精神，毛泽东主席对刘少奇、邓小平采取的是谅解的态度，“要允许刘、邓革命”，“犯了路线错误，改了就好。”不说“句句是真理”吗？这几句话意思明白，用不着作高深理论的阐述。很多人因为这个精神松了一口气。但是，会议之后的实践证明，那种轻松感，完全是对精神没有吃透没有吃准。这就是人们又经常说的：理论要与具体情况相结合。有时，照办，不照办，反正都不对；也有时，又都对。事全在人为，难办就难办在这个地方。

会议刚刚开过，江青就召见了北大的聂元梓，对她说：“给你个光荣的任务，到上海去。你只要把上海搞乱，就立了大功。”……

一个阴冷的清晨，陶铸晋见毛泽东。直言不讳，慷慨陈词，他认为，从经济建设，到党的作用，从干部的思想到社会风气，都处于严重危急状态。

沉默了片刻，毛泽东离题千里之外地问陶铸：“你今年虚岁是五十八，实岁应该是五十七？”

陶铸的心情顿时轻松了一下：“对的，主席记得这样清楚。”毛泽东说：“选你来中央工作，这也是一条。”

陶铸道：“从心里讲，我真愿意在外地工作，水平低。”

毛泽东：“京官难做，婆婆多。听说你以前讲过：在广州是个西瓜，到了北京就成了芝麻。西瓜、芝麻两样都是稀罕

作物，都要的。”说完他笑个不停。

陶铸也为自己的戏言发起笑来。

毛泽东说：“过罢新年，你到几个省、市去考察一下，去看一看运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还是老问题：‘糟得很？还是好得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亲自去望一望。几个省、市委第一书记要保呢，上海的陈、曹，云南的阎，江苏的渭清……凡是能保的都要保。要救人于水火呀！你代表中央去，讲话的作用会大些。”

陶铸的心激动不已，他恭敬地告辞了党的主席，忙整理了谈话记录，当即报了总理周恩来。

周恩来又慎重地请示了毛泽东：“具体地保哪些人，主席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毛泽东说：“我看，凡是受严重冲击的，都可以保。”

当天下午，在中央的会议上，周恩来正式宣布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并说：“主席的指示，现在就作为中央的决定。把主要工作安排一下，过了新年，陶铸同志就出发。”

但是，江青几个人，下了大决心，绝不能让陶铸出北京！

尖锐的矛盾，不都是正面、直接冲突。人的情绪、意识时时存在，处处流动，偶遇时机会爆发出电光石火，使局外人莫名其妙，这便是灵感。才能。

聪明人有百分之七十的机会，当即做出反应。笨蛋，百分之九十是事后追悔。

是在另一次会议上，谈到了当前社会秩序有些混乱，学生没有人管，终究不是办法。毛泽东同意派军队干部训练学生，实行军训，加强组织纪律性。正就这个题目议论下发通知的当中，江青突然以很大的嗓门说：“我有意见。你们总

是不让我说话，总不让我民主。”

大家都望着她。

“为什么不把贺龙揪出来？”江青打横，而且不让人插话，她说，“我有大堆的材料，非常确凿的，他是个大坏蛋！他要搞军事政变。要把贺龙端出来，你们不敢，我去触动他！我什么也不怕。他老婆也不是好人！”

与会者没人发言。这也是一种沉默，是十分复杂的沉默。

毛泽东说：“此事现在不议。”

江青不依，她半是发疯，半是故作天真姿态，语出所有人的意外，她转向毛泽东，说：“毛主席，不让群众起来，我要造你的反！”

在场的人从心里感到愤慨。

毛泽东觉得难堪。

全身的血已经涌到头顶的谭震林，怒视江青：“你岂有此理！毛主席是我们全党的主席，全国人民的主席，今天是中央会议的主席，在这里，你有什么权利胡闹？你是什么东西！”

江青被咽住了。别的人也都屏住了气。

“散会。”毛泽东在江青没有再泼之前，果断宣布，然后离席而去。

江青放声哭起来了。

大部分人都退出了会场。

陈伯达走到江青面前，劝她：“太悲要伤心的，制怒，制悲。你也太过了点！”

江青本来窝火，又一个灵机出现，她腾地站起，直对陈伯达：“你是个什么东西！还穿着军装！”江青伸手把陈伯达的领章撕了下来。

陈伯达好象被大棒击懵。他吃吃地说：“我瞧不起你！你听清了吗，我瞧不起你！”

江青反唇：“我也瞧不起你！”喊罢，又使劲提着脚后跟，走了。快到门口处，还回过头来重复了一句：“我就是瞧不起你！”那情绪已经变为得意、高兴了。

陈伯达用声音追击那远去的江青：“不是毛泽东，谁会把你放在眼里！乌鸦！”

（摘自《十年动乱》）

毛泽东性格之谜

埃德加·斯诺

(1937年·延安)

我到后不久，就见到毛泽东。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象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霎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几天里面，我总没有证实这一点机会。

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这一点——大概是对的。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我常常在想毛泽东自己对于武力、暴力以及“杀人的必要性”等问题的责任感。但我想他身上似乎没有什么可以称为宗教感情的东西，我相信他的判断都是根据理性和必要作出的。

理查德·尼克松

《1972·北京》

周陪我走进毛那摆满书籍的书房去会晤时，我记起了来

北京前几天在白宫的晚餐上马尔罗对我说的话：“你将同一个巨人——不过是一个面临死亡的巨人——打交道。”毛和我并没有进行谈判，他在估量我，我在估量他。

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在我进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不能很好地讲话，我看他这是中风造成的后果，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不过灰黄的肤色看上去却几乎象腊黄色的。他的面部是慈祥的，不过缺乏表情。他的双目是冷漠的，不过还可发出锐利的目光。他的双手好象不曾衰老，也不僵硬，而且还很柔软。毛完全被讨论吸引了。毛直爽、质朴、有棱角、洋溢着一种天生的吸引力。毛是政治局主席，即使在风烛残年也仍然是公认的领袖。

毛有一种谈吐随便而又深奥的风度（周则高度文明、彬彬有礼），这给人留下一个印象：他是一个胸中同时盘算着各种思想的人。他提出他的观点时，声调安祥平板，如果向大众演说，这种语调是不行的。

震颤性麻痹症的袭击使毛的动作全部僵化了。他的体态从来不曾优雅过。不过在八十二岁时，农民的拖沓大步已经变成一个缓缓的拖着脚步走的老人了。毛象年迈的丘吉尔一样，仍然是自豪的。我们结束会晤时，秘书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搀着他陪我走向门口，在电视灯光和摄象机要记录我们最后的握手时，他却推动了助手们，自己站在那里向我们告别。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1937年·延安）

在我到达延安并见到朱德将军的那同一个难忘的夜晚，我还有机会拜访了毛泽东，因为他总是白天睡觉夜间工作。深夜，我掀开悬挂在一座窑洞门口的棉门帘，跨进一个黑暗

的洞穴。在这一片暗黑的正中心，一座制作粗糙的桌子上点着一支细长的蜡烛，烛光落在成堆的书本和纸张上，涂抹着低矮的泥土窑顶，一个男子的形体，一手扶着桌子，站在那里：他，转向门口的面孔遮掩在阴影里，一身黑衣服上披着一件棉大衣。他站着的泥土地面比其余部分高出一块，使他的身高更加突出，为仅有的孤零零一支蜡烛所划破的黑暗给目前的场景增添了一种阴森的美——仿佛是一幅古画，有着几乎已被时间的风雨冲刷得模糊了的画面。

那高大的令人望而生畏的形体向我们缓缓移近，一种高腔调的语声对我表达欢迎之意，随后，一双手握住了我的手：那双手纤细、柔嫩、有如女人的手。他那副阴暗而难以测度的面孔呈长型，额头宽而高，嘴是富于女性美的。他也许还具有别的什么品质，但无疑个审美家。我确实对他身上的女性气质和那阴暗的环境产生过反感。一种本能的敌意在我的心头油然而起，而我一心急于控制这种情绪，以至他后来讲了些什么，我几乎是一句也没有听见。

尽管他具有女性气质，但是他象骡子一样倔强，有一种钢铁般的自傲和坚毅贯穿他的性格。我的印象是，他会等待和观望若干年，但是最终，将为所欲为。他的幽默常因含有讥消而显得冷峻，仿佛来源于精神孤高的深邃洞穴，我的印象是，他的灵魂里有扇从不向任何人敞开的门。

亨利·基辛格

(1973年·北京)

毛的住处很简朴，象一个中层官员的住宅似的，屋里放满了书，毛跟前的地上、小茶几上、靠墙的书架上、到处都是。毛说了几句风趣话，中国摄影师大拍其象。当我们朝着

沙发走去时，他说道：“我看来还不错吧，可是上帝给我发请柬哪。”这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无神论国家的领袖、唯物辩证大师居然谈起上帝来了，但不知怎么倒不使人觉得突兀。除了上帝老子，谁敢中断这位主席的伟业？尤其使人印象深刻的是，毛很随便而合乎实际地谈到他的统治行将告终的问题，暗示必须把需要他亲自过问的事情赶紧办完的意思。

正如他一年前与尼克松会晤时那样，毛接着谈笑风生地与我进行苏格拉底式的对话，用漫不经心的方式谈论重大问题……

究竟是毛鼓励了那些日后被叫做“四人帮”的人呢，还是那帮人钻了毛日益老朽的空子？大概两种情况都有一点。可见毛临死的时候还被他自己那个“革命”以及中国历史的难题和矛盾所缠绕。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1946年·延安）

紧挨着周围邻居的四个窑洞，就是毛主席的家。看到陆定一来做我们谈话的正式翻译，我很高兴。毛泽东身材魁梧，毫不拘束。举止象美国中西部的农民，缓慢、有力而从容。他那略带扁平的圆脸上，有一种平静而含蓄的表情，微笑起来就变得生动而幽默了。在乱蓬蓬的浓密黑发下，高大的前额和敏锐的眼睛表明他的思想活跃，富有洞察力，没有什么能逃过他的注意。一种高深而又具有灵活性的理智支配着他，使他生气勃勃。

他身穿一套普通的深蓝色布制服装，态度不慌不忙，沉着而友好。

毛直率的谈吐，渊博的知识，和诗一般的比喻，使他的谈话成为一次我所经历的最为鼓舞人心的谈话。我从未遇见过有人使用如此鲜明而又充满诗意的比喻。

（摘自《女友》1988年总2期）

毛泽东喝药论英雄

戴维·艾森豪威尔乘坐着“红旗”轿车驶进中南海新华门的时候，看见警察向大街上其他车辆猛烈地挥手，命令它们止步。雄纠纠的门卫行持枪礼。他看了妻子朱莉·尼克松一眼。他们在黑暗中微笑。哦，不会错了，不折不扣的元首待遇。

中国通基辛格说，永远开着的新华门其实是永远闭着的，只有元首或准元首才有资格从这里进中南海。

这一对小夫妻的体内流着两位大总统的血。但他们是平民。他们甚至认为自比平民低一级。因为，当今世界，总统的孩子几乎毫无可能再做总统。

然而，来到中国，他们与爸爸们平起平坐了。中国对他们的态度热得烫死人。他们曾怀疑过这种热情的纯洁性。不过，怀疑很快溜了。他们被告知，毛泽东主席要见他们，毛主席的接见是一种礼遇的象征。有些外国人虽贵为元首也未必能得到这份荣耀。不是听说曾有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总理抹着眼泪离开北京吗？真惨。瞧我们，如些堂皇地进入新华门，把无限的体面留在长安街上。

戴维又一次笑了，并出了声。朱莉听得出来，这笑是凉的。

美国人最难侍候，常常给脸不要。你的圣殿在他那儿可能是废墟。戴维被宠得这么厉害，偏不动心，脑子里竟还有不健康的想法呢。

他在想接见时的照象。那当儿，照象必不可少。中国人

在这方面灵气十足。在他们发表的与外国人会见的照片上，你永远能发现一种上下级关系。外国领导人对中国领导人恭敬到家了，简直象……象朝拜。举中美关系史上那张历史性照片为例：岳父尼克松总统走下飞机舷梯，急急扑向等候在那里的周恩来总理。岳父脸上笑开了一朵花，胳膊伸得长得不能再长。周恩来一点反应也没有，山一样地站着。他没笑却让人感觉到他在笑。好功夫！戴维直直地觉得岳父再走一步就该跪下了。

政治家为了政治有时候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叫人看轻呀。我不是政治家，绝对做不出那副嘴脸。就是见了上帝，我也得挺起那美利坚的胸脯。脸必须绷起来。笑容装进口袋。

车灯割开黑暗。星星和路灯在南海里游泳。再向前，便是中海。海纯粹是号称，其实不过是小湖而已。然而，把小说成大，多么浪漫。

海边的一决空地上，灯很亮。很多人坐着，一看就知道是士兵，因为整齐得象豆腐块。他们都挺胸昂头。虽然车窗关着，仍有一个男中音挤进来。

戴维问坐在身边的翻译：

“这些人在做什么？”

“听广播。”

难怪那声音有点变形。

这么晚了，外面又冷……”戴维嘟囔着，“广播很重要？”

“正在广播毛主席的两首诗。第一次发表。”

“毛主席新写的诗？”

“1965年写的。”

今天是1976年1月1日。

当戴维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竟微微涌上来一股心酸的感觉。他的客厅里很暗。有人影，但几乎完全锁在黑暗中。随着戴维的走近，一些灯相继打开，他便毫无遮拦地呈现在客人面前。他显得那么苍老，比他的年龄苍老十分，比人们的想象苍老二十分。他的头向后仰着靠在沙发上。头发有些乱。嘴张着，还在动，但动得一点也不生动，仿佛艰难地吞食着空气。

戴维快走到他身边了，一个女护士用手去梳平他的头发。

美国人谈到他时，很爱使用一个字眼：巨人。尽管他们不那么尊重他，但绝对把他看成一位巨人。砸碎一个世界的人就可以称为巨人。他砸碎了，而且相当彻底。可现在，巨人垂垂老矣，连头发都要别人替他抚平。

他们握手。戴维的心一动。他的手不老，很光滑，很温暖，很柔软，甚至有点过份柔软了。

这就是那只曾经握住中国历史以及差点握住亚洲历史的手吗？

戴维凝视着他。他依旧坐在沙发里，因而这种凝视就变成居高临下的了。极少有人能从这个角度看他。其实，从这个角度看他，能发现他作为一个人的全部聪明才智。戴维此刻正有这种感觉。他面孔的上半部是智慧的。前额宽阔而平坦，夸张地说，不仅能跑马，能跑汽车呢。耳朵很大，紧贴在头上，耳垂薄薄的，这种形状本身对那些想朝里面灌谎话的人就是莫大威胁。眼睛里有火。确切说，是有过火。今天，火将尽了，但痕迹犹在。不用说，当这火年轻时，很少有人看见了能不震颤的。

显然是戴维的凝视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开了口：“你在

看什么？”

这声音令戴维一惊。吐字清晰，底气虽不足，也算中等上，与他的老态十分不协调。

“我在看您的脸。”戴维说，“您的上半部很……很出色。”

听完译员的翻译，他说：

“我生着一副大中华脸孔。”

思维也不老。戴维觉得这话挺有趣，想笑，但忍住了。自他来到客厅，故意让脸阴着。迎面有一大排记者，个个手里拿着家伙，似与他对垒，却很少有人动作。

他又说：

“中国人的脸孔，演戏最好，世界第一。中国人什么戏都演得。美国戏，苏联戏，法国戏。因为我们鼻子扁。外国人就不成了，他们演不了中国戏，他们鼻子太高了。演中国戏又不能把鼻子锯了去！”

戴维终于控制不住自己，脸放晴了。照象机快门声炒豆般地响成一团。霎间，一片白。

但戴维的心马上下又抽紧了。他见到的是一副多么矛盾的景象啊。他从未见过这种景象：躯体几乎不属于自己了，可思想依然那么锋利，锋利得能刺人。这一定令他痛苦。也令别人痛苦。

他们在他身边坐下。朱莉·尼克松拿出一封信递给他：

“我爸爸给您的。”

六年前，就在这间客厅里，朱莉的爸爸和他共同把历史撕下了一页。

“总统先生的腿怎样了？”他问。

“好多了。”

“好好保养他的腿。他说过还要爬长城呢。把这话转告

总统先生。”

戴维插进来：

“他已经不是总统了。”

尼克松到了八辈子霉。他手下的人在反对党的竞选总部——水门饭店安了两卷录音带搞窃听，竟一下惹恼了全美国。几天前他们刚刚选他上台，几天后又轰他下台。脾气发的真大，仿佛尼克松宰了他们的父亲。

“我乐意这么叫他，”他说，“你管得着？”

戴维无语。这话含着温情。这温情属于东方。

“不就是两卷录音带吗？”他接着说，“有什么了不起？当你手中刚好有一台录音机的时候，录下一次谈话有什么错？谁让你们美国有那样多录音机！”

为了美国，不能同意这话。戴维说：

“这个问题很复杂，关系到西方的政治……”

“西方政治？那是假的。”

为什么不？简直假死了。也弱脆死了。两卷录音带就能把一个帝国搅得天翻地覆，不是纸糊的是什么？甚至是卫生级糊的。在东方人眼里，西方政治带着一股奶味。他们对水门事件的看法一致得就象商量过似的。英迪拉·甘地说：“为几卷录音带大吵大闹，值得吗？”萨达特说：“大惊小怪，统治者难道不充许进行统治？”

戴维耸耸肩。明知说也没用，干脆退却。

他不退却，对朱莉说：

“马上写封信给你爸爸，说我想念他。”

仍是温情？怎么味道不对？变质了？

“我这句话，可以登报。”他补充道。

戴维的眉毛不易察觉地抖了一下。这句话不是说给一个

人听的了，而是说给两亿人听的。那不是普通的两亿人，那是两亿座火山。

“现在，在美国，”戴维沉吟道，“反对我岳父的人很多。还有人强烈要求审判他。”

“好，”他说，“我马上邀请他到中国来访问。”他略加重语气：“马上。”

戴维脸拉长了。他觉得自己被这句话伤了——作为美国人，而不是作为前总统的女婿。

他又转向朱莉：

“信里再加一笔，我等待他父亲再次来中国。”

戴维把嘴紧咬着，为的是不让一句热腾腾的话进出来：“如果白宫邀请已经下台的刘少奇主席到美国进行友好访问，你们会作何感想？”他把这句话杀死在肚子里。水门丑闻也不能留着，扔进废纸篓，转话题。

“刚才在来的路上，我们看见很多人在听广播，”戴维说，“在听您新发表的两首诗。”

“那是我六五年写的。”

“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您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诗人。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您首先是诗人。在延安时，您同她谈过诗。有一句话给她印象太深了。那句话，您是指着自己鼻子说的。您记得您说的什么？”

他笑了。

几乎是40年前，他站在陕北黄色的高原上对斯特朗说：“谁说我们这儿没有创造性的诗人？”他指着自己，声音提高了一倍：“这儿就有一个！”

此刻，他脸上浮出沉思的神情，喃喃道：

“这儿就有一个。”

戴维看见他举起右手。显然他想重复40年前那个豪迈的动作。但他的手只抬到胸口就跌下去了。又抬起，又跌下，接着痉挛般抽搐起来。戴维明白，他已经不具备那种力量了。当年的豪情，不曾减少分毫。可仅仅是豪情了。

“您的诗有很多读者，”戴维说，“但相比之下，您的著作读者更多。因为您的著作印了几十亿册。”戴维想说，“比圣经印得还多。”但斟酌一下，改了口：“是地球上印得最多的书。”

“我的那些书没什么好读的。”他说，“我在里头写的没什么教育意义。”

“你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并改变了世界。”

“改变世界？”他笑了，“不可能。我没有那个能力。你瞧，”他朝沙发右侧唠唠嘴，那儿摆着一个地球仪。“地球那么大，大得象个西瓜，怎么改变得了？”可他脸上分明带着一种切西瓜的痛快神情。“我只不过改变了北京附近很少的地方。”

戴维笑了。

“说得好。”

他突然问戴维：

“你们吃中国菜习惯吗？”

“不习惯。基辛格说，美国人一吃中国菜，肠胃功能就不正常。”

“我的肠胃功能也常常不正常，尤其是在北京。”他顿了顿，“只有在战争中，我的肠胃功能最正常。”

“可惜中国不会再有战争了。”

他提高声音问：

“为什么？”

戴维一时语塞。为什么？因为中国在核大国中排行老三？因为中国全民皆兵，举目一片国防绿？因为中国有一位不让成吉思汗的统帅，而他的肠胃功能在战争中又最正常？

“因为中国人爱好和平。”戴维为自己得体的回答感到高兴。

“谁说中国人爱好和平？”他的语调突然变得咄咄逼人。

“那是瞎说。事实上，中国人很好斗。”他显然觉得意犹未尽，补充道，“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和谁斗呢？”

“不打仗，也有敌人。各式各样的敌人。”

“按我的理解，您说的敌人是指右派，是这样吗？”

他向戴维送来一瞥，笑笑，笑得很神秘。

“不，错了。恰恰相反，我喜欢右派。你岳父算右派吧？在上次美国大选期间，我投了你岳父的票。戴高乐是右派，希思首相也是右派，我喜欢他们。将来我还要投他们的票。”

一个女护士走进来，把一个托盘放在他身边的茶几上，盘里有一杯黑色的水和几粒药片。戴维知道那黑水定是名声很亮的中药。女护士把药片放进他嘴里，然后端起黑水送到他唇边。他呷了一口，皱眉，显然极苦。女护士毫无表情地保持着原有的动作。他呷第二口，微微一动，中药溢出来一些，他胸前顿时湿一片。女护士的脸沉下来，嘟囔了一句什么，音调是不耐烦的。他苦笑。

戴维立即对女护士产生了的敌意。无论怎么说，这个人 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高山中的一座。他为中国人赚的东西下辈子也受用不完。自从蒙古铁骑横扫欧陆以来，他使中国第二次影响世界。即使是他的敌人，也十二分地尊敬他。你算哪

棵葱？

戴维的神情，似乎被他察觉了。他对护士说：

“你去吧。我自己喝。”

“一定要喝。”

他点头，几乎是顺从地。

护士走了。他抓住杯子。他的手抖得厉害。仿佛抓着一块冰。戴维屏住呼吸注视他。刚才他的手空着才举到胸口。现在距离乘一倍，又负重，如何可能？

他手握杯子，不动作。戴维觉得他在积蓄力量，象举重运动员那样，为的是全力一击。他脸上显出一种坚决的神色：眼眼眯虚起来。嘴紧抿着，嘴唇薄似刀片。从这种神色中你可以看到他昔日的雄风，历史不止一次在他这种神色中打摆子。

他把杯子举起来了，晃动，好剧烈。要坠毁。稳住。再晃动。再稳住。那只手在挣扎。客厅里静死了，让人心里慌慌的。渐渐，他脸白了。戴维脸也白了。他举的什么？一杯药？绝不是。那是一大杯信念和力量。这要用掉他多少气力？这气力是他用自己发黄的生命交换来的。

战士。戴维暗暗道：战士。事后他对别人说：“那一刻，这个字眼猛从我心里跳出。不管我对他怀有何种成见，此情此景，使我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战士。一个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

他把药喝光了。戴维觉得，这是一种完成，或是一种完善。从他脸上马上就能看到惠灵顿式的笑容。不幸，不是这样的。

他深深地望着空杯子，目光竟是伤感的。

“我老了。我的负担太重了。”

你的心仍然年轻。”戴维说。

他仿佛根本没听见戴维的话，让目光僵着，许久。喃喃道。

“一个人如果负担太重的话，死是最好的解脱办法。”
空气站住不动了。戴维连忙挑轻松的话说。

“我岳父让我转告一句话：他希望能在美国见到你。”

“美国？”他轻轻说，把脸转向沙发右侧。地球仪显得又沉着又含蓄。而对他的的是世界最大的孤岛澳大利亚。“我不想去澳大利亚，我想去美国。”他说，“澳大利亚在地图上看看就怪让人寂寞的。”

翻译转动地球仪，美利坚来了，来得风风火火的。这个国家骨头里都透着得意。看到它，你就会感到上帝的偏心。他望着。

“40多年前，您对埃德加·斯诺说过，”戴维说，“您渴望去美国旅行，特别渴望去加利福尼亚。”

“加利福尼亚让人感到亲切。”他说，目光没移开。
“因为离中国最近？”

“为什么您不找个机会去看看呢？”

当年斯诺也提过相同的问题。那时，他答：“在我看到中国更多的地方以前绝不去外国旅行。”然后他补充道，“中国和苏联一样，本身就是一个世界。”

现在他答：

“到美国去要坐飞机。他们不让我坐飞机。”

戴维觉得他语气中透着一缕悲哀。

“如果我没有记错，”戴维说，“您一生中只出过两次国，而且都是去苏联。”他咽回了后面一句话：“两次都是坐火车去的。”

他点头。

戴维说：“美国比苏联好玩多了，您真应该去。”

他继续望着地球仪，无言。美国是耐看的。无论何时，

从地图上或地球仪上看，她总给人一种赤身裸体的感觉。

半晌，他缓缓开口：

“不会再有这个机会了。”

分明是叹息。他的眼睛，他的神态，乃至他的身体，都在说，是叹息。他的头微微低垂，一绺老极了的头发耸拉下来盖住了耳朵。

翻译用眼睛向戴维示意，该结束了。戴维和朱莉站起来向他辞别。他们热烈地说着一分钱就足以买两箩筐的赞美话。典型的美国佬。他显然非常熟悉这些语言，完全不为所动。他的一只眼睛几乎是闭着的。他吝啬得不仅不吐一字，甚至头也不点。

戴维最后一句话是脉脉含情的：

“祝您健康长寿。”

他的眼睛突然睁开了。一脸警惕的颜色。

“这是什么意思？”

但他很快又闭眼了。他面前这两张白色的面孔毫不故作。

他坚持要亲自送戴维夫妇到门口。他被搀扶着，一脚深一脚浅地前进。

“我不会送给你们什么东西，”他对戴维说，“因为我无求于你们美国。在并安时，我们有求于苏联，斯大林天天给我们送吃的穿的和用的，可我只给他送过一次东西。是一包红辣椒。他送的枪炮和物资，都是工人农民生产的。我送的红辣椒，却是我亲手种的。我们打了个平手。”

戴维想，今天也是个平手。

“红旗”轿车沿着南海奔驰。戴维默默坐着。朱莉问：

“你对他有什么印象？”

戴维足有五分钟不开口。“红旗”来到长安街了，戴维说：

“十里之外，就可以呼吸到他的个性。”

（摘自《南风窗》1988年6期）

病中吟与村妇泪

今日——1975年12月26日，他的第82个生日，应该称为他的诞辰，荣寿华诞。

他居于中南海丰泽园内——围墙中的围墙，禁苑中的禁苑，前有颐年堂是会议室；后有菊香书屋是书房办公室兼卧室。虽是冬季，但屋内温度仍保持在25摄氏度以上，因为人愈老愈病愈怕寒。

他久病，由肺气肿转为肺心病，喘息、咳嗽、吐痰，这是起自他长期大量吸烟造成的恶果；他虽戒过多次烟，始终未戒掉过。他在卧室内，还有医生护士出入，送药、诊脉、试体温。偏午之后，遗孤新贵毛远新引着风云人物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大模大样地来过，但见他在床上睡着，使都同样穿着兔绒鞋似地悄悄溜去了。此时此地，还有谁能来这儿呢？

他睡着，呻吟着，呓语着，他神魂交感地睁眼闭眼，半醒半睡，模糊间听见有一个站在身前的警卫干部的轻声语音：

“报告主席。”

“……说……说……吧……”

“有个农村妇女要见您，非要见您不可！她说，她是给主席送寿礼的。”

“不收礼嘛……”

“我们也是这样说的。”

“你再、去说，我谢、谢她，她……让她走吧……”

警卫干部去而复转，再站在他身前说：“不管我们怎么说，她坚决不走！她说，奉她父命遗嘱，来见主席的……”

“她父、亲是……是，谁？”

“她父亲是过去的西柏坡老支部书记，现在死了两年了；不，三四年了吧。”

“怎么……死、死的？”

“她说，是造反派打死的。”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你们对她呢？”

“我们只能劝说她走呗！”

“她呢？”

“她要放火烧死，也就是引火自焚！”

他一听一怔，一鼓作气坐起，睁大了眼睛，他醒了，完全醒了。

“你们见死，不救吗！”

“救了……我们让她进了门房，询问过她。”她说：1948年的今天，她代她的父亲——西柏坡的老支书，一大早送寿礼给主席。第二年建国，主席派车接过她上天安门城楼看国庆焰火，那时，她小名叫小樱，小——樱！”

“好了！我想起她了……我记、记得。你们去叫他快进来见我。你回来，要有尊重的礼貌……你说，我请她呢……去吧，去吧！”

当小樱走进来时，只见她面黄肌瘦，额纹深深，两腮瘪瘪。她火口余生，带着一股呛鼻的汽油味儿，搭着一条破的烧残围巾，披着满头蓬乱焦曲的毛发，穿着一身破旧褴褛的棉裤。

他怎么也认不得她就是27年前的小樱了！

她一进门，一看见他，一声未吭，便一跪跪在地上，站

不起来了。直到他去拉她的时候，她才放声嚎啕恸哭起来了。他望望她，颜面抽搐，眼圈发红发湿，不胜今昔之感。感慨，又感叹：“这……这么、多、多年了……这么多多年了，你怎么、不、不来……来看我呢？这么多年了，你生……活、生活可好吗？”

“不好……”

“你们全村人呢？”

“哪里的全村人？”

“西柏坡嘛！”

“我早已不在西柏坡村了……”

“为什么？”

“因为家穷、穷……早把我嫁到外地去了。”

“哪个地方？”

“延庆县的一个小村。”

“不管西柏坡村，还是延庆县村，我问的是农、农民的生活……你怎么，不、不说话了？”

“我不敢说……话……”

“为什么？”

“人家私下说，毛主席变了，脾气大了……人家都不敢说话了，都不敢说话了。”

“那你，怎么还敢来，来看我？”

“我是受我父临终之托，叫我一定来看您，我自己也想来看看您，老早想来看看您了……说说话，我就走了……可是，我看见您，又不敢说了。”

“你说吧……说真话……说实话！不管说什么话，我都不、怪、怪你。老人不见，小人之怪！”

“那我就说！我说农村生活不好，很不好！”

“公社成立这么久了，生活没有改善？”

“没有改善！”

“你再，说一遍！”

“没有改善！没有改善！”

“可是，可是，我听的我看的，大不相同，完全相、相反！”

您听的看的，是假汇报，瞎宣传……”

他的神态声色骤变了，冲动激愤起来。双拳捶胸了，他更加喘息急促，更厉害地咳嗽吐痰了。他长吁长叹，头一仰，倒在了床上，挺了颈，合上了眼，近似弥留之际，昏迷之兆了。

她被吓呆——颤栗，惊悸，不知所措：“毛主席，醒醒！毛主席，醒醒！”

“……我没……没睡，我没……没睡……”显然，经过此番波动震动，他感觉太疲倦。他需要休息，也需要深思——在安息中深思，在深思中安息。

她呢，她无可奈何了。“我……我走吧？”

“不……不……你讲……你讲……”

“我没讲的了……我走了……走了……”

“小樱——小樱”！

喊话声音进来，随着进来的是江青。他被她喊话的声音惊开惺松的睡眠，一看是江青，便又把双目紧闭，紧紧凛凛，

她一瞥他，也未加理睬，仿佛未见着他似的。小樱起，向她行了个礼，只见她穿了一身高贵的戎装，一双闪光发亮的筒长到膝盖的大黑皮靴，目光灼灼，神态自恃，好不威风人也。

“阿姨……不，不……首长，首长。”

“我可不敢当，不敢当，你阿姨不过是一名文化大革命的流动哨！说真话，听说你这位稀客来了，我才来了！不然的话，我也不敢随便来呢……这些年不见了，你的生活好吗？”

“……好……好得很！”

“是啊，全国人民生活都好，你当然也不会例外嘛，你说是吗？”

“……是，是。”

“坐下，坐下，咱们都坐下，坐下说话嘛！”

“不，我该走了。”

“干嘛？我一来，你就要走？”

“我跟主席早说过了，我该走了。”

此刻，他蓦地睁开眼睛，睁大了眼睛，发辉发光，烁烁熠熠……他醒了，苏醒了，清醒了。他伸出手，拉住小樱的手：“不、不走，吃饭、留宿、歇息……明天，派车……送你回家……”

她听到这感人肺腑之声，憋不住心中的隐情、热情和激情，潜流涌了出来，哇的一声又哭起来了。

“……不，不，感谢……感谢毛主席……”

他却喊来了警卫干部，要他去通知准备客饭客房。随后，他又倾全力加重语气补充了一句：“优待客房——”

“是！有贵宾客房。客饭也不必准备了，今晚为主席设有寿宴。”

“噢！你不说我。倒忘、忘了。今日……今日是我的生日，好吧！好吧……小樱，今晚，你与我同桌……同饮……”

“不……不……”

“怎么？”

“我……怕……”

“怕？既不怕自焚，还怕什么？什么……”

“住下来，不是把我扣下吧？”

“你放心！……谁敢动你、一根毛发……我就敢动她、一颗脑袋！现在……我还有这点、发言权吧？”

“不……不……”

“你听我的话，我明天还要与你谈话呢……”

“不！”

“不？”

“……”

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光芒万丈；一缕残阳向西落去，黯然失明失色，一代伟大史诗，一折临终悲剧。

（摘自《广州青年报》）

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

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八八级学生。他喜欢历史。他说他对中国和世界现代史尤感兴趣，今后如果不从政，便研究历史。

他正在写一本《乞丐皇帝》，是有关朱元璋的。已阅读了一些明史资料，写了一万多字，他计划从明清一直写到唐朝。

毛新宇那方正的脸盘，宽阔的额头和眉宇，与毛泽东很有几分相象；而细长的富有英气的眼睛，则酷似他的伯父毛岸英。

毛新宇为人忠实厚道，性格随和开朗。他今年18岁，体重将近100公斤。然而，他那总是笑眯眯的胖乎乎的脸膛，和待人处事的单纯、天真劲儿，又使人觉得是个可爱的“小家伙”。同学们都很喜欢他，爱护他。

毛新宇生于1970年1月17日。那时毛泽东在江青等阴谋家的包围、封锁之下，他已失去了同家人和亲友正常生活的自由。毛新宇虽然有6年零8个月同自己的爷爷呼吸在同一片蓝天下，但祖孙见面的机会却不多，以至连一张象样的合影照片也没留下。

然而，这也不能妨碍新宇对爷爷的崇敬。爷爷毕竟留下了丰富的著作。他认真地读过，虽然不能全懂。当然，毛新宇从周围听到的不全是对爷爷的崇敬和赞扬。对毛泽东主席晚年的缺点、错误及其影响，同学们常有尖刻的议论。

他们并不回避新宇，甚至乐于同他探讨。而新宇也乐于参加。课本里有毛泽东和其他领袖人物的文章，他发现同学们特别喜欢爷爷的文风，称赞它犀利、幽默、明快，他听了特别高兴。

有一次，一位女同学象个大姐姐似地勉励他好好学习，要对得起毛主席，还说将来要找一个好媳妇，说得小新宇脸都红了。最后，他忍不住向这位老练的“大姐姐”，提了一个埋在心底很久的问题：“你说，过多少年以后，人们会不会把我爷爷的功绩都忘掉？”“不会。”那同学很肯定地说，“毛主席的伟大功绩是抹不掉的。”

在所有课程之中，毛新宇对历史兴趣最大，成绩也最好。他还特别喜欢看古典小说、历史剧和古典诗词。

一天下午，记者来到毛岸青夫妇的住处。毛新宇兴冲冲地从学校回来，他顺手把交学费剩下的块把零钱丢给妈妈。邵华同志笑着对记者说：“瞧，还是那样，口袋里不留钱。”

（摘自《今晚报》）

M

ISBN 7-5036-0411-5 D·352

定价：4.00元

